

普希金的《现代人》杂志研究

耿海英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普希金于1836年创办《现代人》并主编4期。杂志内容不仅具有多样性,同时,其混合内容的协调性和目的性使《现代人》具有了特别的意味——在严苛的书刊检查下,普希金以巧妙的内容编排,曲折地关注当时的社会问题: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民族和农民问题,殖民与平等问题等。这些连续的相辅相成的主题证明了办刊者缜密的思考,体现了在当时出版物普遍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文化生态中,其坚持严肃文学的办刊立场。普希金的《现代人》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反应时事的敏捷性,题材的多样性,都被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所继承。

关键词:普希金;《现代人》杂志;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01-08

《现代人》是普希金于1836年在圣彼得堡创办的一份文学杂志,从1836年至1866年前后历时30年;其间三易其手,经历了普希金(1836)、普列特尼约夫(1838—1846)、涅克拉索夫(1847—1866)三任主编,发表过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丘特切夫、果戈理、伊·屠格涅夫、赫尔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格利戈罗维奇、鲍特金、安年科夫、谢德林等众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论坛,在19世纪中期成为俄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鉴于篇幅,该文仅研究普希金的《现代人》。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大诗人,还是热忱的新闻人、出版人和编辑。在他独立出版《现代人》杂志之前,就曾参与俄国《北方之花》《文学报》的工作,为其后来主编《现代人》杂志奠定了基础。

一、普希金与《北方之花》和《文学报》

1824年12月下旬,安·安·杰利维格和奥·米·索莫夫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不定期集刊《北方之花》(1825—1832,普希金主编和出版1832年号丛刊),刊物分为《诗歌》和《散文》两个栏目,其作者形

成了一个固定的圈子,有安·杰利维格,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维亚泽姆斯基,德·达什克夫,伊·科兹洛夫,巴拉津斯基,费·格林卡,彼·普列特尼约夫,阿·伊斯梅洛夫,尼·奥斯托洛波夫,玛·达尔戈梅日斯卡娅,瓦·图曼斯基,费·图曼斯基,瓦·格里戈利耶夫,米·扎戈尔斯基,普·奥博多夫斯基,阿·沃耶伊科夫等。从这个圈子中,我们可窥视到那个“黄金时代”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圈子里产生了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想法,期望文学能审视时代的社会问题,涉足政论和社会批评。这个倡议人就是普希金。这个想法立即获得了圈子其他成员的支持。因此,《文学报》的诞生完全是普希金促成的。

《文学报》1830年1月1日开始发行,五天一期,主编和出版人依然是《北方之花》的杰利维格,外加他的助手——文学家、新闻人索莫夫和编辑部秘书弗·夏斯内,三人承担编辑工作。秘书除了技术性工作,还从事翻译和转载科技文章。新闻检查机关只批准了新报纸的文学性质,政治板块则没有通过。普希金为报纸奔走争取完全独立的权利,请求放宽限制,允许开辟其他板块,但他所有的努力都落空。尽管政治栏目不被允许,但报纸出版伊始就

收稿日期:2016-12-10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俄罗斯宗教哲学教学、研究和翻译近30年。

表露了自己的立场和情绪,从第一期起就带上了自己的政治倾向,例如对刚刚过去的土耳其战争(1828—1829)的回忆不是在《万岁—爱国主义》的文中,而是在人类的残酷和不义的观点中流露出来,这与官方的立场及给沙皇和俄罗斯军队唱赞歌的官方出版物相悖。这样,它以其发表的作品区别于趋于保守和主张“纯艺术(无涉政治)”的刊物,如布尔加林的报纸《北方蜜蜂》(1825—1865),米·彼·波戈金的杂志《莫斯科新闻》(1827—1830)和尼·阿·波列伏伊的杂志《莫斯科电讯》(1825—1834)。

关于报纸的目的,编辑部声明:“该报的目的在于,给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介绍最新的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1]5}报纸在强调自己的文学性质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的主要对象是针对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同时声明:“报纸将不给谩骂式批评以版面;对于批评家们,将不以个人关系,而是本着有利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满怀感激地接纳进《文学报》……而一切合乎报纸目的的文章都将不胜感激地予以采用。”^{[1]5}关于供稿作者,编辑部在自己的公告中说道:“六年来那些在《北方之花》上发表自己作品的作者都会经常为《文学报》撰稿(当然,两位杂志出版人,忙于自己的刊物,将不成为该报的撰稿人)。”^{[1]5}这两位先生指的是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在《北方之花》所有撰稿人中唯有他们两位拥有自己的刊物。这样,《文学报》立即就将自己置于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和格列奇的《祖国之子》(1812—1852)的对立面了。

《文学报》主编杰利维格编了两期之后,就因事暂时离开彼得堡而把报纸交给了普希金两个月,因而普希金成为接下来的十期的实际主编,他和索莫夫一起出版了第3—12期。《文学报》辟有散文、诗歌、国内外图书、学术资讯、杂俎五个栏目。诗歌板块允许普希金畅通无阻地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报纸第一期就刊登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八章片段。诗歌栏目还发表过主编杰利维格本人的诗歌以及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基、费·尼·格林卡、阿·瓦·科利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外,报纸还匿名发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阿·阿·别斯图热夫和维·卡·曲谢尔贝克尔的作品。散文部分给读者提供了各类作家的文章。这里发表了俄国著名的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例如阿·阿·沙霍夫斯科伊的《斯摩陵斯克人在1611年》,果戈理最早的作品也发表在这里,以及司各特、霍夫曼、蒂克、雨果等的译本。散文作家中还有安·波戈列利斯基,安·波多林斯基,

尼·斯坦凯维奇,阿·霍米亚科夫等。批评部分聚集了俄国当时最卓越的作者和思想家,他们毫不留情地解剖和评析当时那些最主要的作品,发表了巴·阿·卡捷宁、维亚泽姆斯基、普希金的评论、随笔、观察。作者中还有索莫夫、瓦·柳比奇—罗曼诺夫斯基(历史学家、文学家、果戈理的中学同学),甚至有流放中的维·卡·曲谢尔贝克尔(其《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思考》)等。普希金也积极投入图书栏目的工作。1830年他在《文学报》上发表20多篇文章、评论、论争性杂文,还有十多篇完成但未及发表。在学术资讯栏目经常发表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短文。杂俎栏目提供各种文学的和接近文学的文章,包括发表过亚当·密支凯维奇的书信选,回忆艺术家、回忆拿破仑和若泽芬娜的文章。

作为反对派的活动,在当时沙皇专制制度下当然不可能持续太久。报纸在第一期就刊登了冯维辛的翻译作品,他的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打压;也发表了十二月党人匿名的作品。1830年8月,杰利维格因《文学报》上出现过法国革命歌曲的词句而受到申斥,10月在第61期上引用了卡·杰拉韦温献给1830年七月革命牺牲者纪念碑揭幕的四行诗。而与此同时,《北方蜜蜂》的出版人布尔加林的创作不止一次地遭到《文学报》有根据的攻击和嘲笑,因而他恼怒《文学报》,指责其政治不正确,因而《文学报》引起第三厅将军阿·赫·本肯多夫将军的注意,结果《文学报》的整个工作都被置于第三厅的监控之下。作为回应,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讽刺诗和小品文,揭露布尔加林就如同为本肯多夫的机关服务的代办和特务。《北方蜜蜂》对普希金展开公开整治,两个刊物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于是1830年10月所引用的卡·杰拉韦温的四行诗就招致了《文学报》不可避免的厄运,杰利维格被免去报纸编审职务,报纸的出版被迫停止。本肯多夫愤怒地以流放西伯利亚威胁报纸的主要作者和编辑杰利维格、普希金和维亚泽姆斯基。杰利维格据理力争,最终《文学报》重获出版,但是主编被更换为索莫夫。而被此事震动的杰利维格很快就病倒了,并于1831年1月14日病逝,享年33岁。报纸又持续了不久,到1831年6月30日停刊。

《文学报》总共出版了一年半,对于一份报纸来讲实在是太短暂了,而且在同时代人中并没有广泛的受众和太高的知名度,仅限于社会很小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但是,它对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性政论的发展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和重要阶段。

1831年1月杰利维格病逝后,他坚持多年的

《北方之花》也在一月刚出版不久^①。为了纪念诗人,他的朋友们决定再出一集“1832年号”。普希金主持并编辑了该期,发表了杰利维格生前未被发表的作品及朋友们悼念诗人的作品。

二、普希金的《现代人》

普希金早就希望获得许可,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它应该是一份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和主题的新型杂志,以区别于当时刊物中已经非常明显的“商业倾向”。这就是后来的《现代人》。然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并不容易。早在1824年时,他就给维亚泽姆斯基写信说:“你所说的关于杂志的事情,早就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2]96}但那时从首都被驱逐出来的普希金^②和处于秘密监视中的维亚泽姆斯基,没有可能出版一份杂志,所以当杰利维格着手办《北方之花》时,他竭尽全力支持,慷慨地提供自己的许多诗歌作品^③,这些作品很快就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经典作品。但是集刊,在普希金看来无法代替杂志或报纸。1826年,普希金结束流放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他就和莫斯科欲意出版《莫斯科新闻》的文学界朋友商谈,希望全权管理这份刊物。1826年11月,他给维亚泽姆斯基写道:“也许,不是波戈金,而是我,将成为新杂志的主人。”^{[2]304-305}但是,莫斯科圈子是极其坚硬难啃的“桃核”,这使得普希金慢慢失去了对《莫斯科新闻》的兴趣。正如我们前文指出的那样,他后来积极参与了《文学报》的事业。《文学报》停刊后,他就又开始忙于出版自己的报纸。1832年他获得了许可,但是阴差阳错,现实条件并没有让他顺利实施:1832年初,伊·瓦·基里耶夫斯基的杂志《欧洲人》第二期被禁^④,原本在上面应该刊登普希金的作者名单。1832—1833年,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一再向政府递交出版刊物的申请方案,都无果而终。同时,报刊业越来越成为并不太干净的盈利途径,布尔加林和格列奇步步高升,他们的报纸《北方蜜蜂》灵敏地感应和捕捉政府在文学领域哪怕最小的政策变动。“百科全书式”的杂志《读者文库》1834年开始出版,其主编奥·伊·先科夫斯基事业的惊人成就证明,这位机智的、有时肆无忌惮的主编能准确无误地猜中社会需求。后来的“大型”杂志如《祖国纪事》等都借鉴了他的经验。但是《读者文库》的作用不仅仅是正面影响,它是最早预示了“大众”文化的杂志之一。普希金圈子的作家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正是《读者文库》的这一副作用。普希金希望打破布尔加林、格列奇、先科夫斯基的“报刊三寡头”的垄断及商业倾向,坚持不懈地争取办自己的刊物。1835年12月31日,他给本肯

多夫写信请求允许来年出版“四卷纯文学(诸如中篇小说,诗歌之类)、历史、学术,以及批评分析国内外文学作品的文集,就像英语季刊《观察》一样”。^{[3]69}尼古拉一世准许了“上述定期刊物”,1836年1月普希金获得了官方许可。终于,最大的外部障碍排除了,然而,另一些外部阻力接踵而至。

普希金要出版杂志的消息在出版界引起了不小骚动。对《现代人》的围攻甚至在杂志还没有到达读者手里时就开始了,手段五花八门。《读者文库》的出版人斯米尔金和主编先科夫斯基先是劝说普希金以一万五千卢布的价格将《现代人》出售,普希金当然断然拒绝。随后,先科夫斯基就展开了另一种攻势,他在1836年第一期《读者文库》上刊登文章,对德国诗人克·马·维兰德^⑤的一本诗歌集的俄译本进行讥笑式评论。这部作品是一部题材相当古老的诗体小说,早在1807年就由在皇村供职的叶·彼·柳岑科译出,当时普希金曾建议斯米尔金出版未果,而后自己出版,标明“普希金出版”,没有显示译者,因而此时遭到先科夫斯基的诽谤,说普希金自掏腰包一千卢布,买下了署名权,将译本据为己有。所以他在评论中引用柳岑科最平庸的诗,不无恶意和讽刺地说这是普希金的诗:“这是他的诗,令人吃惊的诗!”^{[4]5}《读者文库》的攻击还不止于此。在《现代人》第一期面世前,先科夫斯基从侧面了解到将要在发表《论1834和1835年新闻报刊的动向》一文,其中论及他的杂志活动。没有等到《现代人》出版,先科夫斯基就在四月号《读者文库》(3月27日通过审查)上发表杂文谈论普希金的杂志,说它出于对《读者文库》读者量的嫉妒,这将是一本漫骂式丛刊,必将灭亡于肮脏的争论。先科夫斯基甚至不惜对普希金直接威胁:“请自重!不谨慎的天才!”^{[4]5}事情的实质是,先科夫斯基向政府和新闻检查机关提示,怀疑普希金的政治善意问题——说他是尖刻的讽刺诗及小品文作品的作者,暗示这些作品鞭挞了尼古拉一世的近臣国民教育部部长谢·谢·乌瓦罗夫。

因担心《现代人》的命运,普希金转而请求《北方蜜蜂》的支持。他利用《读者文库》与《北方蜜蜂》出版人个人性格的磨擦,采取措施,润滑对他的攻击。1836年4月17日《北方蜜蜂》上出现了未署名文章《关于“现代人”说几句》;《莫斯科观察家》也在1836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应该怎样进行批评》出面为普希金辩护。就是在如此激烈的气氛中,《现代人》第一期面世了。

在应付外部阻力的同时,普希金同样面临内部

困难——如何选择撰稿人。普希金考虑，自己圈子里的作家应该成为《现代人》的撰稿人。正如他后来在第三期《现代人》中写的，在主要方面“都将是《文学报》的继续”。^{[5]331}但是，距离《文学报》停办已经五年过去了，这些年发生了许多变化，杰利维格和索莫夫都去世了，卡捷宁不再从事文学活动，普希金圈子里被认为最具批评天才的基里耶夫斯基被禁止发表作品。尽管如此，在1837年出版的四期《现代人》中，被普希金采用稿件的作者20多人，但投稿者相当多。没有被采用的有叶·罗森男爵和彼·沙利科夫公爵的诗，米·博格金的历史文章；罗森的关于写木偶戏演员的文章的建议没有下文；有一些被普希金约稿的文学家没有实现他的要求；流放地诗人曲谢尔贝克尔寄往《现代人》的文章手稿《诗与散文》被截获而没能到编辑手里；普希金也曾请米·谢普金和巴·纳晓金为杂志写回忆文章。在撰稿人中有些知名人士，如彼·科兹洛夫斯基——外交官、自然科普工作者；杰·达维多夫——1812卫国战争的英雄、诗人；文坛新人——果戈理，娜·杜罗娃，科利佐夫，丘特切夫，这些作家和诗人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注意，他认为他们具有无可怀疑的天才。

编辑稿件时，普希金关心的是它们是否符合杂志的精神和风格。他从娜·杜罗娃的札记中删去了针对亚历山大一世冗长的颂词，在给作者的信中普希金建议风格尽量平实些，并且建议作者放弃最初的题目《娘子军札记》，改为更简单朴实的《娜·安·杜罗娃札记》。普希金对果戈理的影响更是文坛佳话。众所周知，在1837年3月28日果戈理从罗马给普列特尼约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他的建议我就无从开始，没有他出现在我面前，我简直难以想象，我会一行字也写不出来。他所说的、所批评的、所嘲笑的、所永恒赞美的，就是占据我全部身心的东西，给我力量的东西。”^{[6]186}而《娜·安·杜罗娃札记》、果戈理的《鼻子》等都附着普希金善意的评论出现在杂志中。可以看出，在使稿件严格符合杂志精神的同时，普希金对文学新人给予悉心的呵护和指导。

普希金对《现代人》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在出版《现代人》期间，他写有超过百封信件，几乎一半与杂志有关。他生平最后一封信是给儿童作家阿·伊希莫娃的，在决斗那天普希金请她为杂志翻译巴里·康沃尔^⑥的诗歌并给出了建议。在决斗前夕，他催促彼·科兹洛夫斯基完成答应过的关于蒸汽机理论的文章；据书商伊·季·利先科夫所见，普希金曾去书店挑选为杂志的“新书”专题所需的书籍；他

还认真读完杂志文章的校样，并与书刊检查机关进行了交谈。

关于对《现代人》的书刊检查，亚·瓦·尼基坚科在自己的日记（1836年1月20日）中作了这样的记录：“审查官委派阿·阿·克勒洛夫为新杂志的检查员，他是我同行中最胆小的，因而是最严格的。”^[7]过了三个月，尼基坚科在4月14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检查员经常挤压普希金，普希金对他多有抱怨，要求给自己另派一个来协助第一个，结果给他派来了加耶夫斯基。普希金懊悔不迭，但已经晚了。加耶夫斯基早被关禁闭吓怕了，他曾被拘留8天。所以现在甚至类似国王去世这样的消息是否允许刊发都值得怀疑了。”^[7]作为主编的普希金的处境艰难，还因为教育部长谢·谢·乌瓦罗夫和彼得堡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米·亚·科尔萨科夫对他也都有敌意，因为诗人曾针对他们分别写过讽刺短诗和小品文。有一批准备用于《现代人》的作品完全被禁止发表：普希金的文章《亚历山大·拉吉舍夫》，果戈理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卡拉姆辛的《古今俄罗斯札记》，丘特切夫的《两个恶魔》。达维多夫的文章《德累斯顿战役》《论游击战》遭到了删减；在《德累斯顿战役》一文中达维多夫讲述了卫国战争的最后一战，几个将军希望无论如何获得战功，不惜以血战赌注，并预先准备好了胜利简报。阿·屠格涅夫^⑦的文章《俄国年鉴·巴黎》出现在第一期《现代人》中，是经过主编坚持不懈的斡旋的结果；果戈理的《鼻子》中的一些揭露性片段并不为读者所知。米·彼·波戈金的《莫斯科漫步》、丘特切夫的诗歌《自然，不是你所想的……》被删节发表。普希金的作品也备受折磨。他的《阿尔兹鲁姆旅行》由沙皇亲阅并删除了一系列关于政府对高加索政策的批评意见；《我的主人公谱系》《彼得一世的盛宴》《统帅》等作品最终能够面世，是经过长时间的检查机关的审理、反复进行交涉和通信等环节后才得以实现的；《上尉的女儿》则不得不给出解释：姑娘米罗诺娃究竟存在不存在，她实际上究竟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见面没有。而卡济-吉列伊·苏尔丹的文章《阿日图加伊的长度》已经刊发出来后，又收到了本肯多夫的来信，指责编辑破坏了最高守则里禁止军人没有得到上级裁定不得刊发自己作品的规定。作为编辑的普希金的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的，许多隐情并不为外人知晓。

根据杂志的备案和出版许可，《现代人》表面看来与其他刊物没有什么区别。封面上表明“现代人，文学杂志”，目录分为两个栏目《诗歌》和《散

文》，但是内容被普希金巧妙地编排，具有了文学—社会杂志的特点，其中文学艺术类散文、诗歌与政论、文学批评夹杂在一起，许多文章以事件日期开头，《散文》栏目中的“新书”专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杂志所刊发的内容不仅具有多样性，同时，其混合内容的协调性和目的性使《现代人》具有了特别的意味。

第一期刊发的文章《论 1834 和 1835 年新闻报刊的动向》由果戈理执笔，但发表时没有署名。果戈理指出了大部分当代期刊没有什么鲜明色彩，他称《北方蜜蜂》“在文学意义上没有任何确定的调子”，“它是一只编筐，想装什么就装什么”^{[8]203}；而《读者文库》的主编先科夫斯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确定的信念和感情，他“今天喜欢的，明天就成了他嘲笑的对象”^{[8]198}。果戈理嘲笑他的“轻率”，“因为他从来不关心自己说了什么，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之前所写的东西了”^{[8]199}。果戈理还不无揶揄地指出在俄罗斯闻所未闻的现象，就是《读者文库》主编相当勇敢地公开宣布，他把几乎所有刊发的文章都作了修改和重编，“任何一条新闻都不是照原样发表的”，经过他们的“照顾”，“文章便大有起色”^{[8]202}。果戈理的文章公允地评价了当时的各主要报刊，还指出了刊物中的“商业倾向”。不过果戈理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商业倾向”，“文学应该成为商业现象，因为读者的数量有了增加，阅读的需求也有了提高”，应该“从作品内在价值的角度”判断作者和出版物的作用，“而不是去计算他们的利润”^{[8]213}。关于文学的“商业倾向”这一问题，普希金也不止一次涉及。他在去世前不久给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巴兰特的信（1836 年 12 月 16 日）中谈到《1828 年 4 月 22 日法规》，这一法规为俄国作者的权利打下了基础，他讲道：“文学在我们这里成为工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仅仅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优雅的贵族的事情。”^{[3]401}在欢迎文学界的新秩序——建立法规、保障作者的权利——的同时，普希金也指责那些把文学变成了“跳蚤市场”的杂志人和出版商。

果戈理的这篇批评矛头明确且犀利的文章被其他出版人看作是《现代人》杂志的纲领，并把它算在普希金头上。《现代人》面世前已经引发相关人的围攻，发表后更是招致各相关方的论战。为了《现代人》能生存下去，普希金不得不在第三期杂志上发表《致出版者的一封信》，假托署名 A. B. 并注明信来自特维尔市，且在第二期“编者的话”里就已经预先说明，该信因时间仓促无法及时刊登。特维尔

市的这位居民惊奇于《现代人》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与《读者文库》进行斗争。显然，普希金无法在《现代人》这份三个月一期的杂志中进行有效的争论，他希望息事宁人。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拒绝论争，他坚持自己刊物的另一个目的，正像后来别林斯基所阐明的：“普希金创办自己的刊物并不是为追逐《读者文库》那样的荣誉（很可怀疑的荣誉！），而是为了俄罗斯哪怕有一份刊物，在上面那些天才、知识、价值、独立于商业要求的文学见解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9]在来自特维尔的信中，普希金认为《读者文库》出版得及时有序，也承认《北方蜜蜂》付费广告的实际效用，他说：“拥有 15000 订户的英文报纸，仅用刊登广告的收入就足以抵偿发行的费用。”^{[5]326-327}这位特维尔居民认为《论新闻报刊的动向》一文的不足在于，作者“在谈《望远镜》时没有提及别林斯基，他正显露头角，大有希望”。^{[5]327}在给来自特维尔的信所作注释中普希金声明：“《论新闻报刊的动向》一文发表在我的刊物中，但不能就此认为文章中所表达的充满年轻人活力和直率的见解与我本人的意见完全吻合。无论如何该文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纲领。”^{[5]329}而同在第三期上的普希金的“编者的话”实际上成为了对署名 A. B. 来信的实质性评论和注解，其中讲道：“《现代人》的出版人没有发表任何自己杂志的纲领，因为他认为‘文学杂志’——已经说明了一切。一些杂志人认为有必要为新杂志撰写纲领，有人宣称《现代人》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斯米尔金先生出版的《读者文库》搞糟；而在《北方蜜蜂》中则说《现代人》将是已去世的杰利维克公爵出版的《文学报》的继续。在此《现代人》出版人不得不声明，他没有这份荣耀，与这些杂志人先生素无任何往来，他们往自己身上揽活儿，要为《现代人》撰写纲领；他从没有委托他们此事。但是，在拒绝与文学家不相称的和《读者文库》不正地强加于他的目的同时，他完全承认《北方蜜蜂》上的说法是正确的：《现代人》就其批评精神，就其撰稿人的名单和分工，及对事物的见解的表达方式和应有的评判，都将是《文学报》的继续。”^{[5]330-331}普希金办杂志的目的，一如过去的《文学报》，在于捍卫真正的艺术价值，在于传播科学和文化成就，在于确立社会生活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从他在《现代人》上刊发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他选用的作品所关注的问题，就可窥视一斑。

《现代人》问世时正值俄罗斯悄无声息地纪念十二月党人事件十周年。普希金绝无可能公开谈论十二月党人，但是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同胞想起

那些被流放的人，他们中有许多是他的朋友。第一期就出现了《彼得一世的盛宴》，其中写的是沙皇与自己的臣民和解。该作品写于1835年末，其实是希望尼古拉一世在其继位十年之际宽恕十二月党人，但是期望落空，十二月党人处境依旧。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彼得一世是作为呼吁宽恕、和解的榜样而发声。同期发表的《阿尔兹鲁姆旅行》，普希金重又提起一些阴谋家，当然只是用开首字母* * *代替真名，但作者在军人中指出他们，其真实意图相当明显。在第三期的“新书”专题中，刊登了一则没有署名的对意大利作家西里沃·佩利科的著作《论人的责任》的俄译本书评，也出自普希金之手，它引起了读者对这位意大利诗人命运的关注——他因被控与烧炭党有联系在狱中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生活，最后被奥地利皇帝赦免。西里沃·佩利科的生活道路引起人们联想起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在第四期出现了《上尉的女儿》，作品最后一个场景发生在皇家花园：玛莎·米罗诺娃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谈话，请求宽恕格利涅夫。小说注明写作日期为1836年10月19日。这些与皇村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对青年时期朋友的怀念，其中就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曲谢尔贝克尔。这让我们想起普希金在创作诗歌《纪念碑》时，认为自己对人民的功绩之一是“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1836年，卫国战争25周年前夕，1812年主题成为重要话题。《北方蜜蜂》《读者文库》刊登显要人物的回忆和文章，他们将所有战功归于沙皇。《现代人》从另一立场走近这一主题。分别刊于第一期和第三期的1812年的真正英雄娜杰日达·杜罗娃、杰尼斯·达维多夫的作品，讲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士兵们的勇敢，人民对祖国的爱。普希金注意到天才的统帅库图佐夫、巴克莱·德·托利^①的功绩。《现代人》把卫国战争视为俄罗斯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

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它在普希金的杂志中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在俄国期刊中尚属首次。在第一期中，“半开化的高加索的儿子”切尔克斯人卡济·吉列伊在特写《阿日图加伊的长度》中，讲述了本民族对教育的向往以及这条道路上的障碍。普希金的写实作品《阿尔兹鲁姆旅行》中，隐含着政府殖民政策的谎言性。他写道：“切尔克斯人恨我们，我们把他们从辽阔的牧场赶走，他们的山村被毁坏，整个部落被消灭。他们越来越潜进深山，从那里实施自己的攻击。”^{[8]25}在第二期中这个问题以新的材料展开。在一篇民族学文章《沃佳克人和切列米斯人的神话》中，阿·叶

米切夫写道：“使人不得安宁的客人强烈地逼迫那些长久居住在这里的人，要么毁坏他们的住所，要么让他们搬到新地居住……”“仿佛弗拉基米尔的新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到河里接受洗礼。1834年炸毁了最后一块孤独地躺在荒野里的巨石——他们多神教崇拜的对象。”^{[10]181,187}在这里普希金看到了俄罗斯人对边区族群文化与生存的毁灭性破坏。

在第三期普希金以英文署名“一位观察者”发表了政论文章《约翰·滕那》。该文写的是1830年出版的美国人约翰·滕那的回忆录——他9岁时被印第安人绑架，在他们中间生活了30年。在此期间他忘记了母语和自己的英文名字，完全养成了印第安人的传统和习性、世界观和信仰。他返回后，在美国博物学家和研究者爱德文·詹姆斯博士的帮助下，写就了《关于被绑架和受苦难的故事——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三十年》。普希金的文章大部分是转述和片段翻译约翰·滕那的回忆录，这里他关注的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1836年普希金阅读了托克维尔的论著《论美国的民主》，在它的影响下，普希金撰写了文章《约翰·滕那》。19世纪30年代，欧洲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之一就是民主制度，与此相关，欧洲尤其对美国发生了兴趣。欧洲不无嫉妒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每一步，对其时而报以赞赏，时而报以怀疑。结果，不仅新历史活动家可以成为“神话”（如拿破仑），年轻的国家也可以成为神话。因此，1835年在巴黎出版的托克维尔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事件，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并迅速成为描写异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典范。普希金最早是从阿·屠格涅夫寄给《现代人》第一期（通过审查日期是1836年3月31日）的文章《俄国年鉴·巴黎》^②中得知此书的，文中写道：“昨晚是在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度过的。塔列兰称此书是我们时代最智慧、最值得一读的书，而他本人了解美国，他本人就是贵族，就像托克维尔一样。”^{[8]273}阿·屠格涅夫希望引起俄国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同时借法国外交官塔列兰的话安慰书刊检查员。可以推断，普希金应该是在1836年春天读了此书，又立即在《约翰·滕那》一文中提到托克维尔（《现代人》第三期标明的出版日期是1836年9月）。看来，诗人了解托克维尔的书与写《约翰·滕那》一文，几乎是在同时，在他的意识中，法国思想家的名字与这位半开化的“白人”印第安人有了有机的联系。

诗人本人很少翻译散文，而他在文章中却详细

转述甚至大量翻译滕那的回忆录,以让读者了解美国的总体情况,了解印第安人的处境,了解美国文明的特点,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了解仅限于小说中,因而应当了解一些他们现实的情况。普希金在文中指出:“夏多布里昂和库柏两人呈现给我们的印第安人带着诗性的一面,是用他们自己的想象之色彩涂抹了真相。而华盛顿·欧文说:‘小说中呈现出来的野蛮,如此像现实中的野蛮’。”^{[5]206-207}看得出来,在半开化的作者朴实的讲述中,普希金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重要的佐证:“叙述朴实而平静,它们最终将在世人面前证明美国在19世纪扩张自己的统治和基督教文明时所使用的手段。”^{[5]207}在文中进行转述以及对滕那的话进行诠释时,普希金对美国“文明”表达了负面的评价:“印第安人所遭遇的苦难和贫穷远远超乎人们所能达到的想象。”^{[5]223}诗人同时阅读的滕那和托克维尔的书中有东西同时回响着,相互补充着,从不同角度照亮现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印第安部落的现状和可能的未来》一章中,所呈现的画面和表达的思想,在滕那朴实的讲述中找到了独特的支持。托克维尔指出:“自从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区附近定居以后,飞禽走兽都吓得逃进森林而不再回来……”^{[12]407-408}“原来在那里过的还算丰衣足食的印第安人,现在处于难以维持生计的境地……赶走他们的猎物,其后果等于我们农民的耕地变得贫瘠不毛一样”,“他们在那里只有饿死和受苦”,于是,“终于决心离开,跟踪野兽逃退的路线,让野兽指引他们选定新的家园”。“随着这种被迫迁徙而来的可怕苦难,是不堪设想。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衰败不堪;而在他们新选定的落脚地区,又早已住有只会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部落。他们背后是饥荒,前面是战争,真是到处受苦受难”^{[12]409}。托克维尔的论述借助的是推断,而滕那的叙述借助的是现实。

普希金毫不怀疑滕那叙述的真实性,他几乎用类似的话语描述印第安人的处境:“他们处于不断的迁徙中,整天整天地没有食物,他们陷入覆盖冰雪的深谷,借助随手得到的薄树皮涉过湍急的河流,每时每刻都处于失去生命的危险之中。”^{[5]223}在涉及到滕那回忆录真实性问题时,诗人提到的正是托克维尔的名字,两个印第安人生活的观察者在这段行文中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不应遭到任何怀疑。约翰·滕那还活着,许多人(包括托克维尔本人)见过他,并从他本人那里购买他的书。他们认为,伪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消读上几页,就

会确信:没有任何艺术痕迹和朴拙得简直寒酸的叙述保障了真相。”^{[5]207}普希金的整篇文章除大量转述之外,只在文首、文末加了简短引言和结语,却对约翰·滕那书中的美国现实给出了深刻的判断:“人们无不吃惊地在民主中看到了可憎的犬儒主义,残酷的偏见,难以忍受的残暴。一切崇高的、公正的,一切滋养人类心灵的东西——都被冷酷的自私和渴望舒适的情欲压倒;无耻地压制社会的大多数,在教育 and 自由中奴役黑人;在人民中间实行种族排斥,没有贵族精神;而选民贪婪嫉妒,管理者胆小、奴颜婢膝;天才,出于对平等的尊重,勉强自愿地自我放逐;富人,穿着破烂的长袍,为了在街上不伤害傲慢的穷人,可他们在暗中却是被藐视的。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图景。”^{[5]205-206}滕那的书成为普希金这篇政论文章思考的出发点。他所指出的文明的美国人无人道地对待印第安人的情况,对于俄国读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内省作用——他们看到的“可怜的黑人”,正如俄国农奴制下的农民。

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民族和农民问题,殖民与民主、平等问题,这些主题的连续的、相辅相成的呈现证明了杂志结构缜密的思考。《现代人》上发表的普希金的每一篇政论文和文学作品都成为每一期杂志主导的、确定的意图。还有那些对日常事件的反应,如维亚泽姆斯基对《钦差大臣》上演的评论,弗·佐洛特尼茨基对《纳西切万省的统计学描述》一书的意见,阿·屠格涅夫的信件《俄国年鉴·巴黎》,普希金的文章《论米·叶洛巴诺夫对国内外文学精神的见解》,以及他对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会议的总结等,都赋予了《现代人》新闻的敏捷性。而彼·科兹洛夫斯基公爵按照普希金的请求所写的《巴黎数学年鉴整理》,以及他的科学论文《论希望》,都担当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

普希金的《现代人》所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反应时事的敏捷性,题材的多样性,都被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所继承。民众教育问题,科学知识普及问题,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十年之后占据了杂志的中心地位,这时杂志的精神领袖已经是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

普希金共出版了1836年的四期《现代人》,并部分地准备了1837年第1期的稿件。诗人1837年1月27日决斗,1月29日去世。去世后,以茹科夫斯基为首的友人们按照接下来的序号出版了1837年的四期《现代人》,以纪念普希金、抚恤他的家庭。主持出版的友人分别是:普列特尼约夫第5期,克拉耶夫斯基第6期,奥多耶夫斯基第7期,维亚泽姆斯

基第8期。1838年,普列特尼约夫接手《现代人》。

文章至此。再过两句许恰值诗人普希金辞世180周年,谨以此文向伟大的诗人致敬!

注释:

- ①《北方之花》是当时坚持时间最长的不定期刊,持续了8年,从1824年到1832年,共出了8期。
- ②1820年5月—1824年7月,1824年8月—1826年9月,普希金分别被流放在高加索和米哈伊洛夫斯科村。
- ③《叶甫盖尼·奥涅金》片段,《奥列格之歌》《普罗塞庇娜》《恶魔》《莫扎特和萨利里》《回声》《大胆的人》《群魔》等。
- ④基里耶夫斯基在1832年开始出版《欧洲人》杂志,但很快就被尼古拉一世禁止发行,因为上面刊登了基里耶夫斯基的文章《十九世纪》,文中被看出要求为俄国制定宪法。
- ⑤德国诗人克·马·维兰德(Кристоф Мартин Виланд)。
- ⑥巴里·康沃尔(Барри Корнуолл,英文 Barry Cornwall,笔名。真名 Проктер Брайан Уоллер, 1787—1874),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 ⑦不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伊·屠格涅夫,而是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阿·屠格涅夫(1784—1845)。
- ⑧即米哈伊尔·博格丹,1761—1818,公爵,俄国元帅,苏格兰人。
- ⑨普希金把自己的朋友阿·屠格涅夫长期在国外期间寄到俄国的一系列书信发表在《现代人》上,并称其为“俄国年鉴”。它们是对欧洲生活敏锐的观察,普希金意识到了这些书信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Касаткина В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А С, Пушкина и А А. Дельвига [J]. 1830 год (№ 1 - 13).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 [2]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 томах [М]. (Том 13). Изд - во АН СССР, 1937 - 1959.
- [3]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 томах [М]. (Том 16). М.: Изд - во АН СССР, 1937 - 1959.
- [4] Синуков 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 [С]//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факсимильному изданию. М.: Изд - во Книга, 1987.
- [5] Синуков 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 [М]. Т. III М.: Изд - во Книга, 1987.
- [6] 果戈理. 果戈理书信集 [M]. 李毓榛,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根据原文文中改译)
- [7] Никитенко А В. Записки и дневник (В 3 - х книгах) [М]. М.: Захаров. 2005. (http://az.lib.ru/n/nikitenko_a_w/text_0030.shtml).
- [8] Синуков 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 [М]. Т. I М.: Изд - во Книга, 1987.
- [9]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 ти томах [М]. Т. 3.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2180.shtml).
- [10] Синуков 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Пушкиным [М]. Т. II М.: Изд - во Книга, 1987.
- [11]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19 томах [М]. (Том 12). М.: Изд - во АН СССР, 1937 - 1959.
- [12]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M]. 董果良, 译.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tudy of Pushkin's Magazine *Modern Man*

GENG Hai - 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Pushkin founded the *Modern Man* magazine in 1836 and edited four issues. With its diversified contents, its coordination and teleonomy endowed the *modern man* magazine with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strict censorship, Pushkin makes a delicate arrangement of the contents and pays tortuous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problems at that time: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e decembrists, the national and peasant issues, the colonial and equal problems, etc. The continuous and complementary themes prove the meticulous thinking of the Journal, embody the editors' insistence on serious literature i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widespread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ssification. The depth and importance of questions raised by Pushkin's *Modern Man*, the agility to reflect current events and the diversity of subjects are all inherited by Nekrasov's *Modern Man* magazine.

Key words: Pushkin; *Modern Man*; research

鲁迅与左翼:理解的障碍

张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420)

摘要:“时代转换”构成了今日理解鲁迅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障碍,但理解鲁迅的障碍远不止于此,还有知识者自身的思维局限,其中之一是从一个被否定的时代中又无意识继承下来的“正/邪”“天使/魔鬼”的历史二分法。此外,还包括过于依赖既有理论、概念“组合”对象,而不是依其自身逻辑“进入”对象,于是,鲁迅“那些化不掉的剩余物”,历史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便都在研究中烟消云散了。比如“‘进入’历史”方法中的那种痛苦的“逼入”性质,便被置换为休闲式的“走入”性质;对“第三种人”论争事件,也会习惯地停留于字面义,而未能进入那真正的历史伦理学及今日相似处境;“两个口号”论争,也会被视为半斤八两,而无力辨析鲁迅留下的另一种左翼文化思路;胡风的创作论和“典型论”,自然更会因话语的陈旧,而无法意识到其内在于历史的那种痛苦和智慧,自然也不会谦卑地从中看到先驱者的身影……

关键词:鲁迅;左翼;理解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09-06

1949年春,任职香港《大公报》的萧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要么去剑桥大学任教,要么随《大公报》起义,然后去解放区。其实他已做出了选择,写信回绝了剑桥,但他的剑桥老友、汉学家何伦教授,又几乎专程来香港动员。何伦亲来,不止是为剑桥刚成立的中文系邀请一位教师,还带有劝老友及早脱离“危境”的私心。何伦是捷克人,对自己祖国正在发生的悲剧感同身受,他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件告诉萧乾,“在共产党政权下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对萧乾“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回答则充耳不闻,三番五次地登门规劝。^{[1]216-217}

何伦教授的预言果然应验。八年后,萧乾也在他热情投入的新中国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可问题在于,萧乾在1979年复出后,竟然写道他不后悔;此后在出版文集时,也丝毫无改。这很容易被认为是虚情假意或“牧马人情结”,但已故日本学者丸山升却从中读出了另一种情结。这情结

是以一系列细节体现的:萧乾幼年在北平“粥厂”觅粥时,每每看到一个饥饿的白俄,被从排队中驱赶出去,有一天早晨,他看到那白俄的尸体横陈街旁。后来在去欧洲的船上,他遇到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对德国进攻波兰兴高采烈,询问之下才知,这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白俄舞女之子,他预计法国参战需要雇佣兵,他想通过参军获得一个国民身份。1949年,在萧乾拒绝何伦教授苦劝的当晚,他失眠了,因为他早已知晓当年苏联的大肃反和东欧近期发生的事情,何伦的“忠告”噬咬着他的心,但恍惚间他又看到那个死挺在街边的白俄的那两只脚,“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抽噎起来,从他那委屈的哭声里,我仿佛听到‘我要国籍’。”丸山升指出,“一种今天已经消逝的情结,却支配着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者。但由于业已消逝,历史变得不那么容易理解”。^{[1]223-225,227-230}换言之,在萧乾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原本的“自由+祖国”情结,由于“祖

收稿日期:2016-11-10

作者简介:张宁(1960—),男,山东菏泽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鲁迅与左翼文学。

国”因素已像空气一样平常,萧乾当年的行为反而变得不可理解。

那么,这个故事与本文所言的鲁迅和左翼文学有什么关系呢?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关系,但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鲁迅和左翼文学,与这个故事一样,也处在由时代转换所形成的“理解的障碍”中。因此就理解的命运而言,二者息息相关。

一

本文以学者黄悦的鲁迅、胡风和左翼文学研究为例,展开这个论题。

但需要说明的是,理解的障碍,并不止于“时代转换”这一个因素,还有理解者自身的理解障碍(包括思维方式、体验方式和把握现实与历史的方式等),而后者则更隐蔽,更不容易被认知。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黄悦才那么煞费苦心,力图理论性地构建一个对于鲁迅的“理解史”(不纯是“接受史”意义上的)。他心平气和,即使对于那个该控诉的时代,也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他描述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把知识、思想等按照一种“终极标准的走向排序”:离“共产主义”近的,自然被排在前头;远的,则被排在后面;而越往后者,离“反动”越近。鲁迅的前后期也是这么分出来的——当他“向左转”了,被命名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时,他就具有了绝对的价值优先性。加之绝对权力强力推行这种排序法,排斥、打击哪怕只是松散这一秩序的任何可能,鲁迅研究遂就成了钦定的官学,“鲁迅”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名称。^{[2]9-15}

这一按照“终极标准的走向”的排序,早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就已经出现。但与后来成为“钦定官学”时不同,瞿秋白一方面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简化了鲁迅(这是“理解”中经常遭遇的现象),另一方面,瞿秋白也在“与鲁迅的全部思想感情的交流之中”呈现出相当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展开说,一是瞿文中的视角和方法——“阶级论”,它在1930年代的揭示性,和在1950—1970年代的封闭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揭示性的真理,在经过把“真理”制度化后,就完全变质了。一如作者举的“稻田靴”的例子,只有在稻田中,在“脚”与“鞋”密切配合以及鞋对脚的保护中,“鞋”的功能才被凸显出来;假如农夫出了稻田,走在乡间的路上,走回家里,乃至走在城市的通衢大道上,仍然穿着“稻田靴”,而且必须穿着,就不仅荒谬,而且也是对生命的戕害。但在经历了荒

谬和对生命的戕害后,人们很容易把“只能穿稻田靴”这种专横方式,迁怒于“稻田靴”本身,加以一概排斥,直至时代的“狡计”把人们再次抛入泥泞的稻田中。瞿秋白的序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即使他以“阶级论”简化了鲁迅,也是结论性的简化,在形成结论的过程中,一些无法被结论所容纳的内容,即作者所言的那些“无法被意识形态‘化’掉的东西”,依然充盈着,如序的开篇引用的罗马寓言故事^①。这是当事人在“与鲁迅的全部思想感情的交流之中”,所体味并体现出的那种具体性。但当今今天的人们,对历史采用“魔鬼/天使”的二分法时,这些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些化不掉的剩余物”,就都随之烟消云散了。事实上,在前一个时代,它们已经烟消云散了,因为那种按照“终极标准的走向”的排序,本身就是一种“魔鬼/天使”二分法。它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并反向性地构成今日“魔鬼/天使”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真正来源。区别只在于它与今日流行的正好掉了个过儿,即“文革”时是“天使/魔鬼”二分法,今日则是“魔鬼/天使”二分法。

正是这种“魔鬼/天使”二分法,导致今天“在鲁迅研究的圈子之外”,对于鲁迅的非难到了空前的程度:“心胸狭窄,造谣生事,政治投机,民族虚无主义,汉奸卖国贼,直到语言艰涩,文法不通,逻辑混乱,知识浅薄……鲁迅成了万恶之源,似乎鲁迅的影响不加肃清,中国就没有希望,而在诸多诋鲁人士中,似乎确也不乏善良正直的人……”^{[2]4}但这仍然可被视为“时代转换”之际的一种局促现象,只不过,“局促”的时间过于长了,其带来的危害也日益明显,包括在孕育中国当代思想的资源本来就贫乏之际,又人为地割掉了一个强劲本土资源……

当然,这种排斥鲁迅的集体倾向不会出现在鲁迅研究界和爱好者那里。事实上,正是他们,构成了今日互联网上持续不衰的鲁迅大论争的另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研究界不存在理解鲁迅的障碍。事实上,自“理论向我们走来,或我们向理论走去”的新时期以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等方法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也在鲁迅研究中走了一遍,但却“并没有获得意想中的成功”。因为“当我们从‘文学性’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只是技术性的方法,这些方法自然大大超越了鲁迅自己所理解到的‘白描’,‘画眼睛’,‘写灵魂’,‘写类型’之类,然而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叙事学’,都只是将鲁迅作品的赋形方式作为研究

对象,而将构成文学性本身的内容因素轻轻忽略掉了。”这和1980年代以降的整个文学研究范式是同步的,即“对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进未必出于对方法论本身的深刻理解,更多的也许对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反拨”。这种“文学领域的‘变形记’,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剪辫子似乎很有几分相象”^[3]。

这么说,并非否定来自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启示,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一片贫瘠中;而是说在上述“研究范式”中,新理论、新方法带来的往往只是“理论崇拜”和“方法崇拜”。“我们所握的不是鲁迅的手,而是用鲁迅做包装的西哲们的手”;我们所得到的新视角,也是向某种方法临时借用的,而不是血肉化地生长在我们身上的。书中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相比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自然让人们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因为“当我们用通常的‘写实’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时候,狂人及其对于世界的认识就显得荒诞可笑。而当我们放出‘象征’的眼光,在狂人的立场上去看世界的时候,这世界却变得狰狞可怕。”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对‘吃人’的认识,并不总使我们震颤。它可以……被设定在一种形式的研究里,我们不怕它”,就像老虎被关在笼子里,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因而“我们对‘吃人’的‘理解’,正像狂人在未狂之前和狂过之后一样的心安理得”。

真正使狂人理解了“吃人”的,是他的“狂”,然而“狂”的起因,却是由于“迫害”。只有当狂人自身处于受害或者说“被吃”的处境时,他才能“理解”“吃人”。因而这对“吃”的理解,正是一种“受难”。在这“受难”之中,而且只有在这“受难”之中,他才不但理解了他人,而且理解了自己:“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3]

“理解”在这里不再是多一些视角和方法的问题,而变成了理解者是否也在“受难”或内在于“受难”。这就进入了书中的另一个问题,即“逼入历史”的问题。

二

“进入历史”是学界十几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它“起源于这样一个假定,即历史是一个尚未进入而又需要进入的他者。这一假定的意义在于,历史研究不再只满足于对象化地处理历史材料,将

他者看成是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是要置身于他者之中,使作为他者的历史成为与主体自身密切相关的东西,由此才能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解”^{[2]49-50}。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愿问题,也不是一种学术训练,甚至不是一种方法论的获得问题,在这之上或之下,“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存在论基础”,简言之就是:企图“进入历史”者,是否能感受到历史的疼痛?如果回到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那么,“进入历史”就不是是否“进入”的问题(取决于意愿),而是“逼入”的问题(不得不如此),因为“进入”意味着自己曾在“历史之外”。真的在“历史之外”吗?还是一如《狂人日记》中那些影子一般的人物,自己生活在“吃人”和“被吃”的世界,却觉得一切正常,身在“历史之中”而不自知?狂人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只是因为发现自己“被吃”,而被“逼入”对自己身处“历史之中”的自觉。如此,“进入历史”就从来不是从历史“之外”进入历史“之中”,而是被一种痛彻的感觉逼着你认知到自己早就被胁迫在“历史之中”。正是沿着这个主体性“炼狱”所展开的方向,作者探讨了狂人在意识到自己也曾“吃人”,进而康复、“候补”等一系列内在于我们今天的发人深省的问题。

而历史也不再是一个不可重复的过去,一个与我们无关的对象,一个只能按现行标准“提取精华”的对于“标准”的印证,而是一个与我们自身存在的可能性密切相关的“曾在”。它本来就是“我们的”,每当我们在那可能性的路上踟蹰彷徨的时候,每当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选择道路的时候,每当这一选择的现行标准不再生效的时候,它就“走出来”,向现实报到。^[3]

“进入历史”之于理解鲁迅,最为贴切的命题是“回到鲁迅”。然而,正如“进入历史”不是“进入”,“回到鲁迅”也不是“回到”,而是“新的筹划的开始”。因为“回到”的原本意义“复原”,是“把鲁迅带回到‘科学’的历史‘客观性’中”,以祛除意识形态的笼罩。正是在“复原”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本来面貌”——“无法被‘意识形态’所‘化’掉的鲁迅,那个去掉了‘意识形态’包装后的‘剩余物’”。然而,这个貌似“客观性”的显现,“却是从我们的‘主观’感受的深入中挖掘出的”。因为“理解并不意味着对于材料的占有和把握,而是意味着……占有到和把握到那材料的意义。而意义的意义性在根本上不是指向对象,而是指向我们自身。鲁迅的意

义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他曾经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起过什么作用,而是对我们自身及其处境起到什么作用”^[3]。

这就走入了胡风当年的视野。胡风,这个自命为鲁迅学生的人,因其在“新中国”的受难而引人注目和受人尊敬,但却鲜有将其文章和论述当作楷模而推崇者。陈旧的概念,左翼的修辞,过于欧化的冗长句子,以及缠绕的论述,在阻碍着今日的读者进入他的世界。人们似乎只满足于夸赞他的独立、勇气和牺牲,但作者却从他那里,发掘出进入和理解鲁迅的钥匙。

首先是对三重角色的重新认定。毛泽东曾称鲁迅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胡风虽受其影响,但他对三重角色的类似定位——诗人、思想家、战士,却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兑换为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文学家、思想者和行动者。在胡风看来,鲁迅并不是“创体”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一位思想的践行者和实践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这当然不能算作思想家,这也是李长之当年称“鲁迅不是思想家,而是战士”,以及今天若干现代思想史著作拒绝收入鲁迅的原因。然而,鲁迅又与通常的思想接受者不同,他把思想“吸收到他的神经纤维里面”,变成了经过“血肉的考验”后的“自己的东西”;而承载思想的“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有的只是伴随“思想”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方法”和“战斗气魄”,用竹内好的话说,即“他这个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思想”^{[4]146}。而热衷于奥林匹克世界赛的人,自然不欣赏、乃至不承认这样的“思想家”,但在习惯于把西方思想当作权威的第三世界里,这已是了不起的思想。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那“无影无踪”的思想,又深深浸润着“对于旧社会的丰富的知识”;这些“知”和“识”虽然可能先于“思想”和“行动”而存在,但却被“血肉化”的思想所照亮,也在不断的行动中被应用,因而得以继续丰富和发展。而“行动”本身之于“思想”的生长性也显现出来,因为“行动”的过程正是对于“思想”的理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念回到原初的思想状态,‘知识’回到原初的经验状态”。于是,“行动”本身便构成“知识”与“思想”的基础,反过来,“知识”与“思想”的融合,也构成“行动”的基础。正是在这个互为表里的过程中,主体充分觉醒着,将自己召唤到“可能性的将在的路上”;主体也获得充分的自由,不再屈从任何权威理论,也不再耽溺于任何教条主义,而是将那

“穿透”观念、逻辑和意识形态的无数感知之须,伸展到广袤的存在之域。诗或艺术,就此诞生!这是诗人、思想家、战士(或文学家、思想者和行动者)的不可分割的融合^②。换言之,鲁迅的思想就是艺术,或鲁迅的艺术就是思想;而这种“诗之思”,又只能承载在“行”之中,成为“行动”的“诗之思”。那么前面所言的“回到鲁迅”,就不止是回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单向地走向鲁迅,也是处在“无路可走”(包括幻灭于各种标准观念)的我们,在“无”的催逼下,迎接鲁迅走向自己。^[3]

正是在这种以胡风为中介的理解鲁迅的视野中,作者出色地处理了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这笔糊涂账。若以今天的通常眼光来看,这场论争既无价值,也无必要,因为无论“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左翼阵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的一个标签,而且很快也烟消云散了。但这场论争却引发了一场左翼文化界内部有史以来最大的论争,成为外人看不明白的“内斗”,也如今日网络上的口水战。但奥秘却存在于“口号”之下。“国防文学”不仅以其“政治正确”,有着向“外”的统战之效(表面上取悦于政府,实际上暗中“领导”),也由此确立的“正统”,向“内”实行着绝对的统治之功(通过认同口号,标明对“我”和“我们”的服从;而反对就是“汉奸”)。这一“口号政治”内含了此后丰富的历史内容,也被鲁迅称为新时代的“奴隶总管”。而另一个口号的提出,当然是“口号政治”之争,但却昭示着,如果仅仅为了权力,为了“一把交椅”,那么“左”就会立即转为“右”,“解放”的政治也将沦为新的“奴役”政治。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许不会取悦于政府,从而获得临时的政治功效,但却始终贯穿着“进步”与“解放”合二为一的主题,贯穿着“大众立场”或“人民立场”,而非“权力立场”或“夺权立场”。症结就在:为了权力,还是为了民众?^[5]

从今天的眼光看上去,“左联”批判“文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是一个“昨是而今非”的事件。事实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就已经批评了“左联”的“关门主义”。据作者考查,鲁迅的“半路出手”也极有可能是受“左联”领导者(冯雪峰)的请托,出面压阵和缓和批评分寸的。但问题是,鲁迅出手即不放,一直将批评持续到临终之前。鲁迅的文艺观点本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相当接近,他的批评方式也与瞿秋白、周扬等的“非此即彼”完全不同。这种诡异的现象如何理解?鲁迅的批评背后又

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如果纳入“我们自身及其处境”因素就会发现，在鲁迅看来，“第三种人”（中立者）在对抗“左联”批评家的“非此即彼”时，却陷入了“无此无彼”的境地。在反抗的作家们还在遭受“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和“摧残”之际，不去批判压迫者，却屡屡批评反抗者，这是一；任何不当的强力者都应该批评，但使用“他固然不该……但你也不能……”的话语策略，巧妙地将批评和更强烈的情绪转移到弱势一方，使“中立”态度仪式化，仅仅当作（对弱者）迁怒行为的掩饰，这是二；所谓“中立”，所谓“非阶级的人性”，虽然逻辑上成立，但在此时此刻的严峻的现实中，同样是一种掩饰，掩饰着随“地位”之“位”的移动，原来的不满者、批判者如何转而对现实谅解、妥协、认同，并把反对者视作一种麻烦，这是三；虽然是对现实谅解、妥协、认同，但却把这种无法公开的“存在状态”，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把人的脆弱和怯懦给予振振有词的理论化包装，使其完全正当化和合理化，这是四。^[6]也许，这些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时代的故事。

相对于理解鲁迅，理解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的障碍则更多来自于“历史的后果”。假若这场文化运动没有随政治革命而最终成为胜利者，而是像在印尼、马来西亚那样悲壮地失败了（由此凸显了普拉姆迪亚·杜尔和马华文学），那么理解的障碍恐怕要少得多。这种让“后果”覆盖“过程”乃至“后果=过程”的认知方式，不仅重创或稀释了历史的积累，也将珠宝一般的思想文化遗产遗落到历史的尘封之中。其中就有胡风的创作理论。

胡风的创作理论其实是一种主体性理论。他对创作问题的探究，延伸到哲学，其理论来源主要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也仅限于左翼文学的弊端；如果说多了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鲁迅的精神遗产。然而，他却做出了一篇大文章。用黄悦的话说，就是在传统的“演绎”和“归纳”的认识方式之外，又开出了一种“文学式”的认识方式。

问题源自“客观主义”（客观反映现实而不加一丝一毫的主观）和“主观公式主义”，胡风认为，这两种主义都是“奴役”的表现——臣服于观念的奴役。这在后发展国家是常见的现象，一如少儿总是以因袭的成人观念来（概念性、幻想性地）看世界一样。要认识客观存在，就要使认识主体符合客观对象，如客观对象所“是”的那样——这是常识。但这“常识”却包含了一个错误，或说省略了一个过程，即客观对象之所“是”，并不总是像一颗树、一块石头那

样，静静地呆在那里等着你去“看”，而是只有在你“正确地”“看”时，它才“正确地”“存在”。这就需要两个还原：主体由“意识”还原到“意识的存在”，客体由“感性的对象”还原到“感性的活动”。换言之，当你还处于“对观念的臣服”状态时，你仅仅属于有“意识”，只有摆脱“臣服”，让观念回到思想的原初状态，“意识的存在”才会产生；与此同时，当你只能依赖观念去认识世界时，那世界仅仅是你观念中的“世界”（“感性的对象”），只有击碎观念的束缚，进入“感性的活动”，世界或生活才回到其原初的状态。

在这双重的还原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战斗”，这个极具革命时代特色的词，更多时候被胡风称为“搏斗”。其功能是“主体通过与对象的‘搏斗’，在对象的反击下内化成为与自身的‘搏斗’，在克服对象的过程中克服自己，在体现对象的过程中扩张自己，于是文学创作得以实现”^[7]。这很像竹内好写鲁迅，在一种“挣扎”或“抵抗”中，完成自我“进入又扬弃他者”和自我“进入和扬弃自身”的双向过程^{[8]58-59}。经过“挣扎”“搏斗”，也经历“创伤”，观念就不再是观念，而变成了思想，一种活生生的、血肉化的思想，或称一种“思想要求”。这种“思想”的要求，使主体从观念和对象中得到双重解脱，获得双重的自由；或者反过来说，使“自身和对象同时还还原为‘感性的活动’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世界和生活遵循“现实/真实论原则”，以如其所“是”的样子展现出来；同时，也遵循“理想/价值论原则”，以如其所“应该”的样子展现出来。这双重的展现，既杜绝了后者对前者的僭越（受“真实论”制约），又通畅了前者向后者的迈进（受“价值论”引导，因为“现实性的真实的存在，必然要引出理想性的存在的真实”），世界的固有关系便由此而松动起来。这是艺术之于世界的最大功能，也是人类更为基础性、始源性的认识方式。^[7]

但这种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却被当作一种创作理论闲置了。这与鲁迅遗产的“隐性部分”被过分张扬的“显性部分”所压抑一样，因其自身的晦涩而遭遇了理解的厄运。但这显然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则是受制于“历史后果”这一理解的障碍，又被置于普遍服膺于西方理论“权威性”这一知识范式的背景中。鲁迅和胡风所切中的“病症”，正被今天的人们视作常态而处于凯旋的进行曲中；而左翼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也被今天的人们以反向的方式继续经历着而不自知。

社,2013.

注释:

- ①在拙著《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中,笔者曾分析过这个例子,见 P12 - 13、P139 - 142、P157 - 16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 ②胡风的原文是“思想家”的鲁迅,只能生长在“作为战士的他的道路以及作为诗人的他的道路的有机的联系里面”。(胡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见《胡风评论集》中册,P1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参考文献:

- [1][日]丸山升.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C]//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黄悦.鲁迅、胡风与左翼文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3]黄悦.“回到”与“不愿回到”:理解鲁迅之困惑[J].新文学(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 [4][日]竹内好.鲁迅·附录:作为思想家的鲁迅[M]//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 [5]黄悦.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6(4).
- [6]黄悦.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J].文史哲,2009(2).
- [7]黄悦.对文学的认识和文学式的认识:关于胡风创作论的思考[J].新文学(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 [8]孙歌.竹内好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Lu Xun and the Left - wing: Barriers of Understanding

ZHANG N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transition of the era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of understanding Lu Xun and the left - wing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1930s. Meanwhile,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is another one, such as the thinking mode of binary opposition: “upright and evil”, “angel and devil”. Furthermore, they depend too much on the established theories and concept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logic “into” the object. So, “Lu Xun’s ideas that cannot be understood”, the concreteness,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are all swept away in the study. The approaches to history are likewise changed from the painful “being compelled into” to the casual “wandering into” (Study of Diary of the Madman); the issue of “The Third Category Persons” tends to be satisfied literally instead of probing a real historical ethics and a realistic portrait; the controversy of “Two Slogan” is equally pale to differentiate another left - wing cultural thought of LU Xun; “The Writing Theory” and “Type Theory” of HU Feng thus, for their antiquated expounding, can’t make sense of the pain and wisdom with historical depth, nor view the forerunners from the humble eyes……

Key words: Lu Xun; left - wing; understanding

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何以走向式微

——以1990年代文学生态为考察对象

卢月凤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19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公共空间建构趋向多样化,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不再成为折射政治和思想事件的重要载体。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呈现出作家群体精英意识的淡薄,文学作品的通俗化与大众化,话语言说形式的多元化等面貌。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虽然在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的现代化方面意义深远,但随着这一话语所依存的文学样态倍受冷落,同时在民间话语、个人话语等不同文学表达方式的夹击中走向式微,在“无名”的文学场景中面临两难处境。

关键词: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无名的文学场域;启蒙的两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15-04

知识分子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同古代社会的“读书人”“士”等称呼有着相似的内涵,自古以来,他们不仅承担着文化使命,还深切关注国家发展,铁肩担道义成为一种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等先进知识分子由对这次运动的向往发展成广泛的启蒙运动,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致力于国民思想劣根性改造。鲁迅以作品的形式揭露封建礼教痼疾、批判国民性,在他影响下的“乡土小说流派”,创作旨归亦是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与民众精神的不觉醒。这一主题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随着民族矛盾不断激化,面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现实环境,革命、救亡的呼声逐渐湮没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反帝救国的紧迫性压倒了对封建以启蒙的初衷。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更是对作家的创作规定了方向,知识分子试图“化大众”的启蒙话语走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民众启蒙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出现了经济复苏、文化相对繁荣的局

面,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中再次看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复归的迹象。19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促使昔日被无限压抑的欲望表面化,大众文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冲击,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所坚持的启蒙话语也受到强烈冲击并走向式微。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文坛曾出现“告别革命”的呼声,社会发展中心由政治转向经济,文学格局也很难用一种话语模式来概括,那么以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为考察对象来分析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衰弱的原因意义深远。

一、大众文化对启蒙话语主要载体的冲击

文学与文化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所以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渗透着文化的因子。而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真正兴起在改革开放之后,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沃土,并在1990年代成为博人眼球的文化现象。戴锦华说:“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性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

收稿日期:2016-11-25

作者简介:卢月凤(1986—),女,河南郑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识形态实践。”^{[1]283}这时期文学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就是大众文化实践的结果,90 年代之前的文学格局是二元对立模式,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精英文学一直处于文坛主流,而精英文学正是启蒙话语的主要载体。在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下的 1990 年代,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显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带给文学最大的影响是精英文学从中心滑向边缘。而知识分子多是这一文学样态的书写者,他们试图以文学的手段启蒙民众,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的重铸,但这一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启蒙话语不可避免地出现衰落境况。

大众文化从文学生产、流通、接受方式等方面影响精英文学的生存环境。恰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2]156}“视觉”强调的是文化对文学流通的影响,在大众文化娱乐性、消遣性的刺激下,文学的流通不再局限于纸媒,而更多是诉诸于读者试听觉的电子声像、影视等新形式的媒介。同时读者也养成了“快餐式”的接受习惯,那些大部头的文学经典如果不加以包装和改编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比如把当代文学文本改编成影视剧本成为一种潮流,读者对《妻妾成群》《活着》《手机》等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最初源于以此为依据所改编的影视剧。随之读者的审美期待发生转移,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无厘头文学、网络文学成为追捧对象,曾经位居边缘的文学形式受到青睐,实际上这是大众文化加速了这些通俗文学的兴盛。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符号化不断侵蚀其审美性,同时文学创作被戏剧化,曾经所承担的探索、追求复杂心灵世界的使命被消解。这一趋势给精英文学带来新的挑战,那些一直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作家面临文学创作的瓶颈,加之文学整体上失去社会轰动效应而逐渐逃逸社会话语中心的趋向。新写实作家把日常生活神圣化,先锋作家由“怎么写”到“写什么”的集体转向等,迎来了大众文学繁荣的局面。读者阅读作品不再是单纯地获取知识而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昔日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愈加稀薄。从文学思潮的精神脉络来分析这一现象,无论是作者的创作心态还是读者的阅读兴趣,亦或是文学市场的商业化导向都在无意中认同了“欲望辩证法”的价值取向,而依然坚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书写的创作者失去了训诫和启蒙读者的思想资源,他们心中启蒙的使命感出现了危机。于是在社会从“官本位”到“金本位”的转轨中,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众多作家尝

试改变叙事方式以获得市场认可,出现了作家向影视传媒靠拢的现象,甚至有的作家依据电影剧本的要求进行文学创作,剧本仿佛成了衡量作家文学创作的标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边缘化,作为其主要书写形态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难以逃脱逐步衰落的命运。

二、“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对峙

诗人于坚在 1988 年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中提出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对立范畴,1990 年代仍继续发酵,在诗歌创作中围绕语言、汉语写作的思想资源、诗人的立场等方面展开了以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与韩东、伊沙、于坚等为首的“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于坚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纯粹的知识罗列,而只有民间写作是对日常生活原汁原味的呈现。虽然最终没有得出多少有价值的结论,但却使坚持“民间写作”立场的作家重新得到文坛重视,其影响力从诗歌波及到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促使民间话语成为多元化文学格局中的一翼。

何为“民间话语”?陈思和指出:“这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3]其实,“民间话语”既可以是学者进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阐释视角,也可以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持有的立场,这里主要指向后者。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所坚持的民间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启蒙话语一直有着相当复杂的张力关系。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他们可谓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现代延伸,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清醒认识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欲以思想启蒙的方式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痼疾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所以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成为主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象征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占据时代制高点,这就相对抑制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发展空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告别了极左思想的控制并获得一定自由,在刘心武《班主任》、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谌策《人到中年》等作品中看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复归。而“民间话语”在 1990 年代大众文化、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引起文坛重视,走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遮蔽,并在合适的土壤中日益强劲,挤压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生存空间。

造成这两种话语言说方式对峙的关键是作家在不同叙事立场引导下产生了迥异的文学形态。就拿

三、“无名”的文学场域与启蒙的两难

陈思和最早以“共和和无名”来指称现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特征,其中1990年代因碎片化、多元共生的文学形态而被冠以“无名”的称谓。在这一文学场域中,启蒙话语由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主流走向边缘,其历史合理性受到质疑;尤其是文学思潮与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文学话语向不同路径延伸,启蒙逐渐失去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效应,出现了两难的窘态。

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启发下,不同的创作形态涌现于文坛。追求对生活原生态呈现的新写实写作,关注个人经验及感情变化的私人化叙事,以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嘲弄其本质与规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视市民群体生存的奋斗与挣扎,性爱与欲望的新市民文学等不同类型,构成了“无名”现象的具体所指。尽管表现对象不尽相同,但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淡化,强调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是相同的,即使哪一方都不能占据文坛主导,但却共同加速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弱化。“新写实”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对启蒙理性的反叛,当“身体”以及相关的欲望、潜意识、无意识成为新生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时,朱文《弟弟的演奏》《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作品面世,林白、陈然在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支配下的“身体叙事”,无不是对启蒙话语的有力拒绝。当“去掉一切遮蔽”几乎成为一种创作姿态时,我们看到了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点正经都没有”“过把瘾就死”的创作模式仍在继续;莫言对人类生命意识中原始强力的肯定,文学中出现了对暴力和丑陋的欣赏,呼吁对历史本身的回归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表征,但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的恶化也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的发表可谓是文坛的及时雨,由此引发的王蒙、王朔与张承志、张炜之间的论争尚未得出实质性结论,但对扭转整个文坛沉闷的处境与文学书写中现实终极关怀的匮乏有一定的意义,不过依旧难以改变启蒙话语式微的局面。这是启蒙的两面性使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启迪民智、呼唤民众思想觉醒为能指的启蒙话语成为时代最强音,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1990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变,市场经济以“利”为主导的价值观冲击着中国传统“义”的价值取向,这就致使文学书写中的启蒙叙事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处于两难处境。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其主要言说方式的启蒙话语走向式微,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现代性内

人性书写来说,当作家把“民间话语”奉为圭臬时,就不再以社会导师的身份自居,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民间“藏污纳垢”“多元性”等特征,他们笔下的人性,超越启蒙话语所恪守的伦理底线,也不以“阶级”和“政治”为标准,我们看到的是完全自然、自由、本真的人性。作者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时,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承接了古代士人阶层的主体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灌注始终,在人性书写中,以消解封建话语为支撑,指向人性的真善美和尊严,至于人性中丑恶与阴暗多是极力批判的对象。所以“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话语核心,康德在《何为启蒙,答复这个问题》一文中强调“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4]22}。启蒙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对黑暗的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民众思想的不觉悟毫不留情地给以否定,同鲁迅所说的“一个都不宽恕”“有相通之处。李新宇在其著作中指出:“知识分子话语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获得民间话语发言资格者对知识分子的劝说与招降。他们认为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和引导大众,而应该彻底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5]这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民间话语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发起的进攻,但是中国社会无论在新时期、后新时期亦或是新世纪等不同阶段,知识分子文学书写中的启蒙话语都不能缺席。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尽管呈现出多元的景象,新体验、新生代、新写实、女性市民、新都市、新人类等不同的文学风格,但不难发现作者在叙事中的“民间话语”立场。市场经济成就了以民间话语为主的通俗文学,同时诱发了精英文学的低谷,而其言说方式的启蒙话语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这时期尽管有张炜《九月寓言》、张承志《心灵史》、梁晓声《又是中秋》《荒芜的家园》等彰显着作家启蒙意识的作品构成文学多元走向中的一个侧面,但却难成气候,因为读者期待的是消解权威、弥漫着消遣娱乐气息的文学作品。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6]22}。面对1990年代的历史语境,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衰弱的原因之一正是社会转型时期时代对文学新需求之间的错位使然。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文学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平凹、余华、阎连科等作家纷纷搁置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表现出对“民间话语”的倾斜足以说明新的文学发展趋势。

部冲突的表现形式。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描写了几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与悲剧命运,他们心中所坚守的宗教情怀是其人文精神的写照。这正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嬗变中恪守启蒙话语的两难处境之象征。于是,作家的创作理念出现分化。张承志和张炜以道德理想主义来对抗世俗化的文学环境,但一些作家选择了叙事转向,贾平凹在《高老庄》的后记中说,他所坚持的叙事立场是“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7]277}。余华在谈到《许三观卖血记》时说:“在叙述的时候,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8]135}莫言表达了他“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立场”^[9]。同时阎连科的《耙耧天歌》《天宫图》,刘庆邦的《种在坟上的倭瓜》《响器》等作品,表达对民间信仰的认同,而放弃了知识分子启蒙批判的话语立场。莫言的《檀香刑》体现出民间伦理对社会国家伦理的挑战;《丰乳肥臀》虽写了战争和历史,但在作品中毫无顾忌地呈现女性的“丰乳”,这是坚持启蒙叙事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其充满着前现代性底色的文学书写也一直是启蒙话语批判的对象。

借用狄更斯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可以概括1990年代的文学风貌,可谓是生机与危机并存。当我们为文学卸下沉重的负荷,获得自由欢呼雀跃之时,也不能忽视文学因无所承受而失重的危机。张志忠在《1993:世纪末的喧哗》中说:“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不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10]7}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正是在这种多元话语模式

的挑战下走向式微,比如,以自我情感表达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忽视理性的欲望叙事等话语方式都是对启蒙的解构。当“消费”“市场”走向时代前沿,人们沉溺于文学的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其质量。于是出现了非文学与文学的竞争,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的博弈,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尽管启蒙话语在两难的处境下走向式微,但人的精神的现代性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依旧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所以知识分子不能“自我放逐”,同时其精英意识在推动文学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 [1]戴锦华.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2][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 [3]陈思和,何清. 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9(5).
- [4][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5]李新宇. 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N]. 作家报,1998-04-02.
- [6][捷]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孟湄,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7]贾平凹. 高老庄[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 [8]余华. 我能否相信自己[M]//余华随笔选.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 [9]莫言. 文学写作的民间资源[J]. 当代作家评论,2002(1).
- [10]张志忠. 1993:世纪末的喧哗[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ploring the Reason of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the Intellectuals to Decay ——Taking 1990's Literary Ecology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

LU Yue - f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90s, the social public space construction tends to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gradually loses its sensationalism, no longer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refraction of politics and thought events. The literature field of this period presents elite consciousness weakness of the writers group,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literature, the diversity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forms, etc. Although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i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has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t faces a dilemma in “unknown” literary scene as literary forms of the words are neglected, at the same time, it fades in the attack from the different literature means of expression, such as folk discourse, personal discourse expression and so on.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the intellectuals; nameless literature field; the dilemma of the enlightenment

“文学身体”的多维符码

——桂西北当代小说的一种读法

鹿义霞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身体既是肉身的存在,也潜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符码,承载着复杂的社会、人文讯息。从大山中走出的桂西北作家们虽文学开掘领域各有不同,却大多孜孜于身体叙事。解读桂西北当代小说“文学身体”的存在方式与修辞策略,揭示其生物身体之外的各类附着和累积,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地域的基因链条与时代的不同侧面,透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处境。

关键词:身体;苦难;城乡;权力政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19-04

在桂西北当代小说中,身体书写是相当突出的,透过它,生活的苦难被赋形,身份的焦虑被凸显,现代的忧思被呈现,政治的创伤被隐喻……文本中一再被凝视、被特写的“身体”成为桂西北作家群重要的叙事对象,它渗透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潜隐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指涉。

一、在生物身体之外:生活苦难的赋形

桂西北由于多山多石、滩陡流水急、岭谷相间、地处边缘,长期以来几乎与外界隔绝,被称为“南蛮之地”,“七山一水二分田”,甚至被称为广西的“西伯利亚”。贫瘠、粗粝的“石山王国”,使在这里生活过并从这里积蓄写作原料的作家尝尽了底层的辛酸,看尽了生存的艰难,从而引爆了作品中喷涌而出的苦难意识。他们更倾向于把目光投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挥笔勾勒生存的疼痛。伤痕与疼痛往往是通过感官体验出来的,于是身体被频频推上前台,链接了严酷的生活现实与更为隐秘的精神天地。

文学是有出生地的,从桂西北走上文坛的作家们常常将复杂的目光扫射到身边的山石、暗河、野

草、黑森林等,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意象化,借助身体与自然的通感来叙述生活。比如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在我们村,最高的山是加广山,然后依次是加脉山、加料山、加饭山、加权山。我们要在这五个山顶上,砍掉五棵大树,之后在将倒未倒的树下,安排一个人在树下守望。加权山是我弟,加饭山是我哥,加料山是我,加脉山是我妈,加广山是我爸。”^[1]东西的《草绳皮带的倒影》中,草绳、皮带、倒影与人的身体、人的命运构成双关。蓝怀昌的《一个死者的婚礼》中,一面是自然的受虐:活了一百多年的老树奄奄一息,整个格鲁苏城都沉浸在黑暗的雾海里;一面是巴楼人惨遭大屠杀。作家们好似剪辑师,借助大自然与人的身体的蒙太奇混剪,书写底层人野草般的生命,展现其身体的承受哲学,对苦难进行了极富张力的书写。

桂西北当代小说有多篇涉笔身体的残缺,或先天残疾,或后天致伤,或偶然受难,或宿命“阉割”……生理身体的描摹与生存现实的不堪互为表里,盘根错节。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既有大社会的长焦,又有小家庭的短距,全面立体地为读者呈

收稿日期:2016-12-30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桂西北作家群当代文学叙事研究”(KY2016YB045);桂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地缘文化与生命诗学:广西壮族当代文学意象研究”(201608)

作者简介:鹿义霞(1977—),女,河南开封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现了一个冷酷荒诞的世界。小说中被欺辱、被隔绝的王老炳一家，父亲瞎，儿子聋，媳妇哑，身体的灾难和生活的艰辛共存。李约热的《李壮回家》中的弟弟李壮，原本是生活在千张镇上的一个青春蓬勃的男子，在经历现实的打压和理想的挫败后如同被抽干了汁液的、蔫了的植物，悲怆地向那个“有狐臭”“一只腿长一只腿短”“已经和十二个男人睡过觉”的杨美求爱。而小说中的哥哥，最大的希望是打捞到一网银鱼，因为“银鱼可真是件好东西，我看见它们，我就感觉我那只被摘掉的眼球又回到我的眼窝里”。故事的最后，他仍然没舍得去为自己装一只假眼。李约热的另一小说《巡逻记》中，甘湾村被戏谑为“肝大村”，因为连续十几年，村里的小伙子在新兵体检时都是因肝大被刷了下来。在底层人物的世界里，关于身体的叙事闸门一打开，生存的不易就如同一层层剥开的洋葱，那么辛辣，让你眼泪汹涌。随着生活的内核被一点点裸露，屈辱、苦难、挣扎被物态赋形。这些小说中，残疾或者阉割已经超越了医学的生理范畴，携带着呼啸而来的疾风骤雨和丰富驳杂的想象，它们在诉说一种人生，讲述一种困境，咀嚼一种苦涩。

在身体的残疾之外，身体的“流通”更是一种难言的伤痛。它不但关系到身体本身，更指涉精神创伤。东西的《耳光响亮》中的姐姐牛红梅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多重身份的变迁：作为少女的她、作为姐姐的她、作为恋人的她、作为妻子的她、作为母亲的她、作为第三者的她。“牛爱”“牛恨”“牛感情”三个生命在她的子宫里夭折，其身心都经受了不堪承受之重。岁月对于她而言，一撇一捺都是被动的承受和人情的凉薄。凡一平的《圩日》，写妻子迫于生计去镇上为米店老板做女人，夫妻二人的尊严折腰于斗米。东西的长篇《篡改的命》中，贺小文为生活所迫做了暗娼，竟然得到了婆婆和丈夫的哑忍和默许。家人从愤怒、冷嘲热讽、尴尬直至帮着掩饰，这背后，搅拌着多么悲怆的况味！

关于身体与生存多艰更极端的故事是身体的殒灭与消亡。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因为向采石场老板索要工资没有成功而愤激杀人，最后又被人所杀。《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生活困窘的母亲因为捡了一块脏肉因而被戏谑、被侮辱，悲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父亲离家出走，女儿被强奸，母亲不堪生活的多重折磨而自杀。凡一平的《女人河》中的船伙计在河上讨生活，下水去探触礁的船只，不幸沉入了河底。黄佩华的《百年老人》中的农保田，妻子依月、依达姐妹被红水河吞噬。《涉过红

水》中的巴桑、《红水湾上的孤屋》中的无名老者，在红水河打捞起无数溺水者。极端的故事里渗透着复杂的生存悲情。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底层最无力的小人物，他们越是挣扎，加在其身上的绳索就勒得越紧。

桂西北作家群笔下聚集了一大批生活在苦难中的小人物。如果说身体的“不正常运行”是小说的发生装置，那么生存的苦难则是其小说叙事的推动机制。作家们站在底层群体的立场，以身体为媒介，既书写人们对苦难的坚忍承受，也揭示人们对苦难的无奈应对。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世界后面隐藏着忧郁与悲悯的目光，表现出对人性的观照和反思。

二、拨开身体叙事的表层：城乡二元生态的表述与想象

桂西北作家多有乡村生活经历，又有从乡进城的足迹。刚刚洗去脚上黄泥巴的他们对农村有着特别深刻的认知，对都市也有着十分清醒的体察。那一份都市外乡人视角下的审视，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作家们以身体书写为时代、社会的病象把脉，其身体叙事下的城乡世界，在他们笔下发酵为城乡二元生态的表述和想象。

城乡的两极分化呈现在身体叙事上，常常是惨烈的姿态。鬼子的《农村弟弟》中的马思，是城里干部因当年婚外情在农村生下的儿子，他为了回到城里，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不惜杀母。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的唐艳，是以卖身的代价与屈辱的经历圆了进城梦。而东西《篡改的命》中的汪槐、汪长尺父子为了进城，亦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汪槐不惜耗尽家财、赔上健康、赌上所有，以换取儿子的城里人身份。作者以苦涩荒诞的黑色幽默把荒谬与平静、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城乡的两极分化，令人触目惊心。

桂西北当代小说没有把乡村浪漫化，也没有美化都市的喧嚣与躁动。作家们聚焦现代化视域下乡村的破败与当代城市文明下迷惘的人性，文本中的身体叙述传递出对社会的深沉思考。李约热的《巡逻记》与《一团金子》中，赌博正像毒蘑菇一样生长蔓延，村镇的一些年轻人像中毒的植物，沉湎其中不可自拔；同时，乡村也失去了作为乌托邦乡土的特征，呈现出枯萎凋零的气象。而那些进城的青年，或者在现实中失去了诗心，或者在都市的大染缸中被扭曲异化，都市的欲望泥沼吞噬了传统文化诸多的伦理品质。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讲述了一个看似荒唐实则悲怆的事件——三个进城之后儿女不认父亲。李四曾把他的三个儿女看作自己心中的

“麦田”，他所希望的只是让孩子们记起自己的生日，但多次暗示换来的仍然是一片冷漠。自杀的他也许到最后才明白，进城后的孩子们就像瓦城上空的麦田与漂浮不定的云朵，看得见却够不着。

桂西北作家还敏锐地看到，在现代化大潮中，人们身心的漂泊和无所依托已是典型的文化症候。李约热的《墓道被灯光照亮》中，做保安的老李自嘲儿子留学德国，在西门子公司任职，在青山有别墅。外人所不知的是，老李的皮箱里除了换洗的衣服之外，还藏有儿子的骨灰盒。其子死于都市现代化下的病症——“得的是败血症，他长期跟一个老板搞家装，检查出来时，已经是晚期”。特别悲情的是，老李因为失去乡土而难寻可以安放儿子尸身的地方，儿子的灵魂难以“回家”。

进城受伤或致残的例子，在桂西北当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密集呈现的情节已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成为复杂的现象。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中，“我”和兄弟们厌倦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放弃土里刨食的困境改去城里打工，结果不但没有赢得财富，反而运交华盖：我哥的三个手指被机器锯断，我因讨要工钱差点送命，我弟为了有烟抽而偷钢材遭受一顿痛打。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不甘留在农村，向老板索要工资无果而杀人，最后也死于别人设计的谋杀。故事似以酷烈的姿态暗示如下问题：在都市化的滚滚洪流中，“进城”的他们只能是城市的局外人或者过客，最终被城市所践踏或牺牲。

面对条件优越者或者围观者过度的热情和强加的善意、悲悯，弱势者、被救助方如何守护尊严？李约热的《火里的影子》，通过姐姐杀人之谜将探照灯探进了苦难者的心理迷宫。小说中，姐姐杀人的真相一直是个谜。记者的长枪短炮对准了她出身的家庭，来小村寻找“恶基因”的由来；医生也来村里寻找源头，怀疑“我姐”得了精神病……但这些都非杀人的真正诱因。姐姐之所以杀人，是因为她只能看到黑色和白色，不幸的她总想躲在自己的壳里，而类似“施舍”的“暴力慈善”让她无以躲藏。“那种悲悯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侵犯，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为了躲开这种过度的热情，免得自己被围观被曝晒，她只有“拿着一把水果刀，追逐杀戮帮助她的同学”。身体，成为“进入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敏锐切口”^[2]。小说以肌体的苦难与极端的杀戮说明，高调而粗暴的慈善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伤害，比如自卑的泛滥、尊严的缺失。

在桂西北当代小说的世界里，身体修辞播撒在

文本中的许多角落。拨开身体叙事的表层，文本的深层涌流的是作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对社会的忧患意识。

三、撬起身体的沉重分量：权力政治的象征与寄托

权力的疆域无所不在，政治的影响绵延不绝，它们不但搅动起社会风云，也大肆侵入私人领域，投影到身体上。“身体”的压抑、“身体”的戕害、“身体”的流动、“身体”的张扬，背后掺杂了大量社会性元素。“在身体上，一直遮蔽着厚厚的历史帷帐，充满了沉重而荒诞的政治文化负荷。”^[3]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相当多的作家通过身体叙事阐释时代和社会的密码。十七年文学中，身体叙事几乎被终止，文学负载起将革命圣洁化的使命；知青文学中，张贤亮以情爱表象凸显生存真相，其偏离宏大叙事的私人叙事别具一格。身体叙事投影着时代，表现着灵魂的悸动。桂西北当代小说家们也热衷于勾画身体符号，他们更倾向于展示身体荒诞的存在状态，以夸张、反讽的笔调，撬起身体的沉重分量，书写一代人的身心创伤史。

东西的《后悔录》与李约热的《我是恶人》都重在揭示“文革”造成的心理创伤难以治愈。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性失败”还是精神病，都浓缩着一系列时代病症，寄寓着作者的复杂认知。作家东西和李约热擎起身体的旗帜，喊出了宏大的生存命题，映射出政治荒谬的辐射力与精神疼痛的持续性。东西的《后悔录》以“我”（曾广贤）为轴心，串起两代人的“性挫败”，描写文革中与文革后的身体怪圈，从而在身体叙事的幕布之下揭示政治后遗症，书写心理创伤。文革语境下，“我”妈是绝对听话的“好学生”，把领导教诲当作信仰与宗教。在她看来，同志之谊高于一切，革命情怀不容玷污；哪怕是夫妻，生殖之外的性事都是不道德、不高尚的，从而导致“我”爸近十年未近女身。“我”也受此观念影响，泄露了父亲与赵山河的事情从而导致父亲屡遭磨难。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曾广贤，因在男女情事方面的单纯、执拗或者说心理障碍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可以接近幸福的可能。即使在文革之后，其身心仍然在自制的禁忌内原地踏步。从性禁忌的文革时代到性自由的开放时代，性与政治的非正常关系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消失，巨大的副作用仍然禁锢着故事中的人们。李约热的《我是恶人》中的马万良亦是走不出“文革”积重的创伤，最后身患精神病，于恍惚之间命丧于白露岩。东西与李约热书写身体的荒诞史，其深刻之处在于：他们不但瞄准了文革禁忌中的身体，还书写了政治禁忌的延续性、放射性，多侧

面透视了未能治愈的身体与心灵。在此,身体“提供了瞭望世事变迁的窗口”^[4]。

桂西北当代小说还有把镜头对准失语者,以身体为符号书写心理之殇。李约热的《殴》以知青梁燕三十年后回黄村为切入点,将时代政治的风风雨雨、个人命运的起起伏伏纳入一个经纬圈内。梁燕与黄村的最大联系,除了当初的知青经历,除了男友在此的遇难,还有方承运的一个肾。当年,梁燕因为得了一场病必须换肾,那个瘦弱的富农方承运为了能早一点“脱帽”,竟跑到公社革委会主动为标兵梁燕捐肾。几十年后,梁燕再到黄村时,方承运已化作一抔黄土。黄村人依旧太容易冲动,当年的斗殴造成的巨大灾难没有改变他们火爆的脾气;方承运的卑微依旧,他付出一个肾的代价,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被人记住;梁燕对农村人的误解没有改变,她接受了农村人的一个肾,反倒觉得是累赘,甚至找到医生欲把肾摘下来,“再换一个新的”。小说书写知青下乡后与黄村人彼此的不理解、暴力冲突以及双方都受到的伤害。这正如一张钞票被截成两半,一半在知青手中,一半在黄村人手中。知青会时不时借助话语优势向人们倾诉悲情、展览苦难,其实钞票残缺的另一半——那沉重的另一部分,“早已被黄村的人苦苦吞下……”时代大潮滚滚向前,青春只是一闪而过的影子。畸形的岁月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肉体的创痛,还有心灵的扭曲、信念的失落与理想的幻灭。无论是知青群体中失去身家性命的丘阳,还是黄村人中被枪毙、被判无期的年轻人以及被摘去一个肾的方承运,没有谁是社会的赢家。小说借助身体叙事,将疼惜的目光投向了为时代买单的

一代人。

东西的《一个不劳动的下午》《雨天的粮食》,围绕乡村权力,勾画了两个以职务换取钱色的干部。陈裕德、范建国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抢占女性资源。小说中的性叙事不但昭示着自古以来就存有的男性强烈的占有欲以及父权统治逻辑,还揭示着乡村权力政治的魔障。这些小说通过身体叙事,体现了“社会力量与权力是如何渗透与宰割了个人的生活及命运”^[5]。

梅洛·庞蒂曾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6]¹³桂西北当代小说家,正是借助对身体的呈现,来关注生存之艰,呈现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影射权力政治,揭示人性黑洞,从而展示更为宏观的社会生活。身体之痛的背后,是身体的社会学、身体的政治学、身体的经济学和身体的人类学。

参考文献:

- [1]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J].作家,2005(5).
- [2]李梅.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论“身体叙事”的文学含义[J].理论与创作,2007(1).
- [3]崔红涛.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 [4]权雅宁.论阎连科底层写作的身体叙事[J].小说评论,2012(4).
- [5]夏豫宁.论毕飞宇小说的身体叙事[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 [6]谢有顺.身体修辞[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Multidimensional Code of “Literary Body”

——a Reading Method of 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in Northwest Guangxi

LU Yi - xia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body is not only the existence of the body, but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de, carrying a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writers of Northwest Guangxi walk out of the mountains, though they dig in different fields of literature, but most diligently in the body narrative. Deeply reading the exist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literary body” in Northwest Guangxi Contemporary novel, revealing all kinds of attachment and accumulation outside its biological body, we can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nuclear gene chain and the region of the era, then see modern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spiritual situation.

Key words: body; suffer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power politics

国民人格的变形镜像

——谈贾平凹的《老生》

梁艳丹

(郑州大学 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贾平凹的长篇新作《老生》自出版后备受关注,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小说,其批判的矛头所向就是“国民性”。《老生》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运用了夸张、变形、戏谑、意象性等叙事手法,所呈现的是一种关于书写对象的变形镜像。

关键词:《老生》;批判意识;国民性;变形镜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23-04

《老生》^[1]是贾平凹2014年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出现在了多个好书榜单上。从整体水准上看,也许不能说它高出了此前的《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但从主题到表现形式都还显示出了某些新的特质。本文围绕小说的思想主旨、叙事视角、结构特征等要素谈一下有关看法。

首先,这部小说在思想主旨上,与贾平凹之前的作品有着某种内在的差异。我们知道,贾平凹小说的“典型环境”就是他的商州故土,“典型人物”就是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对于他的描写对象,贾平凹的情感态度呈现出了这样一个路线图:他最初的“商州系列”作品,多是对这个地方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进行歌颂。写完《废都》,由城市重返乡土后,“视角不一样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了”,而是“基本上都在说商州不好的东西”^[2]。或者说,其文学世界,在内在精神上体现出了这样一种转变:从对心中乡土的歌颂情怀到对现实的乡土人性的理性批判意识。同样的地域文化,同样的场景及人物,但他的作品开始真正学会了“向整体说话”。一个作家,当他真正学会了“向整体说话”,对于他的描述对象能真正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的文学世界才算是抵达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心理

学的角度看,或许意味着一场隐秘的精神逃亡:由乡土家园梦的破灭,及对都市生态的不适应感(《废都》),深深地逃进写作本身那“叙述的密林”中去疗伤。《老生》基本上延续了作家自《秦腔》以来的创作精神,在作品的基调上,如果说《秦腔》还是作家为逝去的风土人情所唱的一曲挽歌的话,《老生》则是一部颇具批判色彩的变文。《老生》的叙事浸润有“清白和温暖”,但更多地是“混乱和凄苦”,是“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样的题材本身也许很难给创作主体带来精神上的抚慰,但狂欢化的叙述想必会成功地补上这一功能。

《老生》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沿两个似乎有些相悖的维度,把贾平凹的小说叙事推向了一个更高的表现层次:一方面,其叙事空间伸向了更为宽广的历史场域;另一方面,人物则更加由具象走向抽象。活动在这些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一个个人物,虽然也都是活生生的生存个体,但总让人觉得更像是一些符号化了的人。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作者要触及更为深刻的内容:勾勒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面相,大时空跨度地漫画国民人格的现代演绎。

首先,作品描写的场景发生在秦岭里的一些村镇上。作者以“蒙太奇”的手法,在四个大的历史场域——革命战争时期、土改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及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剪辑了一些人物故事,浮

收稿日期:2016-11-20

作者简介:梁艳丹(1991—),女,河南西华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光掠影地叙述了祖辈父辈及我辈的生死。这里，众多人物的行动被置入不同的历史场域，但总好像有同一根神髓在连接着、主宰着各种历史环境中的人——我们不妨仍以国民性命名之。这里，看似具体的历史人物，实乃全体中国农民的一些缩影；看似在进行一种关于“大历史”的叙事，其实是在描写历史语境下琐屑人性的脸谱化表现；看似某种地域性的人性演绎，其实折射了整个国民性的现代镜像。小说所铺陈的基本事实脉络就是，历史戏剧的荒诞性与自私、蒙昧、缺乏理性和良知的人性状态，互为表里地创造着真实而又奇特的中国历史。

放眼中国新文学史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以其深入国民灵魂的力度，把国民性这一现代文学的表现主题推至顶峰。后来，赵树理、高晓声、韩少功等作家接续这一文学表现主题，都曾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贾平凹《废都》之后的作品，尤其是这部《老生》，在新的历史视野下，与这一现代文学脉系遥相呼应。在《废都》之前，贾平凹着力描写的主要是商州这一特定地域的人与事，到《秦腔》以来的几部作品，他思考得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的命运，虽然表面上看写的仍是一些特定地域的人与事。贾平凹在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古炉》时，说的一段话，就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古炉》封底）而《老生》，不但延续了这种思想主旨，而且提交了一种全景式的书写，堪称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底层社会和人性的一面镜子。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没有先进的思想，没有现代意识，没有理性眼光，只是本能般地忙着生，忙着死。但不管是生还是死，都给人以某种难以尽述其味的“轻”的感觉。在第一个历史场域，老黑、匡三、三海等祖辈们，起初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能吃饱饭，能够依靠枪杆子抢地主家的粮食，能把财主的家财据为己有。游击队员们所抱的革命目的，有“消灭反动派”，有“建立秦岭苏维埃”，还有另一条：“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由此可见，社会各阶层人的境界也都不尽人意。他们可以随意草菅人命，可以随意像丢一袋垃圾似地丢掉自己的性命。他们做事表现出很多令人诧异的“去底线性”：缺乏对生命起码的尊重，完全无视生命本身的尊严，个体生命

在“阶级敌人”的语境中经常极受其辱……在第二个历史场域，随着土改运动的开展，富户们非常恐惧地意识到“天变了”，因为“定出了成分就划分了阶级，地主富农属于反动的，是敌人”；破坏土改不但吃枪子，而且“枪子还得他家里掏钱买”。穷户们却也都惴惴不安地闹着土地和财产的分配，谁都怕分配的结果不尽自己的意。老城村忙着分地时，唱师（即作品中那个亲历了所有历史阶段的专事“唱丧”的“老生”）可真够忙的，“因为这一个乡 23 个村寨里不停地死人，除了正常的死亡，更多的是一些想不通事理一口气上不来死掉的地主，还有在分地过程中因分配不公斗殴打架死去的贫农”。在第三个历史场域，也即合作化运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活动开展得可谓彻底。因为每个村都分摊有坏分子指标，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互相检举揭发，无中生有，结果冤死的冤死，气死的气死。在对“坏分子”的惩罚和体罚上，“心红气壮”者的手法中还经常融入了某种“超绝的想象力的智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描写：“几个人在给送来的那三个坏分子下马威，蘸了水的麻绳捆住往紧里勒，三个坏分子一个不吭声一个只吸气一个杀猪一样叫，叫着叫着就没气了。有人说：叫呀！没气了？没气了就补些气！便拿了给架子车用的充气筒，皮管子塞到肛门，嗤嗤地往里打气。”在第四个历史场域，也即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小说告诉我们，此时的人们继续发挥着“农民式的狡猾”。他们“巧妙”地利用政策，通过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的伎俩发家致富。在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戏生身上，我们似乎仍能清晰地目击到阿 Q、二诸葛、陈奂生们的影子。可以说，虽然历史变迁了，社会更替了，时光推移了，江山旧貌换新颜了，也改革开放了，但唯一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就是那顽固的国民性。在它的混沌却又强势的“光线”氛围中，依然看不到人性的光辉，依然看不到高贵的人生境界。不管是“头顶上的星空”，还是“内心深处的神圣感”，在它那里引起的，好像永远都只是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漠然。

二

无需赘言，《老生》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应该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始终有着现实主义的底色，呈现“国情、世情、民情”永远都是其创作的基本思想追求。不过，他显然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当代作家，必须要不断汲取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手法的优长并加以革新，必须要不断转换其叙事模式——这一点与自我“风格”的纯熟以及一个作家创作的最高

境界之间其实并不矛盾。要想增强作品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作家在处理人人熟知的题材时,必须在叙事技巧上尽量给读者带来某种“陌生”感。贾平凹在《老生》的后记中谈到:“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通常来看,中国作家有一种现实主义惯性,但我们也不要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一种缺陷。其实,现实主义作品才是最难写的作品。某些现代主义式的随意书写,有时还能遮掩一下作者的创作水平;而现实主义的书写,则最直接地检验了作家的创作水平,使其无以遮掩——写好了,就是大手笔;写不好,就会味同嚼蜡。

自《秦腔》开始,贾平凹其实就在有意地尝试着多种叙事技巧。不难发现,贾平凹在《废都》之后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其叙事氛围中“出现了一些意象的东西”,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互补互渗的结果。《废都》之前的作品,如获得较多赞誉的《浮躁》,“是老小说的写法,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写法”,或者说“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2]。《废都》之后,贾平凹逐渐探索出一些新的写法,其基本表现是:中国本土味及其浓厚的历史文化语境、题材内容、语言形式与人类意识、现代意识及某些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意象性叙事氛围的成功营造固然受到了绘画中的意象主义及文学上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贾平凹亦从事美术创作,且从美术作品中汲取了不少东西),但贾平凹在借鉴它们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不显山不露水地化用了它们,以致于读者在阅读他的小说时,既能明显感知到其中融入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又能发觉其原创性之所在。新的叙事策略使贾平凹的小说延续了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底色,又使其美感氛围得到了强化。

贾平凹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技巧的化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采取的一些独特的叙事视角。在这方面,《秦腔》和《老生》两部作品最具代表性。《秦腔》叙事情节的“非情节性”或者说写意性特征,是作家钦定的叙述者引生(一个善良、朴实、秉有生命情怀和审美情怀的“疯子”)的独特叙述口吻所引发的;《老生》叙事情节的漂移性及夸张、变形、狂欢化的话语色彩,则与作家所写的又一个特殊的叙述者——冷眼看尽人生世事的唱师——处在奄奄一息之际的那种谵妄般的叙述语气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关联。故事中,奄奄一息的唱师像是一个游走于阴阳

两界的幽魂。历史是怎么演绎的,历史中每个人的命运是怎么展开的,他好像都知道,他于冥冥之中不断道说着从他飘忽的记忆中大块掠过的历史戏剧。

也许,正是《老生》这一独特叙事视角所导致的话语氛围,使得这部现实主义长篇所反映的国民性发生了变形,使得这面反射国民性的镜子成了一面夸张的大哈哈镜,有些叙述甚至具有了某种魔幻色彩。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发生,与小说中的叙述者有关,作者本人则“狡黠”地脱身了。这部小说所采取的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颇为隐秘地使小说的另一叙事特征得以彰显,即叙述语言的狂欢化。其实,也正是这一点,为作家的这样一种诉求——如何使叙述“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保证。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曾言:“小说性就是一种杂语狂欢性,其主题精神可能是悲剧性的,但其语言却“完全是欢快的,无所畏惧的,洒脱不羁和坦率直白的。”^[3]¹⁸⁷毋宁说,一代代小说家都在努力创造着这一话语事实。

显然,《老生》的叙事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其民间原生态的、不拘形迹、欢快诙谐、富于动感以及实写与想象性的描写间杂的叙述话语,确立了小说的狂欢化叙事风格。不管是在描写喜剧性的场景还是悲剧性的场景,都能给人带来阅读的快感。尤其是那众多的悲剧性场景的描写,让人为那人性的野蛮、蒙昧的表演感到寒栗的同时,快感神经也会不时为作品幽默、诙谐、生动的语气和恣意狂想性的叙述所刺激。另外,小说中还有很多描述,则属于小说独特的叙事视角自身逻辑的产物,它们带来的是另一种性质的话语狂欢,如:“唱着唱着,我感觉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来了不吭声的豹子,也来了野猪,蹲在那里不动,还来了长尾巴的狐狸和穿了花衣服的蛇。它们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也不停唱,没有逃跑。唱完了,我起身要走,它们也起身各自分散,山坳里就刮开了风,草丛里开着拳大的白花,一瞬间,在风里全飞了,像一群鸽子。”

三

这部小说结构上的铺陈也带来了某种“陌生化”效果。这主要表现在其显在结构上的双重线索性。主线索是唱师过电影一般呓语四个历史场域的故事;次线索是放羊娃在唱师临终的床榻前听父亲从镇上请来的老师讲解《山海经》。写作因人而异,各有各的路数,而且,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往往也是路数各有不同。那么,贾平凹为什么会想起来在这部小说里安排这样一种结构呢?笔者认为,这两

重故事线索的并置并非一种偶然幻想的结果。

这固然是作家追求“陌生化”阅读效果的一次特殊的叙事路数。在后记里他谈到,《山海经》是他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也许是作家从《山海经》那种空间感很强的叙述结构中得到了某种灵感吧,“《山海经》是一座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于是,“只写人事”的《老生》与“只写山水”的《山海经》就有了某种神不似而形似的同构性。一方面,这种同构性增强了整个文本设置的空间感;另一方面,小说叙事的大时空感与《山海经》叙事的强烈空间感,由此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互为特殊镜像的关系,这使得两者之间有了某种映射性。

两个有着如此历史距离的文本之间,除在叙事的空间转换方面的互相映射外,还有没有内涵上的一些延续性呢?或许之。渗透在《山海经》中的观感、认知事物的方式,如对周围事物认知上的直感方式及巫术迷信色彩的处理方式等,到了今天,也仍有不少被延续下来。两个文本的叙事在内在质地上,都有着令现代理性无法解释的混沌性。《老生》中,不管是社会哪个阶层人物的活动,都有讖纬色彩顽固相伴,这使得作品的整个叙事场都弥漫着传统的阴森氛围。当然,也正是这一点,恰恰给唱师施展自身绝技提供了广阔的历史时空。

作家让这双重线索发生关联的方式相当独特:两个故事板块之间总是在上下文间发生着叙述上的牵连。老者每读一段《山海经》,就由小孩问问题,老者作答。老者的解答中,还不时拿今天的人生世

事举例子去说明古人所表达的意思。而唱师的叙述往往接着那一老一小的问答进入状态。思绪处于谵妄状态的唱师的叙述,其叙述的开始又总是由上文“问答”中的语言符码而来。这样一来,作家为这部小说钦定的叙述者,那位奄奄一息的唱师,就像是一直处于梦与醒之间的梦游状态,而一老一小的对话又不期然地成了梦游者的提示音,引起其自由联想,及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模糊追忆。而小说的叙述语体,则充分表现了叙述者当下的存在情状,具体表现为——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谵妄般的幻听幻视情节随意地交织在一起。

或许作家还有另外一些更深的思考,就是《山海经》的叙事看上去怪诞不经,但“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看来可能也是怪诞不经的事,但这的确又是真实的故事。对作家贾平凹来说,此举很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种意思:他在尽可能使自己的叙述“陌生化”的同时,也在提醒读者以及他自己,要充分警惕从元叙事的视角去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哪怕是充满了异常想象的,其背后也折射着外在的或内在的真实。

参考文献:

- [1] 贾平凹. 老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2] 贾平凹,王尧.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J]. 当代作家评论,2002(6).
- [3]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 李兆林,夏忠宪,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eformed Mirror Image of National Personality

—On Jia Pingwa's *Laosheng*

LIANG Yan - d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Jia Pingwa's new novel *Laosheng* is so much concerned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is a critical novel with its target, "national personality". *Laosheng* is not a traditional realism work. It applies such narrative methods as exaggeration, distortion, banter, and imagism, which make it a deformed mirror image of the object.

Key words: *Laosheng*; critic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personality; deformed mirror image

追逐与抵抗虚妄的虚妄

——论郭昕的长篇小说《驯风记》

司真真

(郑州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郭昕的小说多以进城者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进城后对钱权的追逐,他们进城后虽然物质上不同程度地得到满足,精神上却依然难逃束缚,时刻感到虚无、烦躁、疲惫。他们开始寻求救赎、解脱的方式,马立找到了诗歌,刘湘民找到了听风,而回乡成为他们心灵获得片刻宁静的一致方式。小说中城乡对立模式的书写,隐含了作者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肯定。最终,回乡等方式的救赎也陷于虚妄,在宗教文化的阐释中沦为命定的悲剧。

关键词:郭昕;《驯风记》;虚妄;传统文化价值观;宗教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27-04

郭昕的长篇小说《驯风记》以几个由农村进入城市奋斗的不同领域的人物为核心,展现了他们在拼搏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精神危机。小说内容庞杂,却不失头绪,紧紧围绕虚妄,将人物的救赎方式一道道来,展现了不同人物的人性和大时代下生活的众生相。

一、追逐钱权与抵抗虚无

对金钱、权力、欲望的追逐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经常书写的对象。其中,对权力的追逐与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有关。“中国思想史流传至今的那些概念,诸如入世与出世,兼济与慎独,庙堂与江湖,中心与边缘等等,皆出自政治为轴心的官本位文化,一切以权力为转移,以此为参照,则权力无疑是天下最具威势、最具价值的。”^{[1]81}对金钱的追逐也与我们的封建文化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公开宣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民间也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驯风记》中,由农村奔向城市的诸多人或逐钱,或逐权,展现了传统文化和当代商业时潮对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小说中的马立、刘湘民是主动奔向城市的。马立对名利、金钱的追逐

丝毫不落于人后。他经常在电视及其他传媒上露脸,成为被业界熟知的专家,然后,他待价而沽,不断地调整自己被采访节目的价格。追逐完金钱后,他有了更高的追求: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名,是虚的。位,才是实的。他只有得到一个职位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2]。但在权力的追逐中,他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刘湘民对权力最为热衷,“从小到大,当官都是刘湘民的理想,是他的追求”^[2]。这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关。幼时,他在孩子们中称王;上小学后,他想尽办法做班长;大学时施计当上学生会主席;毕业时,因善于表现被系主任推荐给一位县长做秘书;到了社会上,因有女学县长县长的帮助,他轻轻松松当了副科长、科长。……一路上对权力的追逐,刘湘民很是享受。“他喜欢听人汇报,喜欢在各种文件上签字,他觉得这个城市在他的笔尖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那样的感觉,让他的心理得到了巨大的满足,那是权力带给他的满足感。”^[2]

在城市生活的这些异乡人,虽然他们能从金钱、权力和欲望的追逐中获得满足,但也时常会感到一切都是虚妄,感到烦躁、疲惫。马立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点令他自信、满足,但其他诸如升迁、

收稿日期:2016-10-10

作者简介:司真真(1983—),女,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调资等很多跟生活品质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事情，一直都不如意。有时候，他会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虚妄的”^[2]。刘湘民在当上蜜如市市长后，经常会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生活总是无聊”，“随着官越当越大，生活越来越像一场接着一场的表演，他感觉越活越假，越活越累”^[2]。

为了缓解心中的虚妄、烦躁与疲惫，马立采取的方式是阅读诗歌和回乡。马立读书时代就喜欢上了惠特曼，他觉得惠特曼是一个能让人产生能量的诗人。当他无情地嘲弄自己卑微的出身与命运，看不到希望时，他接触到惠特曼的诗歌，“在一豆灯火之下，惠特曼的诗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灵光。他一读起那些诗，好像鲜花在春天的阳光里开放，如同树叶在细雨中沐浴，身体都会产生一种通透的感觉”^[2]。以后每次遇到精神危机，他都会读惠特曼的诗。不同的情境之下，他会选择不同的诗。当他在学生时代忍受穷苦和无聊时，他读《戴假面具者》，领悟到这个世界是由一重重的秘密组成的，化解了心中的一些积郁。当他到北京读大学时，他读《大路之歌》，心中的不安被万丈豪情所取代。当他在生活与工作中出现虚幻的感觉时，他读《幻象》。当他竞选失败想要轻生时，他心中浮起《现在你敢吗，啊灵魂》，从中生出了向前走的勇气。但由于这次的打击过于强大，马立在读诗的同时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回乡。回乡对于马立来说，是医治心灵的良药。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乡“接地气”，因为“生活在北京这样繁华而拥挤的大都市里，他的心灵感到干渴，常常有被榨干的感觉。回到老家院子里，呼吸着湿润的空气，嗅着野花的香味，心里就万物复苏，充满着希望”，“让人产生打拼的勇气与信心”^[2]。

刘湘民采取的方式是听风与回乡。每当他被难事困住了心，或者有不快烦闷的事儿，他都到山里去听风。他觉得“不同的地方，风的声音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带给他的感受也就不相同”^[2]。在风里，他把自己的隐私一点一点藏起来，并且常能产生出很多灵感，那些灵感刺激着他的头脑产生出很多处理难题的办法，他困顿的心灵便会在刹那间解脱出来，听风是他整理思想、调整灵魂的优良方式。回乡也是刘湘民经常采取的方式。蜜如山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他的父母亲、初恋都在蜜如山。蜜如山是他的“命之所系”，给予他爱、安慰、灵感、智慧与甜美的梦。离开大山后，他无数次地回来，“这里是他的智慧之地，是他的灵感之源”，“每回一次，心灵好像就丰富一些，心智就成熟一些，处理问题的手段也就会圆润一些”^[2]。

二、城乡对立书写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肯定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城乡对立书写的情况。乡村代表着贫穷、善良与正直，城市则代表着财富、堕落与丑恶。农村人往往渴望进驻城市，但最终或重返乡土，或回归乡土，再重返城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作家们在两种文明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价值理念的惶惑。这可以说是百年来乡土小说所面临的困境。

在《驯风记》中，马立、刘湘民等人都积极主动地选择进城，他们对农村生活极为厌烦，觉得在蜜如山里的生活十分痛苦。马立这种心理产生的根源在于贫困。马立读乡中学时，每天要赤脚走过很窄的坎坷不平的碎山石路，碍于面子与尊严，他宁愿把鞋子脱掉，原因就在于贫困。刘湘民也厌倦农村生活，他厌倦的原因与马立不同，他不想“被那种小环境拘囿着……他想拥有自由的生存空间与自由的生活环境”^[2]。马立与刘湘民所代表的物质与精神的束缚是小说中人物选择进城的两大原因。他们在城市中虽获得了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却并不快乐。他们时常感到虚无、心累，他们的精神逐渐被扭曲，他们的品行发生了变化，朴实、纯真逐渐少了，坏心眼多了起来，官气十足。马立刚开始参加论坛收红包还会觉得羞涩，随后就变得期待了。刘湘民任市长期间，送礼、玩弄权术，“有多少人被他玩残了，玩废了，玩得消失在茫茫人海，没有踪影了”^[2]。他以权谋私、谋财害命，权术被他玩得索然无味。这些论述显然隐含着作者对城市的批判，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拜金主义”“拜权主义”及其造成的人性扭曲与道德败坏。

进城的农村人逐渐道德败坏，小说人物产生出远城市近乡村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城市不再具有神秘性，反倒是乡野山川更具有吸引力。马立和刘湘民对故乡的多次回归，就体现出了故乡的魔力。另一方面，对于没有走出大山的农民，城市却一直诱惑着他们，充满了神秘感，“山里的乡亲们仍然觉得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市”^[2]。他们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城里看一看，走一走。和城市里人们精神的扭曲异化相对比，蜜如山里的人们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他们之中仍有人未失赤子之心，保有善良、勤劳、朴实的美德。毛姑姑年轻时喜欢刘湘民，后来刘湘民做了官，她反而离他越来越远，原因就在于“毛姑姑，喜欢他的书卷气，不喜欢他的酒色财气，更不喜欢他十足的官气”^[2]。燕双来受父亲连累，下放插队到蜜如山，得到村长和村人的帮助，干最轻的活，吃的却是最好的饭；他和姚丽娜双双失踪

后,村里一位老人收养了他们的孩子。

在对农村贫困狭小、城市富裕神秘,农村人善良、朴实、城市人腐化、堕落的对比书写中,小说把侧重点放在了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上。“侧重于礼赞乡村生活的古朴、和谐与宁静,凸现和张扬农民具有传统文化中的美与善的人性和人情。这可以说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3]116}郭昕也是自觉追求的,他在小说中多次写到乡村对马立、刘湘民的精神感召,他们源源不断地从乡村获得前进的动力、生命的活力。刘湘民最初踏入仕途与大学系主任的推荐有关,后来他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看退休在家的系主任,“没有功利目的,也不是作秀”^[2]。来钱进城后一直保有善良、淳朴、勤劳的品德,他跟扬州师傅学艺,为了报恩,在扬州师傅被关起来后,经常看望;无私帮助二毛学习搓背技艺,后两人合开澡堂。马立有时也流露出淳朴的心性,他会鄙视那些善于经营人脉关系的人,自己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会觉得在男女之间,金钱与欲望的关系是最低等、也是最为庸俗的关系,努力想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

作者把批判的重心放在了城市生活的欲望上,“外面的世界坏了,外面的风不断去地吹进山里。那是什么样的风啊,那是由物与欲组成的淫风与妖风啊。山里的人啊,他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经得住外面世界的引诱,怎么经得起金钱与美色的勾引。他们的心灵被物欲所害,他们的身体与灵魂被物欲之火点燃,他们成了这个世界的灰烬”^[2]。这种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的价值选择,弱化了批评的力度,在建构新的价值观上亦无多少拓展。乡村在现代生活的强势影响下,日益发生着变化,乡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作为进城者的灵魂归属地?这种归属的诗意思象又能持续多久?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郭昕对宗教文化的书写就体现出了他对此的思考,只不过他的思考暴露出的是和多数乡土作家类似的价值观念的紊乱不定。

三、宗教文化、神性的返魅与救赎的虚妄

新世纪以来,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土地日益减少,生态遭到破坏,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危机。于是,乡土小说中宗教文化开始返魅。“乡土小说中宗教文化的‘返魅’,是在世纪末精神沉沦与拯救的思潮下产生的,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无常人生下对民间的恒常关怀,在对现实的批判中饱含着对未来的寄托。”^{[3]392}郭昕的小说中出现了多种宗教文化,显然与救赎有关,因为无论是阅读诗歌、听风,亦或是回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虚妄的问题。

这是整个人类遭遇的难题。

在郭昕的小说中,共出现了三种宗教文化或神性资源,一是基督教,二是佛教,三是通灵。基督教仅在题记中出现,透露了小说的主题。“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愁: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这句话取自《旧约·传道书》,意思是人在世上的一切追求,都只是捕风,是虚妄,若不相信神(上帝),智慧、知识的增添,只会带来更多的忧愁烦恼。小说所着力描写的就是几个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物对金钱、权力、欲望的追逐,以及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烦恼与虚妄感。但小说并未让人物转向上帝、信仰来获得救赎,而是以诗歌、听风、回乡等方式获得心灵的片刻宁静。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

燕双来的故事与佛教相关联。故事背景关涉“文革”。“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和影响,这是中国(特指大陆)当代作家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题目”。^{[4]2}小说没有对“文革”的来源梳理解释,只叙述了燕双来一家受到“文革”的影响。燕双来出身于红色革命家庭,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者,因性格耿直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后病死狱中。燕双来为躲避迫害躲进蜜如山,虽受到村长与村民的保护,但和他一起逃到山里的李家印被抓后为自保把他供了出来,结果害得村长死于山沟,恋人/孩子的母亲逃入深山,后生下孩子再次进山,杳无音信。燕父“文革”后被平反,燕双来被重新分配工作,而李家印在大觉寺出家做了和尚。两人晚年成了朋友,经常喝茶谈禅。小说没有过分渲染“文革”的苦难,没有耿耿于怀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身心受到的严重创伤。相反,在燕双来的意识里,他更在意的是蜜如山善良的农民,尤其是他的恋人及村长。故在被安排工作时,燕双来提出到蜜如山工作,目的就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回报善良的山民。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认为论起亲情与人伦,自己不称职,但在政治生活中是成功的,他对自己的出身具有优越感,他教导女儿应为革命者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小说从村长之口也道出了他光明的政治远景:“他说我是一个落难的公子,被恶风刮进了穷苦的山里,等风头一过就会飞黄腾达的。他劝我不要因为儿女私情而影响了前程。”^[2]燕双来后来确实飞黄腾达了,他也确实谨记村长的教诲,宁愿抛弃亲情与人伦,也不愿割舍他的政治前途。这样,燕双来的“文革”经历就被作者叙述成了“公子落难记”(外加“多情女子记”),对文革的反思则被置换为道德伦

理叙事;甚至对“文革”,流露出了怀旧的情绪:“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父亲经常做梦,梦见又回到了蜜如山中,梦见找到了你的母亲。太阳出来时,我跟她一起上山劳动。太阳下山了,我跟她一起回家,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可是这样的生活只能在梦中出现啊。”^[2]小说缺乏从政治、制度角度对“文革”进行反思,于是“文革”中对立的双方在宗教(佛教)的掩护下,轻而易举地就和解了。

小说中神性描写的重心是蜜如山的通灵者。这些一代一代的通灵者,掌握着天的秘密,指导着山里的人平平安安地生活下来,其中最有名的是程大仙,他自诩劝人们“避害趋利”,指导人们“去恶意生善心”。在小说中,他指导刘湘民“当官如开车,安全为上”,帮助刘湘民化解贿赂县委书记的事情,显然属于“避害趋利”;但从中并未看到半点教导他“去恶意生善心”的意图。在马立的读书时代,因暗恋上一位出身干部家庭的女孩,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他的母亲请来程大仙为他算命,这时的马立已读了大量的书,有了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但小说最后,马立听到程大仙讲述蜜如的神话传说时,不仅激起了倾听的欲望,而且也不再发出质疑的声音。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他对程大仙前后并非一致的态度,显出了他在启蒙理性与神性之间的犹疑。

程大仙最后讲述了一个神话传说,这个传说是关于苍公、泌娲与蜜娲的三角恋情引发的一场悲剧。而蜜如山人的生活悲剧与这个悲剧神话密切相关。程大仙讲述的这一神话,为蜜如人的痛苦寻找到了源头,如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蜜如人在泌娲杀

死蜜娲,上苍惩罚苍公、泌娲,将他们投入人间,蜜如人也开始背负着罪与罚。他们注定要受到各种诱惑,经历各种灾难。精神的异化,道德的滑坡,不再是城市文明惹的祸,而是神的过错,“我们的先祖,培育这一个地方的先祖动了淫心,坏了神人之间的规矩”^[2]。救赎与抵抗变得毫无意义,马立、刘湘民们抵抗虚妄的努力便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陷入更大的虚无之中。“救赎时代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宗教文化虽然是有效的,但绝不是万能良药。乡土小说对宗教文化的表现,不能成为宣扬宗教教义的布道场,更不能制造新的蒙昧,而应该从中发掘有益于价值重建的精神资源。”^[5]郭昕小说中对宗教文化的书写虽然试图救赎时代的精神危机,但多少有些空洞,对“文革”的反思批判力量也因此而削弱,马立等蜜如山人的虚妄在神性的解释下被注入命定的成分,对乡村、城市的反思批判也被置之一旁。这是小说存在的遗憾之处。

参考文献:

- [1] 夏中义. 九谒先哲书[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 [2] 郭昕. 驯风记[J]. 莽原,2015(4).
- [3] 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4] 许子东.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 [5] 李兴阳. 新世纪乡土小说折射时代焦虑[N]. 社会科学报,2010-06-2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Falseness of Chase and Resistance

——on Guo Xin's Novel *The Wind Down*

SI Zhen - zhen

(Colleg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Guo Xin often writes the migrant workers as his novels' object to show their chase after money and power after they come into the city. Although they get material satisfaction to some extent, their spirit is still in the bondage, and they often feel nothing, irritable and fatigue. Then, they begin to seek the way of salvation and deliverance. Ma Li finds poetry, Liu Xiangmin find listening to the wind, and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become their consistent manner of achieving the quiet mind for a moment. The writing of the opposite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ovel implies the author's poetic imagination of the country, 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affi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Finally, the salvation way of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falls in vain and becomes a doomed trage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us culture.

Key words: Guo Xin; *The Wind Down*; falsenes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religious culture

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的心理诱因及其疏导

——基于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村民纠纷的考察

马润凡,路旭东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在市政建设中,村民、村干部、基层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纠纷时常发生。这一群体性冲突的发生动因很多,其中,村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焦虑心态、村干部的“内心委屈”等心理症结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利益取向性的偏差、宗族行动力量的过度依赖以及村域分利集团的张力,是促发上述心理的关键因素。因此,建立利益表达的双向传导解压机制,规范宗族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构建村域利益群体关系的平衡机制,是疏导和化解市政建设中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政治心理;疏导机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7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31-04

市政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建设有效推进的关键环节,在繁荣城市经济、便利市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市政建设实践中,村民、村干部、基层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纠纷时常发生,成为阻碍市政建设发展的痼疾。其中,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的占地村村民群体性冲突更为典型。为改建扩建该市濮水河相关河道,解决多年来城区西部防汛除涝问题,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深入5个占地村向村民明确了以租期15年,每年每亩补偿1800元的标准补偿占地村民的用地政策及赔偿标准和支付办法。绝大多数村民同意以上方案。次年3月,J市新出台了调整国家建设征地的补偿标准,每年每亩补偿2600元,用地范围内附着物按有关政策规定据实清点补偿。上述工程占地村部分村民强烈要求按新征地补偿政策执行。但按规定,用地及附着物赔偿标准应按原政策执行,否则,类似工程参照此工程索赔,财政无力承担。在政策认知和执行的分歧中,一方面J市市政工程执意推进,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强行阻工,甚

至走上上访之路,并且抱怨村干部的态度倾向,而村干部在上级施压和村民抱怨的“夹缝”中更是尴尬无奈。这一群体性冲突的发生动因很多,本文尝试通过对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冲突的个案分析,来揭示诱发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心理症结,以期提出化解冲突和增进村民市政建设认同的心理机制。

一、“被剥夺”的焦虑、夹缝中的“委屈”、认知的偏差: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的三大心理诱因

在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主管部门就土地使用政策与被占地村村民产生了分歧,J市市政工程执意推进。部分村民也坚守自己立场,抱怨村干部并强行阻工,甚至上访。而村干部在上级施压和村民抱怨的“夹缝”中更是尴尬无奈。在此冲突中,村民的“被剥夺”的焦虑心态和处于夹缝中的村干部的“委屈”心理更为凸显。

村民利益“被剥夺”的焦虑是引发群体性冲突的关键心理诱因。根据土地使用补偿标准,J市按照每年每亩补偿1800元的标准补偿占地村村民的用地政策及赔偿标准和支付办法,之后J市出台了

收稿日期:2016-1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Z007)

作者简介:马润凡(1976—),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调整国家建设征地的补偿标准,每年每亩补偿 2600 元,用地范围内附着物按有关政策规定据实清点补偿。面对此标准,部分村民强烈不满,陷入自己利益“被剥夺”的焦虑中。在此焦虑中,在“闹大有理有利”的心理驱使下,村民群体性冲突多次发生。当工程进度到达被占地村土地并按计划施工时,被占地“当事人”就集合所在家族强行阻工闹事。一方面,家族中的老人分为两拨:年迈的妇女负责蹲坐在施工工地上和施工机械上哭天抹泪,破口大骂当地政府胡乱作为,一旦出现现场公务人员劝阻、搀扶等肢体接触,便瘫躺在工地与施工机械上,高声大呼“政府打人啦!”,以博取旁观者的同情;年迈的家族男性与家族“能人”则负责在现场与公务人员激烈交涉,依据自己对我国现有法律与制度的理解为自己家族利益辩护,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和制度一概不谈。另一方面,家族的中青年作为表达不满的中坚力量,被分为留守妇女、留守家中务农的男性和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家族青年等三类,并各有分工:留守务农的男性负责接应蹲坐在现场的年迈老人,一旦家族中的老人遭到劝阻或现场事态对本家族不利,便时刻准备以保护家长的名义诉诸暴力行为;留守妇女负责对闻讯赶来的村民旁观者进行动员,激发旁观者对当事人的同情,唤起围观村民也是潜在受害者的“被剥夺”的焦虑;一部分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家族青年因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法律意识,负责在现场利用图文和视频影像的形式,通过传统媒体曝光和新媒体平台快速交互传播现场事态发展,以期在大众网络化的环境下引发社会舆论,还有一部分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家族青年专门组织人员到国土资源部、省、市上访,致使工程严重延期。

在基层政府“责备”和村民抱怨的“夹缝”中,“内心委屈”的村干部执行力弱化。在村民心目中,被选举出作为村民利益代表的村领导班子,本应是维护村民利益的主体,是协调村域内多元利益阶层矛盾、实现乡土社会资源分配均衡的“仲裁者”。但是,夹在村民和乡镇干部之间的村干部更是尴尬无奈,更是充满“委屈”。当占地村领导班子代表上级基层政府维护乡土社会公共安全,召开村委会化解村民因占地补偿而引起的纠纷时,被占地“当事人”所在的家族的“能人”威胁道:“咱村 450 亩耕地被占用,假如咱们力争按新政策每年每亩 2600 元补偿,咱村被占地的农户每年可多得 36 万元的收入。地面附着物若按最高标准争取,每年可多争取赔偿 800 多万元。咱村的干部就要为咱村谋利,不能胳膊肘往外拐!给咱村带不来效益的村干部要他干啥?不如趁早换个当家人!”而关心工程进展的基层政府则也不断施压和责备村干部的工作不力。在“委屈”心理的趋势下,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极易产生。

基层政府对处理方式的认知偏差也是诱发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因素之一。村民群体性冲突往往伴随着多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杂,合理要求与无理要求交织。问题错综复杂,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矛盾,引起事态升级。当村民群体性冲突发生,群众情绪激动时,基层政府往往采用“拿钱买稳定”“更换村领导班子”“处理干部”等权宜性手段,甚至违规迂回处理。这在基层干部的心理上形成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1]的偏差认识。基层政府权宜性的处理农民群体性冲突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闹事者”的利益需求,但客观上也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致使“闹大有理有利”的心理不断强化。

基层政府对处理方式的认知偏差也是诱发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因素之一。村民群体性冲突往往伴随着多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杂,合理要求与无理要求交织。问题错综复杂,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矛盾,引起事态升级。当村民群体性冲突发生,群众情绪激动时,基层政府往往采用“拿钱买稳定”“更换村领导班子”“处理干部”等权宜性手段,甚至违规迂回处理。这在基层干部的心理上形成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1]的偏差认识。基层政府权宜性的处理农民群体性冲突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闹事者”的利益需求,但客观上也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致使“闹大有理有利”的心理不断强化。

二、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心理诱因的生发根源

1. 直接利益与非直接利益的并存与交互影响

作为经济性直接利益冲突的主体,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当事人”在与基层政府的多次博弈中,得不到预期的价值补偿,其“相对剥夺感”的焦虑不断强化。作为村民群体性冲突的旁观者,虽然与该博弈的特定利益客体和利益博弈双方并无直接利益冲突,也无明确的或直接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冲突引发的乡土社会治安事件的频发和少数利益受损村民“代表”的社会动员,旁观的村民感受到自身也是潜在受害者。在此感受下,其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和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被点燃,引发了对群体性冲突“当事人”的情感共鸣。在情感共鸣的发酵下,“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动参与到村民群体性冲突之中,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群体越是在现实的问题(即可达到的物质性目标)上发生争端,他们就有可能寻求实现自己利益的折中方案,因此冲突的激烈性就越小。群体越是在不现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激起的情感与介入的程度就越强,因此冲突就越为激烈。^[2]

2. 村民对宗族行动力量的非理性认同和过度依赖的制约

宗族因其地位和行动力量在村域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塑造着村民的心理倾向和行动能力。宗族集体行动是借助农村正式组织或非

正式组织而在成员之间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进而为实现潜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宗族集体行动的有效交涉力量及其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激发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和消极的政治行为,由此也形成了村民对宗族行动力量的非理性认同和过度依赖。但是,对内奉行狭隘私利主义,对外采取排他主义和实力优先的丛林法则,追求本宗族利益最大化,是各宗族集体行动的主导取向。因此,在村民群体性冲突中,各宗族都是集全族之力进行集体交涉,有的甚至采取暴力化方式。在频繁的宗族集体行动与无序纠纷冲突过程中,宗族“精英们”的交涉能力不断增强,推动宗族集体行动由“有动员无组织”向“强动员有组织”方向发展。在这种强大的宗族集体行动交涉力量下,基层政府只能采取延缓或妥协的权宜方法处理,而村民并没有花费较大的交涉成本就获得了宗族的私利。由此,这种“成功”的无序政治参与模式的效应不断扩大,农村宗族在解决官民纠纷问题上表现出强大的集体行动力量再次强化了村民在群体性冲突中对宗族的心理依赖。

3. 利益分化加剧所引发的“争抢瓷器”现象的强化

随着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不断加剧,农民阶层进一步细化,形成了占有不同农村社会资源、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不同集体意识和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微观层面上的阶层群体,引发了乡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伴随着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村域内权力格局的分配也向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或强大宗族势力倾斜。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匮乏的农村,因基层政府动员能力趋势上的弱化,农民法律契约精神和有序政治参与能力的缺失,村域内各利益集团为了私利的最大化,强力干预基层民主,在村领导班子选举中选出代表自己利益阶层或家族的代表,以求占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配权。于是,就产生了竞相获取更大分配份额的“争抢瓷器”现象。村域基层民主选举受到农村分利集团的强性动员,选举出不同的农村分利集团的代表担任村领导班子的成员,以实现竞选成功后分享收益的格局。村民的利益意识日益觉醒并不断强化,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途径。村庄内小姓宗族与占有较少社会资源的分利集团,在集体行动困境的制约下,产生了“搭便车”的心理,由群体性冲突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由“观望者”变成“支持者”。然而,由于村民支持率的下降和未能完成上级基层政府公共治理的任务,村干部在这次博弈中落败,取

而代之的是代表被占地“当事人”利益的宗族精英代表。在“争抢瓷器”的竞争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向“村庄权贵”倾斜。村域内的利益博弈,并未因某一宗族集团单次博弈的失败而告终,反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增强了村民群体冲突的效能,必将诱发更为严重的村民群体性冲突。

三、建立心理调适机制,有效化解市政建设中村民群体性冲突

1. 建立利益表达的双向传导解压机制

缓解村民“边缘化情绪”和提高村民政治参与效能感,可使村民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放松。通畅的沟通系统可以让村民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及时地宣泄不满情绪,防止和减少不满情绪的积聚。这等于在政府与村民之间安装了一个意见表达双向传导的“调压阀”,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3]一方面,基层政府应采取符合村民需要和特点的方式,将主导的政治价值倾向和行为模式有效传递到乡村,并引导村民认知、认可进而自觉认同主流政治信息,提升自身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改善村干部的录用,扩大基层民主范围,提高政治体系整合村庄多元利益的能力。同时,不断强化以村委会为枢纽的基层政治沟通机制的优势,拓展村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及时满足村民内在诉求,缓解和消除其焦虑心理。

2. 规范宗族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一是有限度地承认宗族在农村社会及乡政村治中的社会政治地位,限定宗族发展的合理边界,划定宗族等非正式组织在农村自治权力的负面清单,实现宗族在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上的权责对等,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二是加强农村产业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农村社区城镇化。实现农村社会化生产的变迁,使宗族的内部结构逐渐松散分化,同时也为宗族的可控性健康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三是以乡政村治为制度载体,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引导乡土社会政治价值倾向,实现农民对政策和基层组织的情感认同。四是创新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立村域内宗族参与村务协商制度和宗族与村委会交流反馈机制,强化宗族制度化参与和村委会精细化调节能力。

3. 构建村域利益关系的平衡机制

村民心理的合理调适有赖于村域内利益关系的平衡。因此,建立一个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均衡

政治结构,调节农村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是有效化解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通过建立以竞争机制、价格导向、利润导向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来构建“平衡阀”,发掘乡村社会潜在的社会资本优势,实现资源有效分配。另一方面,建立群体利益非市场化的分配制度设计,运用政府财政手段这只“有形的手”,“张扬农村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缩小高低端收入间、贫富间的利益量差,”在农村各阶层利益中寻找平衡点,把利益差距限制在农民承受心理可控范围内,有效防止和矫正农村社会资本向占有多数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集聚的“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现象,从而实现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和谐,有效消除市政建设中的村民群体

性冲突。

参考文献:

- [1] 刘中起. 转型期群体性社会冲突:特性、动因及其“安全阀”机制研究[J]. 城市观察,2011(5).
- [2] 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M]. 孙立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50.
- [3] 向德平,陈琦.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2003(4).
- [4] 葛贤平. 当代中国群体利益心理问题与政府协调机制的构建[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Psychological Inducement and its Solution of Group Conflict in Municip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Villagers Dispute Investig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J City of Henan

MA Run - fan, LU Xu - d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the conflict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villagers, the village cadres, the grass - roots government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ten occur.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group conflict. Among them,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nxiety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 inner grievances of the village cadres are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bias of interest orientation, the over - reliance of clan action force and the tension of villagers' profit distributing groups are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above - mentioned psychology. Therefore, it is the key way to ease and dissolve the conflict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bidirectional transmission and decompression of interest expression, regulating the path of clan participation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the balance mechanism of the village interest groups.

Key words: group conflict; political psychology; dredging mechanism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国内外“城中村”改造治理比较研究

唐琼, 禹航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长沙 410006)

摘要:“城中村”是城市快速发展中的产物,由“城中村”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俨然成为了一座城市良好发展的“障碍”,随着此类问题的不断积压,加上这几年城乡之间的二元矛盾越来越突出,“城中村”治理成为了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新型城镇化”“城中村”概念出发,结合国内外的改造经验,联系社会实际,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改造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中村”治理;改造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8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35-04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国家征用了城市周边大面积农村土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使得城市规模飞速扩张,但有些地方完成了土地城镇化,当地的人口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城镇化。这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杂乱,滞后的城市规划,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质量不高,土地使用存在诸多产权问题等。关于“强拆”等新闻屡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使得一部分群众对政府的工作产生了不信任,这是中国城市版图迅速扩张所产生的城乡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便是当下越来越突出的“城中村”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与“城中村”的内涵界定

(一)新型城镇化与城中村的内涵界定及表现形式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在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城乡互动,资源集约,生态宜居,发展和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面向整个农村,以农村居民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不以生态环境和农业粮食生产作为发展成本,以城乡公共设施的一体化和福利的均衡化作为核心,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城乡结构方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利用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促进作用,推动城乡一体化,形成工农互惠的城乡关系,让广大的农村居民积极平等地参加现代化建设,共享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对现有的农业经营体系进行创新。

城市建设方面。以提升城市的品质内涵为主旨,改变过去单纯追求城市规模的错误思路,关注人们对城市高质量生活环境和多样化生活方式的需求,真正使得我们的城镇可以成为促进居民素质、文化、技能、思想全面发展的人居之所。

土地制度方面。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为第一目标,坚持走集约化道路,对土地高效利用,让“看不见的手”积极发挥作用,促使房价回归理性,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时完善其相应的配套措施。

产业支撑方面。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动出台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市场需求,对主导产品进行大力扶持,对弱质产业进行适当保护,对衰退产业进行积极调整。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本质上是一个追求城乡一体化和城乡

收稿日期:2016-11-2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治理研究”(15YBA36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户籍制度同步改革问题研究”(16CJL025)

作者简介:唐琼(1983—),女,湖南邵阳人,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统筹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存在已久且不和谐的关系,构建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条件。

(二)城中村的概念界定及表现形式

在早期研究中,“城中村”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村落的农村居民由于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土地被政府所征用,转为城市居民后仍居住在原村落,进而演变成的居民区,因此也被称为“城市里的乡村”;随着更深入的研究,现在更普遍地将“城中村”定义为:在城市总体的规划区中,农业用地已经几乎不占用地分配,在主要指标上如居民生存方式、职业结构已经向城市社区完成了转变,但在思想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内涵特征的村落^[1]。因此,“城中村”是乡村地区“城市化滞后”的具体产物,具有农村和城市两重特性,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形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因为它特殊的现象和地位而发生,它的主要表现为:

1. “城中村”主要由流动人口、村民、市民三方面构成,人口来源杂乱,治安形势严峻。

2. 由于拆迁整治共识难以达成,“私房”“违章房”现象集中,极大影响了城市形象。

3. 卫生条件极为落后,公共设施水平低。杂乱无章的管线、不完善的排污排水系统、乱堆的垃圾、狭窄的街道不能满足急救、消防的要求,居住环境质量差。

4. “城中村”土地是以村集体所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经常与城市管理体制发生冲突。权限不明,多头管理问题突出,商业用地、宅基地、工业用地之间管理权错综复杂,非法倒卖、转让、出租现象屡见不鲜。

二、国内外新型城镇化的“城中村”改造治理实例

(一)国外典型城市“城中村”的改造实例

“城中村”这一概念在国外并不存在,但是自主性居住区(self-help housing)如贫民窟与我国的“城中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被国内学者在“城中村”对比研究中广泛应用。自主性居住区的本质在于:社区的房屋、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等配套都由居民自己提供,政府不进行资金和行政投入^[2],与其他城市社区在空间和社会经济活动上隔离,难以被主流社会所认同。

1. 铲除贫民窟,代表城市:纽约、芝加哥、曼彻斯特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的主要城市曾开展过大规模

的贫民窟清理运动,即推倒占用城市土地资源的贫民窟,将居民转移到城市或者驱逐到其他地区,然后用能够提供高额税收的项目如房地产进行开发。然而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把贫民窟转移到了其他地区,被铲除贫民窟城市的治安环境城市形象变好了,但是贫民窟存在的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且这种做法缺乏人文关怀,引发不同立场和角度的深刻反思。

2. 政府重新安置,代表城市:巴黎、德里、加尔各答

政府直接出资建房将贫民从贫民窟中转移,这种方式被国外许多国家所实施过,且与我国的“棚户区改造”相类似。但是这种看似比较迎合贫民利益的方案却也带来了比较多的问题:由于政府建房的社区环境比贫民窟好得多,房屋的租住权被一些住户变卖给其他需要城市住房的人从而直接得到一笔现金,再到其他的贫民窟中生活;新居民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承担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管理费,或政府建房后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并没有建造,居民素质不高,使得社区渐渐的成为了一座新的贫民窟。

3. 政府对贫民区环境改造,代表城市:孟买

与“铲除贫民窟”和“政府重新安置”相比,对贫民区环境进行改造的经济性使其成为国外解决贫民窟问题中实施得最为普遍有效的方案。

在众多对贫民区改造的方式中,孟买的贫民区措施具有代表性^[3]。上个世纪90年代初,通过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贫民窟升级”计划使得两万多个孟买的贫民窟家庭享受到了基本的生活服务和使用土地的权利。印度“全国贫民窟居民联合会”与“促进地区资源中心协会”一同与孟买地方政府协商,使得1000多家住户配备了新的卫生设施,并为贫民窟地区提供了300套公共厕所,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带动了孟买周边区域的贫民窟居民自发地配合政府工作,对所居住地区的环境进行改造。

由印度中央政府带头的,为贫民区居民提供如道路、供水、公厕、公交、排污等基本的公共服务的方案,已经在孟买地区施行了近30年。对贫民窟内互联网进行普及,设立商店,支付电费、水费和财产税,帮助申请许可证、执照和登记、发放出生或死亡证和抚养证,对财产进行估价等等进一步改造方案正在实施。目前印度正在对以社区为主体的“基础设施财务基金”进行试行,宗旨是为促进扩大住房和公共设施项目的建设提供政策和物质支持。

4. 多主体参与整治,代表城市:韩国

韩国在1983年,引进了“联合国重建计划”,用

于解决城市中出现的“贫民区”问题,其社区、私人部门、居民多主体参与整治计划的方案十分具有特色。主要做法是: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制定了鼓励非政府组织 NGO、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发起和引导,低收入居住区、贫民窟、非法聚集居住区的居民及房地产开发商、NGO 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地整理,使国家、社区、社区居民及企业等多方受益。^[4]

5. 国外“城中村”的改造经验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中村”问题受到城市地域、政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成多样化趋势,国外不同城市丰富的“城中村”改造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强制性地清理“贫民窟”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所有的城市对待“贫民窟”(“城中村”)现象都有一个从忽视到重视,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整体上是一个进步过程。

二是政府立法扶持房屋建设,提供租金补贴。城市外来人员一般经历从租住“廉价房屋”到收购住房,最终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城中村”逐步纳入城市规划,引入开发商等市场手段进行开发改造。

三是政府的各部门统筹规划,鼓励多主体参与改造“城中村”,主动对居民的生活条件进行改善,对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检查完善,同时积极为贫困人口寻找就业渠道。

(二)国内“城中村”的改造实践

中国城市扩张速度快,但农村集体所有制仍被大量地区所保留,“都市里的村庄”成为了城市管理上的“盲点”,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限土地的集约利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在我国,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进行了一些改造实践。

1. 广州市:村集体(村民)主导的“城中村”改造

广州市政府对于“城中村”问题所坚持的两个基本原则为“市政府不直接投资”和“不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采取“政府引导,村民自行开发”的改造思路。村委会和村民是主体,决定自己的改造方案,改造的资金一般通过村集体和村民个人自筹,政府仅提供配套资金,补偿方式据实而定。^[5]

在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方案中,体制方面最明显的特点在于乡村转变为居委会,村民转变成了市民,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变成了股份公司,这使得村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由被动身份转变为了主动身份,大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占主导地

位的村集体将获得改造的最终大部分收益,政府在整个改造过程中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加强对改造过程中违规现象的监管上^[6]。但是,以村集体为主导的改造也遇到了诸多实际问题:房地产商被排斥到投资的主体之外,改造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对于村集体来说无疑是一个考验;“城中村”改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一般的居委会很难具有如此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政府对“城中村”的补偿难免分配不均,造成村民的不满,使得改造方案的实施受到影响。

2. 珠海市:市场主导的“城中村”改造

珠海市的“城中村”改造,市政府并没有直接投入任何资金,而是巧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利用竞争机制,引入开发商的投资对旧村进行改造。政府以引导为主,通过制定规划、政策在改造过程中扮演“教练”的角色。

珠海市“城中村”改造成功的第一个关键点是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房地产开发商进行投资,如“拆一免二至三”政策,开发商依据不同村落的拆迁量和区位,开发商每拆1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面积,可免交2至3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价,并减免相应的消防费等,这项政策使得开发商25%以上的合理利润得到保证。另一个关键环节在于对旧居民的拆迁补偿,政府对居民所拥有的房屋在拆迁时根据年份以1:1到1:1.2的比例进行面积补偿,开发商对拆迁期间村民的安置费和出租房屋收入进行补偿,极大地调动村民配合“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积极性。

政府投入少,征迁群众的利益得到很好的维护,开发商团队的协调能力强,管理水平专业等是市场主导型的“城中村”改造的主要优势,但是它同样存在一些“短板”,如:对开发商过度依赖,而开发商的理念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与政府要求的房屋条件打“擦边球”,对居住环境质量造成影响;从整体上看,被动地去接受开发商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和改造计划是征迁的群众的唯一选择,这使得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受到怠慢,容易滋生不满情绪;若开发商的改造不负责任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改造不符合标准而失败,政府将会左右为难,对其形象造成严重影响。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的改造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成功后城市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是城市经济、文化、环境、体制、形象得到飞跃的“跳板”,如何化“绊脚石”为“垫脚石”,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对于“城中村”改造,不管什么样的方案,其出发点都应该是城

市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村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政府在规划时应该利用城市的地理条件、发展状况、民俗文化、城市定位等特点进行“量体裁衣”。村民在改造之后基本的居住、就业、社会保障以及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发展权利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的。针对我国“城中村”的现状,从整体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强调政府、城市和原村民的“三赢”

以公平、持续发展为核心强调社会效益,经济上以可持续经营和土地资产经营为主,效用与城市的规划和发展相协调,着重改善环境质量,保护和弘扬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以“三赢”为目标,积极地对已形成的“城中村”进行改造,使得政府、群众、投资商三方的平衡关系得到好的处理。实施拆迁安置工作时,放在首位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

(二) 对“城中村”改造提前规划,分步实施

通过各级政府的政策,由原村民,村集体经济实体共同协商、参与、实践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过程,它包括了制定方案和实施方案两个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是当今中国城镇化的趋势,及早地规划建设,提前安排人员转移,可以很好地降低“城中村”改造所需要的成本。

(三) 增强城市的包容性

“城中村”虽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但是对于较大的城市来说,它也是吸纳外来人口的

重要场所。若“城中村”改造欠妥,会影响外来人口的安置,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城中村”改造需要从不同方面协调外来人口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如完善城乡规划体系、促进农村居民进城、完善城乡管理机制、发挥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尤其是监督和辅助政府的工作,重视自上而下的改革。

参考文献:

- [1] 高峰,董晓峰,侯典安,等. 国内城中村研究综述[J]. 现代城市研究,2006(7):20-24.
- [2] Zhang J, Wu F. China's Changing Economic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Annexation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 Regional Studies,2006(1):3-21.
- [3] 王英. 印度城市居住贫困及其贫民窟治理:以孟买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2012(4):50-57.
- [4] 董晶慧. 国外城市贫民窟改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特区经济,2010(11):117-118.
- [5] 冯健,周一星,王晓光,等. 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 城市规划,2004(3):30-38.
- [6] 陈颖颖. 我国城中村改造实践模式比较[J]. 中国行政管理,2012(8):127-128.

(责任编辑 许峻)

Comparative Study of Renovation Management of “Village in the City”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ANG Qiong, YU Hang

(Hunan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Village in the city” is a product during the fast urban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have become a “obstacle” of the city’s good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backlog of these problems, the dualistic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se years. So,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has become the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s in an urgent need of research.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 villages”, combined with the reform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connecting the social reality, puts forward a more practical modification proposal.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reforming practice

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秋龙, 晋秀龙

(滁州学院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以安徽省2001年、2004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数据为基础,运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系统分析全省A级旅游景区近13年来的空间结构演变特征;通过相关分析、缓冲区分析、叠置分析等方法探析研究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趋于聚集分布,在三大地理区域中分布不均衡;旅游资源、社会经济、交通网络、湖泊河流及地势对全省A级旅游景区结构演变均有不同程度影响。从深度开发旅游资源、整合资源、完善交通、彰显自然环境优势等方面对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提出优化方案。

关键词:影响因素;演变特征;空间结构;A级旅游景区;安徽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9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39-06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业的载体。目前我国主要用景区的质量等级指标测评一个景区或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与优劣程度。在各区域追逐质量等级的同时,区域内景区结构也发生着相应变化,景区的空间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旅游业的发展。我国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末,对于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方法、角度也日趋完善。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主要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数理分析以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1-2]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演变规律的研究主要采取数理分析以及图表计算等方法。^[3-4]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A级景区建设发展迅速,从2001年的50家发展到2014年的488家,13年中增加了438家。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景区或地域盲目追求质量等级,“南热、中温、北冷”的旅游发展格局^[5]使得某些区域在超负荷承载,而某些区域旅游价值没有充分发挥等。旅游业发展地域不均衡,制约了安徽

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2001年以来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等级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可以找到其影响因素,提出优化方案。

一、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源

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旅游局和安徽省与各地市旅游局官方网站。将各A级旅游景区综合为点,通过Google Earth获取UTM投影下2001年、2004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安徽省各A级旅游景区的点坐标数据,以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安徽省交通旅游图为底图,获取安徽省交通道路数据。

2. 研究方法

将全省A级旅游景区综合为点状目标,^[6]基于最邻近点指数测度安徽省2001年、2004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通过基尼系数探究其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和均衡程度演变特征,综合分析近13年来全省A级旅游

收稿日期:2017-01-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干扰下的旅游地生态系统响应、演化与调控”(41371162);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安徽省江淮分水岭区域生态旅游可开发适宜度研究”(SK2016A0671)

作者简介:王秋龙(1981—),女,河北唐山人,硕士,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

景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选取旅游资源、社会经济、交通网络、自然环境等为影响因素,通过相关分析方法和缓冲区、叠置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剖析诸因素对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并提出优化建议,为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1. 总体发展趋势

安徽省 2001 年至 2014 年 A 级旅游景区数据见表 1。由表 1 可知,自 2001 年以来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总体数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约 19.15%。其中 3A 级和 4A 级旅游景区增加数量最多,分别从 2001 年的 1 家和 5 家增加到 2014 年的 161 家和 152 家,年均增长率分别约 47.83% 和 30.04%。5A 级旅游景区增长速度最为缓慢,2007 年黄山和九华山成为安徽省首批 5A 级景区,此后皖南古村西递宏村、天柱山、龙川、天堂寨、八里河、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相继入围 5A 级,截至 2014 年底全省 5A 级旅游景区共计 8 家。2A 级旅游景区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1A 级旅游景区发展最为缓慢,自 2007 年起,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表 1 2001—2014 年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数量变化情况

区域	景区等级	年份					年均增长率%
		2001	2004	2007	2011	2014	
全省	5A	0	0	2	4	8	—
	4A	5	10	41	114	152	30.04
	3A	1	1	66	133	161	47.83
	2A	32	31	88	164	161	13.23
	1A	12	12	7	5	6	-5.19
	合计	50	54	204	420	488	19.15
皖北	5A	0	0	0	0	1	
	4A	0	2	4	15	21	
	3A	0	0	11	17	30	
	2A	2	1	19	35	45	
	1A	1	1	1	0	0	
	合计	3	4	35	67	97	30.66
皖中	5A	0	0	0	1	2	
	4A	2	2	12	47	67	
	3A	1	1	24	56	62	
	2A	16	16	29	76	66	
	1A	7	7	2	2	3	
	合计	26	26	67	182	200	16.99
皖南	5A	0	0	2	3	5	
	4A	3	6	25	52	64	
	3A	0	0	31	60	69	
	2A	14	14	40	53	50	
	1A	4	4	4	3	3	
	合计	21	24	102	171	191	18.51

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出现的初期,等级结构严重失衡。2001—2004 年全省 2A 级景区所占比例超过 50%,3A 级景区仅 1 家;2007 年以后,随着高等级旅游景区比重的增加,4A 级和 3A 级旅游景区逐

渐成为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等级结构逐渐形成相对稳定、合理的纺锤型结构,等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省 A 级旅游景区主要集中在皖中和皖南地区,自北向南呈现“少—多—多”的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从增加数量来看,皖北、皖中和皖南地区 A 级旅游景区分别增加了 94 家、174 家和 170 家,皖中和皖南地区增加的 A 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多,但从增长率来看皖北地区增长率最高,约 30.66%。综合景区数量和质量,皖中和皖南地区优势显著,皖北地区发展潜力较大。

2. 空间分布类型演变特征分析

通过最邻近指数定量分析安徽省景区空间分布类型。最邻近指数是将实际区域中的点和理论意义中随机分布的点相比较,从而判断景区空间分布为集聚分布或随机分布。^[7]其公式如下:

$$R = 2\bar{r}_1 \sqrt{N/A} \quad (1)$$

其中, R 为最邻近指数, \bar{r}_1 为每个景点与其最邻近景点距离的平均值, N 为景点数, A 为研究区域面积。 $R < 0.5$ 和 $R > 1.5$ 分别为集聚分布和均匀分布; $0.5 < R < 0.8$ 说明景点为集聚—随机分布; $0.8 < R < 1.2$ 为随机分布; $1.2 < R < 1.5$ 说明景点分布趋于随机—离散分布。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不同年份每个 A 级旅游景区与其最邻近景区之间的距离为欧式距离,并取其平均值计算得出。

表 2 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最邻近点指数

年份	景区数	最邻近点距离平均值(m)	R	分布类型
2001 年	50	26182.39	0.989	随机分布
2004 年	55	23833.86	0.944	随机分布
2007 年	204	10741.78	0.820	随机分布
2011 年	420	7083.55	0.776	集聚—随机分布
2014 年	488	6566.58	0.775	集聚—随机分布

由表 2 可知,13 年间安徽省 A 级景区最邻近点指数均小于 1,且越来越趋于 0.5,表明全省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从随机分布趋于集聚分布。

3. 空间分布均衡程度演变特征分析

基尼系数是地理学中用于对比描述一个区域中不同子区域分布差异的重要指标。^[3,8]运用基尼系数衡量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在三大区域中分布的均衡程度,其公式如下:

$$G_i N_i = - \sum_{i=1}^N \frac{P_i \ln P_i}{\ln N} \quad (2)$$

其中 P_i 为第 i 个地级市的景区数占全省景区总数的比重, N 为地级市总数。 $G_i N_i$ 介于 0 和 1 之间,其值越大说明集中程度越高。根据公式(2)计算各个时期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结果

如表3所示。

表3 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

年份	2001年	2004年	2007年	2011年	2014年
N	3	3	3	3	3
G_i/N_i	0.795	0.824	0.924	0.929	0.959

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4年、2007年、2011年、2014年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 G_i/N_i 越来越趋于1,表明全省A级旅游景区在三大地理区域愈加集中,呈不均衡分布。

三、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有很多,结合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选取旅游资源、社会经济、交通网络、河流湖泊和地势等影响因素,通过相关分析、缓冲区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对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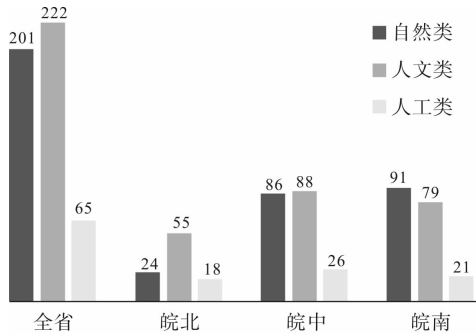
1. 旅游资源影响因素分析

资源类旅游景区是指依赖本区域的旅游资源建设开发的旅游景区,分为自然类和人文类,如森林公园、纪念馆、文化馆等。人工型旅游景区是指不受区域自然环境、人文因素等影响,主要受市场因素等影响而人工建造的景区,如科技馆,主题公园,生态农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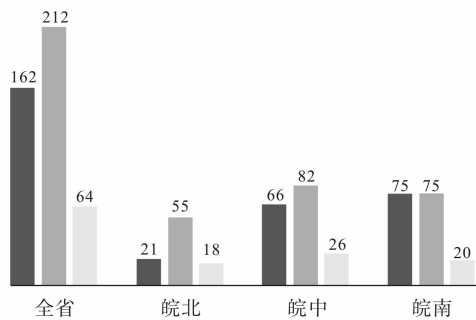
从全省2014年A级旅游景区不同地域分布情况(如图1a)可以看出,全省488家A级旅游景区中有423家以资源类景区为主,占总数的86.7%,其中自然类景区201家,人文类景区222家。皖北、皖中和皖南地区A级旅游景区亦是以资源类景区为主,分别占该区域景区总数的81.4%、87.0%和89.0%,其中皖北地区人文类旅游景区所占比重较大,占全区资源类旅游景区的69.6%。

从全省2001年以来A级旅游景区不同地域变化情况(如图1b)来看,13年间新增旅游景区共计438家,其中资源类景区374家,占全部新增景区数的85.4%。同样,在皖北、皖中和皖南地区新增A级旅游景区均是以资源型为主,分别占该区域景区总数的80.9%、85.1和88.2%,其中皖北地区以新增人文类旅游景区为主,占全区资源类旅游景区的72.4%。

综合分析,全省各地区A级旅游景区对旅游资源依赖性较强,资源的差异直接影响全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变。不同区域的旅游资源吸引力稍有不同,皖北地区对人文类旅游资源依赖性相对较强,皖中和皖南地区对自然类和人文类旅游资源的依赖性相对均衡。



(a)2014年A级旅游景区数量



(b)2001年以来新增A级旅游景区数量

图1 安徽省不同类型A级景区分布情况

2.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经济是一个地方旅游业以及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可以为旅游景区建设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旅游景区基础设施设备以及相关技术提供支持,促进景区开发,提高旅游地的吸引力,从而会影响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2004年到2011年各地区A级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此后增长速率有所减缓,而各地区GDP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速率。结合旅游资源对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排除黄山、六安、安庆、宣城,对其余12地市A级旅游景区增加数量分别与GDP增加值,人均GDP增加值,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国内旅游收入增加值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见表4。结果表明,自2001年A级旅游景区增加数量与国内旅游收入呈高度相关;与GDP增加值、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呈显著性相关;与人均GDP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相关性不显著。

表4 安徽省各市增加景区数量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GDP 增加值	人均GDP 增加值	第一产业 增加值	第二产业 增加值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国内旅游 收入增加值
相关系数	0.622	0.131	0.441	0.672	0.722	0.822
P值	0.031	0.684	0.151	0.017	0.008	0.001

3. 交通网络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景区具有不可转移性与地域性特点,旅游者只能通过空间的转移进入某一区域的旅游景区,

而这种位移的转变只有通过交通网络来实现。截至2014年底,安徽全省公路总里程约17.4万km,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3752km,铁路运营总里程3586km(其中快速客运铁路756km),较为快速且便捷的交通对旅游业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构建全省高速公路、国道、铁路、高铁等交通干线10km缓冲区,然后与全省2001年至2014年增加的A级旅游景区进行叠加分析,结果显示,近13年全省增加的A级旅游景区有356个分布在交通主干线的10km范围内,占全省新增景区总数的81.3%。新增A级旅游景区有明显的沿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旅游交通的均衡发展对全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变有着重要影响。

4. 自然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1) 河流和湖泊影响因素分析

安徽省水系发达,河流众多,自北向南分属淮河、长江、新安江流域,三大干流的主要支流30余

条。湖泊星罗棋布,多达500多个,其中超过100平方米的湖泊约有20个。通过构建全省主要河流和湖泊10km缓冲区,然后与全省不同年份增加的A级旅游景区进行叠加分析,数据见表5。

从A级旅游景区不同年份分布情况来看,2001年50家A级旅游景区中,有45家位于全省主要河流和湖泊的10km缓冲区内,占总数的90.0%;2007年、2011年和2014年主要河流和湖泊10km缓冲区内分别有164家、347家和404家,分别占新增总数的80.8%、82.6%和82.8%。从A级景区不同年份变化情况来看,自2001年分别至2007年、2011年、2014年,新增的A级旅游景区中位于主要河流和湖泊10km缓冲区范围内的分别有119家、302家和359家,分别占新增总数的77.8%、81.6%和82%。综上,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呈现沿水系分布的特征,说明全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及演变受到河流和湖泊的牵引作用。

表5 安徽省主要水系10km缓冲区内A级旅游景区分布及变化情况

年份	2001年	2007年	2011年	2014年
缓冲区内A级景区数量/比重	45/90.0%	164/80.8%	347/82.6%	404/82.8%
缓冲区内A级景区变化数量/比重		119/77.8%	— 302/81.6%	— 359/82.0%

(2) 地势影响因素分析

安徽省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类型南北迥异。北部和东部地区主要为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西部主要是皖西大别山地,南部主要是山区,以黄山、九华山脉为主,中部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特色的旅游景区,不同的地势条件也会影响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借助ArcGIS软件将安徽省数字高程模型中的高程值进行重分类,与全省2001年至2014年增加的A级旅游景区进行叠加,探究不同地势条件对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

研究表明,全省近13年增加的438个A级旅游景区中,79.0%的景区分布在低于200米的平原地区,其中5A、4A、3A等级旅游景区217个,占高等级旅游景区总增加数量的75.6%;200米以上丘陵、山地地区仅增加92个A级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安庆、黄山、宣城等西南地区,占A级旅游景区总增加数量的21.0%。200米以下低海拔地区新增的人文旅游资源244个,自然旅游资源102个,分别占该区域新增总数的70.5%和29.5%;200m以上高海拔地区新增的人文旅游资源29个,自然旅游资源63个,分别占该区域新增总数的31.5%和68.5%。安徽省新增A级旅游景区和地势分部情况见图2。

综上分析,2001年以来全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主要集中在200米以下的平原地区,随着海拔高度的递增,增加的景区数量减少;高海拔地区新增自然旅游资源较多,低海拔地区新增人文旅游资源较多。地势的差异影响了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变。

四、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1. 持续优化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

2007年以来,全省A级旅游景区等级结构逐步形成以4A、3A、2A中间等级旅游景区为主,高级和初级旅游景区较少的纺锤型结构,全省景区等级结构相对稳定、合理,但仍有进一步优化调整的空间。^[9-10]同时,在空间结构上趋于不平衡分布,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结构应该在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持续优化。第一,从景区数量和质量上来看,皖中和皖南地区有明显优势,在稳定皖中和皖南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要深度挖掘皖北地区旅游资源,全面推进A级旅游景区建设,构建皖北区域性旅游区,完善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第二,根据景区自身条件,制定合理的旅游景区发展规划,鼓励低等级旅游景区的发展,扶持中高等级旅游景区的建设,促使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等级结构愈加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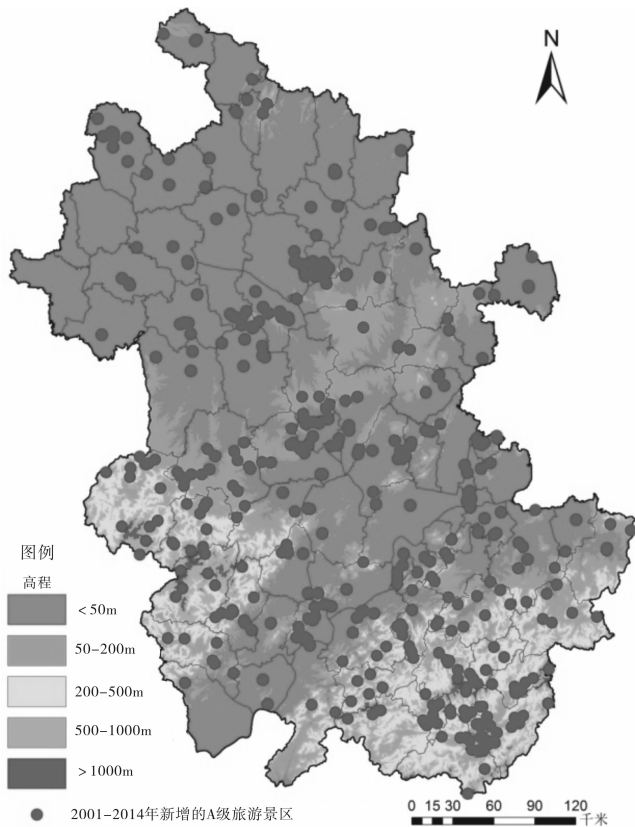


图2 安徽省新增A级旅游景区和地势分布情况

2. 整合旅游资源,以点带面发展旅游景区

目前安徽省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合肥、六安、安庆、黄山等地,且处于同一区域,旅游景区类型单一,空间分布愈加集中不均匀。面对这种情况,首先,整合安徽省各地旅游资源,提高区域的整体旅游吸引力。对于皖南、皖东等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吸引力的区域,在规划旅游线路时要注意自然型与人文型、体验型景区的结合,“冷门”与“热门”景区的结合。在皖北等人文型景区较多的区域,应注意与自然景区的相互结合。其次,以黄山、合肥、安庆为主要节点,以富有特色的旅游线路为载体,加强皖南徽州文化旅游圈、皖北历史人文旅游圈和皖西山水景观旅游圈的对接与合作,做到优势互补,南北呼应,从多方面加强安徽省区域合作,以点带面缩小区域差异。

3. 深度开发皖北人文旅游资源

相对皖中、皖南地区来说,皖北地区对人文型旅游资源依赖性较强。针对这一特征,皖北地区应深度开发人文旅游资源。第一,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并根据市场需求将其商业化、舞台化。例如阜阳人在饮食习惯上主要以面食为主且种类多样,可以举办面食节;亳州有“中国药都”之美名,也是名医华佗的故乡,适宜发展中医药旅游、养生游

等,同时可以用华佗行医救人的故事为题材,加入现代观念与科技编排节目,让游客更加了解历史文化。第二,深入开发人文类景区。对于知识文化较强的地方,可增设博物馆,增设游客体验项目,还可利用科技还原古时候场景,如模仿古代曹操运兵时的场景等,增强游客体验。

4. 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的可进入性

旅游交通的均衡发展对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全省交通网络虽已初步形成,但跟江苏、浙江等省份相比,交通网络尚不成熟,由西南到东北、西北到东南方向的高速公路以及铁路线路还较为缺乏,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县乡(如六安、安庆)没有通高速公路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公路在某些乡镇也没有完全覆盖。同时,在黄山、安庆、六安等以山地为主的地区,景区与景区之间的通达度也不高,游客想实现空间位置上的转移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财力。这些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游客的出游意向,阻碍了区域旅游景区的发展。因此,安徽省需要创建便捷的交通方式以及交通路线。一是大力建设皖南、皖西等旅游景区较为丰富的区域,改善路况,优化交通路线;二是加强景区与景区之间交通的通达性,尤其是核心旅游景区与不同吸引力景区之间的通达性,如观赏型与体验型景区之间、自然类与人文类景区之间等,提高旅游景区的外部吸引力,带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

5. 发挥河流湖泊及地势优势,增加景区吸引力

安徽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受河流和湖泊的牵引作用,同时也受地势差异的影响。对于河流湖泊等水资源,在游客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同时,可以为其增加一些创意性活动。对于湖泊类旅游资源可以增加采莲、赛龙舟、高空跳水等水上活动,另外还可以修建水上栈道、音乐喷泉以增加景区吸引力;对于河流旅游资源,在河段平缓的地方可增加游船游览项目,河水湍急地段可加入漂流项目。^[11]对于山地,可以根据不同海拔高度进行旅游开发:低海拔山地可以进行生态农业观光、生态鱼庄体验、保健型山地观光等活动;中海拔地区可以举办高空摄影、骑马、滑翔、野营、山地自行车等参与型项目;中高海拔地区可以进行动植物生态考察、丛林探险、科学考察等考察性活动;高海拔地区可以进行登山远眺、观光等活动。^[12]此外,还可以开展建造森林树屋、认养古树名木、植树造林等活动,以提高景区知名度,丰富旅游景区活动。

五、结语

通过对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研究可知,自 2001 年以来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数量逐年上升,整体呈现“少—多—多”的分布格局;等级结构逐渐形成以 4A、3A 中间等级旅游景区为主的相对稳定合理的纺锤型结构。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愈加趋于集聚分布,同时在三大地理区域中愈加集中、不均衡。

通过对旅游资源、社会经济、交通网络、河流和湖泊、地势等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资源禀赋直接影响着全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变,人文类旅游资源对皖北地区景区结构演变有较强的主导作用;社会经济是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动力,经济增长较好的地区其 A 级景区发展也相对较好;交通网络、河流和湖泊对全省 A 级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变均有牵引作用。此外,地势的差异也影响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变。

本文对安徽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由于收集的资料数据有限,在分析空间结构演变时,采用的是不等距时间分组,所揭示的 A 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变特征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在旅游景区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和地域,其影响因素会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在后续的研究中,会进一步针对不同阶段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 [1] 王硕,曾克峰,刘超. 甘肃省 A 级景区旅游空间结构分析[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3,30(4):88-93.
- [2] 申怀飞,郑敬刚. 河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2013,33(2):179-183.
- [3] 王通,刘春玲. 河北省 A 级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2015,22(5):223-233.
- [4] 吴丽敏,黄震方,周玮,等. 江苏省 A 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 经济地理,2013,33(8):158-164.
- [5] 武真真,章锦河. 安徽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差异分析[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0,22(2):70-75.
- [6] 吴必虎,唐子颖. 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分析:以中国首批国家 4A 级景区为例[J]. 人文地理,2003,18(1):1-5.
- [7] 王恒,李悦铮. 大连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1):84-89.
- [8] 宋福临,汤澍,吴小根. 江苏省旅游等级景区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 河南科学,2010,28(1):121-126.
- [9] 袁俊,余瑞林,刘承良,等. 武汉城市圈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J]. 经济地理,2010,30(2):324-328.
- [10] 李振亭,王香玉. 基于地理量化方法的四川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结构研究[J]. 地理信息世界,2014,21(4):25-30.
- [11] 张朝枝. 水资源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对策初探[J]. 经济地理,2002,22(12):242-246.
- [12] 刘宇峰. 陕西秦岭山地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辑 姚虹)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f A – grade Tourist Scenic Area in Anhui Province

WANG Qiu – long, JIN Xiu – long

(Colleg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Selecting A – grade scenic spots of Anhui province in 2001, 2004, 2007, 2011 and 2014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s using the neighboring index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The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factors with the methods of related analysis, buffer analysis and overla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types of A – grade tourist scenic areas are tending towards aggregated dispersion, the gini coefficient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is becoming more imbalance in the three geographical areas. The tourism resource, the social economy, the traffic network, the lakes and rivers and the terrain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scenic spatial structure evolve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optimization plans in deeply developing tourism resources,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improving traffic and advantag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Key words: influence facto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structure; A – grade scenic spots; Anhui Provinc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专利保护策略研究

——以面上项目为例

张占江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 100020)

摘要: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例,分析了基金成果的专利保护状况,结果表明:科研人员对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保护意识逐渐提高,但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产出量相较于学术会议论文、期刊论文及专著数量而言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现阶段专利事业的发展趋势表明,加强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保护已是大势所趋,同时专利保护也为科研成果的运用转化提供了保证。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专利策略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进行保护。

关键词:自然科学基金;知识产权;专利;保护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0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45-04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表现形式通常有专利、专著、学术论文、商标、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1]。专利作为智力成果的载体,一方面通过其公开性使专利技术为公众所知,发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其独占性使专利技术为专利权人所独占,进而使专利权人对其权利客体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的权利。随着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各创新主体深刻体会到专利的价值,我国的专利申请量也逐年攀升,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92.8万件,同比增长12.5%。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合理利用专利战略进行有效的专利布局,运用专利制度的特点和功能对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保护,可以为研究成果运用及转化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通过在相关研究领域中超前部署一批核心技术专利,可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清除专利壁垒,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成果产出率。然而,由已结题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分析可知,我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产出率相较于学术论文、专著的产出率而言还有较大差距,大量具有潜在经济

效益的高新技术成果以论文、专著的形式被无偿捐献于世界,再加上我国科研成果的专利保护力度不够给力,无形中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例,分析面上项目结题时的专利保护概况,剖析现阶段我国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重点阐述新形势下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保护策略,旨在为加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保护力度提供借鉴。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结题时的专利申请概况

表1汇总了2009—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结题成果,由表1可知历年结题项目成果中期刊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及专著的数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专利申请量及占比远低于相关成果。但令人欣慰的是,历年项目成果的专利申请量自2009年起呈整体增长态势,2013年的发明占比为4.15%,相较于2009年的1.95%,增长率高达113%。图1显示了2009—2013年面上结题项目数与专利产出量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知单项面上项目的专利产出量呈逐年增高的趋势,2013年单项项目的专利产出量达到0.6件,与之对应,单件专利合计的项目

收稿日期:2016-10-12

作者简介:张占江(1982—),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领域: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

数呈下降之势,由2009年的3.5项降低至2013年的1.7项。

表1 2009—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结题成果统计表*

年度	国际会议	国内会议	国外期刊	国内期刊	专著	评议鉴定	发明专利	已推广	发明占比	结题项数
2009	12729	10045	28243	41261	3909	259	1926	488	1.95%	6648
2010	10654	11531	26018	38122	3818	931	2175	476	2.32%	7289
2011	6197	12277	16908	58303	3647	295	5163	640	4.99%	7666
2012	18425	13595	39771	43160	4482	258	4263	492	3.43%	9031
2013	18480	15541	47264	43962	7763	325	5795	424	4.15%	9984

*注:原始资料中,结题项目成果还包括:获奖情况及人才培养等项目,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上述项目未统计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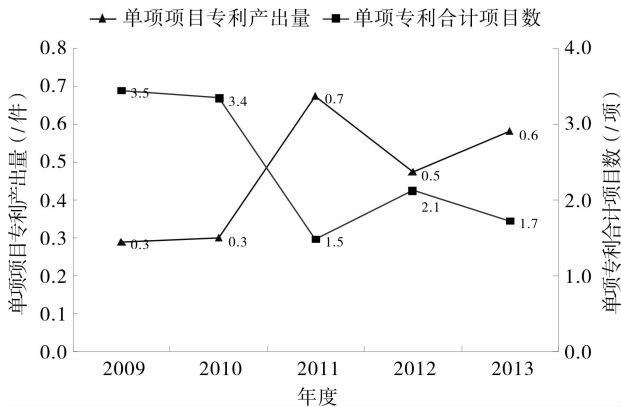


图1 2009—2013年面上结题项目数与专利产出量之间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科研人员对研究成果的专利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专利保护趋势呈整体增长态势,但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研究成果而言,专利保护状况仍不容乐观,反映出我国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重论文、轻专利的思想^[2],许多具有商业价值的成果以论文或其他方式被无偿公开于世,甚至有些成果被竞争对手或投机者获取后抢先申请专利,专利保护状况的落后严重影响了后期研究工作的开展及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造成经济效益的无形流失。

二、基金项目成果申请专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整体态势要求我国科研人员在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专利保护

我国于2008年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经多年发展,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步健全,知识产权拥有量快速增长,以2010—2014年我国专利申请状况为例(图2)^[3],自2010年起我国三种专利申请总量稳步上升,专利申请总量由2010年的122.2万件上升至2014年的236.1万件,其中代表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也由2010年的39.1万件上升至2014年的92.8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三种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也由2010年的32%上升至2014年的39.30%(图3)^[3],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年增长率均保持在两位数。结果表明,我国的专利申请结构进一步优化,重心继续向技术水平较高的发明专利倾斜,我国创新水平、知识产权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创新水平、知识产权水平的持续提高,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在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专利布局来保护研究成果已是大势所趋。专利具有攻守兼顾的效果,对己方成果申请专利,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防止不法分子的窃取;另一方面可以为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扫除障碍,防止己方陷入被动侵权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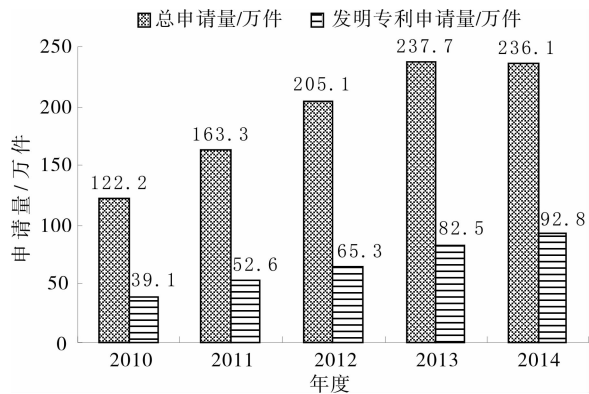


图2 2010—2014年我国专利申请量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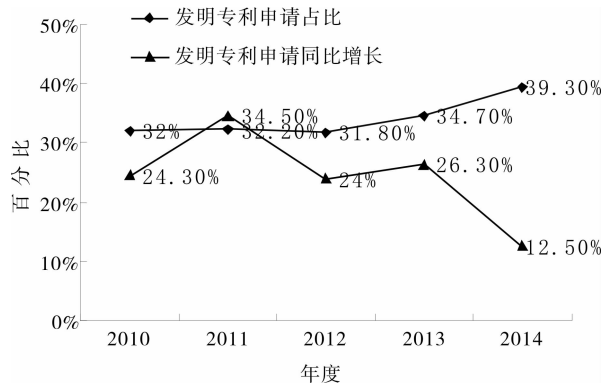


图3 2010—2014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及发明专利申请年增长率

(二)对基金成果申请专利保护是成功实现成果转化重要保证

专利通过其独占性使专利技术为专利权人所独占,进而使专利权人对其权利客体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的权利。对基金成果申请专利后,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转让专利技术获得收益,进而实现研究经费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为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的资金。

此外,在研究成果运用转化过程中,投资者更青睐于投资专利化的研究成果。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知识产权纠纷也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以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为例,2010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2931件,至2013年,该数据已上升至88583件,数据表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了最大程度地排除侵犯他人专利权的可能性,投资者往往选择已获得专利保护的研究成果。

三、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专利保护策略

利用专利策略保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促进专利成果的运用和转化已是科研人员不容忽视的问题。以下重点分析如何运用专利策略对基金项目成果进行有效的保护。

表2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知识产权评议事项

评议阶段	评议内容
项目启动前	技术创新可行性分析 基金项目的创新空间分析;技术可代替性分析;技术核心度调查及技术创新度、成熟度评价 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项目所属领域已有专利技术的竞争状况调查、竞争热度分析;知识产权关联度调查;知识产权风险方向调查
项目研发中	可专利性分析 对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成果的可专利性进行分析,对专利申请的时机进行把控 专利申请策略分析 根据创新成果的特点具体分析申请专利保护的类型,分析如何对创新成果进行专利布局
项目结题后	专利价值分析 对专利经济效益进行调查,评估专利成果的价值,制定成果转化途径

如表2所示,通过对基金项目开展知识产权全流程评议,能够较为客观地判断项目所处的知识产权环境、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以确定研发的方向和制定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同时为项目成果的运营及转化奠定基础。

(二)准确把握专利申请的类型及申请时机

根据研究成果的类型合理选择专利申请的类型对于成果的保护至关重要。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不同类型的专利所保护的主体也不相同。发明专利保护的技术主体是产品或方法,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技术主体是产品,外观设计专利则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申请经过国家专利审查部门的实质审查,专利的技术含量及专利权的稳定性较高。而实用新型专利不经过实质审查,具有授权快捷的特点。

此外,申请专利保护的时机对基金项目的实施也至关重要。在课题立项阶段,研究人员应通过专利文献的检索,确立课题的专利侵权预警信息,为研究重点的确定提供指引。在研发阶段也要根据研发进度对核心技术进行专利布局,对边缘技术进行外围性的保护。研究成果做出后,应在发表学术论文

(一)对基金项目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工作

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在新形势下要建立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制度,围绕国家重大产业规划、高技术领域重大投资项目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工作。知识产权评议是运用情报分析的手段从法律、技术、市场的角度对项目涉及的专利等知识产权进行综合分析,对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价值及保护策略等进行评估、核查与论证,为经济、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4]。

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发过程中适时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工作无疑是提高基金项目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有效方式。基金项目的知识产权评议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见表2)。

或专著前优先申请专利,否则专利申请将因发明内容被论文或专著在先公开而无法被授予专利权。在成果市场化阶段,应通过专利策略引导产品在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避免产品侵权现象的出现^[5]。

(三)注重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策略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因此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申请人切身利益的体现。

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允许对说明书中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或实施例作合理概括,以更加全面地保护申请人的发明创造。通常申请人会在说明书中公开其核心技术方案,然后围绕其核心技术方案进行适当扩展,以便确定更大的保护范围。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与说明书中公开的技术方案或实施例的范围的关系如图4所示^[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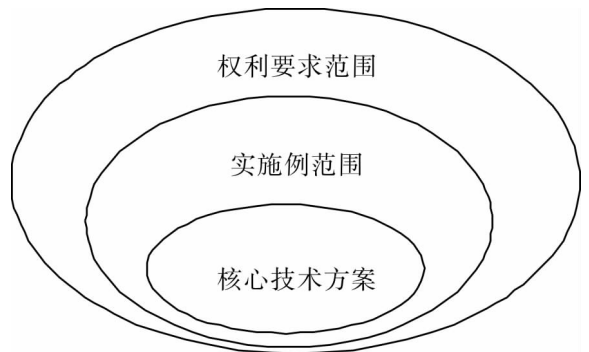


图4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示意图

由图4可知,在撰写权利要求时允许对说明书中的技术方案作适度合理的概括,但前提是所概括的技术方案必须能得到说明书的支持,而不是盲目随意扩大保护范围。合理概括的原则:概括后的技术方案可以涵盖说明书所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所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变型方式,并且这些方法均能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并取得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效果。

概括的方式通常由上位概念概括、并列选择概括或采用功能性限定。上位概念概括是采用说明书中记载的某一技术特征的上位概念替代该技术特征,从而扩大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并列选择概括是采用某一技术特征的等同替代方法或明显变型方式对该技术特征进行扩展,从而起到扩大保护范围的作用。功能性限定是通过对某个技术特征功能的描述来代替说明书中描述的该具体技术特征,从而实现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扩大化^[6]。

(四)灵活运用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同日申请”原则

根据《专利法》第9条第1款的规定,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不经过实质审查,相较于发明专利申请,其审批周期较短,申请人可以快速获得专利权,但其专利权的保护年限仅10年且专利权的稳定性较差。因此,对比发明专利申请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优缺点,申请人可以灵活运用“同日申请”原则。如果申请人既期望快速获得专利权又希望获得稳定的权利,则可以采取同日共同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方法,首先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在先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发明

专利申请符合授权的条件,申请人可以通过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而获得发明专利权,进而实现实用新型专利权与发明专利权的衔接。

四、结论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科研人员对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的专利保护意识逐渐提高,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有待提高。就基金项目的专利保护策略而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全流程的知识产权评议是发现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同时应根据科研的进度准确把握专利申请的类型及申请时机,在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过程中注重权利保护范围的适当界定,并根据成果的类型灵活运用“同日申请”策略实现发明专利权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无缝衔接。

参考文献:

- [1]张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知识产权管理政策研究[J].中国科学基金,2004,18(1):13-16.
- [2]吕莹,吴贵生.从“863”计划专利保护谈我国的高科技专利战略[J].科技导报,1997(12):39-42.
- [3]张占江,王良猷,李珊.“一代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研究[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6):107-112.
- [4]张占江,李敏,李珊.公司设立中专利权出资的风险及防范[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6(9):76-80.
- [5]张占江,阴胜尧,张建升.论专利维权体系的构建[C].2014年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年会第五届知识产权论坛论文(第二部分),2014.
- [6]张占江,张建升.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策略[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29(9):23-2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Patent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NSFC Project

—An Example from General Program

ZHANG Zhan - jiang

(King & Wood Mallesons,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The patent protection status of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general program of NSFC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ers' consciousness of patent protection improves gradually, but the number of its patent application is far less than the number of the journal papers, scholarly monographs and the academic seminar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t pat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patent protection for NSFC project will be a general trend. Meanwhile, the patent protection will also be a guarante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Patent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the NSFC project are mainly studied.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protection strategies

Web2.0 环境下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马宏丽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在 Web2.0 时代,网络媒体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于主要传播资讯的体育赛事,进行网络整合营销是其发展的关键。本文对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网络设备终端及媒体、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整合营销传播流程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 NBA 网络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方式,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提出网络整合营销传播模型,以资国内赛事组织者参考。

关键词:Web2.0;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利益相关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1

中图分类号:F274;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49-0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 年 12 月发布的第 37 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表明,截至 201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20 亿,互联网成为继电视之后的重要媒体。同时,调查数据表明,人们花费在报纸和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与网络信息的易得性和强黏性有关,用手机、平板电脑上网使得网民能够更方便使用“碎片化”时间。

体育拥有超越国界、民族和种族的力量,具有强健人的体魄、丰富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体育产业在现代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很多国家依靠体育推动了产业升级和转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同时,体育产业成就了很多的联盟、运动队、运动员,体育明星已经是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性群体。这一切都离不开成功的体育赛事营销传播。随着媒体工具的发展,体育赛事营销走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营销路程之后,迎来了网络媒体时代。固有的以电视为主导的营销模式,^[2]使得很多体育赛事对网络媒体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同时由于网络媒体工具发展迅速,使得相关赛事营销传播

者无所适从,在使用网络媒体营销时往往给人一种混乱的印象。

因此,研究 Web2.0 环境下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是必要的、迫切的。在研究 Web2.0 网络、体育营销、整合营销传播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体育赛事营销传播的特点,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构建体育赛事网络整合营销传播的媒体整合模型,以资体育赛事组织者参考和体育营销教学者借鉴。

一、Web2.0 的内涵与特征

Web2.0 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跨设备、跨操作系统的富媒体平台,是相关理论、技术、应用的综合。与传统媒体 Web1.0 相比,Web2.0 具有独特的内涵与特征。

1. 在传播空间和时间上更具优越性

Web2.0 时代,网络媒体在传播空间范围、时间跨度、传播模式、传播渠道、内容丰富程度、跨文化特性等方面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3]网络媒体可以把信息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语言、文化的障碍大大降低。有研究表明,要积累 50 万规模的客户群体,电视媒体需要 15 年,网络媒体仅需要 4 年,而新一代媒体工具(如微信等)在短短数月即可达到这一规模。

收稿日期:2017-01-15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22400430039)

作者简介:马宏丽(1963—),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营销。

2. 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模式

Web2.0 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Web2.0 是一种新的理念,使消费者行为模式从传统的 AID-MA(Attention, Interest, Desire, Memory, Action) 模式转变为 AISAS(Attention, Interest, Search, Action, Share) 模式,从而使用户体验更为丰富,应用更具黏性。^[4]

3. 导致整个商业环境的“碎片化”

首先,我国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渡期,社会关系、市场结构、社会观念、话语方式、信用体系,即整个社会的“碎片化”,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文化部落诉求不同。其次,Web2.0 理论、技术导致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人们不再有大块的时间去阅读大部头的厚重的书籍,就某一问题、事件或现象,不再服从权威和意见领袖,而是经过去中心化和再聚合后形成自己群体的意见、观点、结论。最后,以网络为主导的“快餐”文化也导致人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消费者的时间也更加碎片化。

二、整合营销传播基础框架

营销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历了客户营销、企业营销、社会营销、关系营销、一对一营销等模式,伴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走到了今天的整合营销模式。营销管理的范式也由麦卡锡提出的 4P(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 理论转变为劳特伯恩提出的 4C(Consumer, Cost, Convenience, Communication) 理论。整合营销传播,以客户为中心,强调的是企业与客户的互动传播,企业以一个声音、统一的形象在不同的地点、媒体工具上传播,从而带来客户较高的品牌忠诚度,企业利润持续增长。^[5] 主要包括:

(1) 媒体融合和利益相关者导向。不同媒体必须传播统一的价值取向、品牌形象,同时要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叠。例如,一个员工可能既是社区的决策者、投资人,又是客户,企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必须是一个声音。

(2) 战略协作和关系管理。为达到彻底的整合,必须整合不同的内部传播部门,如广告代理部门等;整合内外部功能,达到信息一致;建立和维持统一的公共关系。

(3) 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面对消费者、客户、潜在客户以及相关受众,必须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而不是在不同时间给人以不确定的、模糊的甚至混乱的形象,进而影响目标客户的选择和需求。

(4) 数据库管理。针对市场细分、客户、利益相关者,建立起完备的数据库,这是制定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起点,并且跟踪战略实施的效果,最终反馈到数据。

综上所述,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的整合营销传播基础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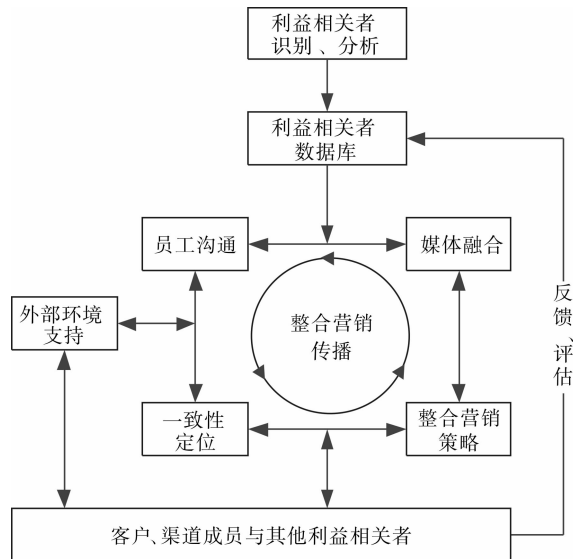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营销传播基础框架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媒体整合模型

1. 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流程

整合营销传播,本质上是关系营销。体育赛事的网络整合营销,首先是基于数据收集的数据库的建立。根据体育赛事所处国家地区、公共关系、财务系统、目标客户等背景,收集相关数据、政策法规、营销资源,并构建利益相关者整合营销传播数据库。其次是利益相关者、网络媒体的分析与选择。对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目标,对各种媒体的优缺点进行分析,选择各自适合的媒体工具。其三是在数据库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选择的媒体工具,制定网络媒体整合方案。最后根据整合营销方案,配置人员、资金、实物等资源,在各种网络媒体上展开营销传播,并配置技术人员对各种网络媒体工具进行技术支持,以便在遇见问题时及时解决。另外,做好每一种网络媒体的营销价值评估,并反馈到数据库中,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流程如图 2 所示。

2. 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指“受一个事件的起因、结果影响的任何个人、集团或组织”。根据国内外关于体育赛事的研究,^[6]从最初的仅仅指参赛的运动员与裁判员,发展到当前的包括政府、社区、赛事组织者、赛

事所有者、参赛组织、参赛队员、赛事观众、赞助商、媒体、裁判员、竞争者及其他相关人员。依据其对体育赛事的支持、威胁程度,划分为支持者、非支持者、边缘人群和混合者,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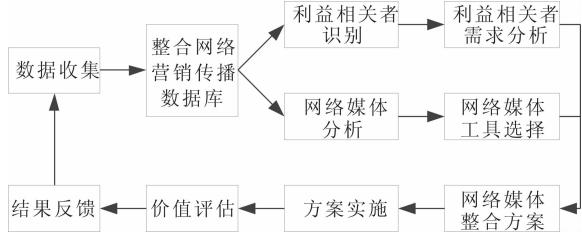


图2 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整合营销传播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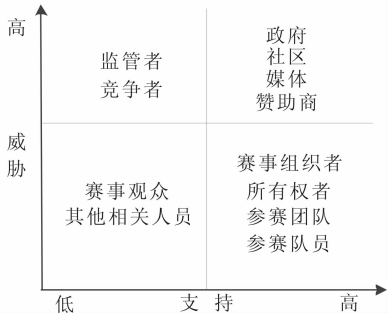


图3 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划分

(1)支持者。指对体育赛事有较高支持、较低威胁的相关利益者,一般包括赛事的组织者、赛事所有者、参赛团队、参赛队员。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体育赛事结成利益共同体,对赛事具有较高的支持程度,但由于内部利益关系,有时候其行为也可能给体育赛事带来较大的威胁,如运动员丑闻、裁判员黑哨、NBA 球员罢工导致的停摆问题等。

(2)非支持者。指具有较高威胁和较低支持的个人或组织,如竞争者、监管者。

(3)边缘人群。指同时具有较低支持、较低威胁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指赛事观众和其他相关人员。这些人员与体育赛事之间没有紧密的利益关系,却是营销传播的目标和潜在消费者,对他们展开适合的营销,是增加收入、提升市场的源泉。另外,观众的专业水平、痴迷程度、普及程度也能体现一项体育赛事的综合水平。

(4)混合者。指同时具有较高支持、较高威胁者,如政府、社区、媒体、赞助商。通常意义上,政府、社区为提升经济、扩张形象,往往对体育赛事有较强的支持态度,如倾举国之力申办奥运、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但有时由于政治、战争等原因,导致体育赛事不能举办或不能顺利开展,如冷战时期,前苏联与美国的相互抵制。媒体与体育赛事密不可分,体育赛事需要媒体的大量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出售转播权获得高额收入;媒体也需要通过报道体

育赛事、转播赛事增加发行量、收视率,但也受到负面报道与假新闻的威胁,如关于中国足球的负面报道,对导致中国足球联赛市场的长期低迷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赞助商是体育赛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赞助体育赛事,主要是为了利用体育赛事公平、公正、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广大的受众进行企业营销,为体育赛事提供大量的资金、现金等价物及服务人员,但大量的非官方赞助商使用的埋伏营销手段往往给体育赛事带来较大威胁。

3. 网络媒体分析

随着互联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技术成熟,互联网媒体工具、相关应用、接入终端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做好体育赛事网络媒体整合的前提是对这些工具、设备及其功能有全面的了解。

(1)个人电脑

主要以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为主。个人电脑在互联网表现性方面仍然优于各种移动终端,尤其是在需要高性能计算的应用程序时。同时,在需要兼顾工作、娱乐的情况下,个人电脑优于移动终端。这一点在进行体育赛事营销,尤其是在网络直播、点播体育赛事时拥有优势。在个人电脑上进行体育赛事传播的主要方式包括官方网站、搜索引擎、网络广告、网络论坛、网络直播等。

(2)移动终端

主要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尤其是智能手机。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使用手机的网民比例为90.1%,比2014年提高4.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WiFi和3G/4G等网络的发展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利用碎片化时间,使得手机网民的上网场所和上网频率增加。同时,由于手机各种应用软件的开发,使得手机网民不仅可以应用文本阅读、新闻关注等相对简单的功能,而且可以应用时间较长、黏性较大的社交、生活服务、即时通讯等功能。智能手机价格降低、性能不断提升,应用软件的开发几乎涵盖了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增加了手机使用的黏度。

在移动媒体上进行体育赛事营销,主要考虑信息易得性、互动性、及时性等特点。相关方式主要包括赛事新闻推送、赛事日程查询、手机电视直播,以及使用微博、微信、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

(3)智能终端

随着家庭网络宽带的升级、数字信号的转换、物联网的发展,智能终端越来越多。这些终端依据人们的生活轨迹进行设置,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智能电视、智能楼宇媒体、车载终端、户外媒体,体育赛事新闻、比赛播出、赛后点播等也离不开这些智能终端。

4. 基于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媒体整合方案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体育赛事网络整合营销传播的目的、营销的对象和阶段都不同。针对不同的体育赛事相关者,营销目标不同,使用的网络营销工具和方式也不同。为了执行整合营销传播在战略上的计划,必须对相关媒体进行整合。

(1)政府及社区。主要营销目标是树立国家、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提供者,主要任务是网络推广。

(2)赛事的组织者/所有者。主要目标是扩大体育赛事的市场和知名度,通知体育赛事日程。网络营销工具和方式有官方网站、搜索引擎、网上票务、网上论坛等。

(3)参赛团队/队员。目标是引起关注,吸引更多的观众成为本团队/队员的粉丝和支持者,通知本团队/队员赛事日程、发布新闻、统计数据、进行赛事评价等。网络营销工具和方式包括网站、主页、博客、微博、网络视频以及网络直播等。

(4)赛事观众。赛事观众既是整合营销传播的受众,也是传播者,具有双重身份。主要关注赛事日程、团队/队员信息、赛事新闻、赛事花絮、赛事直播、赛事集锦、赛事进展、结果统计、技术分析等,发出评价和分析。作为传播者,主要网络媒体传播方式包括链接转载、微博微信分享等。

(5)网络媒体。通过体育赛事的报道,提升网站访问量、用户注册量。主要网络营销工具和方式有赛事新闻、专栏、博客、赛事直播等。

(6)赞助商。主要通过体育赛事传播自身的品牌形象,增加受众数量。网络营销工具和方式有企业网站、网络广告、电子邮件、网络调研、搜索引擎等。

(7)监管者/竞争者。是为了保证体育赛事公平、公正的进行,主要内容是相关新闻发布、历史数据统计等,网络媒体工具有官方网站、网络论坛等。

根据以上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体育赛事网络媒体整合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体育赛事网络媒体整合模型

四、NBA 网络媒体整合营销传播分析

1. NBA 网络传播发展过程

篮球运动是一种关注度较高、参与面较广、普及率较大的大众化体育运动。作为篮球殿堂的 NBA 联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商业化运营,在赛事的组织、传播等方面都有可借鉴之处,尤其在网络媒体运用方面更是首开先河。早在 1999 年 NBA 就成立了 NBA.comTV 网站;2000 年与美国在线合作,负责 NBA 官网的建设和运营;接着,与当时的最大搜索引擎雅虎合作,进行网站的推广;2001 年开始尝试网络直播,成为全美乃至全球第一个在网上直播比赛的体育赛事。^[7]免费的网上直播对 NBA 的传播及其全球化发展功不可没。

NBA 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源于 1989 年,通过每周寄送比赛集锦录像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8]网络传播则在 2003 年通过与搜狐公司合作共同推出。网络直播是在 2006 年通过授权新传宽频体育网站首开直播先河,为不能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比赛的球

迷提供了网络平台,并打破了电视媒体的长期垄断,后又相继与搜狐、腾讯、新浪等多家网站合作。2008 年,NBA 与 TOM 集团合作,成立大中华区独立中文官方网站。2009 年,科比在新浪开通博客,通过个人主页与中国网友、球迷进行交流,并在网易、虎扑、新浪等网站开办有社区和论坛,不仅为中国网友、球迷的交流和 NBA 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而且提供更为广泛、丰富、专业的 NBA 赛事新闻、花絮、集锦、赛事直播等内容。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发展,WiFi 等基础网络设施的完善,NBA 相关的应用开发不断涌现,如 NBA 日程、壁纸、游戏、视频、直播等。所有这些网络媒体对 NBA 的营销传播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2. NBA 网络整合传播分析

NBA 以其雄厚的资金、高超的管理,结合美国在线、TOM 等公司的先进技术,在网络整合营销传播领域堪称典范。根据本文构建的整合媒体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见表 1。

表1 NBA网络整合传播分析

利益相关者	相关网络媒体	媒体终端
美国/中国… 社区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不同语言的官方网站,如英文:www.nba.com;中文:china.nba.com NBA 球队所在城市网站链接,如 www.nba.com/celtics	笔记本、台式机、平板电脑
NBA 组织者	国家篮球协会:www.nba.com;官方微博:e.weibo.com/nba;NBA 中国官方社区:http://nba. weibo.com/;手机应用开发,游戏开发,商店,票务,搜索引擎等	笔记本、台式机、平板电脑、手机
NBA 球队	30 支球队,均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如芝加哥公牛队:http://china.nba.com/bulls/	笔记本、台式机
NBA 队员	现役和退役球员,均有相关链接,介绍其服役时间、球队、位置、战绩等,如 china.nba.com/ stats/players;很多球员建有个人主页、微博等	笔记本、台式机、手机
NBA 球迷	论坛:bbs.hupu.com/all-nba,www.zuiainba.cn 等	笔记本、台式机
网络媒体	Facebook, Twitter, 新浪、网易、腾讯等	笔记本、台式机
赞助商	http://china.nba.com/chinagames2012/sponsor/等	笔记本、台式机、智能终端
竞争者	美国篮球协会(ABA):http://www.aba.com 等	笔记本、台式机

NBA 的网络整合营销,以官方网站为综合性平台,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展示自己的链接和窗口;以搜索引擎为导向,将用户导向到官方网站;以各大论坛、微博、社区为主题,为球迷、观众提供了互动的平台;以游戏、商品、手机应用为外围开发,形成了全方位的拓展渠道。

3. NBA 网络整合营销传播的启示

(1) 利益相关者各方均有展示自己的平台

NBA 作为全球化体育赛事成功运作的典范,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有官方、资本方(组织者、球队)、劳工方(明星、裁判)、消费者(球迷)、赞助商、媒体、竞争者等不同利益群体。在其网络整合营销传播方案中,各方均有自己的展示平台,推动利益相关者各方之间的互动与参与。

(2) 传播内容的丰富化、多样化以及传播方式的跨平台性

网络媒体是富媒体,不仅包括文字、照片、视频,还包括相关的评论,球迷甚至可以和自己关注的球队、球星直接互动。网络媒体不受发行范围、覆盖区域的限制,发布信息步调一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上网,人们即可平等访问。同时,通过网络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息,传播内容是同步的、统一的。

网络时代,传播内容不再受报纸和期刊的版面、电视的特定时间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在个人电脑、手机、移动终端等各种设备上展现。人们不再为错过某场比赛而遗憾,即便不能观看现场直播,也可以在空闲时通过视频点播观看。通过网络整合传播,NBA 为人们呈现了篮球运动的精彩和博大精深。

(3) 网络媒体的高度有序整合

首先,NBA 网络整合营销传播以 NBA 官方平台为核心,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设置了不同的语言,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其次,无论采用何种搜索引擎、

论坛、社交网络、媒体等外部链接方式,均能够导航到其官方核心网站,保证了传播的一致性。其三,相关外围应用开发、赞助商、商品等均需要有正式的授权,以规范的格式、形象传播 NBA 的心念力、突破力、战斗力、凝聚力、优化力、约束力等内在精神。总之,NBA 的网络传播虽然使用的媒体工具纷繁复杂,但其组织是有序的高度的整合,给人的感觉既精彩纷呈,又有章可循。

五、结语

研究从网络发展的现状出发,说明体育赛事展开网络营销的必要性。在阐述 Web2.0 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构建体育赛事的网络整合传播模型。通过对 NBA 整合营销传播的分析,给体育赛事,尤其是体育赛事组织者以启发。展开体育赛事网络整合营销传播仍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

(1) 网络整合营销传播在现代体育赛事营销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加强观念、意识的转变,体现公平、公正、积极向上、重在参与等体育精神。一方面受传统力量的影响,很多体育赛事组织者为保护既定群体的利益,在营销传播时往往对网络媒体采取限制的做法;另一方面受行政力量的影响,组织者认为举办各种体育赛事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只注重硬件工程建设,而轻视营销传播。

(2) 一般的工商企业在实物交付环节必须依靠线下物流系统,而体育赛事与其不同,可以采用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等技术手段,使得观众不必到现场就能观看到精彩的比赛。体育赛事网络营销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的过程,是整合营销传播的典范。因此,必须通过多种营销途径,采用多种营销手段综合进行营销管理;必须以一个声音、一个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

(3) 体育赛事网络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营销管理者的素质、能力要求更为全

面。因此,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尤其是加强对整合营销传播经理的培养,因为整合营销经理是整个事件的沟通核心。同时,注重对体育赛事专业营销团队、第三方组织的培养,毕竟网络媒体工具的技术复杂性、模式的成熟性不同于传统的媒体。

网络整合营销传播是新的传播方式,是整合营销传播的组成部分。网络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模式、模型均需要探索和创新,同时体育赛事营销、传播本身也在发展之中。因此,网络整合营销传播的良性发展需要理论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中商情报网. 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2017 - 01 - 10) [2016 - 01 - 22]. [http://www. askci. com/news/chanye/2016/01/22/141430ekou_5..shtml](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1/22/141430ekou_5.shtml).

[2] 徐行行. NBA 赛事在中国电视传播与网络传播比较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3] 章浩. 赛事官方网站如何提高赛事吸引力 [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8(5): 24 - 26.

[4] Baidu 百科. web2. 0 [EB/OL]. (2017 - 01 - 10). [http://baike. baidu. com/item/web2](http://baike.baidu.com/item/web2).

[5] Shin K Y. The Executor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Marcom Manager's Working Model [M]. 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6] 黄海燕, 张林. 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分析 [J]. 体育科研, 2008, 29(5): 25 - 28.

[7] 蒋玉梅. NBA 网络传播概况的解析与思考 [J]. 体育与科学, 2009, 30(6): 37 - 39.

[8] 朱玉梅. NBA 在中国市场整合营销传播模式分析 [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Sports Event IMC under Web2.0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keholders

MA Hong -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Web2.0 era, the network media shows strong development momentum. It is the ke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o take the network integrated market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orts event stakeholders, the network terminal equipment and media, the sports events stakeholders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process, analyzes the NBA network media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modal, and puts forward the network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keholders for the domestic organizers as an reference.

Key words: Web2.0; Sports Event;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takeholders

免费型商业模式构建探析

宋子鑫

(山东济宁医学院 管理学院, 山东 济宁 272113)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免费的商业模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人们接触到的免费商业模式主要分为四类:直接交叉补贴模式、免费+收费模式、非货币市场、三方市场模式。本文主要从经济学方面分析免费商业模式的基础及其实质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免费商业模式;网络经济;实用性;价格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55-04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商业模式也随之不断的创新。进入21世纪,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平台被广泛运用在商业运作的各个领域,而互联网免费商业模式的大量涌现,使传统的商业运行模式受到极大冲击。免费商业模式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以交叉补贴的吉利模式为代表,例如剃须刀厂商通过免费派送剃须刀具,从后续销售刀片盈利,就形成了典型的捆绑销售模式;早期的电视节目也是免费向观众播放的,通过第三方——广告商预付的广告费来盈利。基于此,“免费”的商业模式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不断的改变其模式来呈现。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免费商业模式以互联网为载体,在互联网时代大放异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多的商品也会逐渐的加入到免费行列,尤其是数码产品的免费化,极大地满足了顾客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悄然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

一、免费商业模式概念

根据《免费:商业的未来》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的说法,这种新型的“免费”商业模式是一种建立在电脑字节基础上的经济学,而非过去建立在物理原子基础上的经济学。^[1]这是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独有特征,如果某样东西成了软件,那么它的成本和价格也会不可避免地趋于零。这种趋势正在催生一个巨量的新经济,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新经济中基本的定价就

是零。

二、免费商业模式兴起的原因

在《免费:商业的未来》一书中,克里斯·安德森认为,新型的“免费”并不是一种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营销伎俩,而是一种把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压低到零的新型卓越能力。^[1]在20世纪“免费”是一种强有力的推销手段,而在21世纪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为什么在21世纪“免费”会成为一种主流的商业模式呢,这是由供给和需求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市场竞争形态所决定的。

(一)供给方面

免费商业模式的基础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所谓的规模经济,就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长期平均总成本下降的特性。免费商业模式中,顾客得到的免费的产品和服务也是有成本的。^[2]正常商业模式下,这些成本都是由消费者或顾客承担,但在免费商业模式下,这些产品的成本不是被分摊到其他产品上面,就是被其他第三者承担,或者被其他顾客承担。如果这些转嫁的成本太高,那就起不到吸引其他顾客的作用。

供给的产品方面,适应免费商业模式的产品一般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固定成本会很高,但产量越大,固定成本就会被分摊的越细,从而使得产品的利润越大。尤其无形资产,如知识、信息、文化、数码、软件、模式、品牌等都有这个特点。

收稿日期:2016-10-24

作者简介:宋子鑫(1988—),男,山东日照人,硕士,山东济宁医学院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代工生产模式的兴起,使得生产产品的固定成本大大减少,这也是实体产品能够试行免费商业模式的一个基础。

(二)需求方面

需求方面存在的“网络外部性”也是推动免费商业模式的重要力量。“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3]

网络效应有两种形态,一是直接的网络效应,二是间接的网络效应。直接的网络效应是指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对它的评价越高,需求量也就越大。网络效应会产生滚雪球效应,一旦网络用户达到一定的数量后,网络的用户人数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网络,即产品的效用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而增大。

间接的网络效应是指同一个网络下多个相关产品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动相关产品需求增加。这种网络效应存在于有着互补效应的产品之间。例如,电脑使用的数量越多,带动的键盘、鼠标及鼠标垫的使用数量就越多。

(三)市场竞争方面

市场竞争的特点也决定了“免费”商业模式的盈利性。网络经济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同时存在着两个市场,分别是同质化的完全竞争市场和专属化、个性化的垄断竞争市场。

在网络经济中,大部分的信息和产品市场几乎是完全竞争市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网络经济时代,对于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同质无差别的产品或服务来说,在竞争的驱使下,产品价格降到很低或干脆免费就成为必然。

互联网中也存在着很多个性化或者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远远高于同质化的免费产品,并且边际成本也相对较高。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消费者则会面对一个有价格差异的产品市场。这些专属化、个性化的产品以差异化服务决定差别市场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互联网经济中的另一个主要市场——垄断竞争市场。

免费的商业模式可以将两个市场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可以通过在同质化、低边际成本的完全竞争市场将产品免费来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引导顾客的消费导向,衬托付费商品品质的精良,从而起到很好的广告作用和目的;然后在专属化、个性化的垄断竞争市场中,通过付费产品来获得利润。

三、免费的商业模式分类

“长尾理论”的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费:商业的未来》一文中将免费的模式概括为四种,分别是:

直接交叉补贴模式、三方市场模式、免费加收费模式、非货币市场。

(一)直接交叉补贴模式

直接交叉补贴模式是通过有意识地以优惠甚至亏本的价格出售一种产品(称之为“优惠产品”),而达到促进销售盈利更多的产品(称之为盈利产品)的目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捆绑销售:运营商免费向顾客提供手机,但需要充大量的手机费;麦当劳常常派发一些免费的餐券,但它必须在下次用餐时才可以使用,为了使用这张餐券,你很可能再次光顾麦当劳。这就是最原始的免费模式。也是直接交叉补贴模式的体现。传统的直接交叉补贴模式是对核心的、利润高的产品收取费用,而现在的直接交叉模式则是核心产品完全免费,只做附件产品的生意。

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合这种免费模式,适合直接交叉补贴模式的产品须满足:一是产品互补性强(指的是盈利产品和非盈利产品要有互补性),二是消费者对盈利产品的需求弹性要低,三是盈利产品的进入壁垒要足够大。例如,通过对相关专利的持有,标准的制定,零部件整修技术以及消耗品的设计,才能使直接交叉补贴战略持久可行。

(二)三方市场模式

是指第三方支付来参与前两方之间的免费模式。我向卖家买东西,但是付费的是第三方。三方市场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第三方广告商给生产商付费,把免费或近似免费的产品提供给顾客,从而形成一个三方市场。三方市场免费模式存在的基础,首先要有庞大的客户关注量。“第三方市场”盈利的基本逻辑是向用户提供服务,然后把用户“卖”给广告商。如果客户的关注量不大的话,三方市场吸引不了广告商的加入,就无法为顾客提供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三)免费收费模式

这种模式不仅仅在于网络生存空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形式也是最为常见。免费加收费模式,核心就是在免费服务或产品上亏损,在付费服务或产品上获得利润,同时把前者当作一种促销或推广手段。

传统模式下,免费的服务或产品占总体销售量的比例很少。但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这个免费和收费的比例彻底逆转。在互联网时代,一家企业要想成功实施这种免费模式,必须遵循“5%定律”,也就是5%的付费用户是网站的所有收入来源,这种模式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给其余95%的用户提供的服务和成本相当低廉,可以视为零。

在互联网时代免费收费模式,源于“二八定律”,企业80%的的利润是由20%的品种带来的。这就可以将

另外 80% 品种的产品免费送给消费者,吸引消费者来购买另外的 20% 的产品。另外,实行这种免费和收费的模式,它需要厂商具有细分市场的能力,也就是价格歧视,对那些支付意愿较高的消费者卖一个高价,对那些支付意愿较低或者为零的消费者卖一个低价格,甚至免费派发。因为产品派发的越多,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付费客户。

(四)非货币市场

在非货币市场,货币不再是市场中最重要交易信号,也就是说金钱并非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唯一动力。相反,而是“注意力”和“声誉”经济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得到提升。这种模式主要是伴随着互联网的粉丝经济的兴起,而形成一种比较新的免费模式。人们提高其注意力和声誉,一旦量化,将会转化为金钱,形成最终价值。

非货币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礼品经济、劳动交换、盗版、日常生活中的免费测试。

以上是这四种免费模式的含义和特征,在互联网经济中,作为互联网企业所最关心的问题必然是企业的盈利问题。互联网企业短期内基本倾向于通过免费迅速占领市场,扩大用户资源,形成网络效应,但是长期来看互联网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盈利模式,以达到最终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互联网企业需要根据不同经营战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免费商业模式。

四、免费商业模式的实质

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自然而然的产生金钱和货币的相对流通。这种流通的本质是通过付出劳动或者购买付费的产品和服务来补偿获得的免费产品和服务,实现价值的平衡转移。免费商业模式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种平衡转移。不过这种平衡转移,转移的是顾客的注意力。免费商业模式的实质是“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是指如何更有效地配置企业现有的资源,以最低成本去吸引用户或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培养其潜在的消费群体,以期获得最大的未来无形资产。即经营消费者注意力的免费模式虽然对顾客提供免费的商品或服务,但是企业的利润一点也不少。而免费模式的盈利来源,其实很简单,就是单方面免费,其他方面的收费。

五、免费商业模式优点

前面我们知道免费商业模式兴起的三个方面的原因是供给、需求、市场竞争。其实在这三个主要方面原因之外,免费商业模式也为其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实用性广

上文提到的四种免费商业模式不仅适应于传统企业,同时也适用于互联网企业。大量生产数字产品的

互联网企业由于产品的特性,正越来越多的采用免费商业模式。在《免费:商业的未来》一文中,共列出了建立在免费基础上的 50 个商业模式,例如,超市里的买一赠一,零售商的“赔本甩卖”,赠送手机销售通话时间等。这些案例,都显示了免费商业模式的适用性广的优点。

(二)能够实现共赢

在免费商业模式中,好象顾客获得了很大的便宜。但是,仔细一算的话,参与免费商业模式的各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三方市场模式能够实现用户、企业和广告商的共赢。用户能够免费获得优质的产品,广告商获得了用户的关注,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企业也从广告商处获得了利润。

(三)能够增加顾客黏性

免费的商业模式是为了将企业的产品交给用户进行初体验,并产生用户黏性,当用户黏性到达一定程度,人与人之间都产生了一定的连带关系的时候,随着增值服务的多样化的产生,最终实现企业盈利的目的。例如,免费+收费模式中,消费者通过免费的商品和服务对这个品牌产生了依赖度,从而购买这个品牌的收费产品和服务。

(四)能够让消费者获得极大的便利

这是由免费商业模式的运营机制决定的,必须先让消费者获得好处,才能得到回报。例如,在非货币市场,消费者就可以免费获得企业提供的礼品,以此来感谢对企业的生意多年来的照顾。

六、免费商业模式的弊端

当然,随着对互联网商品要求的不断提高,在互联网中也存在着很多个性化或者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任何消费模式的出现都具有双重性,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不利的方面,同样免费商业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弊端。

(一)免费商业模式的泛滥改变用户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

以前的商业模式再怎么复杂,其交易的过程,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在免费商业模式中,这个观念被极大地扭转。这一点在数码商品领域更为明显。企业向用户提供免费的聊天软件、办公软件、杀毒软件,这让用户形成了对免费产品的依赖,让他们从传统买卖双方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变成了“唯免费不取”^[4]。有时,为了贪图免费的商品,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去购买一些盗版产品。例如,微软公司的电脑系统就是被盗版最多的产品,微软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机构方面,而民众使用的微软系统绝大部分是盗版系统。

(二) 免费商业模式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无论哪一种免费商业模式,都是首先要给予顾客大量的免费商品和服务,再通过其他方面获得收益。这些免费商品和服务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是企业的负担,为了减轻负担,必然会想办法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必然会从免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上下游,毕竟这是免费商业模式成本构成因素中的最主要因素,这必然会降低免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甚至会以次充好。这些都会影响顾客的用户体验。

(三) 免费商业模式难以将免费用户转化为收费用户

免费商业模式依靠免费商品或服务积累大量的用户群,当用户黏性达到一定水平时,靠收费服务获得利润,而其推出收费服务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新的服务,并且只对新服务收费,之前的基础服务依旧保持免费。第二种方式,在免费服务中划分出一部分使用频率高的、维护成本高的核心产品和服务进行收费。

这两种方式各有其弊端。对于第一种方式,当用户使用了免费商品和服务后,可能认为这些商品和服务就足够了,并没有额外增加服务的需要。对于第二种方式,虽然将核心产品或服务转化为收费,能够将一部分对免费服务或产品产生依赖的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然而,更多情况下使用免费产品或服务的顾客对价格的变动十分的敏感。原本免费的产品或服务变成了付费的,将很大程度上引起顾客的不满甚至抵制。

(四) 免费商业模式容易引起价格战

免费商业模式的实质是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以免费的价格吸引顾客的注意力,从而获得市场的一种商业竞争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企业采用

免费的模式来加入到这场价格战中。价格战的结果只能是各方参与者损失惨重,最后,大家都没有挣到钱,整个行业因为免费的商业模式而没有盈利的空间。最后,大家纷纷撤离这个行业。

(五) 免费商业模式增加企业的资金运营难度

要想成功实现免费商业模式就必须有舍才有得。前期免费商品和服务的推广,需要大笔的投入。如果光靠企业本身的财力可能入不敷出。这就需要企业来整合产业的上下游,拉拢广告商和风险投资者,与银行打交道获取贷款。这些事情,都考验企业的资金和运营能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人类的商业模式由有偿模式向免费模式转变,由免费模式向补贴经济模式转变。所谓的补贴经济模式是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用户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消费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价值的创造者。用户在消费商品的同时,可以为平台运营者或者是商品附属的其他服务带来增值的收益,而这一部分收益,在以往的商业模式中是被忽略的,而以消费者补贴模式为商业逻辑的业务路径,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也能进一步营造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环境。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安德森. 免费:商业的未来[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 [2] 张永庆,毛记云.“免费”商业模式的经济学分析[J]. 商业经济,2012(14):34-35.
- [3] 袁宏伟. 基于互联网的“免费”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 商业研究,2010(12):192-196.
- [4] 李尔慈. 浅谈免费商业模式的优势和弊端[J].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4(7):10-11.

(责任编辑 赵冰)

Study on the Free Business Model Building

SONG Zi - xin

(College of Management,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21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Internet + , th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has been obtained in free business model. The types of free business model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direct cross subsidy mode, the free + charge mode, the non - monetary market mode and the three - party market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base, the essence and the direction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free business model; internet economy; practicability; price - war

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国际合作法制优化新论

周艳云

(东南大学法学院,南京 211189)

摘要:中国正处于反腐败的攻坚阶段,必须完善所涉法律机制,以便能高效利用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跨境追回中国外流的腐败犯罪资产。如何建构中国资产追回的独立民事诉讼法制、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制及设立资产分享配套法制成为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制亟待解决的难题。为妥善解决上述难题,必须对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律制度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和深入思考,建构和完善相对合理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律制度。

关键词:腐败犯罪资产跨国追回;国际合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资产分享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3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59-08

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跨境转移现象已成腐败犯罪的常态。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跨境追回的成败成为衡量我国国家治理腐败问题实效的尺度。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的跨境成功追回必须依仗腐败犯罪资产的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密切的国际合作。然而,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制的滞后、刑事缺席审判法制的缺位、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法制的匮乏、追回资产的分享法制的缺失、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僵化适用等诸多因素均阻滞了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国际合作。中国必须完善所涉法律机制,以便能高效利用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跨境追回中国外流的腐败犯罪资产。建构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独立民事诉讼法制、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制及设立资产分享配套法制成为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法制的有益路径。

一、独立民事诉讼法制的建构:中国追回腐败犯罪资产国际合作民事法制层面的完善

中国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刑事与民事诉

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建构我国独立的资产追回民事诉讼法制,从优化民事法制层面促进中国腐败犯罪资产追回国际合作。

(一)英美法系国家刑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追回犯罪资产主要是通过民事没收程序而实现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诉讼可完全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该资产追回模式的特征是追回犯罪资产的民事诉讼与追究该案犯罪责任的刑事诉讼完全剥离开来,民事诉讼完全独立于该案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处于完全平行、互不干扰的状态。

对犯罪所得资产采用民事没收程序进行追回的法律制度已频繁出现在英国、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立法中。^[1]在美国,对犯罪所得资产采用民事没收程序进行追回的法律制度有2001年的《爱国者法》与1970年的《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 ACT)》。^[2]在英国,对犯罪所得资产采用民事没收程序进行追回的法律制度有2002

收稿日期:2016-12-2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资助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预惩协同型’反腐败国家立法体系战略问题研究”(16AFX002);中国法学会重点专项课题“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CLS(2015)ZDZX04)

作者简介:周艳云(1979—),女,湖南衡阳人,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法学研究。

年的《犯罪收益追缴法》与1986年的《贩毒法》。《犯罪收益追缴法》规定对犯罪收益的追缴采取在刑事没收中植入民事没收程序的方式进行,《贩毒法》则授予法院针对犯罪所获财产有发布没收令的权力。而且,英国为实现对犯罪资产的有效追回,专门设立资产追索局为犯罪资产追回的特定机构,负责对1万英镑之上的犯罪所得进行追缴,并授权其在法院对罪犯提起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之前,可提起追回资产的民事程序。^[3]在澳大利亚,对犯罪所得资产采用民事没收程序进行追回的法律制度主要为2002年的《犯罪收益追缴法》,其中详细规定了追回犯罪资产的民事没收程序。^[4]英美法系国家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中的民事没收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程序,一方面,追回资产的民事没收程序非刑事诉讼程序而归属于民事诉讼程序,需遵守民事诉讼程序的诉讼方式和重要原则;另一方面,追回资产的民事没收程序实质上是以民事程序的形式达至刑事目的,归属于刑法上的没收制度。

(二)中国建构资产追回独立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1. 立法层面建构资产追回独立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不仅源于英美国家相关立法实践,也渊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法律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直接追回资产与间接追回资产的法律机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两种资产追回机制中所要求的资产流入国执行或协助执行有关资产追回的生效判决既可是刑事判决也可是民事判决^[5],且进行资产追回的没收方式既可是刑事没收方式也可是民事没收方式。所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设置的法律机制,一方面,腐败犯罪的资产受损方可通过提起民事确权诉讼或民事侵权诉讼的方式,形成生效判决,由资产流入国执行或协助执行该判决来追回腐败犯罪资产,并将其返还给受损方;另一方面,资产流入国可通过民事没收的方式将流入本国的腐败犯罪资产回收并返回给资产来源国。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国在立法层面建构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提供了可行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设置的资产追回的法律机制为我国建构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示范模式。另外,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负有国际法定

义务将其所设置的资产追回的法律机制通过国内立法方式在中国确立和适用。

为建构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中国国内立法已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行了部分修改。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违法所得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死亡或逃匿且经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为追回其腐败犯罪所得资产,公安机关出具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启动没收程序的申请。人民检察院在提出申请时应提交与违法所得和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并注明犯罪资产的数量、种类、所在地及其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人民法院依据申请在必要时查封、扣押、冻结该犯罪资产。从该规定可分析得出,当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死亡或逃匿情形发生时,针对其违法犯罪所得资产实行的没收程序实质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的,而实行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互独立的平行模式更有利于该没收程序的运行。通过独立民事诉讼实现民事没收制度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间接追回机制的规定,与中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死亡或逃匿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相符合。

故在中国实行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其渊源既有公约的原则性规范的保障,又有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极具操作性的规范,还可借鉴英美等国家经验丰富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在中国建构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提供了法制的保障和制度的支持,该模式在中国短期内建构和完善是完全可行的。

2. 司法层面运行资产追回独立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不仅在立法层面上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在中国短期内建构和完善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具体制度层面上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在中国短期内设立也具有可行性。

首先,民事诉讼在程序要求上非似刑事诉讼严格,在被告人失踪或死亡的情况发生时,独立民事诉讼较易实行缺席审判^①,只要程序正当,民事缺席判决是可以被资产流入国承认和执行的。刑民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确立资产追回中实行民事诉讼和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相互独立的平行诉讼模式,人民检察院或受害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死亡、逃匿或丧失行为能力情形发生时,人民法院可

按照民事缺席审判程序进行审理。民事诉讼中的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有关资产追回的民事判决或裁决更易得到资产流入国的承认和执行。

其次,资产追回类的民事诉讼判决属于民商事判决范畴,民商事判决可受国际上诸多成熟的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国际公约的保障,有详尽完善的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民事判决的法律规则可依据,有成熟的司法协助机制可适用。

再次,刑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的实施能为中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设立与完善赢得充足的准备时间,能避免在中国为资产追回类案件短期内急速建构繁复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系列配套制度所产生的难题,能防止因急速建构肇致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极度不完善。

最后,刑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不易受双重犯罪原则的限制和引渡条约前置原则的限制。资产追回类的刑事判决或裁决易受双重犯罪原则和引渡条约前置原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限制,而刑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中的判决或裁决仅具有民事性质,与相关刑事诉讼完全独立,互不影响,故其不受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双重犯罪原则和引渡条约前置原则的影响或限制,更具有可行性。

故刑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设立条件成熟,阻力困难少,契合中国国情,其在中国短期内建构具有可行性。

(三)中国刑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的建构

中国为实现腐败犯罪资产的有效追回,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中国所建构的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犯罪资产进行追回,将追回犯罪资产的民事诉讼与追究该案犯犯罪责任的刑事诉讼完全剥离开来,民事诉讼完全独立于该案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处于完全平行、互不干扰的状态。

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相较于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资产追回模式而言,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新建构的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允许资产受损方或受害人专门针对腐败案件中的违法犯罪所得及相应的涉案资产单独提起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腐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对追回资产的民事

诉讼毫无影响,是否对腐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对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毫无影响。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可随时进行,不再必须在同案刑事诉讼启动后才可进行,即使同案刑事诉讼因特殊原因终止,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仍然可不受干扰继续进行。

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实质是一种对物诉讼而非对人诉讼^[6],在腐败资产追回案件中仅涉及对违法犯罪所得资产的审理,不涉及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审判,无关涉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不必以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判决为前提,只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该资产为直接或间接源自于腐败犯罪所得,则可对该资产采取强制追回程序,并将追回资产返还给其合法所有人。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是将腐败违法犯罪所得资产的追回与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相分离,两者独立平行进行的模式。

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归属民事诉讼程序而非刑事诉讼程序,属于处理财产纠纷类的民事诉讼的范畴,资产受损方或受害人可采取提起民事确权诉讼或民事侵权诉讼的方式进行资产的追回。^[7]

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资产追回方式虽其本质属于民事诉讼,但其附属同案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必须以同案刑事诉讼的启动为前提。当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逃匿或死亡情形发生时,刑事诉讼程序中止或终止,其所附带的民事诉讼也不能进行。中国将建构的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恰好可摆脱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此种困局。新模式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与该案刑事诉讼部分相剥离,资产受损方或受害人可不受同案刑事诉讼部分的影响采取单独提起民事确权诉讼或民事侵权诉讼的方式进行资产的追回,可避免中国刑事缺席审判法制缺失的困局,不必违反刑事正当程序原则,符合程序正当要求。^[8]

刑事与民事诉讼平行独立进行的资产追回模式赋予资产受侵害方对腐败等违法犯罪行为单独提起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的权利,有利于尽快追回腐败犯罪资产,可防止因腐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匿或死亡而中止或终止对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的情况发生,可避免对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的不当拖延所造成的腐败犯罪资产被犯罪人员挥霍殆尽的情况发生。

在追回腐败犯罪资产的独立民事诉讼中,何人有资格提起民事诉讼呢?

腐败犯罪所侵吞的资产多为国家财产,国家作为国家财产的所有人才有权提起追回国家财产的独立民事诉讼。然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法律主体,国家的诉讼主体资格必须由有权的相关国家机关才能行使。从中国国家机关职权分工与配置而言,由检察机关提起资产追回的民事诉讼、行使民事诉权才合适。检察机关有就腐败犯罪嫌疑人侵吞国家资产和侵犯国家利益的腐败犯罪行为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权力,国家也应授予检察机关为追回腐败犯罪所侵吞国家资产提起独立民事诉讼的权力。尤其当腐败犯罪人员逃匿或死亡情形下,无法通过中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追回国家资产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追回资产的独立民事诉讼程序就成为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有效路径。在腐败案件中,国家之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财产权益受侵害的,单位或个人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资产追回的独立民事诉讼。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制的优化:中国追回腐败犯罪资产国际合作刑事法制层面的完善

(一)借鉴法国宽松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优化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资产追回法制

法国宽松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相较于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而言,更具灵活性,极有利于犯罪资产的追回。中国可借鉴法国宽松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优化建构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资产追回法制。一方面,该种模式中的追回资产的民事诉讼虽附属于同案刑事诉讼,但其中的民事诉讼相对独立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所附带的民事诉讼可先于该案的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不必受制于刑事诉讼和刑事判决,民事诉讼的判决或裁决也不影响刑事诉讼中的定罪量刑,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互不影响,互不干扰,相对独立进行,并且对于犯罪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没收可采用缺席审判制度。另一方面,资产受损方拥有极大的选择权。刑事案件中的资产受损方有权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资产追回,有权选择在公诉前抑或公诉后提起资产追回诉讼,也有权选择在民事法院或刑事法院提起资产追回诉讼。

(二)设立资产追回中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违法所得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死亡或逃匿且经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为追回其腐败犯罪所得资产,人民检察院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提出启动没收程序。但法院的没收机制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制度,故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已

确立了追回犯罪资产的没收机制,但并未建构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原则上要求追回腐败犯罪资产的资产流出国应向资产流入国提交已生效判决,并且在各国的司法协助实践中,多数国家明确规定生效判决是追回腐败犯罪资产的司法协助的前提。^[9]然而,由于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失,且中国民事没收制度尚未建构完善,故在逃往外国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中国审判之前,中国无法提供已生效判决来取得资产流入国在追回资产方面的司法协助。故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失会阻滞中国腐败犯罪资产的跨国追回。所以,中国有必要建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中国民事没收制度一并成为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双保险机制。

然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关涉案件的程序公正,关涉被告人参与诉讼并为自己辩护的诉讼权利的享有,故中国建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必须严格限定刑事缺席审判的运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最大程度地保证程序公正。

首先,刑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限定。

一方面,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被告人,即犯罪行为人是十分确定的,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及侵吞或损害国家或他人资产的事实。否则,如因无法确定被告人而进行刑事缺席审判则会导致该审判难以为继,资产追回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被告人是基于自身原因而非外在原因不到庭应诉,如被告人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匿、拒不归案、故意造成下落不明等,且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用尽各类侦查手段或经公告后在法定期限内仍拒不归案,国家或受损方又急需尽快追回外流犯罪资产时,法院方可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

其次,刑事缺席审判适案范围的限定。

并非任何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逃匿的刑事案件均可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适用不当会对公正审判造成负面影响,故非在十分必要情形下不可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在犯罪资产数额巨大且有可能追回该巨额犯罪资产来补偿受害方的损失,但该案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逃匿的情形下方可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犯罪资产数额较少或该犯罪资产已被犯罪行为人为挥霍殆尽,在此情形下则无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必要。

再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是案件事实认定清楚,定罪证据确凿充分,证据事实有充分证明力,即使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逃匿,也可

依据完整确凿的证据链对其定罪量刑。如果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死亡,但其遗留有巨额的犯罪所得,且案件证据确凿充分,事实认定清楚,此时为追回犯罪资产补偿资产受损方损失,也有必要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

最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注重程序公正,充分尊重缺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启动的前提是法庭必须履行对被告人的充分通知义务,缺席审判中的司法诉讼文书的送达方式应为公告送达较为合适。公告应涵盖告知被告人庭审的具体开庭日期,并告知被告人在审判中的诉讼权利。如至截止日期,被告人未参加庭审,则法庭可认定被告人自愿放弃出庭参与诉讼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至此法院方可采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审理该案。^[8]

(三)完善资产追回中的刑事判决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间接追回方式需要通过同为公约缔约国的资产流入国和资产流出国之间以刑事司法协助方式来进行,在此过程中将涉及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事宜。然而中国只存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民事判决裁决的法律制度,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具体法律制度缺失。为实现跨国腐败资产追回的有效合作,中国有必要设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法律制度。

1. 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必须明确

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之前必须对外国刑事判决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审查外国刑事判决裁决应当满足中国法定的审查标准,通过审查方可被中国承认和执行。然而,中国现行立法只规定了外国民事判决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审查标准,却无外国刑事判决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审查标准的明确规定,而对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司法审查是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前提和关键,故明确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是我国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借鉴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立法实践,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笔者认为,应设立如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A. 作出刑事判决裁决的外国法院必须对该案拥有合法的管辖权和审判权;B. 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所作刑事判决裁决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C. 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所作刑事判决裁决必须依据法定的正当程序作出,充分保

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D. 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所作刑事判决裁决不得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并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中国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A. 按照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刑事判决裁决的外国法院对该案无合法的管辖权和审判权;B. 根据作出该刑事判决裁决的法院所在国法律的规定,该刑事判决裁决尚未生效,不具有执行力;C. 被告人未经合法传唤,或没有诉讼能力时没有得到合法代理;D. 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在中国执行有损于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E. 中国法院对相同被告的同一刑事案件已经作出确定的刑事判决裁决;或中国法院已经承认和执行了第三国法院对相同被告的同一刑事案件的确定的刑事判决裁决。

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如符合承认和执行的全部条件,且无任何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时,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可按照中国法定的程序承认和执行。

2. 必须明确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司法审查主体

对外国刑事判决裁决司法审查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尊严,且行使该权利对审查者的专业水平要求极高,有学者建议将外国刑事判决裁决司法审查的权力集中赋予高级人民法院,而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法院作出的裁决进行复核^[10],还有学者提议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必要时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该司法审查权^[11]。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国刑事判决裁决行使司法审查权,在必要且可行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可授权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代为具体行使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司法审查权,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进行复核。审查法院主要对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是否符合中国法定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标准进行审查,不审查案件的其他实体问题。

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应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三审制程序。首先由外交机关接收需在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刑事判决裁决的外国申请,由外交机关进行最先的形式审查,审查外国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如外交部审查合格后,递交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拟执行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具体行使司法审查权,审查外

国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决是否符合中国法定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的标准,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审查决定再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如外国刑事判决裁决符合中国法定的承认和执行条件的,再递交国务院进行行政审查,审查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裁决是否会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最终能通过行政审查,中国则正式承认和执行该外国刑事判决裁决。如不能通过审查,则由外交部通知该国,并告知不能承认和执行该国刑事判决裁决的理由。

(四)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软化处理

1. 双重犯罪原则的软化处理

犯罪资产的追回注重的是对财产的追求,而非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和制裁,不涉及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保障问题,故在追回犯罪资产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可减低双重犯罪原则的适用标准。各国在追回犯罪资产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时可对双重犯罪原则进行软化处理,不必严格僵化适用,可依据情况需要灵活变通处理,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普遍适用双罚性原则的情形下容许单罚性的例外。在资产追回案件中该犯罪行为即使依据被申请人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法律被判断为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但被申请人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认定该犯罪是否构成双重犯罪对追回犯罪资产无实质性影响的,该国可不受双重犯罪原则的限制,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在一些国际条约和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实践中,已然存在双重犯罪原则的软化处理的规定和做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2款注明,在提供司法协助的腐败犯罪资产流入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被请求引渡的腐败犯罪人员依据犯罪资产流入国法律不认定为犯罪,犯罪资产流入国也可以准予引渡,不必固守双重犯罪原则。^[12]

中国在与他国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中规定了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适用,将双重犯罪原则的减低适用的条件予以明确和限定,既可防止双重犯罪原则的僵化适用,又可避免双重犯罪原则例外情形的滥用。此外,即使在无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的情形下,中国在与他国进行刑事司法合作实践时,在犯罪资产追回类案件中,中国可主动减低双重犯罪原则的适用标准。中国可基于互惠原则,要求他国在对中国提供犯罪资产追回的刑事司法协助时,对待减低双重犯罪原则的适用标准。

2. 条约前置原则的软化处理

资产流入国和资产流出国在犯罪资产追回的刑

事司法合作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缔结司法协助的条约或协定,条约前置原则使得在犯罪资产追回中能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的范围受到限制,故如果严守条约前置原则将会阻滞追回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所以,在犯罪资产追回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可放弃或变通适用条约前置原则。

在一些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实践和国际条约中,已经出现条约前置原则的软化处理的规定和做法。如英国、新西兰、印度、南非等国家立法明确允许在无双边条约的情形下进行司法协助。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泊尔等国允许临时个案协议作为司法协助的依据。即使严守条约前置原则的美国也允许在个别情况下允许在无条约的情形下进行司法协助。^[13]

中国可遵从国际上条约前置原则的软化处理的趋势,通过立法规定在犯罪资产追回类案件中,即使在两国缺少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的情形下仍然可进行资产追回的刑事司法协助。这将有利于中国基于互惠原则,利用多国条约前置原则的软化处理的契机,有效开展追回腐败犯罪资产的刑事司法合作。

三、资产分享法制的设立:配套法规的新设

资产分享机制主要是指在追缴腐败犯罪所得的过程中资产流入国因其在资产追回中的贡献而享有部分被追回资产的制度。中国原则上坚持腐败犯罪所得全额返还的立场,但该立场难以得到资产流入国在资产追回中的积极协助。故中国作为目前资产流出大国应本着资产追回的终极目的,建立规范的资产分享机制,坚持互惠原则,并将其纳入对外司法协助条约中。

中国建构资产分享法律制度,必须明确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 界定分享资产的范围

从公平原则出发,国际公约规定所追回的腐败犯罪资产主要用于补偿或赔偿资产受损方或善意第三人,其剩余部分才能由资产追回国进行分享。如果当追回的犯罪资产大于资产受损方或善意第三人的损失时,追回的犯罪资产扣除资产受损方或善意第三人的损失的剩余部分属于可分享资产的范围。但是如果当追回的犯罪资产远不够补偿资产受损方或善意第三人的损失时,则无剩余资产可分享,又该如何处理呢?此时,资产分享制度无法实行。但若无分享资产的激励,资产流入国可能会怠于追回资产。故可实行另一种激励措施,即根据资产流入国在追回资产中的贡献大小给予相应比例且略低于资

产分享数额的报酬,以激励资产流入国积极协助追回资产。

(二) 确立资产分享的基准

资产分享机制的设立关键在于确立资产分享的基准。笔者认为可通过确立资产分享的上限、下限和分享比例来明确资产分享的基准。

1. 资产分享的下限

犯罪资产流入国为请求国追回资产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司法协助活动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2. 资产分享的上限

资产分享的上限为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50%较为妥当。

(1) 资产分享的上限是否可以超越50%的标准呢?

资产分享的上限过高,超越50%的标准时,一方面,资产流入国对追回资产分享后剩余部分也需支付资产流出国相关司法和行政机构为资产追回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其剩余部分必定远不足以补偿该案中资产受损方或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无法实现资产追回的终极价值,资产流出国也没有追回资产的必要;另一方面,资产分享的上限过高超越50%的标准违反国际社会各国平等互利的相处原则。任何一国在国际社会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平等互利才能和谐相处。如果资产流入国设置资产分享的比例过高,利益真正受损的资产流出国最终只能追回极少的犯罪资产,这无疑有违国际社会的平等互利原则,资产流出国极可能会采用对等性报复措施,最终只会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故资产分享的上限确立为50%最为合适。

(2) 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50%是否会低于犯罪资产流入国为请求国追回资产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司法协助活动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呢?

因外流犯罪资产巨大,对本国利益和本国受害人利益影响巨大时,资产流出国才会启动繁复的资产追回机制。一般而言,犯罪资产流入国为请求国追回资产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司法协助活动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相对于巨额外流犯罪资本而言是很微小的,一般不会出现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50%低于犯罪资产流入国为请求国追回资产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司法协助活动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的情况。再则,如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50%低于犯罪资产流入国为请求国追回资产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司法协助活动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再扣除资产流出国为追回资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最终追回资产无剩余或所剩余部分远远不够补偿

资产受损方或善意第三人利益时,资产流出国也没有追回资产的必要。

3. 资产分享的比例

在资产分享上下限的维度内,必须确立资产分享的比例层级。借鉴美国的做法,中国在确定资产分享的比例时,应依照资产流入国在追回资产的司法协助活动中所做的贡献的多少来确定分享比例的高低,资产流入国贡献多则其分享的比例高,获得的资产多;资产流入国贡献少则其分享的比例低,获得的资产少。

据此,笔者认为可将资产分享的比例划分为三个等级:高等协助、中等协助、初等协助。高等协助指资产流入国承担追回犯罪资产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工作;中等协助指资产流入国承担追回犯罪资产的主要或关键部分的工作;初等协助指资产流入国承担追回犯罪资产的基础性协助部分的工作。当资产流入国承担追回资产的高程度度的司法协助时,可分享能用于分享的资产的35%—50%;当资产流入国提供中等程度的司法协助时,可分享能用于分享的资产的20%—35%;当资产流入国仅提供基础性的司法协助时,可分享能用于分享的资产的20%以下的份额。具体的资产分享数额在依据以上标准的范围内由资产流入国和资产流出国再行协商。如表1所示:

表 1

资产分享的基准	
资产分享的上限	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50%
资产分享的比例	高等协助——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35%—50%
	中等协助——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20%—35%
	初等协助——用来进行分享的资产的20%以下
资产分享的下限	犯罪资产流入国为请求国追回资产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司法协助活动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中国按照平等互利原则,确立合理的追回资产分享的标准和法律制度,能避免资产分享法制的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资产追回司法活动的阻滞,易为多国所接受,也能动员他国排斥英美国家所设置的畸高的资产分享标准,有利于该标准和法律制度的广泛运用,最终形成习惯国际法。

注释:

① 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审判制度是被各国公认的法定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0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1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这3条规定构成了我国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 [1] 陈雷. 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认定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 法治研究, 2015(4): 99 - 107.
- [2] 邓立军.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潜在风险与控制[J]. 法学评论, 2015(1): 183 - 190.
- [3] 陈雷. 论我国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J]. 法治研究, 2012(3): 31 - 39.
- [4] 陈卫东.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J]. 法学论坛, 2012(3): 5 - 13.
- [5] 肖杨宇. 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质疑与民事诉讼之提倡: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资产追回机制和返还机制为视角[G]. 2008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国际法)论文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79 - 85.
- [6] 陈卫东.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J].

法学论坛, 2012(3): 5 - 13.

- [7] 宋阳. 关于构建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J]. 河北学刊, 2009(3): 179 - 182.
- [8] 王永杰, 吴丽梅. 论我国未审没收财产程序的不足与完善[J]. 东方法学, 2012(3): 105 - 111.
- [9] 黄凤. 制定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几个问题[J]. 中外法学, 2011(6): 1151 - 1162.
- [10] 李卫东, 徐荣生. 腐败资产间接追回机制及其立法完善[J]. 人民检察, 2011(10): 52 - 55.
- [11] 姬艳涛. 腐败资产追回国际合作发展的新趋势[J]. 理论界, 2014(4): 80 - 83.
- [12] 梅傲. 论我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 以引渡诸原则的新发展为视角[J]. 理论月刊, 2012(7): 96 - 100.
- [13] 余贺伟.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形成[J]. 行政与法, 2015(9): 119 - 12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New View on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Recovery of Corruption Property

ZHOU Yan - yun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in a crucial stage of anti - corruption. There are many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China, and the legal system must be refined for the efficient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gainst corruption in the recovery of China's outflow of corruption assets. How to construct the independent civil litigation legal system of asset recovery, how to optimiz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criminal incidental civil action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legal system of asset sharing ar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in perfecting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recovery of corruption property in China. For properly solving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Chinese perfect legal system o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recovery of corruption proper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sset recovery of corruption crimin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idental civil action; independent civil litigation; asset sharing

关于我国公民网络 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几点思考

汪景涛¹, 平淑丹²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与反恐怖学院, 北京 100038; 2. 北京邮电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网络匿名表达权是表达权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延伸途径,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受宪法保护。在国际上已经有将网络匿名表达权认定为宪法权利的判例存在。宪法保护的方面包括权利主体的匿名身份和表达内容两个方面,国内外对宪法保护的方面都做了一些排除性的规定。宪法的保护程度取决于保护内容,就国内外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保护程度高于与公共事务无关的言论保护程度。我国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尚存诸多问题,如权利冲突的取舍标准分歧、公权力的过度限制等,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缺少明确的宪法保护依据。

关键词:表达权;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权利冲突;法益衡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4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67-06

网络已是公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公众在网络上匿名或使用虚拟身份发表言论也已习以为常。但是,随之而来的对互联网实行实名制管理无疑与之形成争议。对此问题,当前我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持论:赞成实名制者认为匿名表达导致了言语攻击、侮辱诽谤、网络诈骗等不法行为,而实名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法宝;反对实名制者认为匿名表达不仅为人们共同探讨、表达自我观点、提出有意义的主张提供了一种保护机制,且有助于宣泄社会负面情绪、化解争议,维护社会稳定,而实名制则会导致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仅陷于这种看不到结果的争议中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更应该将关注点聚焦于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以及作为宪法权利应当如何对其进行保护的相关问题上。

一、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概述

(一)网络表达权的内涵

网络表达权属于表达权的范畴,因此对网络表达权涵义的理解应从表达权开始。表达权是指公民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在不受他人干预、阻碍的情况下,拥有的采用各种方法表达自己的认识、看法、建议等的自由。^[1]表达权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伴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进步,人们行使表达权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互联网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它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表达载体。网络表达权是指公民在网络空间表达自己的认识、看法、建议等且在规定的范畴内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网络表达自由其实是一般表达自由的权利范围在网络上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在根本上,两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互联网的出现,使表达自由有了新的延伸空间,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只是多了一种途径。

(二)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内涵

匿名制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采用的“贝壳放逐法”。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实行共同当政的民主制度,每年春天,雅典全体国民以不记名的方式将本人认为破坏民主制度的国民的名字刻记在贝壳上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人会被放逐,这

收稿日期:2016-11-25

作者简介:汪景涛(1990—),男,河南商丘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安学(国内安全保卫学)。

便是最早的匿名投票制度。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公众更多地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对各种公共议题表达观点、进行评论、发表见解。匿名性是网络所具有的功能属性,匿名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用完全虚假的身份甚至没有任何身份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和与他人进行交往。^[2]网络匿名表达权是公民在互联网上以匿名方式行使的表达权,指公民通过网络以匿名或使用虚拟姓名方式对社会公共事件或事务发表意见、表达情绪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性权利。

(三)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价值

之所以对一项权利进行保护,源于其具有值得保护的价值。T. Emerson 认为,表达自由的价值是需要综合考量的,而非仅作为单一政治工具。^[3]互联网作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建立起来的新型媒体,为公众言论自由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网络匿名表达自由是表达自由在网络世界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因而两者在价值上会存在一般性的共同点。但毕竟网络表达自由是一种新的形式和延伸空间,就必然体现出一些新的价值内容,主要包括:

1. 有利于实现个人价值

各国法律都重视保护表达权,主要就是因为其对表达主体本身具有价值,并不是表达主体以外的事务。言论表达形式对表达权的实现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观点或提出建议而不用顾及自我社会身份或地位。网络表达方便、快捷且设限较少,政府管制力度也相对较小,这些都有利于多元化的个人价值的实现。

2. 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通常情况下是难以自我消解的,若处理不当,则会导致其不断积聚和突然爆发,因此政府应该为这些情绪的宣泄创造有利的机制。通过网络表达,人们可以把自己内心积聚的不满情绪宣泄在网上,网络为这些社会“怨念”提供了缓冲平台,降低了急剧爆发的威胁,进而降低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实践证明,在许多民众权利无法于现实生活中伸张的情况下,公众通过网络把自己的意见畅通地表达出来,其民意价值往往大于利益本身。由于网络传播的快捷性、交互性以及范围的广泛性,通过网络扩散信息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目标的价值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的。

3. 有利于促进政府行为

在过去,舆论监督主要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渠道,监督的内容、形式与程度也或多或少

受到政府、利益集团或意识形态的限制。而网络时代给全体公民提供了监督政府的机会和条件,监督的内容和范围也得以扩展。公民不仅可以对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发表不同的认识和见解,还可以对国家公务人员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提出批评与建议,也能够对社会上各种丑恶黑暗现象进行曝光与批评。

4. 有利于加快民主进程

民主社会的建设不能没有公民意见的加入,也需要在其中汲取力量。网络表达克服了原来政治参与形式的一些弊端,点燃了民众参与国家民主建设的激情,人们借助 Email、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愿和请求,政府利用网上听证会、网上在线解答、网上一对一交流、网上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同老百姓对话,使民众得以与政府相互倾听,这不仅保障了民众对与自身利益相关内容的知情权,而且使政府的决策变得更加科学、民主和合理。

(四)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宪法保护原因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该权利在人权谱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基于其如此重要的意义,该权利在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各国宪法中都被广泛认可。从这个角度来看,表达权作为公民一种基本权利,得到了宪法或者法律的明确规定。

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的自然属性,它允许公民匿名或者使用不真实的身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国宪法并没有对公民在表达言论时能否使用匿名身份作出确切规定。但匿名表达是属于宪法权利的内容,应被宪法保护的,其理由如下:

1. 匿名表达是个人选择和免于恐惧的内心需求

个人选择就是不存在对表达主体的外在压力,表达主体想要表达什么内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其他人都不能妄加干预,更没有资格进行惩罚。此外,表达主体还可以自主选择采用匿名、假名等方式自由发表言论。如果表达不能以匿名方式进行,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表达自由。即使对于同一事物,每个人也因经历、学识和眼界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观点。但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人无法以宽容心态对待和包容不同观点,对他人言论进行过分抨击、指责,甚至施以威胁、恐吓和人身攻击。而在国家相关体系设计上并没有相应的措施对表达者进行有效的保护,于是人们对采用真实身份发表言论持有戒心和警惕,以避免受到无理伤害。匿名,可以为公众创造一个开放的、免于恐惧的言论环境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见解,而不用过多顾虑外界环境、自我身份及人身安全。

2. 开放性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所具特征

宪法中的规定大多是原则性的内容,随着时代变革,那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方式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进入宪法保护,使之具体化。所谓宪法解释,不是对法条中本来就包含的存在多种意思的涵义的精确释义,而是对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宪法文字的某种意义上的扩充,使那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涵义融入到宪法内容中去。^[4]举例说明,虽然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都没有以明文方式对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实名或匿名身份作以明确规定,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将网络匿名表达权以合宪合理的途径解释进宪法,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其新内涵和新的时代意义。

3. 已有将网络匿名表达权认定为宪法权利的判例存在

匿名表达权原来并非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而仅出于社会公众迫切的内心需要和权利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匿名表达权在美国第一次被确定为宪法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匿名表达权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至关重要,它作为美国的重要传统而融入美国历史之中。^[5]不仅美国,以色列一名叫拉米·莫尔的医生要求以色列一家宽带运营商提供发表诽谤性言论的匿名博客作者的真实身份,被拒绝后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定了匿名作者的表达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力。这样的判决结果不仅在国外是一种进步,从我国转型期矛盾多发的国情、舆论宣泄的需要的现实来看,网络匿名表达权被确认为宪法性权利,是适应社会发展以及积极推进民主法治进程需要的。

二、国内外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排除范围及保护程度

宪法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包含对表达主体身份的保护和对表达内容的保护。在现实的法律适用中,对前者的保护主要根据后者是否为宪法所保护来判断,因此,对表达内容被保护范围的研究是关于网络匿名表达权研究的关键任务。

表达权是自由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对公民而言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表达权在任何国家宪法中被保护的覆盖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根据欧洲人权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可以得出只要是以试着说服他人为目的的价值判断,无论是他人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的观点,均受宪法的保护。^[6]虽然表达权受宪法保护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但也非任何言论表达的行为和内容不加区别的受宪法保护。

(一)排除范围

1. 国外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排除范围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曾展开过一项有关互联网言论的专题调查研究,其研究报告列举了OSCE成员国基本上共同选择的不在法律保护之内的言论表达,主要包括:(1)种族主义内容、仇外心理;(2)怂恿恐怖活动、散布恐怖主义言论;(3)损害未成年人权利的内容,如黄色网站、视频、图片等;(4)侵犯著作权和专利权的内容,如盗用版权、侵犯商标权;(5)损害他人名誉权的内容,如未经许可公布他人隐私、诽谤、侮辱等。

2. 国内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排除范围

在我国《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网上表达自由的权利排除于保护范围之外的内容分为三类:(1)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言论。如利用互联网公开鼓动颠覆国家政权、散布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在网上公开诽谤、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信息等。(2)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言论。如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散布暴力、色情、恐怖信息等。(3)侵害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言论。如在网上泄露他人隐私、敲诈和勒索、商业诽谤等行为。

以上内容,不仅为公民在网络空间发表言论预设了限制条件,同时也为公民的网络匿名表达权划定了法律认可的范围。

(二)保护程度

1. 国外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宪法保护程度

对表达权的保护程度,一般随表达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公言论是与统治事务有关的,应受绝对保护。而私言论与统治事务无关或关系较弱,虽其言论是否受实体法律保护要看具体内容,但基本都受法律执法程序保护,且总体而言,具体的公言论所受保护程度要高于私言论。表达自由的保护程度主要取决于保护方法。传统宪法理论主要着眼于言论表达内容,如美国宪法判例确定的“实际恶意”“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提供了根据表达内容来判断危险信息的标准。但是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内容保护大部分涉及权利主体的匿名身份,而非表达内容,故以前的宪法理论是不能被直接沿用于网络范围内权利主体匿名身份的保护上的。

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通过审理最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网络侵权案件,形成了一些保护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宪法判例,尽量不允许随意剥夺网络用户的匿名权。观察美国法院审理的一些网络侵权案件可以发现,侵权人以网络匿名、虚拟姓名或其他虚

假身份信息来实施类似于诽谤、侵犯著作权、诈骗等不法行为,使得受害人基本上没有甚至根本没有希望去搞清楚侵权人的真实身份。所以,受害人向法院寻求帮助,要求法院判决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提供匿名人的相关身份信息,来查明匿名者的真实身份。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院在审查这些网络匿名侵权案件时,制定了一项对公开匿名者身份信息申请进行评估的测试标准。在申请达到该标准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做出公开匿名者相关信息的决定。当前,美国各州法院一般采用的是新泽西州高等法院在“登卓公司案”中确立的测试标准,其内容如下:(1)原告应当告知作为网络匿名侵权人的被告正在进行的身份查明程序,并告知被告准备辩护。其目的是给被告一个合理的机会作出回应,而且可以提醒被告聘请律师为他辩护。(2)要求原告确定并向法院提供匿名发帖人发布涉嫌侵权的言论内容。(3)原告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法院下令披露被告匿名的身份的理由。(4)原告提供支持侵权赔偿的证据。(5)原告向法院说明,在充分考虑案情的基础上,并经过利益权衡,公布匿名者真实身份信息所获得的利益超过匿名者受法律保护的表达自由的价值。对于以上五项标准,如果原告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法院就不能准许公开匿名者的身份信息。这对于保护被告的权利而言,具有重要作用。

2. 国内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宪法保护程度

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一般言论自由和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论自由,且对后者的保护程度高于前者。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我国宪法的制度设计与欧美国家是一致的,都是鼓励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论——也就是政治言论自由的正当表达。这类言论恰恰是中国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和言论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网络侵权纠纷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整体而言,这些纠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网络侵权纠纷,如通过“人肉搜索”公布触犯法律或者作风不良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从而造成的侵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的行为;另一类是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网络侵权纠纷,如利用网络手段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根据法律适用过程的具体情况,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往往强调对原告一方的权利保护,而弱化了对被告一方的权利保护。网络匿名表达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应该被合法、有效地保护。当这一权利与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同时遭遇不法伤害时,不可过分注重其他权利而忽视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在这一问题上,我

们可以学习美国的制度设计,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制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立案标准的提高来体现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强化保护。对被告在网上匿名发表的言论内容是否牵扯到公共事务,法院应该进行初步审查,然后通过针对不同案情的分析再决定适用不同的立案标准:对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私言论匿名侵权纠纷,立案标准可以适当降低;而对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公言论匿名侵权纠纷,立案标准应予以适度提高。

三、我国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不足

(一)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对于公民是否能够匿名表达并未作出确切的表述。与网络表达相关的内容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相应条例,可是针对网络匿名表达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规定几乎是空白的,而且在法律实践中也缺少相应的宪法案例。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一些下位法越俎代庖,在没有得到宪法或者法律的授权情况下,代替了上位法的地位,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这种做法其本身也是违宪的。许多情况下,公民在其网络匿名表达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因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使被侵权人无法获知其网络匿名表达权被侵害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认定主体应该是谁,结果就是其被侵犯的网络匿名表达权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救济。

(二)“权利冲突”成为常态,取舍标准分歧大

当网络言论与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形成了被称为“权利冲突”的问题。因为争议双方都是应得到保护的權利,所以就会存在取舍上的困难,该放弃谁又该保护谁并不是容易做出选择的。例如,某网民以匿名方式,在未经他人许可的前提下,在微博上“爆料”,特别是针对一些官员、明星等公众人物,散播一些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消息,或者发布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公布他人隐私等,就会产生双方的利益争执,即一方的网络匿名表达权与另一方的名誉权、隐私权的对立。应该首先保障哪一方的权利,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都是需要法院作出裁决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我国学者主要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位阶论,另一是利益衡量论。位阶论是按照权利的法律地位高低作为取舍标准,首先保障法律地位高的权利。利益衡量论主要是法官通过衡量各种权利所带来实际利益的多少来做出相应取舍。在法律实践中,两种方案都各有依据,也各有利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三)公权力限制过度

对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主要在于保护那些与

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论特别是政治性言论。公共言论既具重要性又具脆弱性,公共言论的重要性表现在其具有公共价值而由宪法来保障,其脆弱性表现在因其指向、抨击对象与公共事务有关,涉及政府政策及政府行为,易受政府的插手和管制。政府持有公权力,对于那些于自身无利甚或有害的言论,具有压制的动机,也具有压制的能力和手段。若政府对公共言论限制和打压过度,便会出现“寒蝉效应”,意即人们因为害怕自己所发表的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会遭到政府的惩罚,所以他们不敢再在网络上发声。即使对政府政策和行为有诸多不满,甚至对决策有误的事项有整改建议,也不愿意冒着被政府惩治的风险去建言献策,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对于公共言论来说,真正的威胁并非来源于社会,而是来源于拥有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所以由一般法律对公共言论进行保护是不安全的,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对抗公权力,很容易被公权力左右。这也是要由宪法对言论自由进行保护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改善我国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几点思路

(一) 出台宪法解释或形成宪法惯例

宪法是根本大法,其内容也多为原则性规定,不可能对具体的法律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规定,因此很多涉宪行为有时还需要依靠宪法解释的效力。宪法解释是一种有效方法,以此可把那些适应时代进步的行为方式融入宪法的内涵中去,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就网络匿名表达权而言,在宪法中对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给出细化规定,将匿名表达列入其中,使匿名表达合法化,应该作为一种宪法权利规定在宪法解释中。因为宪法解释同宪法的正式条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阶,可以为公民的网络匿名表达权提供同等的保护依据。

除释宪外,还有另一种方法,即宪法惯例。在西方国家,如美国、以色列等,已经将网络匿名表达权以宪法判例的方式确定为宪法权利,这一点在文章前半部分已经提及。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存在宪法判例,无法像美国那样通过判例的形式将网络匿名表达权确定为宪法权利。但我们依然可以借鉴美国思路,在没有明确的宪法规定而又没有相关宪法解释的情况下,通过形成相关宪法惯例,作为参照依据,来实现对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的有效保障。

(二) 制定《表达自由法》,独立规定匿名权章节

瑞典是不成文宪法国家,没有独立的宪法典。瑞典《宪法》由4部宪法性法律组成,其中《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法》就占两部。由此我们发现瑞

典是特别重视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国家,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在瑞典有非常稳固而独特的宪法保障。不仅如此,瑞典还特别注重对匿名权的保护。如《出版自由法》第三章和《表达自由法》第二章都确认了作者、原创者以及信息提供者的匿名权。^[7]在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上,瑞典是欧美国家中做得比较出色和具有国情特征的国家之一。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本国法律时都无法脱离历史和国情的桎梏,且瑞典与我国国情相差甚远,简单粗暴的照搬瑞典模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我国有关网络匿名表达权宪法保护的制度设计中,可对瑞典模式进行适当参考、学习和借鉴,制定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现实需要的《表达自由法》,并将匿名权作为独立章节规定于内,从而为我国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提供明确的宪法性法律依据。

(三) 具体分析网络匿名表达权所具价值,进行法益衡量

当出现“权利冲突”时,争议中的对立权利都有理由受到保护。如前述,当网络匿名表达权与名誉权、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根据“位阶论”,网络匿名表达权属于宪法权利,名誉权和隐私权属于民事权利,宪法权利高于民事权利,所以应该优先保障网络匿名表达权。但是仅依靠权利的法律地位高低来确认其是否应当受到保护太过于机械化。试想,若一方滥用网络匿名表达权,恶意侵犯他人名誉和隐私,还要对其进行保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根据对不同案情的具体分析进行法益衡量。在网络匿名侵权案件中,一般情况下被侵权人会要求公布匿名者的真实身份,这时法院就应对此进行考量。具体来说,就是当匿名者的真实身份信息被公开后,无论对当事人还是整个社会而言,可以带来更多利益或减少更多损失,或能够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法院才可以做出公布匿名者真实信息的决定。

(四) 尊重成文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一部成文宪法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是其先于、超过政府的地位。^[8]所以,宪法,在某种程度上首先是为限制公权力和防备政府而非信任政府而制定。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可以也能够用匿名的方式在网络上表达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观点,有利于塑造积极的公民人格。但若政府对于一些批评性的、不友好的言论实行高压政策,无疑会使公民怯于发声。若政府因某些民声于自身不利就强行压制,不仅阻碍了民主进程,更是对宪法权威的一种蔑视,因为网络匿名表达权是

一项宪法性权利,应受宪法保护。民主政治离不开公民积极参与并在其中不断汲取养分,政府对于公共言论不应不加区别地一味压制,相反应广开言路,积极接纳公共言论中的真知灼见,这有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有助于彰显宪法权利的独特地位,维护宪法权威。

(五)推动网络业界与用户的自制自律与自我管理

自治和自律是公共网络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管理要求。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交流平台,许多不同角色的主体参与其中。当我们制定有关网络匿名表达权利的法律时,要合理把握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充分发挥网络表达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责任观念。法律与道德都是调节公众行为的有效工具,在重视法律强制力之外,亦不可忽视道德的力量,因为公众从内心去自觉遵守要比从其外在行为去制止和惩罚更为有效,若说法律调整的是外在行为,使人不敢挑战,那么道德约束的则是人的内心,使人不愿触犯。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制定网络行业管理标准和规范,建设网络道德,以之调节和约束网络服务经营者和用户的行为,对于充分发挥网络服务经营者和用户的自主性、自治性以及实现对网络表达的规范化管理都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在网络行为自律和自治过程中倡导网民自我管

理,是适应网络表达发展的需要。从传统媒体的政府管理转变为网络社会的自我管理,实质是网民获得表达自主权后的必然要求和责任。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借助扩大宣传、加强教育、参加培训等方式培养网络服务经营者和用户的基本素养,从而使其在行使网络表达权的过程中,不仅懂法更自觉遵法,创建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 [1]董天策.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40-142.
- [2]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5.
- [3]Emerson T. The Syste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4]吕炳宽.台湾第三部门之法制规范:一个历史制度论的观点[C].华人社会第三部门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2008.
- [5]王东玉.关于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保护与规制的探究[J].法制与社会,2013(18):170-171.
- [6]杨福忠.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之宪法保护:兼论网络实名制正当性[J].法商研究,2012(5):32-39.
- [7]冯军.瑞典新闻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制度论要[J].环球法律评论,2003(4):492-505.
- [8]姜峰.言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边界[J].清华法学,2016(1):38-5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Anonymous Expression Right of Citizens in China

WANG Jing - tao¹, PING Shu - dan²

(1. Institute of Reconnaissance and anti - Terrorism,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he right of anonymous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is a new form of ex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era and the way to extend it, and it'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citizens,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re has been a preced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right of anonymity on the network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cope of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ncludes two aspects: the anonymous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of right and the content of expression. There are some exclusion rules for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egree of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depends on the content of protection. The degree of protection of speech related to public affairs is higher than that nothing to do with public affairs in term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anonymity in our country, such as the choice of the conflict of rights between different standards, excessive restrictions on public power, etc.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basis for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Key words: right of expression; network anonymous right of expressio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conflict of rights; legal interest measurement

我国抗生素滥用规制分析

赵梦娇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 抗生素滥用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 滥用给使用者带来了身体伤害和细菌耐药性变异, 甚至会导致人体耳聋和致死等副作用以及病菌无药可救的后果。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 以规制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抗生素滥用的原因, 提出了规制经济学解决抗生素滥用的策略。

关键词: 抗生素; 滥用危害; 滥用原因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5

中图分类号: R9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7)01-0073-03

抗生素同时也被叫做抗菌素, 人们熟知它具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而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杀灭细菌那么简单, 它在杀灭细菌的同时, 也会对如衣原体、支原体等微生物起到抑制作用。当今医学界喜欢这样说, 在美国, 买抗生素比买枪要难。据美国疾病管理中心研究显示, 美国每年出具的抗生素处方约 1.5 亿份, 非必要处方大概占其中 1/3, 而对于感冒所开具的处方则基本不使用抗生素^[1]。然而, 我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亚洲抗生素的滥用情况占世界的 70%, 而中国的滥用情况占亚洲的 70%。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 在我国医院, 对于抗菌类药物的使用,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74%, 门诊所开的处方, 对抗生素的使用也达到了 20% 以上。中国人均每年输液 8 瓶, 对抗菌药物的使用,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怎样有效地摆脱抗生素的滥用, 使国民用药更加合理化, 控制细菌的耐药性, 是当今医学研究领域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抗生素滥用的危害

1. 细菌的耐用性增强

2007 年由中国科协赞助的抗生素滥用调查项目显示: 我国人均对抗生素的使用为 138g, 是欧美国家的 10 倍; 临床可以使用的抗菌类药物有 188 种, 是欧美国家的 3 倍; 有约 35000 个抗生素批文, 有 6000 多种抗生素在销售, 医院药品类销售量排名第一的就是抗菌类药物。同时, 国内还有需求量很

大的 89 种兽用抗生素^[2]。

抗生素的滥用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变异, 使得抗生素不再对细菌产生作用, 久而久之会使得一些病菌无药可治。目前许多抗生素已经失去了相应的功能, 如天然的青霉素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已经失去了药用价值。这样就需要寻求新的抗生素, 甚至还出现无法抑制的超级细菌, 对人类的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

2. 产生不良反应

一些抗生素因为无法正确区分哪些是人体组织细胞, 哪些是目标细菌, 所以在灭杀细菌的同时, 会对某些人体组织细胞也同时攻击, 对人体器官造成损伤。有人曾对使用了抗生素的患者的处方进行了数量为 100 的随机抽查, 其中有 10 张达极限量, 更有 4 张超限量^[3]。

对抗生素过敏的人来说, 一旦免疫系统将抗菌药物认定为外来细菌入侵, 身体就会自动进行调节, 进而释放出组胺等物质, 这就引起了人体的过敏反应。在我国内地, 因药品不良反应致死的人每年大约有 20 万, 其中有 40% 的死因都是因为滥用抗生素, 也就是说, 在我国每年有 8 万人因滥用抗生素致死^[4]。

二、我国抗生素滥用的原因

1. 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王锦霞女士曾在一份

收稿日期: 2016-10-28

作者简介: 赵梦娇(1990—), 女, 河南新乡人,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报告中指出:滥用抗生素的源头其实是医院,而不是药店。有记录表明,该协会在统计近几年抗菌类药物的销售额时发现,其中多数药品是医生通过开具处方在医院售出的^[5]。医疗服务因为其特有的专业化属性,对专业和技术要求极高,必须有专门的医生才能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普通患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搜索相关信息比较困难,使得医疗行业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行业。在医疗服务中,患者是委托人,医务人员为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无良医务工作者就会在医疗水平可变的前提下,或用一些临床上并不必需的药,或加大药品的使用量,或用药不求对症只求最好,通过这些手段,来达到增加自身收入的目的。普通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务人员开具的处方和治疗意见。具有信息优势的医生能够诱导患者使用不必要的医疗服务。

2. 我国多方规制机构的不协同

美国对于食品药品的监管采取 FDA 统一规制的模式,而我国对食品药品的规制机关有: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这也就导致了我国对于食品药品的监管是不统一的,即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监管职责,由于各部门在职责上的不同,使得规制口径也不同。比如食药监局,对于药品只是负责到医院,药品到达患者手上以后,卫生局将接手以后的规制。正是由于这种分段式的规制模式,将同一事物的监管权分割,分割后的结果造成了职能部门之间会有摩擦和监管空白的出现,因而产生了重复交叉规制和规制空白的现象,很难实现部门之间的协同规制,进而使投机者有了可乘之机。这对于规制效果和问责制度实施产生了体制性障碍,对有效规制的实现是十分不利的。

3. 我国地方规制机构的规制缺失

我国关于抗生素的使用规制办法主要是《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然而规制部门习惯了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一切规制行为都要符合上级制度规范,而上级制度规范针对的是普遍性的问题,具有总领性的特点,无法完全考虑地方的特殊性,地方规制机构完全按照上级指导文件,实际上是一种规制缺失,是一种被动规制理念。这就使得规制部门在一些细节上容易出现制度的缺失,在一些关键点上无法有效控制,进而使得抗生素滥用的危害向下传递,最终结果当然就是消费者的权益和健康都受到损害。

三、抗生素滥用的规制策略

1. 规制机构改革

规制机构改革,笔者认为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成立专项部门进行全程监管。对药品的采购、运输、保存、销售和使用采用统一监管模式。这一模式会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现有的规制体制,将各部门不同职责分散管理改为一部门集中管理,把现有各部门中的规制机构拿出来,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以求彻底解决现有矛盾,避免交叉重复建设和责任空白的出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种方案是现有的管理体制基本不变,各部门分工不变,职能也不变,只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小的调整。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于职能重叠情况,必须做到只能有一个部门负责,其他部门不得干涉;二是对于规制盲区情况,应设专职部门负责,做到各个细节都规制到位。同时,在确定职能分工的时候,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各部门的优势和强项,做到每个环节都由最擅长的部门把控,相对来说,这个方案是行政成本最低、可行性最高的方案。

2. 充分发挥地方规制体制作用

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能是负责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政策方针,指导地方机构的工作落实,建立监测体系,从大方向上把握整体环境。而具体的实施办法则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完善总方针,制定具体实施细节。我国药品安全主要还是依赖于地方政府规制体制。

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地方行业协会的作用。以美国医师协会为代表的强势组织会对医生的滥用抗生素行为予以谴责,甚至吊销其医师执照,所以,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并不那么明显。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同时这也说明了,面临市场失灵的情况时,仅靠市场自身调节是不够的,政府一定要制定政策来干预的。协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应该为政府的调控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完善地方规制机构的责任落实激励机制。可以运用标尺竞争的方法,对比各个地方规制机构的绩效,形成参考和对比。避免以“严格遵循上级部门的原则”作为规制效果的评判尺度。以条件相似的规制较好的地方的规制绩效指标作为其他地方的标尺,对于规制较好的地方进行一定的激励,对于规制较差的地方给予一定的处罚,防止地方规制机构的被动规制和不作为。

3. 完善医生用药的法律规制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药

品零售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然而这样的处罚方式过于轻微,应当严查重惩,令其本利无归,这才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做法。对于某些屡屡犯规的零售药店应当采取停止销售甚至吊销许可证的方式才能予以抵制^[6]。同时,完善法律环境,既要加强对医生用药行为的某些限制,又要对医生按照规制原则办事的保护。

我国对于抗菌素类药物的规制依据主要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这些或属于抗菌药物使用整治方案,或属于层级较低且只具有指导性意见的行政规章,缺乏长期稳定性,对于医生改变用药习惯威慑力不足。我国关于药品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建议将抗生素的使用准则加入该法,从法律层面来遏制抗生素的滥用。

4. 完善医疗机构的技术基础

医疗基础设施不完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设施不利于查明细菌感染证据,医生会出现经验用药,这和美国医生必须在有明确充分的证据下才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疗差距明显。因此应该对基层医疗机构加大配备相应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病原

体微生物的认定及人体对药物过敏的实验工作,这样才能有效查出抗生素使用的指征,方便对症下药。

5. 加强医生的职业道德约束

对于医生滥用抗生素的约束方式除了法律的强制措施之外,还应该有道德方面的软约束,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培训,使其充分意识到抗生素的滥用会对患者及其家人还有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影响。鸦片曾给我国带来的灾难,不要让抗生素来重演,我们应该从道德的高度来约束医生的行为。从医生开始抵制抗生素的滥用,让民众明白抗生素不可滥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规制抗生素滥用行为。

参考文献:

- [1]何新华,李春盛. 抗生素滥用及其不良反应[J]. 中国临床医生,2005,33(2):10-11.
- [2]崔立杰. 抗生素滥用的危害与合理使用[J]. 药物与临床,2007,45(7):22-25.
- [3]汪秀祝. 滥用抗生素的现状及其对策[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09,3(20):193-195.
- [4]于占玉. 抗生素滥用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J]. 经济研究导刊,2011,7(35):314-315.
- [5]王锦霞.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5,15(2):10-12.
- [6]董伟. 滥用抗生素,威胁人类安全[J]. 中国减灾,2009(2):26-2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f Antibiotics Abuse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ZHAO Meng - ji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Antibiotic abuse is particularly acute in China. It brings the users the physical injury and bacterial drug resistance mutation, and even causes side effects such as deafness and death and the deadly resul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ion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of antibiotics abuse regulation,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the regulation economics to solve the abuse of antibiotics.

Key words: antibiotic; abuse harm; reasons for abuse; countermeasures

近代广西圩镇建筑的“利商”理念与文化传承分析

——以灵山县武利镇老街建筑为考察视角

庞广仪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工商管理系, 南宁 530007;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20860)

摘要:灵山县武利旧圩是近代口岸开放之后广西沿江沿海兴起的众多圩镇之一。武利老街街屋主要由竹筒屋、骑楼和广府西关大屋构成,与寺庙、街巷和码头公共场所及其设施一起构成时代特征明显、地域色彩浓厚的商业民居聚落。老街的选址和规划,街屋、寺庙建筑的结构和装饰风格,很好地将商人的价值取向与传统儒道释文化、百越地域文化和异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体现了近代市井文化中传承传统、兼容并蓄、经世务用的内涵与精髓。

关键词:近代;老街;商业民居;文化内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6

中图分类号:F77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76-06

近代广西北海、龙州、南宁和梧州等口岸开放后,外省商人纷纷入桂贸易并逐渐入籍广西,八桂各族子弟舍农经商现象也蔚然成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广西各地农村新兴了众多商业圩镇,原有的圩镇规模也大为扩大。很多圩镇皆临街而建,其建筑以竹筒屋、骑楼和广府西关大屋为主,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和岭南特色的民居文化内涵,也融进了时代和异域文化色彩,更体现了商人务实的追求。兹以桂南灵山县武利镇老街建筑为切入点对此进行剖析。

一、老街规划中体现“传承传统”与“经世务用”的结合

武利老街建筑群的选址和宏观布局既传承了传统民居文化的内涵,也体现了商人趋利避害的现实追求。

商人们选址武利建圩,首先是青睐该地深厚的商业底蕴和得天独厚的交通位置。武利位于南流江支流武利江上,顺江直下北海仅100余公里。南流江流域有着悠久的贸易历史和浓厚的商业氛围:自秦汉起,南流江口的合浦就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

的重要窗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地,沿江各族人民传承着不辞辛苦远涉重洋以经商谋利的传统。1876年北海开埠,因“闭关锁国”而一度衰落的南流江航运重新兴起,成为广西乃至西南地区与国内外各埠进行经济交往的重要渠道。由于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的食盐主要来自于闽粤沿海和东南亚各地,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将南流江辟为西南食盐进口主要通道。武利位于南流江最大支流武利江上大幅度拐弯之处,河道经过长期冲刷之后岸线平整,水深且缓,便于舟船停泊装卸。进口食盐和煤油等货物由南流江干流转入武利江,在武利卸货之后改走陆路,经由灵山县城运至南宁,再行转运桂西及云贵,其运输里程比溯南流江干流直上玉林船埠的线路大为缩短。

武利老街的具体选址还符合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中国传统民居聚落的选址,非常注重遵循道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原则。《易经》指出:阴阳和则化生万物,阴阳不和则灾咎百出。商人出门经商当然渴望“财源广进”,同时也关注“出

收稿日期:2016-11-1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近代广西通商口岸与农村互动关系研究”(2016M600739);广西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规划项目“近代西江口岸城市对农村地区辐射影响研究”(15FZS002)

作者简介:庞广仪(1977—),男,广西钦州人,博士,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入平安”和“荫庇子孙,五世其昌”,所以商住地的选择必须符合传统民居择地中阴阳和合、顺乎自然、利于繁衍的原则。我们先来看一下武利旧街的地形图(见图1)。



图1 武利老街地形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人们选择在武利江之西北岸兴建圩街,并没有选址在武利江东南岸平缓之地,而且该格局一直保持到今天。根据传统的说法,山之南水之北属“阳地”,山之北水之南属“阴地”。因此,武利江东南岸虽然地势平坦,但却属于“阴地”,而江流的西北岸、同时也位于群山之南,属于“阳地”,是为民居择地的风水宝地。古人择地必须考察“气”场是否良好:“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必须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1]所谓“气”即指“生气”,用现代科学解释就是负氧离子相对充足的空气。根据传统民居择地的经验,居住地周边如果山环水绕就容易聚拢“生气”,利于居民生存繁衍。武利老街所选之地碧水环绕,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自然较高,在其西、北方向又有山峦作屏障,能于寒冬季节对呼啸而下的寒流起到一定阻挡作用,使“生气”聚而不散。

老街的选址还体现了商人们采用物化的方式来表达追求幸福吉祥的文化内涵。先人相信天地有“灵气”,而且自然与人类之间有“感应”,所以为民居选址时讲究选择形似吉祥物的地理环境,并祈求从中得到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恩赐”,此即所谓的“形必有意,意必吉祥”。武利老街选址的地形酷像

一艘靠港的舰船,而舰船地形在“风水学”里寓船卸宝、聚敛钱财之意,同时,船头朝向与水流方向一致,又寓风顺水之意。

老街建筑的宏观布局则渗透了儒家礼治思想。儒家讲究“敬天法祖”,中国传统村落选址之时,往往先选择“风水”最佳之处建立宗祠作为拜祭神灵、祖先和举行公共活动的空间。老街虽然不像村落聚族而居,但仍然将选址建立各姓商人公共祭拜场所放在首位。而这一公共“宝地”,人们选择在位于“船头”之处的小山丘之上。该地位于武利江拐弯向海流之处,在“风水学”上被称为“水口”。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生命之源,而且是农业命脉、运输动脉,故而在很多场合上被作为财富的“代名词”;传统典籍中“上善若水”“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哲理也为务实善变的商人极力推崇。视水为财富图腾的商人们当然乐见江水流入而忌讳其流出,所以在“水口”之处建立庙宇——青云寺作为“镇”住水流的祭拜场所,供奉保佑一方,福泽百家的共神——观音菩萨、关帝和土地公婆。

老街的建筑以青云寺为起点,以中央街道为中轴线呈鱼状延伸,既寓“渔利”于“船地”之意,也体现儒家思想不忘根本,崇尚中庸的涵义。

老街街屋建筑紧密相连,从整体上构成了一道城防工事,这也体现了商人们将民居规划的传统做法和经世务用思想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聚落,无论是城镇还是村寨,一般都设有防御工事。商人们既忙于经营“敛财”,也时刻不忘记“守财”。武利圩街兴起之日正逢清末民初的乱世,广西更有“司令多如狗,大王满街走”之民谚,防御兵匪也由此成为老街建筑的重要功能。为了兼顾经商和防盗两大问题,商人们对街道做了如下整体规划:整个街道呈“丰”字状,中央街道贯穿南北,4条横巷直通江边码头以方便人们往码头搬运货物(见图2),一旦发生兵匪之患,街巷外沿就可以封闭而成为城防工事内部相互支援的通道;街屋外墙全部由砖石构成,外侧房间(圩街外沿)比内侧房间(临街店面)要显得高耸,甚至建成带有防御功能的碉楼,众多高屋和碉楼连在一起就在圩街外沿构成一道坚固的城防工事(见图3);即便是敌患攻入街道,街民也可以利用坚固的房子和纵横的街道予以反攻。

因为武利圩街选址和布局将传统文化和商人的现实需求有机结合,所以能够起到很好的“筑巢引凤”效果。老街首尾长达3公里,其近代建筑的数量和规模并不亚于作为省城桂林的外港、号称广西

四大圩之一的大圩古镇。据街上老人回忆,在老街鼎盛时期的1920—1930年代,武利江上帆樯林立,常年泊岸的船筏逶迤达3公里。另据对居民族谱的调查中可以得知,他们的祖先大多在清末民初因经商而定居此地,既有来自本地的莫、叶、梁、阮等大姓,也有来自广东高州等地的肖、陈、黄、吴等姓氏,可见当年人气之旺盛。



图2 直通码头的巷道

严谨的建筑规划在现实中也很好地保护了商民的财富。如1939—1940年桂南会战期间,名将蔡廷锴率领第26集团军在灵山县担任侧翼防御,所部175师1万人奉命在武利老街设防御敌,参战将士凭借武利江之险和街屋之坚,有效地阻滞敌军、掩护商民,更减轻了昆仑关主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压力。^[2]再如解放初年武利周边爆发国民党残匪武装暴动,匪首庞荫平聚众5000多人,到处抢劫街市焚烧民居,但武利街民和避难群众在人民政府组织下,凭借坚固的街屋多次击退来犯之匪。

二、街屋结构体现的儒道文化和利商理念的兼容

武利街屋结构很好地将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崇德尚礼和商家的实用理念有机融合在一起。

古谚云:“良田万顷不如旺铺三尺。”作为商住两用的街屋自然地价高昂而且资源有限,所以建筑

风格不能像周边农村的广府院落、客家围屋那样端庄厚重,而是采用简约、实用的风格。老街建筑大部分是竹筒屋或者竹筒屋与骑楼的结合体,临街店面绝大部分是单铺面,铺面开间一般都在4米左右。部分大户人家采取的是广州西关大屋的风格,其临街店面设计为2—3个铺面,开间达10—15米。竹筒屋、骑楼和西关大屋虽然杂处老街上,但临街店面的高度相对统一,而且房檐皆往前挑出,从整体上规划成为沿街走廊,方便客人躲避风吹、日晒、雨淋而从容购物。

街屋店面虽相对狭小,但内部空间尽显宽、高、深。房顶高度都在5米以上,房子进深更是达到15—40米。街屋因为面窄、里长、内阔而被称为“蟹穴屋”,在岭南一带有“丰衣足食”“钱财易入难出”的寓意,颇受商民欢迎。店面之后的房间一般用作商务客厅、作坊和货仓,这是由于当时商户经营的商品一般都是盐、粮食、丝、土特产等,货物所需储藏空间大;即便是手工作坊,如腌肉、酿酒、染布、缣丝作坊,也因其劳动力和资源密集的特性而需要较大的劳作与储存空间。街屋内部一般都建有供主人起居的阁楼。武利圩沿江而建,湿气重,从健康角度而言阁楼之上确实更适合居住,但圩镇街屋采用阁楼结构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提高建筑空间利用效率。从实地观测可见,阁楼不仅所占空间相对狭小,甚至有的商户并不设固定扶梯,而代之以可移动的简易木梯,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建筑空间用于囤货、加工和营业。街屋建筑在有限的空间内能够很好体现道家所强调的“阴阳调和”“藏风得水”文化内涵。我们且选取老街临江一侧的竹筒屋进行剖析,其底层结构(见图4)。

竹筒屋“阴阳调和”主要体现在天井的开辟上。按照道家思想所阐述的“规律”,街屋虽然选址于“阳地”,但由于房顶遮挡太阳,故其属性为“阴”。先人们针对该情形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民居院落中设计天井。因为天井对天敞开,便于吸收雨露和阳光,属“阳”,而房屋以“门”形环抱天井,就形成了“以阴抱阳”“阴阳平衡”之势。老街先民在狭长的街屋中辟出2—3个天井,有效地改变起居环境,足不出户即可呼吸新鲜空气和接受阳光。

“藏风得水”主要体现在门窗、冷巷、隔墙和天井的搭配之上。由于街屋狭长、地方气候湿热,很容易造成室内空气更新缓慢、负氧离子缺乏。为了解决该问题,街屋前后皆开辟门窗,临街店面门窗更是尽量拓宽,一则是改善营业环境,二则是为了方便空气进入室内。空气进屋之后通过贯通前后门的冷巷



图3 街屋外侧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

输送到各个房间,构成室内房间的隔墙高度一般都不超过1.8米,其目的就是方便空气在室内流通;前后天井在此起到对流通风的作用,因为室外新鲜空气比室内使用过的旧空气含氧高、密度大、温度低,因此容易下沉进入室内,并形成压力迫使室内旧空气上升流出室外,起到很好的通风散热效果,即便是三伏炎夏,街屋中仍然是凉风习习。由于室内空气流动过快反而对体质较弱的老人不利,所以有些街屋冷巷的设计并非直通前后门,而是在室内设置转弯以避免形成凌厉的“穿堂风”。

儒家的传统内涵也在街屋有限空间中得到很好的传承。“西关大屋”型建筑体现得最为明显。“大屋”面宽(2—3铺面)房高(2—3层),内部大小房间达20个以上(1950—1990年代,镇人民政府、公安局、法庭和工商所等机关各征用一幢“大屋”就能满足职工办公和住宿之用),所以有足够的空间将儒家“礼治主义”和“德治主义”的传统内涵展示出来。兹选取老街27号的肖家旧宅进行剖析,其底层平面结构(见图5)。

首先,肖家旧宅用空间秩序展示儒家的礼治主义。中国传统院落民居一般采用进式布局,由内到外的各进院落按伦理秩序分别作为祭祀、父母、各房子孙和客人的活动空间。肖家旧宅尊重传统并根据街屋实际对空间秩序做了以下布局:祖公厅、头房、仓房和作坊构成中央空间,祖公厅用于祭祀和举行重大家族活动,头房则是家中长辈起居之地,仓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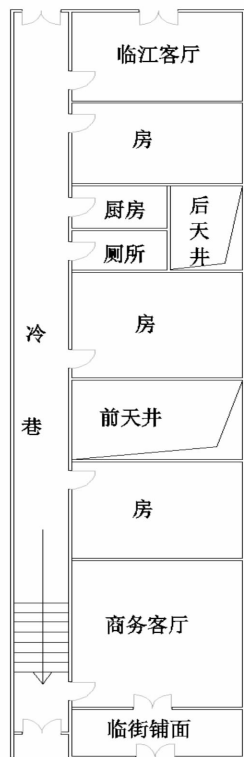


图4 竹筒屋底层结构

作坊之所以居于中央空间,是基于“财富不外露”“祖传手艺不外泄”的考虑;中央空间往北的二房、三房是儿孙起居空间,佣人房、厨房分列两侧,以便于照顾主家的生活;儿孙起居空间往前则是临街铺面、北客厅和临时仓房构成的商业空间;中央空间往南是家庭教育空间,由启蒙厅、藏书房和家庭教师居室构成;教育空间往南则是由大门、门官厅、客房一起构成的宾客空间,因为远道来访的宾客多走水路;阁楼上作为女儿或者来宾的女眷起居空间,这既是遵循传统,也充分考虑了女性的身体和身份问题。如此布局,很好地按照儒家礼制思想将长幼、主客、男女的起居空间有条不紊地区分开来。

在德治主义方面,肖家旧宅突出了“中”“正”修德和言传身教的主题。整座宅子呈方形结构,根据中轴线进行左右对称,提醒人们以“恪守中庸”“持正修德”。房子的中轴线上设有房门,但一般情况下并不前后全线打通,只有在国家重大庆典、红白喜事、或者迎接高级别客人时方可打通;无论主、仆、客,平时在室内来往多走廊道或者冷巷(又称为“青云巷”,寓“青云直上”之意)。如此设计,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中”的崇尚。

肖家旧宅在街屋建筑中依然辟出较大的家庭教育空间,这是难能可贵的。肖家商学并重,家风严谨,旧宅的第一代主人肖镜轩在北海和广州均开有商业分号,并入股当时堪称前卫的行业——商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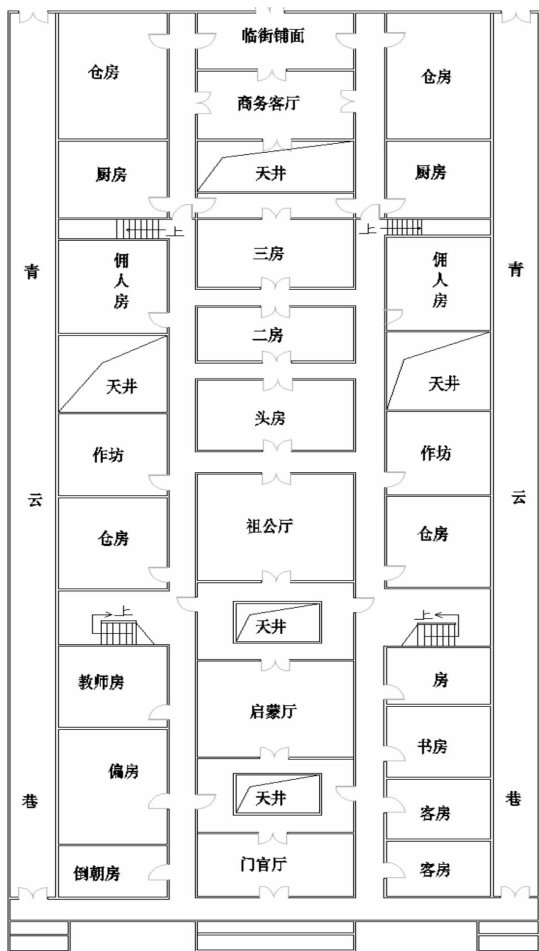


图5 肖家旧宅底层结构平面图

“廉北汽车路普益股份有限公司”。肖镜轩之子肖祖震 1935 年毕业于巴黎新闻学院，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新闻学院，兼任广州《国民日报》编辑，同时创办《持平日报》并自任社长和总编辑。1944 年 6 月，肖氏父子共同捐款 30 万元创办武利中学，创钦廉地区（今钦州、北海和防城）捐资兴学的最高纪录，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3]肖镜轩之女肖祖霞，曾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亦为女中英杰。

三、流行风格上的地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结合

部分商户根据实用原则采纳近代岭南地区流行的骑楼建筑结构和装饰风格，这是老街民居一大亮点。关于骑楼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起源于印度的外廊式建筑，是“英国在印度与当地建筑结合的形态，经过东南亚殖民地的经验模式累积，经由贸易途径，传播到我国”^[4]。另一种说法是由中国南方壮侗民族干栏式建筑发展而来。根据对这两种原型的考察，可以得知“骑楼”原先并非商住两用的民居。直至近代，中国粤、闽、琼、桂等地商人创造性地将骑楼改造为商住两用的街屋建筑。而在武利老街，商人们又将骑楼结构、装饰风格与传统文

化、地方实际进行了再度融合。

武利老街骑楼结构和装饰一般用于店面空间。从美学的角度而言，中式建筑的装饰风格显得端庄凝重，而骑楼装饰风格显得简洁明快，更为追求新鲜时髦的商人所乐用。从实用角度而言，骑楼建筑所形成的临街空间既可以方便商客遮风避雨，又使商家有更大的空间陈列商品以招徕顾客，符合利人利己的经商理念。^[5]

但是，商民们并没有完全用骑楼来代替传统街屋，在临街铺面之后往往采用竹筒屋或者西关大屋的传统结构。因为作为一种舶来品，骑楼建筑原先并没有考虑中国传统建筑所强调的“阴阳协调”“藏风得水”理念，内部空间没有天井、冷巷、天窗之设，而是采用水泥砂浆等材料密封每层楼的楼顶，从而造成室内空气得不到很好的对流更新。在缺乏电力和空调设备的时代，骑楼居民在炎夏倍感闷热难耐。有鉴于此，商民们很有创造性地采取骑楼店面加传统内屋的格局，既便于经商又利于居住。

老街商人的公共祭拜空间——青云寺（见图 6）的建筑风格和供奉的神灵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市井文化的特征。

青云寺的外观类似于同时代在岭南地区兴起的天主教堂。庙宇的房顶虽然采用中式屋檐，但屋檐却不突出，显然是借鉴了欧洲建筑简洁明快的风格。外墙上原先是采用当时盛行于岭南的“满洲窗”采光，窗户的木框是中国传统的“回纹”结构，寓“富贵连绵”之意，回纹格子上再用进口的红、黄、蓝、绿、紫、金等颜色的玻璃镶嵌其中，显得雍容华贵。“满洲窗”起源于广州，据说先是驻防八旗将领将昂贵的欧洲进口彩色玻璃镶窗户作为装饰之用，近代之后玻璃产品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而走进千家万户，心灵手巧的岭南工匠在骑楼建筑上大量采用进口彩色玻璃代替传统中式窗户上的糊纸，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



图6 青云寺主殿

寺庙殿堂采用“罗马券廊式”风格，其特征是采用连续拱廊以丰富殿门空间，以明快的韵律和节奏

感代替中式寺庙的凝重感。

寺庙中所供奉的则是底层商人的精神图腾:观音菩萨、关帝和土地公婆。观音是慈悲的化身,反映了因经商漂泊在外的游子渴求母性关怀,希望“神秘力量”保佑家族“人丁兴旺、五世其昌”的心理寄托,同时警示自己积善成德,以德聚财。关帝是商人的“财神”,因“义薄云天”而成为儒家的“武圣”,也因“镇煞群凶”而成为道佛两教的共神,这既是商人渴望财源广进、出入平安的心理寄托,同时也警示他们出门在外要广交朋友,见利思义。土地公婆是“保佑”一方安宁和风调雨顺的道教神灵,同时也提示商人要尊重地方人文风俗。

青云寺“盖新庙、请老神”,“新庙”建筑风格中西结合,“老神”则儒道佛三教神灵共处一堂,真实地体现了市井文化中兼采众长,经世实用的精髓。

武利老街建筑群是近代广西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圩镇建筑首先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商业民居聚落,无论从

宏观上的街道选址、规划,还是微观上的街屋结构、装饰来看,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迎合商人喜好,营造更好地商业环境和氛围。同时,圩镇建筑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民居文化的精髓,突显了对人的关怀、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尊重和对自然环境的珍惜。

参考文献:

- [1][晋]郭璞.葬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
- [2]郎敏路,唐景积.广西抗战纪实[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49-152.
- [3]灵山县志编辑委员会.灵山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78.
- [4]林冲.骑楼型街屋的发展与形态的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0:80.
- [5]岑丽阳.岭南骑楼城的重商特色[J].江苏商论,2007(5).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Concept of “Benefit Business” in the Town – building of Modern Guangxi and the Analysis on its Cultural Inheritance

——Taking the Building in Wuli old Street as an Example

PANG Guang – yi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xi Cadres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anning 530007, Chin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20860, China)

Abstract: Wu Li is one of the commercial towns in the coastal area of Guangxi since modern times. The houses in Wuli old street mainly consist of bamboo house, arcade and “Xiguan” bullpen, and constitute characteristic commercial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with the public places such as the temples, the streets and the wharves. Site selec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old street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ration of the houses and temples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value of businessme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culture, Baiyu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and shows the connotation and quintessence of modern street culture.

Key words: old street; commercial residence; cultural connotation

阿诺德·伯林特的 环境美学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岳芬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在当代众多的环境美学家中,阿诺德·伯林特是最为关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的学者之一。他试图在东方智慧中寻求某种路径来解决西方环境美学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环境美学遭遇悖论时,由东方生态智慧拓展环境美学的视野,重新建构自然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尤其关注中国园林中的美学思想,他认为:中国传统美学并不完全接受西方所谓的环境美学的概念,中国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美的具化;中国园林更接近生态美学的理想,中国美学不仅是对环境美学的某种超越,而且也体现了一种综合的生态审美观。

关键词: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生态思想;中国园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7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82-03

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是当今环境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环境美学观推动了环境美学的发展,他的参与美学理论为解决环境美学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等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其环境美学理论中,他提出了明确的环境观,并重新定义了“环境”一词:“环境就是人们生活着的自然过程,尽管人们的确靠自然生活。环境是被体验的自然、人们生活其间的自然。”^{[1]11}环境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群体的审美对象,甚至鉴赏者也被囊括在审美对象之中,“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了解我们的环境”^{[1]168}。鉴赏者的存在同被鉴赏者息息相关,原本被割裂的联系得到修复,身体上的每一种感觉都是审美的重要来源。伯林特消除了身体鉴赏者与环境(自然)之间的鸿沟,他试图通过参与的方式让人类重新回到自然当中,他的参与美学观因此带有投身自然的理想色彩。

在诸多环境美学家中,伯林特是最为关注东方传统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的学者之一,他对东方文

化语境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诠释持肯定的态度,“在一些具有很长的历史连续性的东方文化里,如中国和日本,成为审美鉴赏力的文化传播的例证,这种意识的扩展也是文明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1]165}。就文化的关联来看,日本文化大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伯林特对日本文化(主要是园林美学)的赞叹可以被归入到环境美学家对中国思想的接受。

在面对东方生态思想时,伯林特的观点同瑟帕玛等环境美学家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将东方智慧同西方思想进行比较,进而从东方环境审美出发重新审视西方的环境美学思想,最终在东方思想中寻找某种智慧来解决西方的环境问题及其相关的美学问题。

伯林特对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均有一定的涉猎,他在探讨参与美学的问题上,也借用了这些思想。例如,他将审美的感性认识同“气”的思想做类比,“佛教对于呼吸的意识,与之相关的是中国的气观念或日本的气观念”^{[2]47},他认为这是对感性认识的某种独特的审美模式。他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在中国文化里,道家思想的根本特

收稿日期:2016-10-20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5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15-0340)

作者简介:岳芬(1983—),女,山西太谷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跨文化研究。

征是认为人与自然是互相贯通的,儒家哲学则认为人与社会是互相贯通的——这与西方哲学思想迥然不同,因为西方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都是对立的”^{[2]47}。

在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观时,伯林特发现只有将自然与人结合在一起才真正富于生态精神。他认为,本土美国人心目中的万物有灵论思想、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以及中国古代山水画等,均属于此类。他尤其关注到点彩画派和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生态精神,“点彩画派把人物同化到风景中去,以及中国古典山水画把人画成大景致中很小的一部分,种种做法都表现出类似的态度。这一观点不光满足于人与自然间的和谐,而且自然把人吸纳进自己的世界”^{[1]9}。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多是人与自然间的理想状态”^{[1]9}。在大多数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如这些艺术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完美,但是,这些艺术却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对于环境美学而言,它们不仅意味着人类对自然态度的转变,而且为建构某种合理的世界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解析不同历史阶段的环境美学观的基础上,伯林特还提出文化美学的概念,他认为环境审美与文化、历史传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甚至认为环境也是一种综合的文化:

审美的环境,这一新概念将充实环境的内涵。它提醒人们去关注环境体验中时刻在场、却因某些文化原因而遭忽视的美学层面。我这里所说的文化原因,是指有意孤立美学的倾向,把它仅仅当作西方工业、商业社会中世俗行为及产品的华丽包装而已,尚未普及开去。事实上,这种做法与其他大多数文明传统背道而驰。如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明……都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现在西方社会中美学的影子只能在如下活动中依稀看到:宗教仪式、精美的宴会、园林,和尚未被竞争压力破坏的户外运动,如散步、远足、野营、休闲游泳、划艇。^{[1]21}

伯林特将美学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领域,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为环境美学提供了导向。通过历史和文化的回溯,伯林特发现美学在西方文化中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向,自然也相应地被驱逐出人类文化的中心。在伯林特看来,西方现代社会中自然只具有象征性和装饰性意义,自然的存在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装饰性意义远远大于精神价值。而

在其他文化传统中,自然的地位却完全不同。无论是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还是美洲原住民的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社会文化的基础。

二

具体到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天、地和人的关系被当作社会思想的最高指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天、地所象征的自然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自然的存在及其运转的规律是人类效仿和遵循的对象。伯林特不仅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智慧,而且还试图将这一思想推广到西方环境美学研究中去,“我尝试着将中国古代城市美学原则‘象天法地’介绍到西方学术界”^[3]。应该说,“象天法地”既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美学原则,更是传统生态智慧的体现,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类地位的客观陈述。

伯林特在《中国园林中的自然与住所》(Nature and Habitation in a Chinese Garden)一文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园林”应指中国园林艺术,区别于现代园林,以下皆同。他认为,中国园林超越了单纯的审美价值,它在沟通人和自然方面起到了比美感更重要的作用。在空间方面,中国园林利用建筑和植物将单一空间划分为多层次的多元空间,但是各个空间之间又保持着内在联系:

联系中蕴含着差异是一组相关的特征。当中国园林被划分为离散空间时,这些空间从来就不是完全孤立的,或者是彼此分离的。最小的小生境,门口或窗口打开,提供一个可瞥见的空间,在于超越到更广阔的空间中。覆盖的行人通道连接室内外场景,并且蜿蜒的路径与景观紧密结合。^{[4]139}

故意混合的空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宇宙观,借助门廊、窗棂等细节,园林创造了许许多多小的审美环境,并将这些系统巧妙地连接起来。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看,园林的艺术性在于它构造了一种完美的生态系统,园林中的各个区域犹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各个区域之间相对独立又保持着关联。

在伯林特看来,中国园林是人类居所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典范,中国园林实则是将环境美学家理想付诸实践。伯林特进而认为,中国园林背后是道家思想和自然观的影响,“在中国园林中,道家的自然哲学体现了潜在的认知与感知”^{[4]140}。作为观念基石的道家自然哲学,促使园林在很多方面需

要兼顾自然与人的需求:

我们可能会问,这些园林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在实现自然和人类融合的环境中,要努力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将中国园林描述为体现道家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意味着中国园林的传统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工自然与自然栖居方式的融合是否适用于其他的文化环境?^{[4]137}

按照伯林特的理解,中国园林不仅继承了道家哲学思想,而且对于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身处园林之内,面对自然的人不再感到焦虑或恐惧,相反,园林中的自然物给予观者的心灵以安宁,即使凋敝的自然也能够带来感官的愉悦。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伯林特的参与美学等环境美学观在理解中国园林的美学内涵上得到应用:“中国的水边赏月的凉亭请人们静观,从这个环境里面静观容易唤起感情,不同于从远距离之外的无利害的静观。”^{[5]45}置身于景致之中的思想是参与美学的精神所在,它区别于康德式的审美传统。在参与美学看来,中国园林消除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距离,环境和鉴赏者在审美活动中实现融合,“这种交融形式给游览者提供的是富有对比的感知,一系列前后相续的景色”^{[5]45}。中国园林象征人对自然审视的历史,借助空间的变换来隐喻时间的流转,鉴赏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园林中观看到自然一年

四季的变化,人与自然实现了真正的通融。

伯林特认为,如园林艺术这样的中国传统景观审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观念的区别,通过园林艺术,中国美学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而且,中国园林还能够为西方当代环境美学提供更多的启示。在审美方面,中国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美的具化;中国园林所展现的自然并不是环境美学所提倡的纯粹的自然美,中国园林更接近生态美学的理想。中国园林尝试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实现精神与自然的交融。在某些观念上,中国园林不仅是对环境美学的超越,还体现了一种综合的生态审美观。

参考文献:

- [1][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2]程相占,[美]阿诺德·伯林特,等.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 [3]程相占,[美]阿诺德·伯林特.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J].学术研究,2009(5):138-144.
- [4]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 New and Recent Essays[C]//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 [5][美]阿诺德·伯林特.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M].程相占,宋艳霞,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Arnold Berleant'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Thoughts

YUE Fe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Arnold Berleant is 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ians who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wisdom. He tries to find a way to tackle the problems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rough oriental wisdom. Especially, in th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aradox, he tries to expand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by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he East, reconstruct the natural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aesthetic thoughts in Chinese gardens, and he believe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is not totally accepted by the western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hinese garden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beau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garden is more closer to the ideal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Chinese aesthetics is not only something beyo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 words: Arnold Berleant;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thought;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择偶标准性别差异理论假设的检验

——以郑州市20至30岁未婚男女择偶标准为例

雷 霄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生处, 郑州 450044)

摘 要:择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择偶标准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原因,进化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心理学一直存在争议。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择偶标准是存在性别差异且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男女在进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适应问题不同,社会文化心理学家则认为择偶标准的不同是后天文化环境造就的,与先天因素没有关系。为了对进化心理学理论中择偶标准性别差异假设进行检验,本研究通过对随机抽取的20岁至30岁的335名未婚男女的择偶标准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结论如下:男性更关注未来异性配偶的相貌、身材信息,而女性更关注未来异性配偶的经济情况和家庭背景等信息,有效地验证了进化心理学中关于择偶标准性别差异的理论假设。

关键词:进化心理学;社会文化心理学;择偶标准;性别差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8

中图分类号:C913.1;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85-05

择偶是婚姻建立前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是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前提,也直接关系到日后当事人婚姻质量的好坏。择偶不慎往往会为婚后生活埋下隐患,造成当事人婚姻的不幸福和不稳定。择偶标准指的就是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对未来配偶在外在条件和内在修养等方面的要求。

广大青年在择偶时看重的是个人性格、修养、品性、气质风格、才华,注重情投意合、志趣相投等精神因素,还是更看重对方的权力、地位、金钱、美貌等外在因素呢?全面了解现代未婚青年的择偶标准,可以为更好地缔造完美婚姻奠定扎实的基础,也为深入地探讨当代婚姻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依据,对降低离婚率,提高人们婚后生活的幸福感具有现实意义。

在心理学领域中,择偶标准也一直是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心理学家希望通过探讨个体在择偶过程中的心理机制,更好地研究个体的恋爱价值观。其中,“进化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心理学”在有关择偶标准形成的过程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议。

进化心理学试图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对个体心

理的起源和本质以及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同样,在择偶标准方面,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遇到有关环境的适应问题是不同的,所以在择偶观上,男女选择配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生存适应中遇到的问题^[1]。

社会文化心理学家则认为,个体心理本质上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产物。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个体不同的择偶标准也是后天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择偶标准,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关系^[1]。

通过探讨当代青年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究竟是为了解决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适应问题,还是后天文化的塑造而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文献综述

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界的研究热点,心理学家们一般通过三种方式研究它:自我报告、国家公开的婚姻统计资料和报纸杂志上的择偶启事^[2]。通过长期得研究提出了两种相对立的

收稿日期:2016-12-17

作者简介:雷霄(1987—),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生处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理论假设,分别是进化心理学中的择偶标准性别差异理论假设和社会文化心理学观点的“白板说”。

进化心理学关于择偶标准的基本假设是:为了将自身基因成功地遗传下去,男、女性针对择偶的偏好各自发展出不同的模块化心理机制,女性总是寻找能够提供资源并且有精力照顾孩子的男性,而男性则会寻找具有多育潜力的伴侣,由于女性多育和健康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年轻和吸引力,因此男性征婚者更关注年龄、外貌特征等方面的信息^[3]。在进化心理学领域中,提出的关于择偶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例如,朱新秤在其《男女择偶标准的进化观》中提到,因为男女在进化过程中遇到不同的适应问题,所以其择偶观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经过长期的进化繁衍,女性则比较偏爱有权力的男性,以期望给自己和后代带来安全感,而男性则更希望外貌有吸引力的女性为其更好的繁衍后代^[4]。

David Buss 也曾就进化心理学的择偶机制假说,在 37 种不同文化下进行过验证性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证明。其研究结果为进化心理学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表明择偶偏好并不是某种文化、环境的产物,这种趋势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而且不论文化和社会标准如何不同^[5]。另外,秦季飞通过对武汉地区 200 多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在择偶过程中,首先看重的是对方品性,其次是双方的感情,其余的才是相貌,才能,经济条件等方面^[6]。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进化心理学中关于择偶标准性别差异的理论假设。

在蔡琴凤的《择偶策略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到,性别、早期经验、收入和自我择偶价值等因素都会对人们的择偶标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7]。其中提到的性别是进化心理学观点中先天适应问题,而其中早期经验的问题则又涉及到了社会文化心理学观点中的社会文化心理学的影响因素。

与进化心理学相对应的理论是“社会文化心理学”,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在一生中慢慢习得的,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包括人类的择偶标准也是在后天的生活中通过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影响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没有所谓的先天的心理择偶机制。如社会学习理论者持“白板”(Blank Slate)隐喻假设,认为人类的天性就像白板,没有先天的心理择偶机制,男性寻找年轻、有吸引力的女性,女性寻找年龄大一些,有经济保障的男性,这些都只是后天社会化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间会存在择偶标准上明显的、甚至是“质”的差别。

在乐国安、陈浩、张彦彦的《进化心理学择偶心

理机制假设的跨文化检验——以天津、Boston 两地征婚启事的内容分析为例》一文中提到:通过对 404 例天津和 432 例 Boston 征婚启事的内容分析,结果发现:男性更关注未来异性配偶的相貌、身材信息,而女性更关注对方的资源与承诺信息,但天津男女征婚者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更为强烈;男性随年龄增长,会倾向于更大程度地寻找比自己小的女性,而中美两地的女性则较稳定;在年龄选择上 Boston 人的配偶选择年龄空间较天津人广;在个性特质方面,天津人更关注承诺性,Boston 人更关注精神性与“享乐性”。结果表明,进化心理学对男女间差异有较大解释力,但对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却缺乏足够说服力^[8]。此研究试图解释进化观和文化观的联系,通过研究则发现,较好的支持了进化心理学的假设,而对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假设则缺乏更有力的证据。

进化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心理学在择偶标准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且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假设。所以,为了对两大理论假设提供更多的事实证据,我们可以从进化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心理学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大胆进行假设。如果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研究发现,在择偶过程中,男女的择偶标准确实存在差异,且男性偏向年轻貌美的女性,而女性则偏爱有经济地位、家庭条件较好的男性,我们则可以认为进化心理学中关于男女择偶标准性别差异的假设是正确的,男女不同的择偶标准确实是为了解决进化过程中的适应问题。如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男女择偶标准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是存在着社会文化的差异,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无论男性或者女性其择偶标准偏向一致,则我们认可社会文化理论的假设,人类的择偶是没有先天的心理机制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在郑州市省供销社社区、二七区委社区和中原区委社区三大居民区中随机抽取未婚男女作为问卷调查对象,这三大社区分别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二七区和中原区,是郑州市三大主要的社区,其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总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35 份,其中男性 178 人,女性 157 人,男女答卷人数基本相当。

(二)研究工具

经过查阅和整理相关文献,借鉴由梁艳争、曹金明和黄辉编制修改的问卷^[9],经调查研究和商讨,编制出关于当代青年择偶标准调查问卷。为了便于

真实反映情况,把问卷题目定为“关于当代青年择偶标准的调查问卷”。该问卷为四级评分问卷,罗列不同择偶标准,按“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和“不重要”四级排列,分别得分为4分、3分、2分和1分,分值越高表示对该项要求越高。

通过问卷的回收和结果整理,把未婚男女的择偶标准划归为三大因素,分别为生理因素、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其中生理因素包括对未来配偶的外貌、身材、身高、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个人因素包括对未来配偶的性格、受教育情况、月收入的要求;家庭因素包括对未来配偶是否有住房和家庭背景条件的要求。

(三) 研究程序

采用单独施测的方式,在郑州市金水区、二七区和中原区,由研究者担任主试,进行填写问卷。在测试前,主试提醒受测者阅读指导语和填写基本情况说明,并向受测者说明测试目的和意义,特别说明是无记名问卷,无任何商业目的和涉及隐私,然后开始答题,平均每人测试时间约为5分钟。当场收回,对问卷进行初步的整理,对填写不完整,受测者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在测试范围内的问卷进行筛选,共剔除无效问卷65份,得到有效问卷335份。

(四) 数据处理

对所有有效的数据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因为该研究以性别差异为自变量,每项择偶标准的重要性得分为因变量,问卷采用四级评分方式。故对其数据结果的分析主要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卡方检验来对其差异性进行比较。

三、调查结果

(一) 未婚男女青年各项择偶标准平均分排序

对郑州市未婚男女青年择偶标准调查,通过平均数分析,三大择偶因素的重视程度排序如表1。

表1 未婚男女青年择偶标准平均分排序比较

	男	女
1	生理因素:2.7665	个人因素:2.9662
2	个人因素:2.6834	家庭因素:2.8545
3	家庭因素:1.9162	生理因素:2.6532

从表1可以看出,男性对未来配偶的要求中,平均分最高的是生理因素,其次是个人的因素,最后是家庭因素;女性对未来配偶的要求中,平均分最高的是个人因素,其次是家庭因素,最后是生理因素。

(二) 未婚男女青年在生理因素方面重要性差异比较

对郑州市未婚男女的择偶标准在生理因素方面认为重要的百分比进行罗列,并将其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2。

表2 未婚男女青年在生理因素方面重要性差异比较

生理因素	男	女	卡方	Sig
外貌	60.1%	42.5%	3.528	0.000
身材	66.3%	55.7%	1.977	0.048
身高	43.8%	57.6%	3.207	0.001
年龄	60.6%	53.1%	1.521	0.128
身体健康状况	77.6%	70.9%	1.166	0.244

由表2可知,未婚男性在未来配偶生理因素方面的要求中,对其外貌、身材、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均高于未婚女性,其中,在外貌和身材两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未婚男女性在未来配偶生理因素方面的要求中,对其身高的重视程度高于未婚男性,且存在显著性差异, $X^2 = 3.207, P < 0.05$ 。

(三) 未婚男女青年在个人因素方面重要性差异比较

对郑州市未婚男女的择偶标准在个人因素方面认为重要的百分比进行罗列,并将其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未婚男女青年在个人因素方面重要性差异比较

个人因素	男	女	卡方	Sig
性格	71.9%	70.2%	0.618	0.537
受教育程度	48.9%	70.2%	3.984	0.000
月收入	44.4%	60.9%	5.377	0.000

由表3可知,在个人因素的择偶标准中,未婚女性对未来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要求均高于未婚男性,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未婚男性对未来配偶的性格要求高于未婚女性,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X^2 = 0.618, P > 0.05$ 。

(四) 未婚男女青年在家庭因素方面重要性差异比较

对郑州市未婚男女的择偶标准在家庭因素方面认为重要的百分比进行罗列,并将其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4。

表4 未婚男女青年在家庭因素方面重要性差异比较

家庭因素	男	女	卡方	Sig
住房	21.9%	83.5%	10.980	0.000
家庭背景	21.9%	46.9%	6.343	0.000

由表4可知,在家庭因素的择偶标准中,未婚女性对未来配偶是否有住房和家庭背景的要求均高于未婚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

四、分析讨论

(一) 男女性的择偶标准在生理因素方面的差异比较

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在生理因素方面的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重视未来配偶的生理因素,即未来配偶外貌、身材、身高、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

经过进一步差异分析,我们知道,在生理因素

中,男性尤其看重女性的外貌和身材,且和女性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则比较看重男性的身高,和男性对未来配偶身高方面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男女对未来配偶的重视程度都较高,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有较高生育能力的女性就会吸引男性,而有安全感的男性则会更受女性青睐^[10]。但从生理因素方面可以看出,外貌姣好,身材曼妙的女性,在男性看来是具有较高生育能力的标志;而身高较高的男性,从女性的角度分析则可认为是有安全感的标志,在遇到危险时,可以更好保护自己和孩子。

根据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无论男女,在生理因素方面的择偶标准受后天的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同一文化条件下的未婚男女其择偶标准应大体相同^[11]。无论男女都比较重视未来配偶的身体健康状况,因为受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都认为拥有良好的身体健康水平是共同生活,缔造完美婚姻的基础。

所以,根据两种理论的和研究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生理因素方面,男性对女性的择偶标准在外貌和身材方面符合进化心理学的假设,而在身体健康状况和年龄的要求中则符合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

(二)男、女性的择偶标准在个人因素方面差异比较

在个人因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尤其看重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的高低,且和男性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性格因素方面,男女对未来配偶的重视程度都较高,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在个人因素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月收入较高,在女性看来是个人能力高的标志,个人能力水平较高的人则更会给女性和孩子带来安全感,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性格方面,根据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告诉我们,良好和谐的性格是使婚姻幸福长久的基础,所以在择偶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比较重视未来配偶的性格是否与自己的性格相匹配,且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得出:在个人因素方面,女性对未来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高低的要求符合进化心理学的假设;在性格的要求中则符合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

(三)男、女性的择偶标准在家庭因素方面的差异比较

在本研究中家庭条件包含的两个方面中,即是

否有住房和家庭背景,是否婚后有住房我们可以作为对方家庭经济条件好坏的代表,而家庭背景则是以对方父母的职业和父母关系的融洽程度作为代表。

通过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对未来配偶的要求程度都普遍高于男性,且存在显著性差异。

根据进化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人类进化和社会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晶。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分析,婚后有住房和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这虽然不是个人能力的象征,但是这些优渥的外在条件会给日后生活奠定更好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进而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根据众多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普遍认为结婚由男方准备住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当代未婚女性在择偶中也更期望寻找家庭背景好的男性作为依靠^[12-15]。

(四)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中,关于年龄这一项目的设计提到“认为未来配偶的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匹配程度”但并未对匹配程度做详细的说明,是高于或者是低于,且未说明年龄范围。问卷中的这一点不足之处,造成了在结果分析中,我们在比较年龄方面时,通过比较平均分发现男性高于女性,但是其平均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无法得出相应的结论,从而对于进化心理学中提出的男性更偏爱年轻女性,女性更偏爱年纪较大的男性的理论假设,无法进行有效地验证。

四、结论

在择偶过程中,男性最重视女性的外貌和身材等生理因素,女性最重视男性的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

在家庭因素中,女性对未来配偶的重视程度高于男性。

对于男女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在外貌、身材、身高、月收入、住房、家庭背景中,对进化心理学中择偶标准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有效地验证;在性格、身体健康状况方面,则符合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

参考文献:

[1]叶浩生.进化心理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

- [2] Hayes A F. Age Preferences for Same - Sex and Opposite - Sex Part[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5(2):125 - 133.
- [3] Buss D M. Human Mate Selection[J]. American Scientist, 1985(73).
- [4] 秦季飞. 武汉地区大学生的择偶标准[J]. 青年研究, 1995(11).
- [5] Buss D M. Sex Difference in Human Mate Preferences: Evolutionary Hypotheses Test in 37 Cultures[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89(12).
- [6] 朱新科. 男女择偶标准的进化观[J]. 婚恋家庭, 1999(11).
- [7] 蔡琴凤. 择偶策略的影响因素[J]. 社会心理科学, 2009(1).
- [8] 乐国安, 陈浩, 张彦彦. 进化心理学择偶心理机制假设的跨文化检验: 以天津、Boston 两地征婚启事的内容分析为例[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0(4).
- [9] 徐维玮. 长春地区大学生恋爱观的现状和特点[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 [10] 黄洋子. 进化心理学两性配偶选择及相关问题差异的研究述评[J]. 社会心理科学, 2009(6).
- [11] 阎晓军. 中日大学生择偶心理的比较研究[J]. 青年研究, 2002(5).
- [12] 徐明. 某高校大学生婚恋观现状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06(8).
- [13] 杨艳玲. 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及其影响因素[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 [14] 刘祥松, 胡珍. 大学生恋爱价值取向及其整合对策思考[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23).
- [15] 王美萍.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特点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9(4).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Inspection of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bout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Selecting Spouse Standard

—Taking Zhengzhou's 20 - 30 Years Old Unmarried Young People as an Example

LEI Xiao

(Students' Affairs Divis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standard of selecting mate is always a hot point in psychology field. There is a discussion betwee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about selecting spouse standard because of gender difference. 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 believe that gender difference causes the difference of selection mate standard, the reason is the different solutions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human being's evolutionary. However,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ist think that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e the assumption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bout gender difference selecting mate, through Unmarried people's selection mate standard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350 young people from 20 to 30 years old random samples, the result is: The male think the standard of appearance and figure about his future mate is more important, but the femal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her future mate's economic condit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Finally the criteria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s verified effectively.

Key word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standard of selecting mate; gender difference

“礼崩乐坏”与“涅槃重生”： 论春秋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

张书霞¹, 钱东晓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图书馆, 郑州 450044; 2.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 郑州 451100)

摘要:从中华文明肇始, 中经西周全盛和春秋的衰落, 再到儒家重新阐释, 华夏礼乐文化在先秦经历了由合而分, 又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本文以礼乐美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辩证发展为线索, 分析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原因, 指出礼乐美学经历的西周兴盛和东周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 强调礼乐文化美学有其道德缺憾, 但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利益, 其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人文精神有益于当前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和谐与发展。

关键词:礼乐; 春秋; 辩证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19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90-04

礼与乐发生在农耕文明的中华大地,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 得益于适宜的纬度位置、肥沃的黄土地、水量充沛的黄河水系和锦上添花的季风气候四个方面的天造地设, 构成了精美绝伦的孕育和谐文化的温床。就历史文化线索来说, “礼”和“乐”与原始宗教与图腾密切关联。把礼乐两种美学形式结合在一起, 更显中华先民的审美创造能力。经过上古三代的不断发展, 礼乐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审美的核心概念和中国政治美学的标志性内容。和谐, 也就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不变的特征。

众所周知, 西周时代的礼乐逐渐脱离宗教而与政治统治相结合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 是礼乐美学的一个质变。在这一质变过程中, 贯穿礼乐这一社会现象几千年的和谐文化精神没有变, 礼乐相融的形式没有变。“周公制礼作乐”, 造就了以礼为中心、以德为内在、以乐为形式的审美政治的雏形。

就像从中华文明肇始, 中经西周全盛和春秋的衰落, 再到儒家重新阐释, 华夏礼乐文化经历了由合而分, 又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大的逻辑循环一样, 事实上, 在每一个相对独立的较短的历史时期,

礼乐文化也经历着同样的范围相对较小的辩证逻辑过程。本研究以礼乐美学在春秋时期辩证发展为线索, 强调礼乐美学经历的西周兴盛和东周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 探讨春秋“礼崩乐坏”时期礼乐美学的“涅槃重生”。

一、“礼崩乐坏”的原因分析

王室衰微, 诸侯纷争。春秋时期的大变革和大动乱打乱了奴隶主统治次序, 制度体系失去了约束力。西周礼乐赖以维系的社会根基动摇。另一方面, “郑卫之声”等新乐兴起, 则反映当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 社会文化生活需要的民间音乐文化形式迅速崛起。但这些都只是表象, “王室衰微”与“郑卫之声”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 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政治和经济都经历着大变革。礼崩乐坏作为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表象是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使然, 究其根本原因是代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和代表封建制的新兴生产力因素的强大动力都在发生内在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表

收稿日期:2016-12-1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7年度人文社科项目“礼乐美学发展脉络研究”; 河南省社科联2017年度项目“春秋礼乐文化创新发展经验研究”

作者简介:张书霞(1969—), 女, 河南平舆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哲学。

现在生产工具上,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铁器使用愈加广泛。铁器的使用和井田制的瓦解可以理解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而政治上的纷争也只不过是新旧生产关系的较量,而所有这些都,在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到来准备着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东周“礼崩乐坏”不是人为因素,更不是历史倒退,而是社会大变革时代政治文化的表达方式。文化交流方式的更新只是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不能把新媒介带来的文化拓展作为“礼崩乐坏”的社会原因。

对于“礼崩乐坏”,文化研究者历来观点各异。李石根认为“礼崩乐坏”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政治局面,是儒家学派对礼乐文化时代变迁的一种误判,而事实上礼乐文化从来没有过崩坏局面,而且一直在发展。钟琛则认为“礼崩乐坏”是新媒介带来的文化拓展。

当然,和宗法制结合在一起的礼乐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很明显,礼乐制度“对劳动实践的道德意义”以及“知识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1]都非常漠视。可见,我们对礼乐文化的态度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地分析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

礼乐文化在很多历史境况下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体现了民族的审美精神,直到今天,礼乐文化中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人文精神仍然有益于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和谐与发展。经历过“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但礼乐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一分钟也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其对和谐的价值追求,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和其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组成伟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之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基因必然更加富有生命力,这里所指的就是儒家礼乐美学的创新发展。

二、“礼崩乐坏”时期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

东周时期的“礼崩乐坏”给多种文化发展以新的契机,同时也加速了礼乐美学的新生,儒家礼乐美学的创新发展只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东周时期“礼乐崩坏”,但礼乐审美理性成分增加,而正是孔子和他的继承者们对礼乐进行理性主义的思考,实现其德育与美育的统一,赋予礼乐美学以蓬勃生命力,才使之影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而不衰。

首先,对礼乐文化的辩证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数孔子。学者大都认可“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孔子是礼乐的坚定执行者”的说法。孔子在美学史

上最早奠定礼乐相亲、善美相成的原则,使之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理念。孔子的礼乐思想源于周公,但又有很大创新。康德提出“善的快乐”“感觉的快乐”和“审美的快乐”,而孔子说欲仁、好仁和乐仁,两者异曲同工,很好地论证了审美、感觉和社会意义的关系: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升华,礼乐相通。对孔子来说,三者关系对应着对待仁的知性、物性和情性的态度,都是仁的“文”化。礼和乐均建立在仁的基础上。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出人格建造从感性始,经理性的作用,再到感性,最后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的过程。

在《原儒墨》中,冯友兰指出孔子不是儒的创立者,但他却是儒家的创立者^[2]。可以认为从儒者到儒家的转变是一次质的飞跃。儒家借助于西周礼乐制度,用理论充分论证礼乐制度并据此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使礼乐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获得新生。当然,孔子能把儒者改造成为儒家,除了其礼乐教育途径培养出来的学生通过仕途参与政治的主观原因外,当时鲁国的礼乐制度破坏较小是其重要的社会现实基础,当然,进入仕途的儒家弟子,通过人格典范迅速扩大影响,是儒家思想成功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孟子有诸多重大贡献。孟子继承和发挥了“仁”的思想,把伦理道德完善与精神情感的审美体验结合,提出用人格美体现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理论的核心主张。孟子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禽分际的规范性标志。

“以礼释仁”,礼通过内化的功夫,化作人的情感心理,成为人的先验本体和经验现象的概括;“乐与民通”,在强调礼乐美育作用的教化过程中,实现“德教”与“乐教”的最佳效果;“化育天下”,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完美社会关系角度论证伦理美的重要意义,指出和谐的伦理美的最高境界在于人格美,实现“仁义礼智”的社会美学,达到化育天下目的,是孟子礼乐思想的美学意义。直到今天,强调美学的社会功能对美好社会建构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由孔孟开始的对于礼乐的理性理解,在荀子《乐论》的美学阐释中达到高峰。荀子围绕礼乐重建,设计“宽猛相济”和“崇礼兴乐”,关切“王霸之途”和“理国之道”,奠基“天子之学”和“人性之论”,坚持人本主义与通权达变并举,认为审美应以礼乐为引导,促使人性由恶变善,宣扬审美要求与礼乐约束的完美统一。

礼乐是荀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美善相乐”是荀子对礼乐关系的主张。在这里,礼、善、乐

达到了和谐统一,各自既是目的,又是途径和手段。强调礼的规范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关注礼的审美旨趣,通过礼的审美功能完成对礼的诗化阐释。而乐是心性从善的修养工具,给予乐伦理定位和道德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道德善与艺术美的统一。当然,荀子夸张了乐的政治功能,也损害了艺术自身的审美功能。

三、先秦诸子对礼乐美学的身体探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是政治制度使得原有社会文化元素分离的结果,其结果使得具有身体统一性的礼乐文化突然残缺不全。生活在过渡年代里如何用身体思维应对世道变故、挽救世道没落是摆在儒家诸子面前的问题。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都用自己的躬身践履给历史以完美回答。孔子在奔波游说中,在乡校、宫廷、村社不同场合身体力行,用身体语言复兴周道。事物的意义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借助于通感等整体感受,实现身体审美。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也正是这样实现礼乐美学的身体践行的。当然,这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身体美学中“意境”的含义了。王国维曾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3]”。

荀子在《正名》中分析了身体思维和概念思维的关系。今天,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决定了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唯象思维的身体思维模式,但对于哲学理论相对混沌的先秦时期来说,我们只能感叹先秦诸子对身体思维的历史贡献从实践上契合了哲学规律。在中国先秦诸子的身体思维中,具有极大身体涵容性,同时,理论逻辑充分,“理”文化特征明显,“名象交融”成为长期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思维方式。

“身体”两字的造字,可以说明中国先人对于身心关系的理解,对于知行合一的态度。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身”的解释是,“躬也,象人之身”。身体的“体”字繁体字与礼仪的“礼”的繁体字是相通的,都是祀神和敬身的意思。可见,古人对于身体的解释就是躬身与崇敬。

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来说,农耕文明中,社会个体生活距离缩小,身体接近,交往密切而广泛。这种环境从物质基础上决定了礼仪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荀子的礼仪观找到了合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国美学和伦理学的身体性践行特征找到了理论依据。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礼法社会,合乎礼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合适的。这说明身体性审美是

一种实践自觉。

从身体起念,是中国农业文明孕育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特征又造就了风骨、形神之类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和中国传统审美意境。礼乐文化与身体思维和身体审美在较长历史时期的相互影响,又反过来加深了礼仪的模式化和典范化。身体演示通过体态、服饰、场景、氛围对礼的传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审美意识突出、通感联觉发达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美学特征。正所谓民族的失望透顶和审美特征弥漫于我们的身心。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审美基因和文化基因,我们在身体力行传统文化遗产时,才会感受到中国优秀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四、礼乐文化美学批判

墨子以“非乐”为中心的美育思想是先秦美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墨子、韩非子等人的礼乐批判是西周礼乐美育观裂变中的重要声音,引起当时思想界强烈关注,尽管其对礼乐审美的批判过于片面和极端,但其对礼乐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矛盾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上层社会奢侈享乐的批判,有益于礼乐美学的涅槃重生。正是百家争鸣促成儒家学派的全面创新。

墨子对上层社会礼乐的批判是系统和彻底的。从音乐演奏到音乐欣赏,从音乐制作到乐人供养等,最终结论是由“非乐”到“禁乐”。墨子对音乐的态度和他对儒家礼乐教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彻底批判直至全盘否定。墨子这种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全盘否定却显得滑稽可笑。但无论如何,墨子的呼声引起了当时思想界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正是墨子的初衷吧:正是全盘否定引起的强大的反响赚足了思想界重视和反思。从这个方面来说,墨子对礼乐美学的批判至少有以下功用和价值:第一,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其批判精神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下层人民正义的呐喊。第二,战国时期的社会动乱造成人民生活苦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礼乐审美的艺术表现与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现状严重不符,凸显了墨子批判的进步性和历史意义。第三,墨子对礼乐文化最大的贡献和价值在于,他的批判触及到了儒家一贯忽略的审美与社会功利问题。可以认为,荀子对审美和功利辩证关系的论述,孟子“与民同乐”的主张,都是墨子礼乐批判背景下的辩证思考。韩非等法家学派的礼乐批判及其美学观与墨子密切关联,一脉相承。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批判,促成儒家学派在继承和创新礼乐美学的过程中更加系统和全面,礼乐

美学批判是春秋时期礼乐美学涅槃重生的重要环节和条件。

五、启示

研究礼乐美学的发展脉络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要求,对于建设和谐中国、文化中国和美丽中国,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从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辩证发展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文化转型必须适应社会转型。春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动决定了礼乐文化从多方面的变化发展,“礼崩乐坏”是和“以礼释仁”“乐与民通”“美善相乐”“崇礼兴乐”“化育天下”等等同时存在的文化发展状况。“礼崩乐坏”过程与儒家诸子辩证发展礼乐美学的过程相伴而生,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礼崩乐坏”和儒家礼乐重构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

其次,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发展的唯一出路。礼乐文化在春秋时期的涅槃重生就是在传承与创新中辩证发展的例证。春秋时期,对待传统文化诸子百家大都采取了“述”与“作”相结合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统文化问题

时也强调继承与创新的方式和方法。

最后,文化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重要性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往往体现在学术中的文化自觉精神。礼乐在春秋时期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担当起了历史责任,在社会转型冲击中表现出了足够的创新精神。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的确立,也标志着中国礼乐文化在东周时期涅槃重生而获得了新生,并在此后两千余年,在被世界公认为礼仪之邦的国家文明发展史中薪火相传。

参考文献:

- [1] 汤一介. 中国文化与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0:338.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63.
- [3]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8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alling” and “Rebirth”: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the Dynasty of Spring and Autumn

ZHANG Shu - xia¹, QIAN Dong - xiao²

(1. Library,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Zhengzhou 4511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China has witnessed the flourishing perio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fading perio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 and the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combina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em and then the recombination in which th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in pre - Qin period as a clue, analyzes the social reasons of falling and rebirth, points out that the flourishing perio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fading perio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 are two aspects of innovation and related together.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ritual and music aesthetics culture of China being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human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humanistic spirit, even in harmo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nkind.

Key words: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the Dynasty of Spring and Autumn;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熔铸思想启迪后人——评《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史》

李艳华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24)

摘要:《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史》一书首次以分门别类的形式探讨了魏晋南北朝不同书籍类型的编辑思想内涵,较为深入地总结了魏晋南北朝的重大编辑成果。在探讨编辑思想的过程中,本书强调深化对编辑思想的主体性、价值性研究,首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该时期编辑家的文化素养、精神追求和文化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了编辑思想之于编辑活动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编辑思想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0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94-04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编辑活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缓慢发展,但是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异常活跃,编辑活动实践极其丰富:别集、总集编辑形成潮流,类书编辑开始出现,经部书籍编辑活跃,史书编辑蔚然成风,佛经典籍编辑兴盛,科技典籍编辑卷帙浩繁。这些丰富的编辑活动,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文化典籍,同时显示了编辑思想史发展特有的逻辑和活动形态,展现了古代编辑家优秀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编辑活动活跃,编辑类型丰富,编辑实践创新,而且诞生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编辑家,像萧统、徐陵、陈寿、范晔、释道安等。但是,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系统、专题地对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段乐川撰写的这部《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一书正是对这一时期编辑思想断代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以不同图书类别为纲,以重要编辑家和编辑出版物为目,以编辑思想呈现为核,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勾勒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编辑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主要风貌,丰富了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拓展了编辑思想史研究的空间。细读此书,有如下几个问题引人

深思。

一、较为全面地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的基本特征

本书首次以分门别类的形式探讨了魏晋南北朝不同书籍类型的编辑思想内涵,较为深入地总结了魏晋南北朝的重大编辑成果。本书提出了总集编辑思想经历了从辨体思想到选本思想的转变;概括提炼了魏晋南北朝别集编辑思想的主要表现:传世思想、扬名思想、范文思想、言教思想。与此同时,对史书、经部书籍、类书、佛经典籍和科技典籍等书籍编辑思想的个案研究也较为深入、具体、全面。魏晋南北朝的书籍类型多样,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书籍编辑活动的形态多样。既有传统的书籍类型,如史书、经部书籍编辑,又有新型的书籍类型,如类书、佛经编译作品等;既有组构型编辑之作,如《论语集解》《文选》,又有创构型编辑之作,如《水经注》《三国志》等的编辑;既有编辑家个体之作,又有编辑家集体之作。作者在揭示这一时期的编辑思想基本特征的丰富性、复杂性上做了很大努力。

编辑思想的丰富性 是指这一时期编辑思想的表现形态丰富多样,表现内容千姿百态。从表现形

收稿日期:2016-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理论创新研究(15xw012)”

作者简介:李艳华(1979—),女,河南许昌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态上来说,在先秦两汉既有书籍种类的基础上,出现了总集、别集、类书、佛经编译等几种新的书籍种类。与此相应,魏晋南北朝书籍编辑思想的形态就更加多元、丰富。类书编辑的“以类相从”思想,总集编辑的“选本”思想,佛经编译的翻译标准等,都成为一种新的思想表现形态和内容,这极大地拓展了编辑思想的形态和内涵。与此同时,丰富性还表现在不同图书类型的编辑思想的丰富多元上,比如,总集编辑思想就有“辨体思想”和“选本思想”两大方面。前者以李充的《翰林集》为代表,强调文体辨析,重视说明文之特征,并对表、驳、论、议奏、盟檄等文体特征进行了阐释。在这些文体辨析中,李充注重论述结合,重视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鉴赏。

“选本思想”则以萧统编辑的《文选》为代表,提出了“以能文为本”的选录标准和“次文之体,各以汇聚”的体例观。他认为,“姬公之籍,孔子之书”乃“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其功用在于教化,不在“能文”。老庄管孟之作,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此也不加选录。萧统认为,其他子书虽然传之简牍,但是事异篇章,与文学不同,功用侧重于谋事而不在“能文”,因此也不加选录。至于史书,萧统认为它与文学也不相同,功用在于褒贬是非,记录事实,因此也不加选录。但是,对于史书中的赞、论、叙、述,萧统则加以选录,原因是他们具备“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特征。他说:“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由此可见,《文选》选录的标准实际上是文学的标准,“以能文为本”构成了萧统《文选》编辑的基本原则。选录的文章要具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性质,要讲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要表现文学所特有的功能。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在本书中对这一时期编辑思想丰富性的揭示可谓非常充分。

编辑思想的复杂性 是指编辑思想的形成机制更加让人难以把握。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从宏观上表现出多元交叉、相互影响的一面,比如,类书的以类相从的编辑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总集编辑、史书编辑上也可以看到影响。杂史《世说新语》的分类系事特征就非常明显,《文选》编辑中的文学体裁的划分同样有以类相从的特征。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总集、别集编辑思想之于类书、史书的影响。总集编辑思想中,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的交互关系清晰可见。作者指出,以《文选》为标志的大量文学总集、别集的编辑,实际上在显示着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又导致文学家群体的出现、文学家地位的提高,这又是范晔《后汉书》在体例创新中编加《文苑传》的一大原因。凡此等等,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时期编辑思想交互影响、复杂多变的特征。

作者认为,萧统确立“以能文为本”这样一个文学作品编选的标准,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学思想状况及萧统本人的文学观密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整个士人阶层的思想已从两汉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变得更加多元,他们不再热衷于追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而是趋于远离世事,谈玄论道,明哲保身和挥洒翰墨。文学自觉,表现在文学实践中就是整个文学界比较重视文学的创作技巧,比较强调文学所特有的性质、功能。主缘情和求华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观念,尤其是南朝文学更是如此。所谓“永明体”,即是讲究声韵和对偶,就是这一文学观念的产物。这样一种文学观念不能不对萧统编辑《文选》产生影响,“以能文为本”被确定为《文选》的选录标准正是文学自觉观念的必然产物。另外,《文选》的选录标准也来源于萧统本人的文学观。萧统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特有的性质,有主缘情、求华美的倾向。《古今诗苑英华》编成之后,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纷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1]155}可见,萧统的文学观比较强调文学自身的属性,重视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追求文词典丽和修辞华美的,只不过他希望不要因过于典丽和华美而造成文章的形式大于内容。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论述,来试图揭示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形成的内在和外在机制。

二、较为深入地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编辑主体的精神特征

在探讨编辑思想的过程中,本书强调深化对编辑思想的主体性、价值性研究,首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该时期编辑家的文化素养、精神追求和文化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了编辑思想之于编辑活动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编辑思想的文化功能。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注重挖掘编辑主体有关编辑活动的价值性和态度性观念,较为深入地总结了熔铸在编辑成果背后的编辑家的编辑理想、编辑态度和编辑作风。

一方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编辑主题的自觉性。自觉性是指编辑主体对编辑思想的一种自觉体认。编辑思想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自觉的编辑思想,往往意味着编辑主体对其主体行为背后的观念有深入

的认识和反思,而不是一种无意为之的行为。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的自觉性,首先表现在编辑活动的独立性上。这一时期出现的总集、别集和类书,已经不同于史书、经部书籍等编著合一的作品。他们已经是一种由编者在作者的稿本基础上进行加工、完善、编修整合的具有独立性、创造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编辑活动从著作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创构活动,应该始于魏晋南北朝。其次,编辑思想的自觉,还表现在编辑主体对编辑活动的价值和作风要求已经有深入的反思。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所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2]108}他这句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体现着编辑主体对书籍编校活动的高度自觉。这表明,到了魏晋南北朝,编辑主体已经跳出编辑活动而开始对其所从事的活动进行深入思考。再如,陶弘景编辑《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也已经对其编辑活动有了深入认识,认为这是一项“求嗣后世”的行为。这些无不是编辑思想自觉性的表现。

另一方面呈现了这一时期编辑大家思想的深刻性,即编辑思想的内涵深刻和影响深远。魏晋南北朝的编辑思想有着内涵深刻的一面,比如,曹丕在编辑别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追求作品的传世意识。范晔在编辑《后汉书》中表现出的极强的精品意识。作者指出,范晔在谈到自己的论赞时,高度自信,自赏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者。”^{[3]2}作者对此论述到:“‘殆无一字空设’,表现的是他求精求优的编辑观念,说明在论赞编辑之时,他十分重视锻句炼字,精雕细琢,力避陈调冗词,力求字字珠玑。‘奇变不穷,同含异体’则反映了他求变求新的编辑思想,说明范晔追求编辑语言新奇,立争论述新意迭出。从他的《论》《赞》实际状况来看,范晔之言不虚。他的《论》常常立意高远,切中时弊;他的《赞》文采骈文之风,四字一句,韵味十足。”^{[4]45}作者认为,《后汉书》中的赞语可谓是句式整齐,文采粲然,字斟句酌,言简意丰。而这反映的正是范晔希望所编之书能够传世,能够为知音所赞赏。正如他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但是,他又担心世人不能洞悉他编辑过程中的“体大思精”之用意,“恐世人不能尽之”。他还担心世人“贵古贱今”,此书淹没不闻。这些都说明范晔

具有明确的精品意识和传世意识,对此书编辑求精求优,寄予厚望。

还有,杜预在编辑《春秋左氏传集解》中同样所表现出的通过编辑作品“立言”而求传世的意识。如同作者所言:“他从小就将‘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志向。他认为,立言可以实现人生之不朽,因此在功成名就之后,就转向‘立言’。”此外,道安等译经高僧在编译佛经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济世情怀,同样在本书中得到深入的描述。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的很多编辑家都有极强的生命价值意识。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观念,他们才追求编辑作品传世,进而才在编辑作风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编辑思想中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编辑工作价值的高度认同,构成了编辑家编辑思想深刻、厚重的一面。

三、较为系统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演变的逻辑轨迹

编辑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子系统,在作用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社会活动的影响和制约。魏晋南北朝的编辑主体,生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学术趣味、审美风尚,还是编辑宗旨、编辑风格、编辑倾向,都必然受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社会现实的制约。分裂动荡的政治和缓慢发展的经济,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编辑活动的政治经济基础;异常活跃的学术文化思想,则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书籍编辑实践的发展;纸写本普及,有效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书籍的使用更加方便易用,这是魏晋南北朝书籍编辑活动之所以活跃的科技因素。作者正是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编辑实践与社会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地阐述了魏晋南北朝不同门类图书编辑思想发展的交互作用关系。与此同时,他还以专题形式分析了不同门类图书编辑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发展轨迹,较为深入地勾勒了不同门类图书编辑思想发展的动力机制、内在规律和发展走向。作者重视编辑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动力,比较关注编辑思想于不同图书类型的内在发展逻辑。比如文学图书与史学书籍的编辑特征之不同,他认为,文学图书编辑与文学生产密切相关。史学书籍编辑与政治治理交相呼应。与此同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还用长篇幅对这一时期佛教典籍编辑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他对道安、鸠摩罗什、僧佑等编辑大家的关注,

都是此前编辑史研究中所付诸阙如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跨度时间长,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繁不已,这就造成该时期的很多书籍文献散佚、失传。很多书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只能通过后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或辑佚本中进行。这不仅给资料收集和整理带来困难,而且给文献分析和判断提出了挑战。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经典文献,有的实际上是经过多次编辑的文本,比如酈道元的《水经注》。作者在对编辑思想的分析时没有指出不同版本的差异,无疑使得论述存在失当之处。此外,在分析、评价编辑思想的影响时,还显得不够深入到位。因为,编辑思想的影响不限于当时,往往还表现在对后世同类书籍编辑的影响上。在研究编辑思想的影响时,作者

在分析一个图书对后世同类图书编辑的影响上稍嫌欠缺。当然,这也是编辑思想研究的一大难点,需要作者融通古今、采铜于山的博识和耐力。

参考文献:

- [1] 萧统,俞绍初,校注. 昭明太子集校注[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155.
- [2] 颜之推,张霭堂,译注. 颜之推全集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2004:108.
- [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
- [4] 段乐川. 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Fusing Thoughts to Enlighten Later Generations

——Review of *Editorial Thoughts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 Yan - hua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Editorial Thoughts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content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books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ummarizes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editing at that time. This book emphasizes the thorough study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value of editorial thoughts, records those famous editors' activities and pursuit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editorial thoughts to editorial activities, reveals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editorial thoughts.

Key words: Wei Jin dynasty;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ditorial thoughts

关于古籍修复工作环境的建设

李爱红

(中国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310024)

摘要:古籍修复工作环境的建设可通过继承发扬传统修复工艺和开发利用现代科技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方面,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整理归纳传统修复技艺的显性知识,挖掘修复工艺的隐性知识,总结实践成果,形成完整的工艺技术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运用现代科技及方法研究传统技艺的内在原理来发展和创新修复技术,并将最新的现代科技成果融入到古籍修复技术中。

关键词:传统修复设备;现代修复仪器;古籍修复工作环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1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098-03

我国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在加强古籍修复力量,添置修复仪器设备,科学建设古籍修复平台,规范古籍保护与修复制度方面还有待发展。我国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在全国大面积开展刚刚起步,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文献中心等部门都急需建设设施齐备、材料充足、空间分配到位的古籍修复工作平台,这对提高古籍修复质量,提升修复水平,健全修复制度,传承修复工艺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对传统修复工艺的继承和对现代科技的开发与利用可获得古籍修复技术的提升。一方面,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整理归纳传统修复技艺的显性知识,挖掘修复工艺的隐性知识,总结实践成果,经过系统梳理整合形成完整的工艺技术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运用现代科技及方法及方法研究传统技艺的内在原理来发展和创新修复技术,并将最新的现代科技成果融入到古籍修复技术中。

一、充分利用传统古籍修复工艺与设备

中华线装古籍赖以形成的文献物理特征,就是附着于中国传统手工纸上的古代文献,它们所采用的承印形式: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毛笔书写等,都是典型的传统古籍制作形式,只要这类中国特有的古代文献存世,传统古籍修复工种就不会消失。因此传统古籍修复工艺中的必要设备在当代古籍修复工

作环境中必不可少。大漆修复台是传统古籍修复中最重要的修复设备,现在的许多修复工作室依然以拥有一张正宗大漆修复台而自豪。大漆修复台从工艺到材料,要严格依照传统制作工艺,台面要求平整光滑、无裂痕、无疤痕、无暴漆、耐水浸、耐水烫、耐酸碱腐蚀。装裱墙在修复环境中要有一定的空间,虽不像古画修复需要落地大墙好几面,但至少一面墙是需要的。传统修复工艺中师傅手中的修复工具也很重要,这些小工具有许多都是师傅自制或定制的,有些是在长期工作中逐渐打磨出来的,包括镊子、毛笔、竹启、牛角启、马蹄刀、竹刮子、自制挑针、自制刮刀、针椎、铁锥、铁锤、木锤、排刷、棕刷、界尺、镇纸、研石、压石、压书板、隔书板等。老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师傅们精湛的修复技艺,靠的就是这些顺手的工具。传统修复工具和设备看似简易,却是经历了近千年的传承与发展,汇集了先人的智慧与经验,继承这些宝贵的修复工具与设备,将它们充分应用到现代古籍修复环境中是非常有意义的建设。

传统修复工艺中纯手工的修复材料也是现代修复工艺必须继承的环节。运用纯植物的手工纸作为修补书页的补纸是延缓古籍老化、修旧如旧的前提条件。手工打制糨糊、天然植物材料染色补纸等传

收稿日期:2016-10-30

作者简介:李爱红(1970—),女,江西九江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统的修复工艺,虽然方法原始简朴,但对补书是科学的。

二、现代科技条件下建设古籍修复工作环境

古籍修复技术汲取现代科技成果,是当代古籍修复事业的必然趋势。机械化、智能化修复设备逐步出现在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环境中,打破了纯手工操作的古籍修复格局。古籍修复逐步从单一实践经验积累向科学定量定性分析转变,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科学理论使传统的古籍修复工艺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科学的古籍修复工作区域可分为涉水区、检测区、纸库、建档区、修复区等五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区域。这五个区域的分割也预示着古籍修复技术的发展将会朝着这五个方面突破。

(一)涉水区

涉水区的主要职能是清洗书页、调制糨糊、染纸以及蒸煮等。涉水区的设备主要有净水器、水槽、照明、排烟以及操作平台等部分组成。净水器在出水量和温度上有特殊要求,高于一般家用5升水的出水量需求,水温也要达到摄氏70℃至80℃。水槽一般至少需要两小一大。两个小的,一个接普通自来水,清洗修复器具等,一个接净水即打糨糊、补书、染纸用水。小水槽较深,类似家用水槽而略大一些。另一个大水槽浅而阔,水槽深度10至15厘米就够了,展开面要达到一米乘两米以上,大水槽是用来清洗书页,染纸。水槽的材料采用理化板制成,理化板防酸防碱。常用不锈钢金属材料不能作为水槽材料使用,因为金属遇碱产生金属离子,会损伤古籍。涉水区还要有操作平台,用于烧开水、蒸书、调制糨糊、调制染色水等。在整个涉水区上方还要建一个照明和排烟系统,以方便古籍修复过程中对于照明和通风的需求。

涉水区域的研究方向在洗书染纸、调制糨糊的研究。关于染补纸,修复专家们强调一定要用植物原料,同时哪些材料在染色后不会变色也在研究中。随着对修复用纸要求的不断提高,过去我们采用茶叶染色、国画颜料染色,现在在实际修复中都因出现问题而被停止使用。

(二)检测区

检测区的工作职能是监测古籍与补纸的纸张酸碱度,检测纸张色差、纸张厚度、纸张纤维等。检测区仪器设备,主要有白度仪、测厚仪、测酸仪、显微镜、电子秤等。白度仪用于检测文献书页色度,纸张色差,使补纸更接近文献。在没有白度仪之前,给古籍破损书页配纸,全靠目测,色差不可避免。测厚仪

测定文献书页与补纸的厚度,使补纸和破损书页纸张厚度配比一致,保持古籍在修复之后的平整,同时不改变古籍原本的厚薄。测酸仪不仅用于测定文献书页的酸碱度,更重要的是测定修复补纸的酸碱度,确保修复古籍的补纸质量。显微镜用于测定纸张纤维、分析纸张纤维,便于更加准确地判定纸张的种类及成份含量(通常指纸张的竹、皮、草等成分的含量),有利于配纸,同时将含有木浆等不能使用的纸张排除在外。电子秤要求是高精度的,用于称量碱、木瓜蛋白酶等原料的含量。

检测区域的研究在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这也是目前我国古籍修复非常欠缺的方面,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人员。

(三)纸库

纸库的建设主要是指修补古籍专用的手工纸的收集建库。古籍修复中使用的补纸是无酸古法手工纸。首先它的造纸原材料必须是纯天然植物原料,无论竹纸、皮纸、绵纸等,都不可添加任何化学成分;其次,在制作工艺上要求全程采用传统古法手工制作,工艺程序复杂,制作过程耗时。因此,真正合格的古籍修复补纸在市场上很难买到,通常都是国家修复单位定点在几家古法手工造纸作坊内生产。现在这种传统手工造纸作坊在全国都很少,有的作坊在制作工艺上、原材料上有偷工减料、参入木浆等不符合要求的做法,导致纸张不能使用。现在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修复用手工纸生产状况都存在着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产销脱节和技艺后继无人等问题。为保证古籍修复用纸的质量和数量,尽量满足有纸可用,有纸可选,在古籍修复工作空间内,制定修复用纸标准,建立纸库变得尤为重要。修补书页需要各种不同的皮纸、绵纸、竹纸、宣纸等,修补封面、书套等还需要不同的锦缎、卡纸等。在纸库中,除了制作各种规格的纸柜,收集尽量多品种的修复补纸,还要给这些纸按格编号,分类摆放,并建立纸张数据库,按需采购,科学领用。

纸库方向的研究是传统手工纸及手工造纸工艺等的研究,我国已经陆续有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有关于传统手工造纸的保护与研究项目在进行。

(四)建档区

建档区的工作是对古籍修复全过程的记录。这个区域内需要的设备主要有相机、高清扫描仪、拍摄架、电脑等。古籍修复建档是对古籍修复前及修复后作完整的记录,用相机或扫描仪对修复前和修复后的古籍逐页拍照或扫描,包括古籍纸张显微照片,

为古籍建立完整的修复前后的资料档案。档案内容还包括古籍使用的纸张、页数、破损情况、装订位置、修复方案、实际修复方法、修复效果等。在破损情况一栏中,要把每个破洞的位置、大小都一一写明。在实际修复方法栏中要把具体修复步骤、修复细节详细写明。古籍修复档案为制订古籍修复方案的依据,方便修前修后对比研究,还为将来该古籍的研究与再修复留下宝贵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建档区是系统梳理古籍修复技术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这个区域可以为古籍修复的理论工作搭建平台。

(五) 修复区

修复区完成古籍修复的大部分工作,包括拆书补页、喷潮压平、锤书、压书、装订等等。修复区的主要设备有修复台、补书板、修复灯、压书机、纸浆补书机等,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大量修复工具。修复区的空间大小决定了修复台的放置数量。修复区除了设备到位,空间足够大也是必须的,平均一位修复人员一张修复台,台面上除了有足够大的修书区域,还要能摆放下修复人员的常用工具,这是基本要求。

修复区内对修复台的要求在前面提到过了,这

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修复灯和补书板是比较重要的设备。古籍修复耗费眼睛,补书板、修复灯这类照明工具,应尽量采购质量过关,有利于保护眼睛的设备。

现在,修复区的大型现代化设备逐渐在增加,如大型修复台、纸浆补书机、除酸仪等等,这些设备有优势,但价格高、使用成本大,还有如何正确使用,使用后效果如何等等,都存在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许多设备对场地的要求较高,要求操作者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而且仪器的正常运行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以及专业规范的管理。

三、结束语

古籍修复实验平台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在古籍修复工作环境中,先进技术和科学理论应用于古籍修复实践是推动修复技术革新的重要手段。传统修复技艺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二者互相融合、协调并进才是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 许峻)

On Work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s Repairing

LI Ai - hong

(Institute of Art and Design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s repairing work environment can be realized from two aspects: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repair techniques and utiliz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rafts, the explicit knowledge of the traditional repair techniques is concluded, the tacit knowledge of the repair techniques is excavated, and the results of practice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form a complete technology knowledg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dern technology and 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the intrinsic principle of the traditional craft to develop and innovate repair technology, and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ancient books repair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traditional repair equipment; modern repair equipment; ancient books repairing work environment

报业数字化转型的生态位陷阱及其优化

陈艳红

(安阳广播电视台编辑部,河南 安阳 455004)

摘要:以商业生态系统和企业生态位理论观察可以发现,20余年间,互联网企业先后建成了信息门户平台、在线交易平台、自媒体平台和APP平台,成为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型企业,而报纸更多地关注渠道延伸和内容生产整合,使自己落入缝隙型企业陷阱,从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失利。要克服逐渐被边缘化的状态,报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建成海量信息传播平台、公民内容自生产平台和在线服务平台,建成若干个网络核心型企业。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商业生态系统;企业生态位置;平台型媒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2

中图分类号:G219;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01-04

面对互联网对市场的全方位蚕食和加速度冲击,报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步伐。但是截至目前,报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经典案例几乎没有,在国内还未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融合模式或方向。^[1]在国外,即使《纽约时报》这样质量精良有口皆碑的报纸,从付费墙到付费门2.0,将数字化转型视为重要战略决策,依然未能取得类似报纸那样的辉煌。普遍的观点认为报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认知不够准确。张德君等^[2]认为,报纸缺乏互联网基因,传统媒体是单向的你说我看,互联网强调的是开放分享、以用户为中心;陈力丹^[3]认为,报纸缺少互联网思维,例如即时传播、海量传播、平等和互动交流、用户体验等等;喻国明^[4]认为,报纸不理解互联网逻辑,即互联网的“关联”与“开放”优势。这些观点看到了矛盾所在,但是缺少明确的理论边界,因而无法给报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设定清晰的策略。例如,许多报纸已经开通了新闻网站、网络论坛、微博微信,开放互动、即时传播、海量信息等特征都已经基本具备,可是传播效果并不好,学者们就只能建议他们更开放、更互动。因此,分析报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必须找到更准确的理论视角,以审视其在整个互联网产业中的角色,才能找出对策。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和企业生态位理论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手段。以

此观察可以发现,报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没有达到期望值,原因可能在于这种转型建构的多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缝隙企业,因而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境界。

一、商业生态系统与企业的生态位置

1. 商业生态系统及其优势

数字网络技术和资本市场创新使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决定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由企业之内转向企业之间,如何合理创建和利用企业联盟和网络组织,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的基本因素。1993年詹姆斯·穆尔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概念。他认为,企业制订战略时需要把自己视为跨行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单个产业中的成员。商业生态系统是由相互支持的组织构成的延伸的系统,是消费者、供应商、主要生产者、其他风险承担者、金融机构、贸易团体、工会、政府以及类似政府的组织的集合。

相对于标准型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具有发展的超循环性和抵御风险的稳定性等优势,因为它是借助自组织、涌现和协同进化来获得适应性并实现发展的。自组织是指系统子要素能够自我催化,要素之间的功能耦合能够形成推动系统发展的超循环动力体系。涌现是指系统能够创造出众多的细分市场

收稿日期:2017-01-05

作者简介:陈艳红(1976—),女,河南清丰人,硕士,《安阳广播电视台》编辑部记者,主要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场,供各种企业采用差异化定位的原则进驻,形成众多的商业机遇。协同进化是指系统成员分工合作,可为目标顾客提供更多价值创新,并根据环境变化自我调整和自我优化。因此,基于生态系统的战略不仅使公司自身得利,而且将使所有系统成员共同受益,从而形成商业上的良性循环,使公司得以持续发展。^[5]

2. 企业生态位置与其发展境界

商业生态系统建立在企业生态位分离的原则上,即不同的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占据不同的资源空间而避免生态位重叠引发的恶性竞争。企业生态位是指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特定角色及其对生态系统整体特性的影响。据此,扬西蒂和莱维恩将企业分为网络核心型、支配主宰型和缝隙型三类。^[6]网络核心型企业的主要职能是搭建系统所需的低成本资源平台,进而塑造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绩效。例如微软对其他软件系统的开放,共同构成了电脑视窗系统,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操作系统供应商。支配主宰型企业是指直接占有系统大部分资产,为系统提供有限价值却拼命榨取系统价值的企业,由于留下的价值空间太小,系统无法健康运转而趋于崩溃。安然公司是研究主宰型企业常用的案例。缝隙型企业是指系统中以专业化姿态占据狭窄的细分市场,提供多样化产品的企业。沃尔玛就是利用其善于收集消费者信息的优势,在分散的供应商网络中调配资产,从而变成了由成千上万个缝隙型企业组成的巨型企业。缝隙型企业承担了系统大部分价值创造和创新职能,是系统活力的保证。

企业生态位置与企业规模、影响力与利润率没有必然联系,如海尔利用国美、苏宁的营销平台,在该系统中就属于缝隙型企业。但是一般而言,企业生态位置决定了企业发展境界,从许多方面来说,骨干企业都处于有利地位。^[7]而缝隙型企业多由中小公司构成,在沃尔玛开一家服装店仅仅是 App Store 中的一个客户端,不可能拥有与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同样的影响力。

二、报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态位陷阱

以商业生态系统和企业生态位理论观察 20 余年报业与互联网关系史可以发现,报纸作为最早拥抱互联网和报道互联网成长的行业,却一路跌入泥淖,原因在于报纸固执地坚守内容为王和以我为主,同时受到资金、体制的限制,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占据网络核心型企业的位置,最终落入了夹缝中生存的窘境。

1. 门户网站建立的信息服务平台消解了报纸的内容优势

1994 年 4 月,中国与国际 64K Internet 信道接通,成为第 77 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早期的科技精英们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首先产生广泛影响的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类似于“厚报”,策略是通过提供用户所需要的各类内容以积累流量。如“全球最大华人网站”新浪网与国内外近 300 家媒体签订了内容转载协议,翻译外电以跟踪国际时事,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进行直播。其栏目达到 168 个,提供科技、文娱直至星座信息以满足用户需要,并建立了人气最旺的聊天室。门户网站利用了互联网最基本的竞争优势——海量信息与即时传播,建成了超越城市空间的巨型“都市信息文摘平台”。

报纸是最早进入互联网的行业之一。从 1995 年 10 月《中国贸易报》(电子版)开播到 1999 年底,全国建立独立域名的新闻单位已有 700 多家,但是报纸的内容优势却在逐渐削弱:首先,在新浪与报社广签内容转载协议谋求建设全球最大华人网站时,报纸网站却满足于上传自己的稿件而没有集纳全国新闻资源的意志。在新浪网每天可以上传千余条全球信息的时候,普通报纸网站每天只有百余条局限于当地的新闻可看,境界差别一望而知。其次,当新浪 BBS 论坛积累高黏度用户、网易邮箱成为用户必备品、搜狐网络游戏培养忠实粉丝的时候,报纸网站坚持“内容为王”缺少其他项目支持,以至于 2005 年面对报业“寒冬”,吴海民慨叹:“在新兴媒体面前,所有报纸都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孤单。”^[8]

2. 电子商务和垂直营销平台的崛起消解了报纸的广告经营

从互联网对报纸经营的影响来考察,笔者认为 2003 年阿里巴巴的崛起具有标志性意义。2003 年“非典”之前,阿里巴巴每天的商业机会规模保持在 3000 条左右,而“非典”期间最高达到了 15000 条。当年 7 月,阿里巴巴投资创建了淘宝网,由支付宝提供便捷交易,用诚信通保护其可靠性,用物流系统提供运输保障。到 2008 年,阿里巴巴 B2B 电子商务平台有 800 万注册企业,支付宝拥有 1.5 亿注册用户,淘宝网交易总额 413 亿元。此间,当当网等开拓了网上书店业务,京东商城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企业,旅游、求职、家政等商品与服务交易也被专业的网站纵向整合。

网络营销平台的发展消解了报纸的二次销售模式。二次销售模式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即公众无法便捷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新闻信息,必须由

专业的媒体组织来收集提供;企业无法找到经济有效的顾客接触点,只有通过广告取得顾客的认知。前者保证其可以大量收割受众,后者保证其受广告商的依赖。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瓦解了企业无法大规模接触顾客的假定,并且通过展示、支付和物流系统,节约了企业的顾客接触成本,提高了消费者从认知到消费的转化效率,报纸广告丧失了竞争优势。

多数报人并未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把2005年的“报业寒冬”视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把2009年的经营下滑视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承认报纸需要数字化转型,但是着重推进的是报网互动、数字报纸和媒介融合。在网络交易平台切割报纸财源时,报人们忙碌的却是内容生产机制的内部整合和调整。

3. 社交媒体、移动互联和在线营销平台对报业的全方位蚕食

虽然之前有博客存在,但2010年微博的出现,才标志着公民内容生产潜力的彻底激活,140字之内的篇幅,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互相关注、@功能的设置,使得网络社交便捷快速。微信平台更是借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占据了竞争的新高地。2016年初,腾讯微信用户活跃近7亿。天涯社区和猫扑论坛等发展成熟,开心网等成为高级白领的社交平台,它们的发展使得个人增强了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

经营上,电子商务体系发展成熟。各类在线营销平台占领了细分市场:乐淘网是鞋类产品交易平台,蘑菇街以时尚用品交易为核心,小米直接以粉丝经济模式开拓市场。BAT开始了对传统产业的全面渗透:百度投资了去哪儿网、百度房产和百度教育等;阿里巴巴推出了余额宝、快车打车,创建了天猫商城与聚美汇网站;腾讯投资了嘀嘀打车、开发了财富通。“互联网+”模式的繁荣,病毒式营销的流行,全面侵蚀了报纸财源。

2010年,3G网络的开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移动互联网走入普通人的生活。2013年12月,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5亿,超过了宽带上网用户,移动互联网蚕食了报纸发行的最后庇护所。以往网络虽然占尽了优势,但是网民不能抱着电脑随时随地上网,报纸还有移动空间得以喘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实现了网络设备便携化,占据了地铁等移动空间,扯下了报纸最后一块“遮羞布”。

互联网对报业市场的全面侵蚀,逼促报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但是多数报纸依然走着“填空式”路线,陷于左支右绌的状态。内容方面,有了微博就开

设官微,客户端盛行时就开发新闻客户端,但是逐渐淹没在网民自生产的信息海洋中;经营方面,广告断崖式下滑,2015年下滑35.4%,发行量下跌严重,2014年全国报纸印刷用纸量比2013年减少了近1/4,2015年则比2014年下降了18%。

总而言之,20余年来,在新兴互联网企业先后建立新闻信息、电子商务、网络论坛及自媒体平台,成为不可取代的网络核心型企业时,报纸却始终徘徊在内部调整、外部填空的发展状态,而这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的发展差距。

三、报业数字化转型的生态位优化

1. 提供低成本运作平台

报纸数字化转型若想改变边缘化状态,必须在互联网系统中有若干个核心企业,通过向客户提供低成本运作平台创造生态价值和缝隙机遇,以塑造整个信息传播环境并提高商业交易绩效。这些平台可大可小,可以在不同领域,以人的社会关系和企业的关联范围来构造。依据成功互联网企业的经验,网络核心型企业需要着力打造三个平台:

一是富含海量信息的新闻平台。调查显示,与纸媒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三种移动媒介终端接触行为(线上阅读报纸杂志、线上社会交往、线上浏览新闻等资讯)在“时间—空间—关系—伴随活动”四个维度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特别是线上社交和线上浏览新闻。^[9]滋养网站多年之后,报纸需要借此优势抱团取暖,联合建设全国性信息平台,集纳加盟报纸的内容,创建链接加盟报刊的网址导航,并根据新闻热点推荐所在地区报纸网站和新闻客户端。在此基础上,研发关联产品以积聚流量。

二是公众内容生产的开放平台。报纸需要尝试开设、收购或者联姻如新浪微博、天涯社区之类的平台,供网民进行社交、表达意见。党报可利用在党政领导和高端人士中的影响力,设立如Linked In之类的高端社交平台,供其交流信息、开展交易;也可面向大众设立网络问政平台,降低其办事成本。都市报纸则可设置或利用专业的自媒体服务系统,让所有的个人在上面找到自己的通道,找到能够激发自己活力的资源。^[10]

三是连接线上线下的服务平台。在前两个平台收获流量的基础上,报纸需要借助自身公信力和影响力,以及发行打造的客户接触网络,建设连接线上线下的服务平台。党报网站可探索链接各行政部门的在线行政服务系统,解决普通网民的具体问题;其他报纸网站则可以依托经营活动的影响力,设置在线交易监测系统,在房产、汽车、驾考等诸多领域提

供信息服务和公共监测。

2. 实现报业数字化转型

一是要充分认识技术和渠道价值。由于印刷技术长期领先于其他传播手段且技术高度同质,使得报人们在讲述“内容为王”时忽视了背后的支撑系统,^[11]忽视了技术和渠道的价值,后果则是报纸在以技术驱动为先决条件的新媒体发展过程中丧失了产品创新能力,例如汉字输入、BBS论坛、搜索引擎、微博微信、在线支付等,全由技术公司研发。报纸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充实技术人员或购买技术公司,特别需要理解技术发展逻辑,找准市场需求并供给创新产品。

二是改革报纸的经营管理体制。报纸建设数字化平台,需要巨额投资,面临很多风险,首先需要形成良好的投融资机制,既能够募集资金,又能找到良好项目,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上市后创建“传媒梦工场”,孵化新媒体项目;^[12]其次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技术公司常用的项目招标和团队负责制,成功者获得市场红利,失败者承担约定损失,目标是赋予报业数字化转型以持续的动力。

三是要抓住生态系统的空隙。虽然互联网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维度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系统恰恰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关联空隙和关联障碍,影响着用户体验。报人们需要以精准的眼光辨别这些空隙和障碍,将之视为发展机遇。如大数据挑战了公众隐私,如果报业集团收购技术公司研制无痕浏览或者信息锁定技术,将能获得市场欢迎;专业报纸利用行业中积聚的资源,建设专业会员平台,拥有特别的优势。“专业媒体人+精明企业家”^[13]是抓住互联网生态空隙必备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胡正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关键与路径[J].新闻与写作,2015(5).
- [2]张德君,张宇宜.从“全媒体元年”看浙报集团全媒体转型实践[J].传媒,2013(3).
- [3]陈力丹.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介融合[J].当代传播,2014(6).
- [4]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兼论“平台型媒体”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5(2).
- [5]黎群.企业战略管理教程[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60.
- [6][美]扬西蒂,莱维恩.共赢:商业生态系统对企业战略、创新和可持续性的影响[M].王凤彬,王保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9.
- [7][美]扬西蒂,莱维恩.制订战略:从商业生态系统出发[J].商业评论,2004(4).
- [8]吴海民.媒体变局:谁动了报业的蛋糕?[J].中国报业,2005(11).
- [9]何其聪,喻国明.移动传播时代:纸媒二次崛起的机遇[J].出版发行研究,2015(7).
- [10]喻国明,焦建,张鑫.“平台型媒介”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
- [11]董开栋,谢金文.“内容为王”的历史语境与认识误区[J].编辑之友,2015(8).
- [12]张晓燕.5年投入20亿实施全媒体转型:浙报集团发布全媒体行动计划暨“传媒梦工场”挂牌[J].中国报业,2011(11).
- [13]张志安.理念比机制更重要[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11-06(21).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Ecological Niche Trap and its Optimization of Pres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HEN Yan - 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Any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Anyang Henan 455004, China)

Abstract: Observating the commercial enterprise eco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location theory, we can find that the internet company has successively built information portal platform, online trading platform, the self-media platform and APP platform in more than 20 years and has become the core enterprise in the internet ecosystem, but the newspap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hannels and the content integration, which make themselves fall into the gap trap type enterprise and lead to the failur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overcome gradually marginalized status, the pres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eds to build hu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citizens content self-production platform and online service platform, and a number of network core enterprise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siness ecosystem; enterprise ecological position; platform type media

改写理论三要素对翻译的影响

——以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为例

张白桦, 胡雅洁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20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开始“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中心从语言层面开始转向文化层面。美国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三要素的操纵。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倡导翻译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从改写理论三要素入手,以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中的翻译活动,探讨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三要素对其翻译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林语堂;《浮生六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3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05-04

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将重点放在了语言层面上,而文化学派则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西方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w Lefevere, 1945—1996)是美国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家,他提出了对西方翻译研究有重大意义的改写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改写。他认为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1]51}《浮生六记》是由清朝作家沈复所著的自传体散文,后由我国现代翻译家林语堂所英译。近年来,国内对《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从语言层面论述的较多,但从文化视角用改写理论分析的相对较少。中国知网关于改写理论视角下研究《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的文章有26篇,万方数据库中仅有8篇。文章拟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依据,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进行探讨。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主要含义有二:其一是指构成经济或政治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观念和理论;其二是体现某一团体、社会阶级或个人的思维特点或方式。^{[2]425}翻译作为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活动,译者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社会阶级或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了译者文本的选择和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影响了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和其中语言问题的处理办法。一部翻译作品如果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将会顺利地译入语文化所接受,反之则难以传播甚至被禁。下面我们从社会意识形态与个人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来分析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的操纵。

(一) 社会意识形态

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取决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特定的时期有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应的,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

收稿日期:2016-12-10

作者简介:张白桦(1963—),女,辽宁沈阳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译介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济情况。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也受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遭遇了历史上最深刻、破坏性最大的危机,经济的大萧条使人们在精神上也遭到了重大打击,精神上的慰藉与灵魂的解脱成为了当时人们普遍的追求。另外,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西方人脑海中的中国人愚昧、无知、肤浅、粗鄙,对中国人的本性与中国文化的精髓存在很大的误解与隔阂。

面对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与歧视,林语堂试图通过翻译《浮生六记》这部讲述一对中国夫妇恬淡淳朴生活的作品,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人真实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林语堂在《浮生六记》的译者序中写道:“读沈复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幸福的秘诀,这胜过所有肉体上的痛苦和实际的困难。”^{[3]XIV}可见他选择翻译《浮生六记》也是为了给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经受磨难与心灵压抑的西方人一剂解药。

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隔膜颇深,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意在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文化,因此他采取了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使得译作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又容易被西方读者所理解与接受。例如:

原文: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4]2}

译文:I was born in 1763…^{[3]3}

原文中“乾隆癸未”为中国古代编年法,如果直译必然会引起西方读者的困惑,造成理解困难。为了使西方读者更易于理解与接受,林语堂在此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换算为1763年,这样西方读者对于年份的理解就不存在问题了。

原文:彼非作《琵琶行》者耶?^{[4]22}

译文:Isn't he the one who wrote the poem on *The P' iP' a Player*?^{[3]23}

这里林语堂将原文中的“《琵琶行》”译为“*The P' iP' a Player*”,并没有将“琵琶”译为“lute”等其他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形式,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中国的文化特色,目的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西方读者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二) 个人意识形态

翻译活动不仅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对他翻译作品也产生影响。由于成长背景、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等因素的不同,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喜好,因此也就形成了

不同的自身意识形态。

林语堂曾经为自己作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5]27}林语堂自幼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因此林语堂从小就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受到过多年良好的西方教育。1919年林语堂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系,1922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林语堂又在美国生活多年。西方文化已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然而作为中国人,他对东方文化也是十分热爱并引以为豪,因此他自称“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之所以选择翻译《浮生六记》很显然是受到其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林语堂认为在五四之前,中国近代具有文学性质的小品文中可以向西方国家介绍的只有《幽梦影》与《浮生六记》。在他为《浮生六记》写的译者序中,字里行间也毫不掩饰对沈复夫妇生活的赞美与向往,这正是他自身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他翻译活动的体现。

二、诗学观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由两部分组成:文学要素,包括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功能要素,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424}其中功能要素对译者选择的文学主题十分重要,译者选择的主题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诗学观,作品才会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被译入语国家所重视。然而特定的社会时期有着特定的诗学观,社会体制决定了特定时期的主流诗学观,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改写必然会受到目的语国家主流诗学的影响,故而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增减。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西方经济受到了重创,兴起了“西方衰落”的思潮。20世纪30年代起,现实主义成为当时的主流诗学观,人们开始关注现实生活。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严重衰落,导致人们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西方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关注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求解脱。《浮生六记》正是一部描写中国寻常夫妇生活的自传体散文,这部作品表达出来的怡然自得、安逸闲适的生活方式与态度正是当时西方人所追求的理想主题和文学样式,因此林语堂选择这部作品符合了其所处时期的主流诗学观。为了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接受,使译本顺畅地流传开来,林语堂秉着“忠实、

通顺、美”的翻译标准,也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例如:

原文:……即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4]324}

译文:…, which Laotzu passed through on the back of a black cow when he was retiring from the world. ^{[3]325}

译文中林语堂在最后增译了一句“retiring from the world”,向读者交代了当时的背景,这样的文学样式就会使目标语读者容易理解,也符合了他的翻译标准与当时的主流诗学观。

原文: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4]230}

译文:On the south of the bridge there was the Lotus - Seed Temple, with a Tibetan pagoda rising straight up from its midst and its golden dome rising into the clouds, with the terracotta walls and temple roofs nestling under the kind shade of pine - trees and cypresses and the sounds of temple bells and ch'ing [musical stone] coming to the traveler's ears intermittently—all combining to achieve a unique effect that could not be duplicated in any other pleasure garden of the world. ^{[3]231}

原文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莲心寺的美好景色,林语堂将原文的两句话合并为一个长句,形成了一个紧凑而又清晰的结构,形象生动地将莲心寺的景象呈现给西方读者。这种中国的美好景象能够为西方读者带来与众不同的美感,实现了文学的功能,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观。

三、赞助人

一部翻译作品的出版并不是译者的个人行为,其中会牵涉到一系列人或者机构,这些人和机构被勒菲弗尔称为赞助人。勒菲弗尔将赞助人定义为“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6]17}赞助人可以从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三个方面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赞助者既对翻译作品的出版有深远影响,也与译者翻译选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出版社与赛珍珠夫妇

是对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赞助人。

(一) 出版社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报刊杂志业不断繁盛,并在1935年达到巅峰,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注重对外国文化的译入,甚少有人将中国文学译出。就在此时,以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期刊《天下》创刊,林语堂被邀请为编辑之一。《天下》期刊以研究中西思想,翻译中文名著为宗旨,并且设立了“译文”专栏,大力将中国传统文学经典译出。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进行英译符合了该赞助人的意图,因此他的《浮生六记》英译本被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天下》月刊开创了将中国文学经典译出的先河,并取得了良好反响,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本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同,之后他又出版了《浮生六记》英汉对照单行本并作序,这些成果都是与赞助人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二) 赛珍珠夫妇

除了出版社之外,在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中,他的故友赛珍珠夫妇也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林语堂对于文本的选择与赛珍珠夫妇对他的建议和期待十分相关。林语堂与赛珍珠相识于1933年,林语堂向赛珍珠创办的杂志《亚洲》投稿,获得了赛珍珠的青睐,自此便结为好友。林语堂向赛珍珠夫妇表达了他想写一本关于他对中国真实感受的书的想法,赛珍珠则立即表示“你是唯一可以做这件事的人。”^{[3]14}自此便有了林语堂创作的《吾国与吾民》,之后赛珍珠的丈夫又让林语堂从该书中选取一章扩写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这便是后来的《生活的艺术》。赛珍珠夫妇与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上有着共同的观点,赛珍珠夫妇一手将林语堂捧成当时美国文坛的红人。赛珍珠夫妇作为赞助人,对林语堂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不可忽视。《浮生六记》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夫妇恬淡生活,表达中国人怡然自得的处世态度的作品,符合了赞助人的利益与意图,因此翻译该作品也得到了赞助人的支持。

四、结语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翻译研究从以往对文本的分析转向对文化层面的分析。本文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从改写理论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三方面入手,试图分析其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发展,从改写理论三要素视角来研究翻译会日益增多,本文仅以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

记》作为尝试,还存在有许多局限性与不足之处,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张白桦. 趣味英汉互译教程[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2]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 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9.

[4] 沈复. 浮生六记[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 林语堂. 林语堂自传[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
[6] Lefevere, Andrew.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Three Factors of Rewriting Theory'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ZHANG Bai - hua , HU Ya - ji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the “culture turn” has come into the field of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y. The center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has turned from language to culture. Andre Lefevere,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comparative literator and translator, puts forward the rewriting theory. In his opinion,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writing, and it is manipulated by three factors: ideology, poetic and patronage. Andre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advocates the “culture turn”, which provides a new sight of transl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factors of rewriting theory, and the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his translating activities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 on his translation.

Key words: Andrew Lefevere; rewriting theory; 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文化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解析

易明

(洛阳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之一,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桥梁。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制约。文章阐述了文化立场与译者主体性之间制约与依存的关系,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建立在译者、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基础上的,译者应该站在构建翻译生态系统平衡的立场上,正确理解作者和原文本,恰当处理源语言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关系,建立不同文化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文化;翻译;译者主体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4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09-04

一、引言

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活动中译者在尊重原文本的基础上而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为译者的文化意识、生活经历、审美标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西方,译者主体性经历了被忽视——被选择——被强调的过程;在中国,专家学者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有别于其主观性,前者的发挥融于制约与反制约的过程中,而后者的发挥涉及个人意愿的支配,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在翻译中,译者作用的客体是原作,译前工作需要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读原文,译中工作需要其充分的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实现译作与原作信息上的对等。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该在尊重原文本的基础上寻求与目标语相匹配的语言表达形式,这是作者因素与读者因素,甚至是作者、译者、读者彼此间时空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主体性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细节,小至对原文本的理解、阐释、语言再创作,大至翻译的目的、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本质上讲这也是译者语言素养、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的再现。

二、译者主体性在译者承担不同角色中的体现

译者的地域性特征、生活的经历、教育的背景、审美的标准、思维的方式、文化的内涵等因素都会影响译文的表达。从本质上讲,译者在翻译中要经历两个环节和三种角色转换,两个环节即理解和表达,三种角色转换即读者、阐释者和再创作者。

(一)译者主体性在译者承担“阐释者”角色中的体现

作为“阐释者”的译者需要具备鉴赏能力和批判能力,深层次挖掘和分析原文本的内涵、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一过程是在译者主体性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一角色的译者仍处于理解环节,但是属于深层次理解的阶段。在此过程中译者会发现多种矛盾和冲突,例如译者和作者、源语言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不断深化导致译者在阐释过程中很自然地侵入原文本,坚实了建立源语言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共生关系的基础。

(二)译者主体性在译者承担“读者”角色中的体现

作为“读者”的译者首先要阅读和理解原文本,这是翻译的第一步。此阶段译者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来阅读和理解原文本的,本能占有较大的比例。在

收稿日期:2016-12-05

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文化接近视角下河南省旅游外宣英语策略研究”(142400410460)

作者简介:易明(1975—),女,河南洛阳人,硕士,洛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这一角色中,译者处于理解的环节,并体现了对原文本的信赖,即认为原文本是言之有物、有意义的。既然是所谓“读者”的角色,译者这一行为的目的便是对原文本进行认知,涉足其中的文化、语言和思维方式,然后将认知行为的结果或结论作为存在的意识形态,为翻译活动打下基础。

(三)译者主体性在译者承担“再创作者”角色中的体现

作为“再创作者”的译者不仅需要表达原文本的基本信息,还要传达其内涵、文化和思想。在此阶段,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处于高潮。这一角色的译者处于表达的环节,实施吸收原文本意义和精神的的行为,也就是将“入侵”的成果加以“吸收”,寻求最为恰当、最为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客观、准确、形象地传达原文本思想和意义,传递原文本自身外现的和隐含的信息。但是作为原文本的再创作者,译者必然会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容易造成“一边倒”的局面,导致译文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处理源语言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关系,恢复译入语的本来面目。

三、文化立场与译者主体性

(一)文化立场是译者在翻译中的限制因子

作者、译者、译入语读者和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他们共同构建了系统的稳定和平衡。这些翻译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地域性、文化立场等都属于翻译生态因子的范畴,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的文化立场在实现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作为翻译主体生态系统中的限制因子。不同的文化立场使得译者在翻译中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站在源语言文化的立场上,译者会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站在译入语文化的立场上,译者会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站在源语言与译入语文化交流的立场上,译者会避免绝对的异化和归化;站在翻译研究者的立场上,译者会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采用合理的翻译方法处理译文。例如:扁鹊: *Bianque, a famous physician in ancient China*, 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同时又对其作出了解释,这样译入语读者就能知道扁鹊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名医。再如:

1. Everybody said how well the new secretary was doing, but old Mr. Carr said shortly, “Yes. New brooms sweep clean.”

译文:每个人都说新上任的秘书做得好,但是卡

尔老先生却慢悠悠地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评价:原文本中的 *new brooms sweep clean*, 在字面上表达的意思是“新的扫把扫地干净”,这跟咱们汉语中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具有相同的意思,用来表达“新上任的人做得好”。译者舍弃了原文本的意象,采用了归化翻译法,是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的取向。

2. 三十多年前,有两位中年教师在一所美术学院教作品欣赏课。其中一位教西方画欣赏课,姓吕,他本人装扮得也很有“西方风度”,整天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另一位是……

译文一: One of them, whose surname was Lü, taught appreciation of western art, had a western air about him——always wearing a well - pressed western suit and shiny leather shoes.

译文二: The former, named Lü, was dressed in western style with neat suit and smart shoes.

评价:译文一注重字字对应,译文二遵循翻译的目的,讲求文化的交流。原文本的读者是中国人,文中有“西方风度”“西装”这样的字眼,但是译入语读者应该是西方人,像“西装”这样的词对于西方人而言,实际上就是他们日常所穿的衣服,直接将其译为“suit”即可。在这一例子中,译文一的译者站在了源语言文化的立场上,导致译文显得啰嗦、累赘,译文二站在了源语言与译入语文化交流的立场上,很好地传递了原文本的信息。

(二)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立场制约下的灵活运用

1. 译者主体性的地位的重要性

“走向译者”的口号是由法国学者贝尔曼提出的,并且他认为,译者应该从主体的地位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翻译批评。而作为操纵学派,他们指出,译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的时候,对文本进行抉择和摆布的过程,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而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译者在抉择和摆布原文的过程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他们也强调译者存在的重要性。周文革、刘平推崇“互文性”理论,他们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应该定位在读者——阐释者——作者,这三个层面上。原文是一个前文本,而翻译后就是这个前文本的生成文本,这是由“互文性”理论得出的结论。刘弘玮认为,大多数的翻译者为了能够让译文真实地反映原文想要表达的思想,就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提升自身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能力。而这个主体性是客观地存在于翻译的全部过程中的。万莉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要尊重原

文和作者,然后译者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动摇。以上的这些观点能够体现出译者主导地位是存在于翻译活动中的。

2.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译者只有站在全球高度,把自己当作全球文化的主人公,关注翻译的无机环境——某种语言材料,才能将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出来,并且关注相关的制度文化、自然生态环境、行为文化或者特定的观念文化,并让多样性的语言保持健康和活力,形成生态形式,还要关照主体间的个体。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对翻译标准的界定和对原文本的选取,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不是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符合作者、作品和译入语读者意愿的基础上,把翻译研究者的原则和理论作为标准,充分考虑主体间性,即译者、作者、译入语读者和翻译研究者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理解并融合、相互平等、平等对话、双向互动的交往关系和特点。译者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要把文化差异作为存在性的基础,把文化交流和传递作为目的,把等值地传递信息作为原则,这才是翻译主体的核心所在。另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善于合理处理各种对立和矛盾,比如归化和差异、形式和内容、译者和其他的翻译者、源语言意象和译入语文化等等,充分有效地发挥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活动中,一方面译者应该承认原文本存在的客观性,在翻译目的的基础上,忠实于原文本,充分运用自身的综合知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译者主观的猜测和判断,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一些制约,这些制约来自于不同的因素。

例如:

1. She is as virtuous as she is pretty. I esteem her for her good sense, as much as I admire her for her good looks.

译文一:她的正直不下于她的漂亮。我尊重她的品格不下于我赞美她的容貌。

译文二:这个人不但非常漂亮,而且极有修养。我敬重她,不但是因为她的美貌,更是因为她内心品格的高尚。

评价:从以上两个译文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都是正确的,但是从翻译风格而言,体现了两位译者的表达习惯。前者关注的是译文与原文结构上的一致性,是原文文本取向的翻译方法。后者对原文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得译文更加通

顺、流畅,语言表达上符合译入语习惯,是地道的表达,体现了译者作为创作者的角色,是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的取向。

2. 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火烛都砸了的也有。

译文一:Some widows sob and shout when they remarry; Some threaten to kill themselves; Some refuse to bow to heaven and earth after they have been carried to the man's house; Some smash the wedding candlesticks.

译文二:Some widows sob and shout when they are forced to remarry; Some threaten to kill themselves; Some refuse to go through with the wedding ceremony after they have been carried to the man's house; Some even smash wedding candlesticks.

评价:原文本是关于寡妇再出嫁的细节描述。涉及到“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译文一将其译为“Some widows sob and shout when they remarry”,没有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传递出来,译入语读者无法明白“寡妇改嫁为什么要哭喊”,甚至要“寻死觅活”“拜不成天地”“砸火烛”。译文二将其译为“Some widows sob and shout when they are forced to remarry”,与译文一相比,增加了“are forced to”,这样译入语读者就能解读出寡妇再出嫁的种种表现的原因——被人强迫出嫁,进而理解这些令人费解的行为。另外,关于“拜不成天地”的翻译,译文一将其译为“refuse to bow to heaven and earth”,但是由于“拜天地”是中国婚俗文化所特有的,译入语读者难以将结婚与天地联系起来。译文二将其译为“refuse to go through with the wedding ceremony”,这样译入语读者就能明白其中的涵义。此处,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舍弃了原文的意象,按照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的取向处理译文,使意义明确,实现了文化信息的等值有效传递。

四、结语

翻译是建立在多重因素互动基础上的一种认知活动。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了文化立场的客观制约,以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为导向。文化立场制约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但也有利于阻止译者主观性的滋长,使得译者在翻译中能够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翻译活动,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来搭建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译者必须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宏观把握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正确理解源语言作者和作品,合理有效地处

理好源语言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与原作达成共识,为读者展现一个地道的世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现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参考文献:

- [1] 万莉. 译者主体性论析: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到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60-261.
- [2] 朱月娥. 翻译主体生态系统中的译者主体性[J]. 中国科技翻译,2010,23(1):55-58.
- [3] 陈文伯. 译艺:英汉汉英双向笔译[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43.

- [4] 吕俊,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40.
- [5] 张春柏.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20.
- [6] 刘弘玮. 从译者主体性看翻译忠实标准[J]. 江西社会科学,2010(11):208-211.
- [7] 柳晓辉. 译者主体性的语言哲学反思[J]. 外语学刊,2010(4):122-125.
- [8] 周文革,刘平. 互文性视角下译者主体性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25(2):111-11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Analysis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YI 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or is one of the subjects in translation, and plays the role of bridge for transmitt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 inform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translation. However, it is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following paper states the restriction - 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t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translators fulfill the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ranslator, the writer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And the translators should be in the posi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balance of translation ecosystem, try to understand the writer and the original text,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ext, to establish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文化语境视角下的期刊论文摘要英译研究

孙海燕

(广东白云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450)

摘要:以期刊论文摘要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中英期刊论文摘要的规范与内容的差异,结合文化语境相关理论,探讨了期刊论文摘要英译的翻译策略和注意事项,提出期刊论文摘要英译应认清翻译目的与读者对象,结合目标语言文化语境,采取归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国际交流,达到摘要英译的目的。

关键词:期刊论文;摘要研究;文化语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13-03

论文摘要是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深,我国已有许多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逐渐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重视。当前,各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无疑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方便快捷的学术交流场所和方式,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资源的多样化和获取途径的便捷性,都使得这种交流更为国际化。中国的学术论文如果想得到国际关注和认同,使用通用的语言和规范的方式进行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国际上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一般为英语,而快速了解一篇学术论文,阅读其摘要主要的着眼点,国外同行或者是学术领域的专家们通过阅读论文的英文摘要才能够对文章的研究内容有所了解,才能对文章的价值和质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判断,因此,国内学术期刊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与其中文摘要有着一样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英文摘要,学术论文走出去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英文摘要是学术论文国际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论文摘要是学术期刊质量的一个晴雨表,而其英文摘要则是国内学术走向国际的主要途径。

一、国内外论学期刊摘要规范的差异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国际标准(ISO)214-1976(E)中对于论文摘要的定义为“对原文献内容

准确、扼要而不附加解释或评价的简略的表述”。其目的是使读者能够无需通读全文而快速地确定论文相关性及用于论文的计算机检索。论文摘要内容应该阐明该研究工作的首要目的、范围及写作范围;研究所用的技术手段或者方法;清晰表达研究结论与成果及在论文摘要中阐明成果蕴含的意义,特别要阐明这种意义是怎样与研究目的(即撰写论文摘要的目的)相联系的。而一些权威杂志对于投稿论文摘要的写作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如论文摘要应在250字之内,清楚阐释研究目的(purpose)、研究方法(methodology)、研究发现(findings)、研究的局限性(limit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以及论文的创新和价值(originality / value of the paper)。研究发现国际期刊的英文摘要在许多方面和国内期刊的中文摘要有着差异,主要体现在:1. 相比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更强调研究目的。2. 英文摘要的篇幅一般较中文摘要长,比较少见一两句话构成摘要的情况。3. 中文摘要很多时候对于研究背景及目的描述过于笼统和宏观,而英文摘要一般都更有针对性,描述也更简洁。4. 与中文摘要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不同,很多英文摘要在人称上使用第一人称。

在参考和遵循论文摘要国际规范的基础上,我们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论文摘要编写规范。在这一

收稿日期:2016-11-24

作者简介:孙海燕(1980—),女,吉林长春人,硕士,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

规范中对论文摘要撰写的各方面内容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其中规定了论文摘要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特别强调摘要应以概括论文内容为目的。摘要内容中不能包含论文作者对文摘内容的个人评论以及解释,应以较为简明的语言确切地记述文献的重要内容,要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对于文摘的人称明确规定要用第三人称来写。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版的多篇学术论文,总结出中文摘要的如下几个主要特点:1. 中文摘要以较为精准的语言表述,陈述力求做到客观理性。2. 中文摘要各个句子往往通过各种逻辑关系的表达构成段落,组成语篇,对全文进行概括。较少的内容往往可以表达较多的意思,有时候一个句子,一个短语都可能表述出论文的某一部分内容。3. 在句子结构方面,中文摘要中较多使用省略主语的无主句,并列句、四字词以及对仗风格的短语和句子使用较为频繁。

二、中英文论文摘要差异产生的原因

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语篇特征要结合语篇产生的情景语境来进行解释,而情景语境可看作文化语境中沧海一粟。所谓文化语境,即受社会结构制约的语言系统宏观环境。中文摘要所处文化语境应该为东方文化,英文摘要的文化语境可归为西方文化,正是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造成了中英文摘要差异:东方文化以“善”为本,而西方文化则以“真”文本;东方文化强调“和谐中庸”之道,而西方文化则更崇尚“个体”;东方文化更看重“群体关系”,而西方文化突出“个人取向”。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我们在很多论文摘要中可以看到,中文摘要的研究目的中往往更倾向以“群体本位”来概括和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英文摘要则更喜欢详细地罗列各家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做出个体肯定;在研究价值方面,中文摘要对于他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和缺憾之处往往会十分客气地指出,而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则十分谦虚地提及,努力做到顾及他人面子,通过弱化自己等方式来实现关系的和谐,而英文摘要在这一点上则明确和直接得多,作者对他人研究的不足往往明确指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毫不避讳,毫不谦虚;在表达对他人的批评时,中文作者往往通过先扬后抑的方式,先把他人的价值和成就热情洋溢地表扬一番,再提出一点点不同意见,而英文摘要的作者往往会对正面评价一笔带过,直接切入主题,进行个体批评。以上差异因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在阅读过程中会给读者带来不同感受,在《跨文化交际:语篇

分析法》一书中,作者认为东方人看重悠久持续统一的历史,而西方人眼中的历史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短期政治组织。基于这个原因,西方人讲话时总是力图尽快切入正题,而东方人则善于进行冗长、循序渐进的解释。不了解这些差异,在我们进行中文摘要英译时往往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三、论文摘要英译的策略及建议

了解了论文摘要的特点和重要性,我们可以认识到高质量的摘要对于学术论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是获得同行关注的一种途径,而国内论文的研究成果如果想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关注,那么一篇高质量的英文摘要是不可或缺的。目前中国期刊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论文的英文摘要只是简单地将其中文摘要进行了英语翻译,且不说译文质量有高有低,这种简单直白的翻译方式,并未以中英文摘要具有较大差异性为前提,因此也就不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中西文化语境不同所造成的读者反映不同等问题。如何更好地将高质量的国内学术期刊论文摘要转化为同样高质量的英文摘要,并使其传递出与中文摘要一样的信息与价值,是值得每一个论文撰写者和期刊编辑思考的问题。论文摘要翻译并不只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而是一个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充满各种能动选择的过程,不仅要考虑到汉英之间翻译的语言因素,更要考虑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自己在学报编辑部担任英文摘要编辑和英译工作所积累的实践经验,探讨在翻译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摘要时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并就翻译策略在一些具体层面上的处理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议。

首先,应明确论文摘要英译的目的,认识到东西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研究历史上,翻译策略的争论由来已久,而随着文化概念和因素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关于翻译的直译和意译之争,逐渐演变成了归化和异化之争。归化翻译即译文顺应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和习惯,达到译文通顺流畅的目的;而异化翻译则要考虑并保留原文中有别于译入语语言规范的他国特色、异域风情,所以对于译文读者可能会显得晦涩难懂。在期刊论文摘要的翻译过程中,尤其是社科类期刊论文的摘要英译,我们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这一介质,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如果异化翻译所得出的译文让不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及读者产生较大的阅读障碍,使他们因无法理解论文摘要,进而对文献敬而远之的话,那么摘要英译的预期目的即学术交流与传播的

目的就无法达到。因此考虑到文化语境差异,为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在摘要英译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

其次,要考虑到摘要英译的读者对象,翻译过程中应偏向译文读者,而非忠实于原文读者。期刊论文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摘要的英译,所面对的读者显然并非掌握英语的普通读者,而是在政治、文学、历史、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着对论文主题有相关研究的国外学者同行,他们期待阅读到的英译论文摘要,无论从选词、时态语态、句式、文体、语篇模式等各个方面都是他们所熟悉的英语论文摘要的模式。因此,在摘要英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对象的接受程度和语言习惯,才能更好地达到预期的交流效果。受中文摘要的影响,摘要的英译文往往会出现一篇摘要中出现多种时态,一句话中语态混用等情况,这些问题会给英文读者造成困惑或者误会,从而使得摘要内容在读者对象看来缺乏客观性和严谨性,无法达到与原文读者一样的传播和交流效果。因此在摘要英译过程中,时态的运用应以简练为佳,常用一般现在时及一般过去时,语态的运用要施动受动明确,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其他诸如介词的使用、词语的选择等也都应该尽量以译入语语言标准为参照,这样才能保证译文读者能够准确地获得和原文读者相同或者相近的学术信息。

最后,通过翻译单位的确定,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语篇差异问题。中文摘要以段落为主,但却不完全具备段落的结构特征,如主题句不明确、具有多重中心思想等。然而从篇章的角度看,摘要的各句之

间在语言形式上具有粘连性(cohesion),各句子表达的概念或命题之间在语义逻辑上具有连贯性(coherence),这些特点符合现在普遍认可的对于篇章的定义,即篇章并不是一连串句子的组合,而是一个语义上的统一体。任何一个语言段,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论是一句话还是一部著作,只要构成一个语义上的整体,便可称为篇章。因此,摘要英译应首先确定以篇章为翻译单位,在篇章的框架中分析、理解摘要中各句之间的关系,划分出核心句,然后再对句法和词法进行调整和润色。通过分析、转换和重建等一系列过程,使得摘要的英文译文符合英文摘要的篇章规范和习惯,突出英文读者所重视的语篇结构。

综上,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中英文摘要产生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国际间学术交流的不畅与障碍,但只要认识到这些差异,理清摘要英译的目的,把握好目标读者的特点,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就可以克服这些障碍,使得摘要英译文更好地发挥其国际学术交流与沟通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胡文仲,高一虹. 外语教学与文化[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10-223.
- [2] 江建名. 图书报刊编审校手册[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201-202.
- [3] 廖国强. 英汉互译理论、技巧与实践[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98-10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bstr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ext

SUN Hai -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of standards and contents of abstracts betwee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English journalism. Combining the related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skills and strategies and claims that the cultural contex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well as the purposes of English abstra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tential readers. Therefore, abstracts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eans of combining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domestication should be the core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foreignization is the supplement. Only in this way, bett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can be promoted and the purposes of English abstracts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journal article; abstract research; cultural context

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谭笑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基于宏观视野,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对比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的诸多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运行机制是应有之义。本文提出了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构建思路:政府主导,校企参与,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校企深度合作,促进产学研有机融合,为实践教学创造良好的公共平台;深化实践教学改革,促进实践教学内涵建设。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运行机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6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16-05

近年来,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类型改革的深入,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研究和探索也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促进了实践教学的开展,同时也发现了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方面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表现为实践教学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有效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践教学研究必须带着“问题意识”,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从认识论的层面,剖析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现存问题的根源所在,进而从方法论的层面,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使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和稳固性不断提升。本文基于以上目标、思路和方法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

一、构建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意义

(一)开展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2014年3月24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向应用技术型转型,向职业教育类型转变。2015

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以下简称“意见”),其核心内容就是: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突出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目标定位,教育主管部门、各高等学校、研究专家等各方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实践教学的各环节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功能如何定位,责、权、利如何划分,工作如何保障和评估呢?在现实工作中,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制度、方法、步骤等方面还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甚至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完善、不够科学合理、不够符合实际等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效果的质量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二)运行机制的构建之于实践教学的现实意义

运行机制“是引导和制约决策并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的根本准则及相应制度,是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总称”^[1]。自龚晨伟先生

收稿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2016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高校转型背景下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广西地方本科院校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2016JGA405)

作者简介:谭笑风(1972—),男,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管理。

1998年第一次提到“应用型本科教育”^[2]概念以来,学界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内涵、外延,包括核心要素实践教学、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学术理论和实践思路,如创新新学期设置、立足学生能力本位开展实践教学、建立驱动保障和评估机制等等,为国家加强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出台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按照“运行机制”的概念设定来讲,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就是将相关利益方、责任方、参与方(如学校、企业(行业)、政府、社会、学生行)各具体环节要素(如政策、教师、基地场所、教学体系、经费、评估监督等)进行统筹协调,合理安排,以达到加强驱动,保障合作,从而促进实践教学效益的最大化。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进行研究能够强化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合理性、科学性。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运行机制建设的国际性视野

本世纪初的金融危机重挫各国的虚拟经济,而以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为实体经济的德国、瑞士等国家则应对自如,其背后是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应用技术大学所提供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实体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开展应用技术和实践教学最先进、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德国为例,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建设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宏观引导,加强法律制度保障。在实践教学运行机制中,政府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而是起到了“守墓人”的作用,站在学校、学生、企业(行业)、社会之间,通盘考虑,宏观把握,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调动各方在开展实践教学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促进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提升。如1969年颁布、2006年修订作为最基本的职业教育法令的《职业教育法》,以及《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职业教育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范要求。二是企业积极参与,提供岗位师资支持。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大大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法律规定所有企业都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企业教育基金,用于接纳学生开展相应实习实训教学任务。而企业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既可以得到相应的培训经费补贴,又为积累了人才储备,同时又获得了廉价劳动力,节约了人力成本。三是校企深度合作,为企业设置教学内容。应用型本科

院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紧紧围绕行业、企业人才需要和岗位发展趋势,进行适当的调整,突出能力本位的教学理念。四是注重能力本位,加强人才培养。德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十分明确,那就是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因此,他们实践教学模式的价值取向就是突出能力本位,在教学安排上特别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都有相对于普通高等院校时间较长的实践学期,一般是2个学期,其中第8学期的实习要求结合毕业设计一起进行”^[3]。

中国台湾作为一个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十分重视应用型院校建设以及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构建。主要突出表现在加强实践教学动力机制,促进实践教学保障机制建立,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确保实践教学评价。四项运行机制环环相扣,保证了实践教学的有序、高效开展。

二、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现状分析

(一)思想意识不强,制度保障不力(以广西为例)

1. 思想意识方面。广西在应用型本科院校运行机制建设方面,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层面,到具体执行、参与层面,也即从政府,到高校、企业(行业)、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及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就拿实践教学的核心要素“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建设情况来看,广西共有本科院校19所,其中称为大学的共7所,而这7所本科学校中没有查到任何关于“双师双能型”教师的信息。从近年来新设置的地方本科院校所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22%左右。严格意义上讲,广西高校至少有19所院校可划归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评价方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对高职高专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分别要达到专任教师的70%和80%。这是教育部对高职高专院校的要求,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来说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通知》虽然没有对“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提出明确要求,但对各学科、专业实践教学所占学分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此要求,“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至少要占到专任教师的30%才能满足实践教学任务。但总体来看广西“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偏低。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是反映应用型本科院校校内实践教学设施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广西抽样调查4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生均教学仪器设备总值得知,生均不过8000元,而广西大学则达到生均33000元。这是地方院校和国家重点建设本科院校的差别。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满足不了学生实习实训的需要,众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徒有其名,缺乏校企深度合作,甚至根本就没有合作,协议一签就束之高阁,仅仅为了应付评估,为了招生需要。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管理者、参与者、实施者思想观念陈旧,对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的结果。

2. 制度保障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制度建设具有多维度、多渠道、多层次特点和共建、共生、共赢的实践特征。如政府起到引领、督导、激励保障作用,学校、企业(行业)起到具体运转、落实、反馈改进作用,学生起到参与、实践、提高作用。这几个方面,均存在着保障不够、执行不力、参与敷衍等方面的问题。

从政府层面来讲。广西近年来十分重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对加强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校政合作,提高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要求。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多次下文强调:要积极推动产业发展急需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要加快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力争6—7所高校建成国内知名、区内领先、区域或行业特色鲜明的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但是,在具体实施驱动方面,还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没有像德国对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所颁布的系列操作性很强的法律、法规。这也导致高校、企业(行业)、社会等各方在实践教学方面缺乏能动性和实际操作应。

从学校、企业(行业)来说。这两个方面是应用型高校开展实践教学的主力,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更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思考谋划,形成合力,在实践教学标准制定、“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课程设置、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按照规范来操作。然而,广西有关地方高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主力)在实践教学制度建设方面还差强人意。从广西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联盟的发起者某高校关于实践教学运行机制建设情况来看,该校没有专门的实践教学管理机构,只在教务处信息公布中显示有“实践教学”栏目,内容包括教育实习基地、教学研究基地、两课教育基地、劳动课程安排、毕业论文、实践实习等内容。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一是时间久远,多为2007年以前内容;二是关键要素如实践实习部分显示为空,没有任何内容;在

“质量监控”栏目中也没有相关实践教学方面的监控内容。

(二) 政府工作缺位,评估不够科学

1. 政府工作方面。在实践教学,高校、企业、学生所肩负的责任,只有由政府出面,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才具有相应的约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对各方所履行实践教学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可以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评估裁决,给予相应的处罚和表彰。现实工作中,由于政府工作的缺位,导致实践教学运行机制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导致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的刚性要求不足。目前来看,有关政府宏观要求得多,制定的具体可操作的规范制度少;传统、固化的抓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多,结合实践教学的实际情况,改革创新思维模式不够;有关管理者闭门造车的多,深入实际一线,根据学校、企业(行业)、学生实际需要和困难,学习先进经验做法的少。可以说,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在实践性教学运行机制构建方面严重缺位。

2. 评估保障方面。做好应用型本科院校运行机制建设的评价,是保障应用型本科高校运行机制建设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由于教育评估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具有导向、规范和改进的功能,已成为一种促进教育向更加完善方向发展的有效机制。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重视教育评估”^[4]。

目前,国内在实践教学执行成效的考核方面重视不够。首先,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等开展实践教学平台的过程评价监控机制没有得到建立。其次,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的主要指标“双师双能型”教师考核还没有明晰的数据指标,也没有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第三,实践教学质量监控考核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奖惩缺乏依据,相应而言奖惩也缺乏力度,“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评估宗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第四,校内校外在实践教学评价监控方面形成两张皮,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

(三) 高校缺乏抓手,企业活力不足

高校是实践教学教育培养对象的输出方,企业则是实践教学培养对象接纳方,两个方面只有携起手来,形成合力,才能切实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

从高校层面来看,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最迫切需要开展实践教学,最迫切盼望通过实践教学来带动人才培养水平,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主体。但是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往往缺乏抓手。一是高校内部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运行、管理机构,形成了谁

都管,谁又都不管的情况。从广西各高校机构设置情况来看,没有一所学校设置有实践教学(主要指校企合作)的专门管理机构,教务、实验管理中心、各二级学院等都具备这方面的职能,反都存在职责划分不清、交叉扯皮现象。二是对外联络职能偏弱。这方面的职能大多放在各学院,但各学院所联系合作企业存在着资质参差不齐,合约协议书缺乏统一规范的问题。合作过程中关于教学标准、实践内容、学生管理、结果考核等方面缺乏规范要求,实践结果不易把握,而且容易产生矛盾,无法长期持续开展。

从企业层面来讲,企业的趋利性是它的经济本质属性,社会公益服务职能则是它的第二属性,就这个属性而言,也往往参杂着经济诉求。因为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而导致企业在校企合作开展实践教学方面缺乏动力。当前我国尚缺为推进校企合作,深入开展实践教学而出台的系列关于对企业给予免税、奖励(物质、精神)等方面的规范性法律法规。

三、加强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构建的对策

(一)政府主导,校企参与,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

把实践教学的相关利益方(社会、政府、企业(行业)、高校、学生)看成一个互为控制、相互制约的动态系统,只有每个参与方具备了一定的要素条件,这个动态系统才能处于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建立“社会有需求、政府出政策、企业(行业)有动力、高校有要求、学生有出路”的法律法规保障,形成校、政、企“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实践教学才得以正常运行并富有成效。

德国和台湾地区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的运行机制经验以及我国专家、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在实践教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主导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府层面出台必要的组织与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就应该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听取学校和企业的意见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出台配套完备的法律法规,建设刚性、可操作性强、具有制约力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德国在实践教学方面“要求企业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教育培训基金,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并制定一套严格的资金申请与分配制度。接收学生实习的企业可获得相应的培训基金,尤其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获得的补助应更多”^[5]。另外,也可以通过对企业实施减免税额、宣传表彰等相关优惠措施,为企业自身发展

提供良好政策保障,也为企业积极参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外部环境。

(二)加强校企深度合作,促进产学研有机融合,为实践教学创建良好的公共平台

“应用型本科教育属于较高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其任务是培养实际生产与生活部门需要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6]。鉴于此,企业在实践教学方面就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用、创造作用。企业依据自己未来的人才需求,与学校一起建立实践教学大纲,明确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法、目标、定位,建立基于学生能力提升为基础的教学效果评估机制。企业管理、生产、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创造、发明等实际工作需求,应该基于学生实践,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可以锻炼、创造、提升自身实际工作能力的机会。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也要紧扣实践内容,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学生通过各种基于工作实际、能力培养的工作环节,在问题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在实践中分析,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研究创新意识。学校在实践教学环节的方案制定、学生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等方面也要做到与企业无缝对接,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的沟通协调机制。

(三)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实践教学内涵建设

这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更是方兴未艾。在这个历史起点上,谁能够打破常规,勇于探索,潜心实施,谁就会取得突破和收获。抓好落实,取得成效,必须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教学实施方面、内涵建设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创新,这是实践教学取得突破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加强机构改革。根据学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可以适当调、撤、并内设机构,将隶属于其他部门关于实践教学的职能统收统管,成立专门机构,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如广西师范大学建设有“创新创业教育中心”,许昌学院成立有“校地合作办公室”等。其中许昌学院校地合作办公室的职能是推动学校发展转型,主动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服务社会、区域及行业发展的主渠道,是学校实现特色鲜明应用型本科建设的窗口。二是加强学期改革,增强实践教学环节。借鉴德国实践教学的“二学期实习制”经验,将实践教学周期拉长,在大三结束与大四开学之前拿出3个月时间,作为认知实习学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检验,回过头来再进行理论的重新思考审视,针对问题,查找不足,“理论—实践—理论”学习循环递进,螺旋上升。实践教学

环节的构建是建立在学生能力提升基础之上的,因此应该突出学生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在论文设计、实验实习、技能竞赛、社会实践等方面放手让学生大胆尝试,以“没有对错,只有好与更好”的理念来看待学生的实践活动。当学生站在工作岗位上时,也要尽量减少验证性、演示性环节,增设应用性、设计性、综合性内容,让学生养成独立的自我纠偏纠错的行为习惯。

加强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内涵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关键,决定着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然而,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教授聘任条件单一,没有考虑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素质和要求的具体特点。二是出自于企业或者在企业实践过一年以上的教师偏少;三是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由企业参与学校内教学的兼职教师偏少。针对这种情况,从人力、教育管理层到应用型院校都必须重视,拿出科学、规范的管理、建设办法。一是人力、教育管理层协同调查研究,拿出关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师职称评价、聘任体系,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实践经历等相关内容。二是在高校合格评估中也要分清层次,比如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估中要注重对“双师双能型”师资、实践教学安排和实效的评估。三是院校和企业(行业)要共建“双师双能型”

师资队伍,制定互惠互利的合作共建机制。比如企业要鼓励有教学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到院校做兼职教师,院校要鼓励或要求教师到企业行业锻炼,有计划安排,形成常态机制。四是有计划组织安排教师到实践教学环节开展较早,有经验、有成效的国家和地区参观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形成国际化的实践教学办学视野。

参考文献:

- [1]李浩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4.
- [2]龚晨伟.应用型本科应重视创造性培养[J].江南论坛,1998(3):31.
- [3]薛文波.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实践教学及其借鉴意义[J].理论导刊,2010(6):91-93.
- [4]霍跃红.高职教育实践教学条件建设问题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4.
- [5]赛博·霍达,蔡瑜琢.芬兰人眼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6]陈裕先.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实践教学模式及其对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5):84-89.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Practice Teaching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under the Macro Environment

TAN Xiao-feng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acroscopic view, combined with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compar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advanced areas, and further studying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fou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reasonable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practice teaching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a perfect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promotion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roduct and study, and creation of a good public platform for practice teaching;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connotation.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practice teaching; operational mechanism

从“瓜达尔”港口的开发看 “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和实施

——正确引导大学生了解国家新政教学案例

马金杰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320)

摘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部分,增加了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瓜达尔港口的开发为例,展示“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和实施情况,旨在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

关键词:瓜达尔港口;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21-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中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部分,增加了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以瓜达尔港口的开发为案例进行讲解,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和瓜达尔港口

(一)“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倡议就是我们所言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政府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并积极推进这一战略。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各地方的开放态势,中国政府的积极行动,未来的发展前景。2015年7月21日,“一带一路”建

设推进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将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作为今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推进方向;要聚焦重点国家,推进长期友好合作,共同打造互信、融合、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1]

(二)瓜达尔港口

瓜达尔港口是一个深水不冻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瓜达尔市,南临阿拉伯海,距霍尔木兹海峡出海口约400千米。地处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相衔接位置的瓜达尔港口,既可以为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内陆地区提供出海通道,又是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及印度洋巷道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海洋起点的瓜达尔港口是中国迄今为止援外工程中最大的项目。在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中方五年的建设,瓜达尔港口已经开始全面运营,从而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首个落地成果。尤其是2015年11月13日瓜达尔港口2281亩土地使用权正式移交给中国,租期43年,中国与美国、新加坡等各方力量围绕霍尔木

收稿日期:2017-01-08

作者简介:马金杰(1973—),男,湖北潜江人,哲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兹出海口的争夺以中国获胜落下了帷幕。^[2]

二、瓜达尔港口的开发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

从以上对“一带一路”的介绍,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是指南北两条重要的商贸线路。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的线路图:“带”是指以我国新疆为核心的西北五省经中亚、南亚、西亚至波斯湾和欧洲;“路”是指以我国福建为核心的东南、西南边陲省份沿东南亚、波斯湾经红海至地中海,实现亚欧经贸一体化。^[3]随后,国家为了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确定了六大经济走廊,而“中巴经济走廊”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最早推进,也最见成效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起于我国新疆喀什,终于瓜达尔港口,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贯穿南北丝绸之路的一条经济走廊。^[4]早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2013年7月中巴就签订了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备忘录,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巴基斯坦,中巴两国签署了总投资达460亿美元的协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最大笔投资,“中巴经济走廊”可以说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龙头。

瓜达尔港口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瓜达尔港口的全面运营,以及43年使用权的获得,将极大地推动中巴两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瓜达尔港口项目的落地,随后的从瓜达尔港口向我国新疆的公路、铁路、输油管道的建设才成为可能。瓜达尔港口的开发成为“中巴经济走廊”贯通的重要支点,同时也成为打通“一带一路”南北两条商道的关键所在,无论如何高估瓜达尔港口的“支点”意义都不为过。

(二)突破“马六甲”困局,提供能源和贸易新保障

如今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我国进口石油中的80%来自中东和北非。众所周知,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我国传统的海上输油路线必须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长达12000多千米,马六甲海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海上生命线。^[5]在和平状态下,日趋饱和的海峡运载能力是影响中国能源运输安全最重要的因素,海盗和恐怖活动也是影响海峡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在非和平状态下,美国和马六

甲海峡两岸国家有能力且有可能利用海峡对我国形成制约。马六甲海峡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困局,不仅关乎我国能源、贸易安全,而且关系到政治和军事安全。

瓜达尔港口的开发为突破“马六甲”困局提供了可能。我国可以通过修建从瓜达尔开始的公路、铁路和石油管道,直接将石油和货物从中东、北非运输到我国的新疆,开辟一条全新的能源和贸易通道。一方面,这条通道将输油路线的运输里程从传统的12000公里缩短为2000多千米,大大减少了我国海上石油运输道路的各项成本,成为一条更经济的能源和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基于友好的中巴关系之上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形成,将摆脱美国、印度和马六甲海峡两岸国家借海上通道对我国的遏制,为突破海上封锁打开一条新的能源和贸易生命线,从而确保我国能源和贸易的安全。

(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突破经济发展困局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以积极“引进来”的方式深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则标志着以中国“走出去”为鲜明特色的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瓜达尔港口的开发和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样本。作为“一带一路”首个战略港口,瓜达尔港口是中国援外工程中规模最大的项目,中国公司不仅是瓜达尔港口的建设者,在获得43年租使用权后,中国拥有了独立建设、开发、运营的权力,中国对瓜达尔港口的开发形成了从建设到运营的一条龙投资模式。随着瓜达尔港口的全面运营,瓜达尔港口的辐射作用将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例如,以瓜达尔为中心的公路、铁路、输油管道的建设,以及以油气建设为重点,辅以新能源开发建设瓜达尔能源基地等。总之,瓜达尔港口的建设和开发,突破了以往我国对外开放的模式,向资金、产品、产能、技术等多元输出模式迈进,呈现出巨大的输出能力。

开发瓜达尔港口带来的巨大输出能力将成为破解我国经济发展困局的突破口。首先,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市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欧美经济的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美国家对我国商品采取的“两反一保”等措施,极大地挤压了我国的出口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以瓜达尔港口开发为旗舰的“中巴经济走廊”的铺开,有助于密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从而为中国商品的出口拓展了市场空间。例如,目前我国钢铁、水泥等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中巴经济走廊”的铺开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国

家在基础建设领域又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现象,“一带一路”的建设无疑可以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供需对接。其次,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空间支持。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转型,这种腾笼换鸟的过程需要空间上的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我国转移低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突破美国东部封锁,巩固西北边防,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安全

首先,瓜达尔港口的开发突破了西方对我国的经济遏制,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崛起,国际经济地位提升,中国的崛起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我国的经济遏制。2009年11月,美国高调加入并很快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于2015年10月促成协定的签署。这一经济领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构筑起一个排斥中国加入的经济合作俱乐部,乃至给中国制造“二次入世”的障碍,由此达到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针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奥巴马甚至公开叫嚣不能由中国制定规则。在这种形势下,以瓜达尔港口开发运营为龙头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全面铺开,无疑是消解美国从东面封锁的最好突破。

其次,缓解了“太平洋岛链”带来的战略压力,在政治和军事上增强了国家安全。冷战时期,美国在西太平洋上通过一系列的共同防御条约、安全保障条约构建的从日本海经台湾海峡至马六甲海峡的第一道包围圈,以及从阿留申群岛经马里亚纳群岛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西太平洋的第二道包围圈仍然发挥着作用。“太平洋岛链”的存在,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国防安全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使我国的战略纵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同时对我国解决黄海、东海、南海的领土争端也形成了干扰因素。瓜达尔港口的开发从西部为我国谋求出海口,对于我国东部沿海而言是一种战略上的减压。尽管瓜达尔港口现在只是一个商业合作项目,但是其军事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牵制了美国又遏制了印度,一举两得。一方面,使得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要加强对于该地区的关注度,从而减轻了东部岛链的压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印度大力发展海军力量,而且大有插足南海事务的企图,瓜达尔港口的存在使得印度不得不注意自己左翼的安全,从而遏制其向东的力量。

其三,有助于我国的西北“治边”。由于历史原

因,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经济发达程度和开放程度呈递减的态势。这样的分布,使得我国的政治经济缺乏战略纵深,国家安全呈现出脆弱性: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安全问题突出,近些年层出不穷的暴力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在西北制造的事端就是例证;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东部的格局,也增加了东部沿海受美日政策影响的压力。^[6]而瓜达尔港口的开发将使这一状况得到极大的改观。首先,瓜达尔港口的开发,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铺开,将使得我国西北地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支援和被扶贫的对象,而一跃成为开放的前沿地区,这必将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将我国的西北与西亚、中亚紧密关联为政治经济安全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有利于在打击这一地区极端分子的过程中形成合力,进而提升打击力度,为我国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边防。其次,西部地区地位的提升和突破,有助于我国兼顾海陆,实现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平衡。

三、瓜达尔港口开发的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瓜达尔港口的开发前景无疑是美好的,但是客观上也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制约着瓜达尔港口的开发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展开。

首先,我们知道,起于瓜达尔,终于我国新疆的这个区域要翻越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无论是修建公路、铁路、还是输油管道,施工难度都是巨大的。完成于1979年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的运输能力已经严重制约了目前物流运输的需要,虽然改扩建工程早已经启动,但是实际改建效果还不理想,未来其他运输方式的建设都将会面临这样的难题。

其次,运输的经济效益也会制约瓜达尔港口开发的意义。毕竟从瓜达尔港口经过陆路到达我国新疆,如上所言要翻越高原,无论采取何种运输方式都会产生不小的成本,相比于从海陆经东部沿海上岸的经济价值值得进一步评价。

其三,安全问题是制约瓜达尔港口开发的最大挑战。瓜达尔处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恐怖活动频发,中国承建瓜达尔港口时就有三名工程师被害,与瓜达尔港口相邻的阿富汗动荡局势也会波及瓜达尔地区。尤其是从国际政治看,美国、印度、沙特等均在巴基斯坦有利益诉求,美国和印度还在临近区域寻求战略支点以制衡中国。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三国交界处是中亚通往南亚的必经之路,恐怖势力、分离势力在这个区域活动频繁,也威胁到“中巴经济走廊”的铺开。

在海权时代,中国最大的软肋是不拥有大洋。尽管我国有 1.8 万千米的海岸线,但本质上我国仍然是一个内陆国家,拥有的只是几湾浅浅的海峡。东面的太平洋军事价值居多,而南面的印度洋则直接扼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大动脉,因为在印度洋没有出海口,我国只能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到印度洋。而瓜达尔港口的开发破解了这一难题,瓜达尔港口成为中国打入印度洋的一枚楔子,将掀开“一带一路”宏大布局,进而为中国真正的崛起插上翅膀。有人将瓜达尔突围与中国红军在遵义会议前的突围相媲美,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一次漂亮突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转折。

四、结语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宣传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任务。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了解国家新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案例进行教学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分析瓜达尔港口开发的意义,可以让学生快速、全面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容和实施情况,领略到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宏大布局,这是新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7]教材补充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一案例对于经济新常态以及我国的外交

战略等相关知识点,都具有很好的解读价值。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突出重点 扎实工作 确保实现“一带一路”建设良好开局[EB/OL]. (2016-12-29)[2015-07-21].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7/21/content_2900246.htm.
- [2] 闽南网. 瓜达尔港 2281 亩土地使用权 11 月 13 日正式移交给中国[EB/OL]. (2016-12-31)[2015-11-17]. <http://zz.mnw.cn/zh/jj/1033868.htm>.
- [3] 新华网.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 (2016-03-20).[2015-06-08].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6/08/c_127890670.htm.
- [4] 360 百科. 中巴经济走廊[EB/OL]. (2016-12-26). <http://baike.so.com/doc/7090590-7313503.html>.
- [5] 杨航. 试析瓜达尔港开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J]. 发展研究,2015(9):20.
- [6]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0):49.
- [7] 编写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 修订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from the Opening up of Gwadar Port

MA Jin-ji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t thought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re added into the course of an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displays the desig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by taking the opening up of Gwadar port for an example in order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better and carry out Xi Jinping’s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 spirits into the textbooks, classrooms and mind.

Key words: Gwadar port;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ne Belt and One Road

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缺失与对策

李吴磊

(河南工程学院 体育教学部, 郑州 451191)

摘要:人本主义教育观倡导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的潜能,强调学生的自我表现性和创造性,不仅关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情感,特别适合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中应用。本文阐述了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内涵,针对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缺失,从多个方面提出了高等院校体育课程贯彻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相关对策,包括改革传统体育教学方法、创新高等院校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建立多元化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28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1-0125-04

体育课程是高等院校教学中的基础性课程之一,主要通过让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育运动技能和体育运动知识来增强自身体质,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1]传统的高等院校体育教学模式虽然较好地促进了学生基本运动技能的提高和基础运动知识的掌握,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还是一直延续着教师主导课堂教学的模式,严重缺失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已经很难符合当前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改革的需要。^[2]人本主义教育观倡导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能,对学生的自我表现性和创造性都极为强调,不仅关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情感,^[3]特别适合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中应用。本文就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缺失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内涵

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在美国 Carl Ransom Rogers 教授和 Abraham H. Maslow 教授创立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则是兼容了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教育理念,彰显出平等性、包容性、全面性和引导性等特点。^[4]基于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强调人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深入发掘人性潜能,将人的潜在价值予以充分发挥。主要包括三点内容:第一,认为人应该具有自由性,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由;第二,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三,认为人的主体作用和主体地位是值得尊重的,通过对人格尊严的尊重达到弘扬人的主体性的效果。^[5]简而言之,“以人为本”就是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内涵。

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学的归宿点,还是教学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因此,高等院校体育教师不仅要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予以足够的尊重,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积极挖掘、引导学生“体”的能力,以此达到高等院校体育课程的要求,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体育能力,进而培养学生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养成终身

收稿日期:2017-01-03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运动处方对大学生不同身体素质人群运动不足性疾病剂量效关系研究”(162400410281)

作者简介:李吴磊(1983—),男,山东莘县人,硕士,河南工程学院体育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

体育的意识。

二、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缺失

1. 教学方法缺乏人本主义教育理念

很多高等院校体育课程在选择教学方法时,通常都是采取“教师讲解技术动作—教师示范—学生练习”的传统教学模式,主要目的在于对全体学生予以兼顾,最大限度地向全体学生传授体育运动技能。但是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效地对广大学生进行启发式引导,且教师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只是被动地学习、模仿操作,既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情感沟通能力、主体参与能力,又会压抑学生创造力、智力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主动发展,不符合人本主义教育理念“以人为本”的内涵。^[6]

2. 教学内容缺乏人本主义教育理念

随着“三自主”选课制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上的广泛应用,学生往往会本着避难就易的想法去选择娱乐性较强、身体负荷量小的运动项目,少有选择体操、田径等运动强度较大的体育运动能力类项目,但是体操、田径等恰恰是最直接、最有效地增进大学生身体协调性及体能的训练方式。这样一来,大学生的体质健康很难有效提升,也缺乏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包容性。与此同时,很多体育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上缺乏新意,与中小学体育教学无本质区别,更别提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了。大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不利于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3. 体育课程评价缺乏人本主义教育理念

目前,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体育课程在评价学生的表现时仍然过分强调考试成绩,缺乏评价学生进步程度、学习态度的体系,考试方式、考核主体单一,没有形成多元化的主体参与评价模式,教师往往较为关注考试成绩较佳的学生,而不是学习态度较佳、进步较大的学生。长此以往,很多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会受到磨灭,这与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背道而驰。究其原因,还是应试教育观念在作祟,甚至还有部分学生认为上体育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不挂科即可,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养成终身体育意识,是否能够切实改善体质健康状况都是无足轻重的。^[7]

4. 忽视学生的个体需要

很多高等院校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分看重体育教学,忽视学生的个体需要,漠视学生的个性、

经验、兴趣、动机和需要等差异,很难引导、激发学生自身潜能的实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体育教师严重缺少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开发学生潜能、激发学生情感、拓展学生认知的教育措施与教育手段。

三、高等院校体育课程贯彻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相关对策

1. 改革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

(1)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

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以学生为本,以培养广大学生良好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为宗旨。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一的教学者,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而且要让广大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体育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结合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教学原则,使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掌握好基本的运动技能和基础运动知识,更有利于学生去探索、创新,培养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学习中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坚持由广大的学生来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从过去的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进而主动地去提高自我能力、主动地去获取知识、主动地去学习。^[8]

(2) 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大学生虽然年长于中小学生,但是思想仍然不太成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成熟、完善的阶段,他们自尊心很强,往往会对自己的骄傲予以小心翼翼的维护。毫不夸张地说,有时教师的无意之言,或许就会激发他们学习的信心,或许就会让他们放弃某种爱好,或许就会让他们性格得以改变。因此,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要适时激励,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即便是学生由于粗心大意出现偏差,教师也不可大加斥责,而应该予以耐心引导,让他们以愉快的心情来对待错误并进行改正,保持蓬勃向上的良好心态。

2. 创新高等院校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

(1) 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兴趣爱好

基于人本主义教育理念,高等院校体育教师应该结合广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社会需要、个人未来发展等因素,合理设计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并且要将人本主义的理念、思想等融入其中,教学内容的可接受性要强,既不可太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首先,高等院校体育教学内容要注重日常健身方法、体育健康知识的传授,多为学生开设一些学习项目,让他

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选择。其次,高等院校应该逐步形成专业水平与初级水平相结合、选修教学内容与必修教学内容相结合的体育课程教学结构,既要让学生能够对所选择的学习内容感兴趣并愿意学,又要让学生能够学会增进身体协调性及体能的训练方式,在体现个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共性。

(2) 开展小组互助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

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活动中,合理开展小组互助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既有利于提升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团队合作能力。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强调教学过程中要采取多种教学形式,丰富教学内容,以便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求知欲望,而小组互助合作学习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基于不同学生在学习能力、性格、体能等方面的差异,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多个学习小组,每组学生的数量控制在8~10人,以小组集中学习的形式来共同提高、扬长避短,让学生主动提高运动技能,掌握运动技术,学习运动知识。教师则是边操作边讲解,与学生充分互动。教师在教学中只是知识的引导者和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在讲授完毕相关知识点之后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来动手操作;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导者,具有充分的学习自主权,学生既可以基于个人思考、个人理解来操作,又可以基于教师的讲解来操作,还可以与小组同学合作操作,学习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处于平等的状态。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还要努力去发现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范围较广,既有可能是知识上的问题,又有可能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资源上的问题,学生应该将这些问题逐一罗列出来,逐项解决。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深入到学生当中,对他们罗列出来的问题予以检查,若问题不全面、针对性不强,教师也不可大加斥责,而应该用鼓励的言语让学生多去思考、深入思考、全面思考。学生在发现问题之后,就可进入到自主探究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能够应用已学知识来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在学生能力范围之内的问题,学生要独立解决,超出学生能力范围的问题则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他们自主探究、处理解决,既可通过互联网搜集资料,又可与教师、小组成员探讨解决对策。在自主探究阶段,教师辅助学生自主探索,适当的时候给学生相应的指导,但不可全盘讲解,要注意让学生独立去探究。另外,要为学生自主探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条件,确保学

生能够顺利、及时地完成创造项目。

3. 建立多元化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

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客观、公正、多方位的评价。每个学生都有其个体差异,若完全采用统一的考试方式来衡量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那是非常不科学的。建立多元化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主要是指不能仅仅只评价学生是否达到一定的体育测试标准,更要深入评价学生各种软性衡量指标的达标情况。例如,学生掌握体育人文知识、体育学习方法的程度,是否自觉养成每日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等,这些指标往往比只用硬性标准评价效果更佳。此外,体育课程评价体系的主体不能仅仅只有教师,而应该更多地让学生参与进来,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能够对自己的能力和他人的能力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以便于体育教师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基于此,高等院校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应该由教师、学生共同组成,考核分为三大类: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既要强调评价学习过程,又要强调最终考试成绩,真正形成他人评价与自我评价、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良好结合。过程评价包括学习体会评价、体育意识评价、体育能力评价、调查表评价、活动记录表评价等,结果评价则强调学生体育运动技能评价、体育运动知识评价等。

4. 关注学生的个体需要

Abraham H. Maslow 教授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认为人的需要是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并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长需要与缺失需要两大类。缺失需求还可细分为七个层次,包括自我实现需要、审美需要、尊重需要、生理需要、认识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和安全需要。Abraham H. Maslow 教授认为高层次需求的基础是低层次需求,缺失需要会直接导致出现匮乏性动机,待缺失需要得以满足之后,就会降低兴奋程度,消除紧张感,匮乏性动机就会自然而然得以消失。而生长需要会导致出现成长性动机,具体表现为对实现自我潜能的需要与发自内心层次的追求,这种生长需要在被满足之后,就会较好地体现出人的价值与本质,让人瞬间达到“顶峰体验”的心理幸福感。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对于端正体育教师的教育观具有较大的益处,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中,体育教师既要对学生的缺失需求予以关注,又要对学生的生长需求予以满足。为了较好地满足学生的

缺失需求,广大教师应该精心配置体育教学资源,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组织多样化的体育竞赛与体育游戏,创设多种情境等,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进而满足他们的生长需求。基于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来看,每个学生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体育教师要充分意识到学生有自我实现、积极上进的生长需求愿望,要促进、激发学生的这种内在需求,最终达到促成学生自我实现的目的。正如马斯洛指出的:“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丰满人性的形成,是人种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发展。说得浅显一些,就是帮助人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

四、结语

人本主义教育观倡导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的潜能,强调学生的自我表现性和创造性,不仅关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情感。人本主义教育理念能够较好地克服传统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中的诸多弊端,对于增进广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等有积极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高等院校体育课

程的教学改革,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1] 黄四元,谢小平,黄顺久.对地方院校体育教学改革中贯彻终身体育理念的思考[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14,35(4):143-145.
- [2] 张新华,孙岩.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5):209-213.
- [3] 焦建军.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J].四川体育科学,2004,34(1):201-204.
- [4] 陈振宇.浅谈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J].科技信息,2012,34(13):34-37.
- [5] 张虹.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4,26(5):109-114.
- [6] 赵剑.关于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3(3):190-193.
- [7] 卢俊.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探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5(3):209-213.
- [8] 朱志翔,张卫,周晶.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5(3):190-193.

(责任编辑 姚虹)

The Lack of Humanistic Educational Idea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er Institut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I Wu-l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istic view of education advocates maximizing students' potential, emphasizing students' self-expression and creativity. It not only concerns students' mastery of knowledg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but also emphasizes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emotion.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ism education idea. Concerning the lack of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al idea of PE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of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 idea in PE curriculu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any aspects, including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so on.

Key words: higher institute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umanistic educational idea